万卷方法 | 质性研究方法译丛
主编 陈向明

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与生活文化

WENHUA YANJIU
MINZUZHI FANGFA YU SHENGHUO WENHUA

安·格雷 著
许梦云 译
高丙中 校

重庆大学出版社

总序

在参与和对话中理解和解释

质性研究可以被认为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主要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陈向明，2000）*。它具有探索社会现象、对意义进行阐释，以及发掘总体和深层社会文化结构的作用。质性研究是一个跨学科、超学科的领域，被运用到与“精神科学”有关的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心理学、护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它不是来自一种哲学、一个社会理论或一种研究传统，受到很多不同的社会思潮、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近年来，质性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梳理和探讨，但迄今为止很多问题仍在探索和争议之中。

质性研究的历史发展轨迹

质性研究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古希腊，“ethnography（民族志）”一词中的词根“ethno”就来自希腊文中的“ethnos”，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ethno”作为前缀与“graphic（画）”合并组成“ethnography”以后，便成了人类学一个主要的分支，即“描绘人类学”。“民族志”是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地、动态地、情境化描绘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一个文化的整

---

* “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在港台也被译为“质的研究”、“质化研究”）在中国人类学界通常被称为“文化人类学方法”，在社会学界通常被称为“定性研究”，但也有学者认为它是定性研究的一类，另外一类是“思辩研究”（王洪才，个人交流，2007）。

体性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它要求研究者长期地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获得对当地人及其文化的理解。

质性研究在西方

早期民族志研究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对世界上其他地区残存“原始”文化的兴趣,认为“落后的”民族是人类进化链中的一个环节,希望通过对异文化的了解反观自己的文化发展历程,了解整个世界的“本相”,以此修正西方学界有关人类社会的知识框架。实地调查方法的开创者是德裔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 Boas),从1886年始他便经常到美国西北海岸的印地安部落去做实地调查,并把自己的学生赶出图书馆,从学者的安乐椅中站起来,走入实地。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真正开创了长时期实地调查传统的当推波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洛夫斯基(B. Malinowski),他于1914—1915年和1917—1918年间在新几内亚和特罗比恩(Trobriand)岛上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实地工作。通过亲身经历“在这里”、“到过那里”和“回到这里”的三阶段过程,他发现,白人研究者只有离开自己的文化群体,参与到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才能对他们的制度风俗、行为规范以及思维方式有所了解。

博厄斯和马林洛夫斯基的实地调查方法极大地影响了后来西方的人类学家,如本尼狄克特(R. Benedict)、M. 米德(M. Mead)、莱德可里夫·布朗(Redcliff-Brown)、贝特森(G. Bateson)、罗威(R. Lowie)、克罗伯(A. Kroeber)、普利查德(Evans-Pritchard)、弗斯(R. Firth)、保德玫克(H. Powdermaker)、列维·斯特劳斯(C. Levi-Strauss)等人。他们各自在非洲、太平洋岛国、美国本土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了长期的实地研究,为实地调查方法的实施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质性研究中实地调查的传统还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社会改革运动。如美国的杜·波依斯(Du Bois)对费城的黑人社区进行研究时,除了进行大规模的统计调查,还组织了5 000例访谈,其著作《费城的黑人》(1899/1967)被认为是早期城市民族志研究的一个典范。德国的恩格斯(F. Engels)长期深入到工厂和工人居住区,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45/1969)被视为实地研究的佳作。布思(C. Booth)的《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1927)通过统计数据、访谈和观察等方法,将伦敦划分为50个区,按照不同的标准(如贫穷率、出生率、死亡率、早婚率等)将这些区域进行了排序比较。芝加

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R. Park)等人对城市内不同少数民族群体、亚文化群体(特别是贫困人群)进行了研究,在其著名的“城市”(1916)一文中明确地把人类学方法作为研究城市的社会学方法。托马斯(W. Thomas)和兹南尼斯基(F. Znaniecki)的《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1927)则通过大量个人信件,对当事人的主观心态进行探究。林德(Lynd)夫妇将美国中部城镇居民的生活分成六个方面(谋职、成家、生儿育女、闲暇、宗教、社会活动),对居民的道德观念和精神状况进行了考察,发表了《中镇——美国现代文化研究》(1929/1956)和《过渡中的中镇——文化冲突研究》(1937)。此时的研究者对自己个人的作用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重点主要放在如何从资料中挖掘当事人的观点和态度,认为那里存在着“客观的现实”。即使研究的内容涉及被研究者的主观世界,这个主观世界也被认为是“客观存在”。

从1930年到1960年之间的30年间,随着殖民主义的衰落以及非洲和亚洲民族国家的兴起,人类学开始受到独立国家人民的排斥,人类学家也逐渐具有了自我反省的意识,意识到自己所持有的文化进化观过于褊狭,而且自己要保持“客观中立”也是不可能的。他们逐渐将注意力放到对历史文献、语言学以及自己国家本土文化的研究上面。在这里人类学与社会学开始了学科上的合流,两者均在民族志方法上找到了共同点,即长期地与被研究的城市居民群体一起生活,了解他们的真切关怀和日常困扰。此时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反思和分享自己的主观性,将自己的“前见”公布于众,探讨自己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如美国社会学家怀特(W. Whyte)在其《街角社会》(1943)中便直接与多克等知情人士互动,参与到对方的各种活动之中。

1960年代以后,质性研究受到现象学和阐释学的进一步影响,研究者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与被研究者之间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研究者的自我意识不仅可以包容被研究的对象世界,而且可以创造一个社会世界。研究不仅仅是一种意义的表现,而且是一种意义的创造。研究不再只是对一个固定不变的“客观事实”的了解,而是一个研究双方彼此互动、相互构成、共同理解的过程。这种理解不仅仅涉及研究者在认知层面上“了解”对方,而且需要研究者通过自己亲身体验去“理解”对方,并通过“语言”这一具有人类共同性的中介,将研究结果“解释”出来。只有当研究者进入对方所关切的问题域时,“意义”才可能向研究者展现。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地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进一步上涨,世界

政治和文化格局在逐渐地“去中心”、“边缘与中心互换”。在“文化多元”的旗帜鼓舞下,质性研究也被卷入了多种相互不可通约,甚至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和理论范式的论战之中。在后现代的今天,质性研究者意识到,研究永远不可能“客观”、“中立”,“研究”其实就是在“写文化”。此时的质性研究已经从以往对自我和他人关系的反思转到了对语言、政治、历史以及社会科学家作为一种职业的反省,不仅对不同文化的人观、自我和情感的界定和经验进行探究,了解传统小型地方性社区与世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而且将社会科学研究本身作为一种文化批评。在方法上,研究者不再像前人那样讲究研究的“客观性”、“真实性”和确定性,而是采取一种“视情况而定”的态度,在关系中对“效度”、“信度”、“推广度”等问题进行考量。

质性研究在中国

在我国,质性研究的最早萌芽在20世纪初的社会调查,起初由一批外籍传教士、学者和教授发起。如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 H. Smith)于1878—1905年对山东的农民进行了广泛调查,出版了《中国农村生活》(1989);1917年美籍教授狄特莫(C. G. Ditlmer)指导清华学生对北京西郊居民的生活进行了调查;美籍教授古尔普率领学生到广东潮州凤凰村进行调查,并著有《华南乡村生活》(1925);美籍传教士甘博(S. D. Gamble)和燕京大学教授步济时(J. B. Burgess)发表的《北京——一个时代的调查》(1921)。这些调查主要使用西方的调查方法,用外文撰写报告,并在国外发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学术界社会调查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成立了两个社会调查机构:位于北京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位于南京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有:李景汉的《北京郊外乡村家庭》(1929)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严景耀深入监狱,通过参与式观察对犯罪问题所做的调查(1927—1930);陈翰笙领导的对无锡、广东和保定三地区的大规模农村社会经济调查(1929—1930);王同惠和费孝通的“花篮瑶社会组织的调查”(1934)。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比较著名的研究成果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9)、史国衡的《昆厂劳工》(1943)、费孝通和张之毅的《乡土中国》(1946)、陈达的《上海工人》等。作为革命领导人的毛泽东也是社会调查的身体力行者,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湖南农村运动考察报告》(1927)、《寻

乌调查》(1930)、《长冈乡调查》(1930)等都使用了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方法。共产党人20世纪40年代在陕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社会调查研究,写出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和《米脂县扬家沟调查》等大批调查报告。

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社会调查工作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仍有少数学者到实地进行追踪调查,如费孝通于1957年和1980年重访自己1935年调查过的"江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受到更多重视,组织更加健全,方法也更加规范。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质性研究方法被系统介绍和讨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学生在使用质性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如项飚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2000)、李书磊的《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1999)、陶庆的《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走出转型期社会重建的合法化危机》(2007)等。一些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者纷纷使用质性方法回到中国本土进行实地研究,如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1997)、吴飞的《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中的信仰和生活》(2001)。有的学者则用英文写作,然后用中文翻译进入国内出版界,如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里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2000)和《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1949—1999》(2006)。也有海外学者到中国做田野调查,如丹麦的曹诗弟(S. Thoegersen)的《文化县:从山东邹平的乡村学校看二十世纪的中国》(2005)。20世纪末以来,很多港澳台学者也发表了不少使用质性研究方法获得的研究成果。

此外,不少中国学者从方法论和方法的具体操作上对质性研究进行了探讨。如早在1934年,林惠祥的《文化人类学》就对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定义、对象、分科、发展和流派等进行了系统、通俗的介绍。此后,有朱红文的《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导论》(1994)、黄淑娉和龚佩华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1996)、水延凯的《社会调查教程(修订本)》(1996)、李德洙主编的《都市人类学与边疆城市理论研究》(1996)、夏建中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1997)、袁方主编的《社会研究方法教程》、钟敬文的《民俗学概论》(1998)、陈向明的《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2000)以及她与朱晓阳和赵旭东主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评论》

(2006)、杨念群的《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2001)、台湾学者胡幼慧主编的《质性研究》(1996)等。在历史学领域,我国学者在对质性资料的鉴别、考据和分析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可被认为是质性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知识来源。

目前,质性研究方法在大部分高等院校里已成为社会科学的必修课程。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质性研究大都与量化研究一起讲授,学生的实地操作机会比较少。20 世纪 90 年代后,很多大学(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和社会学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等)开始独立开设质性研究课程,并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独立完成一项小型的实地调查。一些大学的研究生还自发编撰论文集,将学做质性研究的艰辛、喜悦和顿悟记录下来,如杨钋和林小英主编的《聆听与倾诉——质性研究方法应用论文集》(2001)。近年来,在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方法高级研讨班上,我国社会科学界也对质性研究方法的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和实际操作训练。

质性研究的理论取向

由于质性研究发源于很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和学科传统,目前在理论取向上,质性研究仍处于三种不同传统的张力之中。一方面,它注重对研究现象做后实证的、经验主义的考察和分析,强调的是自然主义的传统,注重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探究。另一方面,它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性理解",强调的是阐释主义的传统,关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和"视域融合"。而与此同时,它又意识到任何研究都受到一定政治、文化、性别和社会阶层的影响,注意研究中的权力关系,注重研究对知识建构和社会改革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又同时具有一种后现代的批判意识。

因此,在质性研究内部,研究者通常也有不同的学术立场和理论倾向。研究者如果关注对现象进行描述,通常会采取后实证主义的取向,通过一些可操作的程序和手段(如证伪、相关验证)对研究的过程和结果进行检验。如果研究者更加关注的是社会改进,则会采取批判理论的取向,考虑到研究的价值和权力层面,希望通过研究对社会现实进行干预。而如果研究者认为社会世界中不存在"客观真实",社会习俗和规则都是人为的建构,则会采取建构主义的立场,看到人和社

会的相互性和交往性，注意到研究者在理解和解释中的能动作用，使研究成为一种生成的过程。

虽然研究者可以采取不同的理论取向，但这些取向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同时，也各有其弱点。后实证主义假设人们的行为有其内在联系，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动机和意义十分清楚，如果采取严谨的方法，可以（虽然是局部地）了解和理解当事人的行为和意义解释。这种对当事人观点绝对尊重的态度不仅反映了研究者天真幼稚的“现实主义”立场，隐藏了研究者在理解中不可避免的“主观性”，而且很容易导致相对主义，使研究者群体失去衡量研究质量的标准。

批判理论为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批判的向度，但是如果使用不当有可能表现出一种“精英意识”，把自己认为重要的观点强加给被研究者。此外，批评理论自身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矛盾：即本体论上的“客观主义”和认识论上的“主观主义”。如果我们一方面承认“真实”是客观存在，而另一方面又认为它只能被历史地认识的话，那么我们这些存在于历史之中的人们又怎么可能“真实地”认识“客观真实”呢？这涉及一个无法解决的“自相关”问题，即批判理论自身如何知道自己的理论不也是带有偏见的、需要被批判的？

建构主义在理论上十分迷人，为研究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和创造可能性，但是在实践层面却很难付诸实施。在建构主义者的眼中，一切都在流动之中，只有此时此刻才是“真实”的。这种理论很难提出一套可供后人遵循的方法原则，而且无法设立明确的衡量研究质量的标准——这也许是伽达默尔认为阐释学不是“方法”甚至不是“方法论”，而是“哲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质性研究的基本类型

为了更好地理解质性研究，需要对其进行恰当的概念化和归类处理。特别是在大学教授质性研究方法这门课程时，学生对此有强烈的需求。然而，不幸的是，目前质性研究的分类标准繁多，令人无所适从。有的按研究问题类型分类，如意义类问题、描述性问题、过程性问题、有关口语互动和对话的问题、行为的问题；然后据此将研究策略分成六种类型：现象学、民族志、扎根理论、常人方法学/言语分析法、参与性观察、质的生态学。有的按研究者的兴趣分类，如探讨语言特点、

发现规律、理解文本和行动的意义、反思。有的按研究者的立场分类,如批判民族志、后现代主义民族志、女权主义民族志、历史民族志。有的按“传统”分类,如生态心理学、整体民族志、交流民族志、认知人类学、象征互动主义。有的按“类型”分类,如象征互动主义、人类学的方法、社会语言学的方法、常人方法学、民主评估、新马克思主义民族志、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另有按“取径(approach)”分类,如历史研究、民族志研究、个案研究、现象学研究、传记研究、扎根理论研究、行动研究。还有学者认为,质性研究是一个多元、综合、丰富多彩的领域,不能进行分类。

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我认为,研究者应该采取一种更加辩证和务实的态度。一方面,为了了解质性研究这把“大伞”,需要进行分类;但与此同时又不必穷尽所有的类别,不希冀将所有研究类型囊括到一个完整的体系中。研究者只需根据自己的问题选择更“好”、更“合适”的方法,而不是根据一种事先设定的标准对这些分类方式进行评价和选择。

此外,我们也可以改变分类思路,将质性研究作为一个连续体来看待(如下)。平行分类的方式很容易将丰富的质性研究人为地分成一些类别,排除了那些无法被纳入分类标准的类型。连续体可以给研究者很大的思维和想象空间,不会排除那些目前还没有发现的以及今后有可能发明的新类别。

作为连续体的质性研究

完全自然主义的研究	半自然主义的研究
完全自然情境	半自然情境
完全开放型	半开放型
完全悬置假设	主动利用假设
描述为主	建构理论为主

质性研究的发展趋势

从上述质性研究的历史可看出其发展趋势:从传统到现代、后现代,从封闭到开放,从一元到多元,从事实描述到意义解释,从论证理论到建构“现实”,从追求“科学”到重视人文,从“客观性”到“主体间性”,从写语言到“写文化”,从宏大理论到地域性知识,从价值无涉到

价值有涉,从学术研究到实践行动。后现代的多元文化观和世界性视野带来了学科边界的模糊,大大扩展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定义、边界和作用。

重新理解"理解"和"解释"

随着质性研究进入21世纪,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立场和风格进入研究的行列,通过"对话"来检验自己的"知识宣称"。质性研究者对"理解"和"解释"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从强调"客观"、"中立",到"体验"、"移情",再到在"参与"和"对话"中"共同建构"意义。

研究者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成为"他者",不可能进入别人的皮肤和大脑思考和感受。虽然很多人仍旧在使用1967年由格拉泽(B. Glaser)和斯特劳斯(A. Strauss)提出的扎根理论方法(1967),而且这个传统在斯特劳斯和考宾(J. Corbin,1990)以及迈尔斯(M. Miles)和休伯曼(M. Huberman,1993)等人的工作中仍可以看到,但与此同时,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日益受到重视。如龙迪在《性之耻,还是伤之痛——中国家外儿童性侵犯探索性质性研究》(2007)中,为了揭示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人际和群际"关系"及其交往如何建构出有关性侵犯的"真实",使用了沃克特(H. Wolcott)提出的"转化质性资料"的策略:先对原始资料进行"深描",通过细节呈现本质和文化回声;继而对资料中隐含的、有据可依的主题、特征及主题之间的模式化规律进行分析,将它们系统、有序地呈现出来;最后对资料的意义进行解释,建立知识宣称,达致理解的目的。

思考方法与理论和问题的关系

随着质性研究的逐步推广,研究者对质性研究的质量评价标准也在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质性研究刚刚在我国系统介绍时,大家都非常兴奋,似乎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研究人文社会现象的工具。特别是对那些畏惧或讨厌数字计算的人,质性研究方法似乎是一个从天而降的"救星"。但随着尘埃落定,泡沫散去,国人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样的质性研究是一个"好"的研究?仅仅对现象进行描述是"好"的研究吗?理论在质性研究中到底起什么作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实践探索,大家意识到,虽然质性研究强调对现象进行"深描",但一项高质量的研究不应该停留在对现象的简单描述上,而应提升出研究者自己本土化的理论线索,并与前人的理论展开对话。

因此,研究者需要学会恰当地使用文献——“浸泡在文献中”,但不被它“溺死”,将前人的理论整合到自己的经验研究中,但不被这些理论所淹没。

对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将质性研究者引向对它们与研究问题之间关系的思考:理论和方法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都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研究者不应用方法来限定问题,而应具有“问题意识”,让“真实的问题”浮现出来,在历史和社会结构中得到恰当的定位,然后再选择合适的方法。方法总是针对一定问题的方法,而理论总是针对一定现象的理论。方法和理论的目的都是为了澄清观念,解决问题,解放而非限制想象力。研究者不要盲目崇拜方法和技巧,而应该做自己的方法论者、自己的理论家,让自己的心智独立地面对人与社会的问题(米尔斯,1959/2001)。

质性研究通常被定位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量化方法的集体主义相对应),似乎研究的总是小样本的经验和事件。如何将个人困扰与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如何在制度与个人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这也是近年来质性研究者探讨得比较多的问题。个人困扰总是坐落在一定的社会情境、社会关系、制度结构和历史背景中,研究者在关注个人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的同时,还需要关注建构这些心理现象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过程,将个人作为历史和社会的参与者,理解人类社会选择以及形成有关“人”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方式和关系。研究者不再把文化看成是一个独立于个人的系统,而是与个人的自我中最深沉的部分紧密相连的、个人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质性研究已经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走向了关系主义,在个体与集体之间、个人与文化之间、现在与过去之间分析问题。

研究规范不断提高

虽然质性研究不被认为存在一套普适的、固定的、所有研究者都应该遵守的规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什么都行”。为了尽可能意识到并控制样本选择以及资料收集和解释中过多的随意性,质性研究提倡遵循严格的程序,在各个环节都提出了要求:问题的提出、研究设计、进入现场、建立研究关系、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形成结论和建构理论、成文的方式、衡量研究的质量、反思伦理道德问题等。为了提高研究的质量,质性研究还尝试引入量化研究中的“信度”、“效度”、“推广度”、“代表性”等概念,与质性研究者常用的标准(如解释力度、可信

度、一致性、典型性）进行对比分析。

此外，在比较传统的、源自语言学的方法（如内容分析、话语分析、修辞分析、语意分析、符号学、论据分析）之外，质性研究者还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沈崇麟，夏传玲，2007），如扎根理论、海斯（Heise）的事件结构分析、拉津（Ragin）的定性对比分析、雅伯特（Abbott）和赫里凯克（Hrycak）采用最优匹配技术的序列分析、雅贝儿（Abell）的形式叙事分析、鲍尔（Bauer）等人的语库建设、雅特里德—斯图林（Attride-Stirling）等人的主题网络分析和神经网络技术应用的质性分析领域、哈奇（Hatch）的类型分析、归纳分析、解释性分析、政治分析、多话语分析、计算机辅助分析等。所有这些方法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把质性研究向更加系统、精确、严格、形式化的方向推进。

信息时代的电子声象技术改变了质性研究者的工作方式，使他们的工作更加标准化，也更加有效率。手提电脑被带到研究实地，互联网使研究者可以向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进行快捷而又便宜的资料收集。资料不仅可以以文本格式存储，而且多媒体介质（如图像、声音和视频）也被利用起来。研究报告开始用声象形式呈现，克服了语言的平面性和概念化。电子邮件代替了印刷品，研究成果的传播正在不断地加速。传统的“剪刀 + 糨糊”的资料分析方法被计算机辅助质性数据分析（CAQDA）软件所替代，将研究者从处理大量文字材料的繁复劳动中解放出来，也改变了质性研究的流程和研究集体之间的合作方式。数据库结构使质性资料的管理更加方便，为组织大型研究项目（包括多个研究地点、多个研究对象、历时的质性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网络的便利还促进了世界各地质性研究者之间的交流，目前大型的国际网站有 20 余个，如国际质性研究方法协会、质性研究资源库、信息系统中的质性研究、质性研究互联网资源、质性研究报告、质性研究兴趣协会等。

然而，虽然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便利，但不要希望仅仅依靠技术就能创造奇迹。研究毕竟不只是按照一定的方法、手段和步骤就可以完成的，还需要提出问题、捕捉灵感和运用直觉和想象的能力，资料归类和分析编码的工作还是需要人脑来完成。而计算机软件是建立在经典质性资料分析思路之上的，其基本假设是简约论，即任何有组织的实体都是由更小的单位组成的，只有被分解成不可再分的单元才能被理解。然而，社会现象是一个不可简约的生命系统，一旦被分解成更小的单位分别探究，就无法获得充分的理解和解释。使用“分而析之”

的简约论处理原始资料,很容易陷入西方个人主义研究传统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思维定势,描述个人层面的“行为”和“认知”,却看不到“关系”和“生活世界”。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建构扎根理论”的观点和方法(Charmaz,2006)。

质性方法与量化方法结合

早在1950年代就有学者(M. Trow,1957)提出,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应该主宰社会现象的推论,占主导地位的量化方法应该吸收别的研究方法的长处。1979年库克(T. Cook)和雷查德特(C. Reichardt)使用量和质的方法进行教育评估的文章被正式发表,1982年《美国行为科学家》杂志用了整整一期的篇幅刊登使用多元方法所做的研究报告。但是,两大阵营之间的“论战”由来以久,特别是在理论探讨方面至今方兴未艾。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社会学界在个案研究与统计分析之间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辩论,目前很多有关观点都可以在这场论战中找到源头。

对于量化方法和质性方法之间的结合问题,一般有三种观点。①纯正派:认为两种研究分别基于不同的研究范式,不能混杂在一起使用。②情境派:认为两种方法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可以结合以及如何结合。③实用派:认为两者可以结合,但更加注重研究的具体功用,讨论的焦点放在方法的具体操作,不讨论范式以及建立系统的结合方式和衡量标准问题。

目前,两者结合的方式主要有整体式结合和分解式结合,各自分别有三种不同的设计(J. Maxwell,1995)。整体式结合包括:①顺序设计,两种方法的使用存在一个前后顺序;②平行设计,两者针对研究内容的不同部分同时使用;③分叉设计,在研究开始时先使用一种方法,然后在继续使用这种方法的同时使用另外一种方法。分解式结合下面也有三种类型。①混合式设计,包含四种整合形态:a. 量化实验设计,质性资料收集与分析;b. 量化实验设计,质性资料收集和量化统计分析;c. 质性自然研究设计,质性资料收集和量化统计分析;d. 质性自然研究设计,量化资料收集和量化统计分析。②整合式设计: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在不同的层面(如问题、抽样、资料收集和分析)同时进行,并且不断地互动。③内含型设计:一种方法“坐巢”于另外一种方法之中;一种方法形成研究的整体框架,另外一种在这个框架中发挥作用。另外一种对结合策略的分类为:顺序性解释、顺序性探究、顺序

性转换、并行三角互证、并行嵌套、并行转换(克雷斯威尔,2007)。

近年来,两者的结合呈现如下三个新的趋势(沈崇麟,夏传玲,2007)。①将质性数据尽可能量化。如科罗尔(Currall)等人在研究组织环境重要的群体过程时,通过内容分析把五年的参与观察资料量化,然后用统计分析来检验理论假定。处理调查数据中开放题器的编码问题的工具软件(如 Words at,Smarttext)和处理质性资料的传统内容分析软件(如 Nvivo、MaxQDA、Kwalitan 等)也提供了将质性资料转换到常用统计软件的数据接口。②方法论多元,即在应用研究过程中,通过核心概念的测量模型,把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结合在一起。如格雷(Gray)和登斯坦(Densten)在研究企业的控制能力时,利用潜变量模型结合两种方法。③量化研究者对过度形式化的量化方法不满,试图通过质性方法加以弥补。如雅各布斯(Jacobs)等人在研究比利时的家庭形态对配偶的家庭劳动分工影响时,首先用量化方法对纵向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然后延伸出对核心概念的质性研究。对"模型设定"的关注,也可被视为量化方法重新试图返回质性研究的一种表现。

用质性方法做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不是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与学术研究相对应的研究取向,其目的是为了求"善",而不只是求"真"。与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和边缘的解释主义研究相比,行动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它以实践认识论为基础(与技术理性相对),认为行动中的"知"很难用概念和语言所表达,只在具体情境和问题解决中才能了解到行动者思维和情感的"真实"。行动研究以社会改进为目的,强调行动者做研究,在行动中研究,为行动而研究。其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实践理性)"、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反省思维、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勒温(K. Lewin)的团体动力学、阿吉里斯(C. Argyris)的行动科学、舍恩(Schon)的实践研究范式等。

原则上,行动研究可以使用任何方法(包括量化的方法),只要"好用"(对改进现状有用)就行。但是,在具体实施中,大部分人都采纳质性方法,因为它更适合行动研究的要求。质性研究对不同人群(特别是弱势人群)的关注,有利于处于困难中的行动者提高自信和自尊。质性研究对研究者个人价值观和"前理解"结构("前见"、"前有"、"前把握")的肯定,有利于行动者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质性研

究设计灵活,可在研究过程中视情况而改变,符合行动的不确定性和结果无法预测的特点。质性研究强调研究者自我反思,符合行动者在行动中反思并及时进行调整的要求。质性研究没有对大样本和严格实验的要求,对行动者更具有亲和力,更容易“上手”。

行动研究可以由行动者自己做,但也可以与外来研究者一起做。外来研究者扮演的只是一个触媒的角色,帮助行动者确认和定义研究的问题,对分析和解决问题提供参考,并协助将知识公开化。目前,用质性方法做行动研究的现象较多发生在实践领域,如中小学教育、社会工作、医务护理、法律维权、劳工解放等。在教育领域,随着“教师成为研究者”的要求以及2000年以来国家基础教育新课程的实施,我国的中小学教师越来越多地投入到行动研究中。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人员也参与到这个行列,形成了很多大中小学行动研究合作基地。

质性研究之所以越来越重视行动研究,还因为它能够比较有效地纠正传统质性研究中的一些弊端。如研究者单凭个人兴趣选择研究课题,研究内容脱离社会实际。结果,实际工作者一方面得不到研究者的帮助,不能从多如牛毛的科研成果中获益;另一方面,他们又因为种种原因(工作太忙、缺乏科研经费、领导不重视、缺乏指导等)不可能对自己面临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外来研究者的直接介入不仅可以为实际工作者提供技术上的指导,而且有助于当地权力结构的松动和改革缝隙的发掘。

“译丛”的特点

虽然质性研究在国外发达国家发展迅速,但我国对质性研究的讨论和运用相对滞后。现在,重庆大学出版社在原有“万卷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了本“万卷方法—质性研究方法译丛”,“译丛”的出版对增进学界和实践者对质性研究的认识、提高研究规范、丰富研究手段和方法将大有裨益。丛书第一批共有20余种,包括《文化研究的实践》、《质性研究导论》、《如何做质性研究》、《做自然主义研究:方法指南》、《反身方法论》、《民族志方法要义: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民族志:步步深入》、《叙事研究:阅读、分析和解释》、《质的研究设计:一种互动的方式》、《质性访谈:聆听的艺术》、《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者指南》、《焦点团体:应用研究实践指南》、《焦点组

访谈:一种质性研究的方法》、《标准化访谈调查》、《参与观察法》、《质性资料分析:方法与实践》、《分析社会情境:质性观察和分析方法》、《情境分析:后现代转向的扎根理论》、《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质性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质性研究中的伦理》、《混合方法:质性和量化方法的取向》、《质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个案方法的扩展》(书名的翻译也许还有变化)等。

上述书种几乎囊括了质性研究的方方面面:从理论探讨到实际操作,从研究设计到具体实施,从资料收集到资料分析,从现象描述到理论建构,从研究活动到研究反思,从关注现象及其效度和推广问题到关注关系及其伦理道德问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体而言,本套丛书的特点是通俗易懂,便于操作。虽然有一些理论方面的探讨,但作者通常结合了研究实例加以说明。我相信,通过一大批高素质中国学者的辛勤努力(在我看来,“翻译”不仅仅是“再现”,而更重要的是“创造”和“重构”),以及出版社的精品意识和谨慎工作,此“译丛”的出版必能为质性研究在我国的推广和本土化、为我们在参与和对话中理解和解释,提供更加丰饶的精神资源、思维深度和想象空间。

陈向明

2007 年 4 月 10 日

于北京大学

参考文献

1 Charmaz, k. 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 A Practical Guide Through Qualitatieve Analysis. London: Sage,2006.

2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3 克雷斯威尔.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M].崔延强,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4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陈强,张永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

5 潘慧玲.教育研究的取径——概念与应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 沈崇麟,夏传玲.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M].“万卷方法—社会研究方法经典译丛”总序[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7 水延凯.社会调查教程(修订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8 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致谢

我要感谢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文化研究暨社会学系的许多学生,他们对我有诸多的启发与挑战,同时这些学生所提出的问题也使我相信有出版此类书籍的必要。在撰写此书的同时,我也参照了许多优秀学者的著作,在此特别感谢他们提供了如此丰富的例证。同时也要感谢我在本系的所有同事,尤其是与我曾经一起执教过的简·坎贝尔、贝丝·埃金顿、马克·埃里克森、迈克尔·格林与斯图尔特·汉森,他们对我的支持与友谊一直是我工作与个人生涯的最佳支柱。弗兰克·韦伯斯特也在我撰写此书的后期,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

许多朋友都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但我要特别感谢夏洛特·布鲁斯顿与乔克·赫米斯,他们是我的最佳听众,而且也总是给予我最大的安慰。我更要感谢乔克·赫米斯,他为了要阅读我的初稿,不得不在2001年9月的周末,抛下皮特尔、萨夏与诺厄。最后,我还要感谢尼克·格雷,他总是慷慨地付出他的时间、体力、爱与尊重。

安·格雷

目录

第二部分 研究的过程

绪论

我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希望能让徜徉在广阔的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师生与研究者,获得对于社会世界的若干方面进行研究的路径。举例来说,我所说的研究或许是一项小规模的研究计划,对于大题目的某个组成部分的评估,或一篇毕业学年论文,或野心更大一点的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的评估。虽然我们需要掌握所选择的主题与可用的研究方法的理论面向,但是有许多更为根本的问题必须先提出。究竟我们所尝试努力的是什么?究竟这个研究本身是什么?我们如何产生一个研究主题?你该将自己定位为研究者或是研究的创造者?这些都是我们同样会面临的问题,当我们开始着手探讨某些文化过程的面向时,这些问题就即刻显现了。

本书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于:致力于理解什么是构成文化研究本身的根本要素。因为在学界,文化研究的意涵因人而异,而且任何尝试解释何谓文化研究或划分文化研究的历史及其发展的研究企图,也都具有一定的主观选择性。这个标识本身主要为英语系、现代语言学系、社会学与传播及媒体研究所用,同时也被那些结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等不同元素的学位课程所使用,并将它视为一种"囊括一切"的研究主题。在此,我对于文化研究的定义取向(第1章对此将有更进一步的说明)在于:我将坚称文化研究是一项交叉学科且开放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个研究领域还处在不断发展的阶段,同时在不同的学术机构形式里,文化研究会因不同的情境而发展出不同的形貌。然而,我欲主张的是,文化研究的一项关键性特征在于:它将文化理解为由"生活的种种面向"所构成,同时也构成了"生活的种种面向",亦即文化就是日常生活

的物质、社会以及象征性实践。就英国的文化研究而言,这种观点显然可以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晚期与60年代早期的雷蒙德·威廉斯的著作。他的著作《文化与社会》(Williams,1958)、《漫长的革命》(Williams,1961),除了其他主张之外,主要关注于将“文化”从艺术与文学的束缚中松绑,并坚称“文化是平常之事物”(culture is ordinary)。这即是以较为人类学的观点来理解文化,并将文化视为日常生活社会互动下的产物。威廉斯关注文化的民主化(democratise culture),而且就某种意义而言,他将文化普遍化至社会生活的一切形式之中。或许,威廉斯对于民主潜能的形构,是伴随着一种文化政治而出现,而此种文化政治关注于“生活经验”的文化研究上。因此,许多来自于不同知识背景但却从事此领域研究的学者,无论是在过去或现在,都意识到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在实证研究方法里,“文化”是由日常生活的“社会”实践所构成,同时也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社会”实践。本书的论点之一在于,认为这些研究已经成为(并且一直会是)一个重要场域,且不断地以复杂而动态的方式来思考文化及文化研究。

本书包含三个主要且彼此相关的目标。首先,将对文化研究所采用的民族志方法提出批判性的观点。在整本书里,我将不断地提及将我们自己定位为一位知识分子、研究者与作者的重要性,因此,我必须意识到自己在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作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继任者的角色。的确,本书的前半部将说明1960至1980年代,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学者的主要著作,因为这些学者观察到文化研究中一种独特观点的浮现。然而,我自己对于此一文化研究观点的建构,并非意欲将它界定为(也不是想宣称它为)文化研究的起始点,反而是希望指出文化研究这个领域是如何透过不同的方法与方法论,来描绘出文化研究的特定轮廓。这意味着,在文化研究的领域中存在着一个主要关注的核心焦点,亦即:试图关注于研究团体、使用者、消费者与主体的“生活世界”,而且在这样做的同时,文化研究已经发展出一系列特殊的质性方法,此种质性方法即是所谓的民族志方法。

其次,本书将提供如何获得研究路径的指引。从一开始的提问到最终的书写形式等,都涵盖于其中。最后,本书将鼓励读者、

研究者对知识论之相关问题进行反思，亦即：我们如何认识我们所认识的事物，以及认识者与被认识事物之间的关系，正如贝弗利·史盖吉所主张的，“根本不存在着客观的认识者”（Skeggs，1997：27）。虽然这些观点皆穿插于整个文本之中，但是读者仍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来使用本书。举例而言，那些企图完成研究作品的学生可以直接进入第4章，接着再跳到第9章。然而，虽然我希望本书应该是一本可解决研究问题的实用书籍，但我也期待本书能够启发读者对文化研究的历史梗概产生好奇，并且关切于本研究所提出的更为深层的知识论问题。

就部分而言，本书是一本“工具性”（how to）书籍，因为身为一位教授大学生与研究生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的教师，我发现当今并没有一本我可以用来指导学生的文本，所以，我才开始著述本书。如今，文化研究已经是一种学位研究，因此，也必须对此学位的学生的学习与技巧有所评估与测试。虽然许多作者坚称文化研究不是一门学科，然而，尽管不是很明显，对于这种学术作为一门可教授的以及可评估的研究领域，却存在着某种共识。所以，诸如本书这一类的书籍与其他读本或教科书（例如During，1993；Gray and McGuigan，1993，1995；Barker，2000）全都着墨于文化研究的定义、文化研究的历史及其“最佳实践”上。这却是贯彻本书的一种紧张关系，此种紧张关系即是拉里·格罗斯伯格所提出的，他说：“我们这些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学者，最后将发现我们自己陷入了一个陷阱：必须提出定义以捍卫文化研究的特殊性，但是又必须拒绝以任何一种定义的行为来隔离持续进行中的文化研究历史。也就是说，这根本是一种两难”（Grossberg，1996a：179）。

事实上，在思考本书的结构以及书写初稿时，我总是不断地游移于“开处方”与拒绝“划定”此研究领域的范畴或拒绝提供任何既定或保证无误的研究程序之间。为了解决这之间的矛盾，并保持对此研究计划的信心，我不断地回想我与学生数年来对于该研究方法的无数对话。他们问我的问题，诸如：“但是你是如何分析你的访谈资料的？”以及“嗯！我应该做多少次的访谈呢？”或“五次（或十次、二十次）的访谈够吗？”，这些问题都一再提醒我，能够在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例如文化研究）内探讨研究方法的文本根本付之阙如。但是，这些问题也都表明了一般对于研究方法所持的态度。我对于这

些问题的回应(大部分是针对那些备感挫折的学生所作出的回应)是:在鼓励他们构写研究计划的实际目标前,先问他们“这取决于你想做的是什么”。我相信,他们的问题来自于他们对于研究本质、实证研究方法与主要问题间的关系或所关注的研究领域的误解。因此,我并不准备描述某些特定的方法或发展出一种文化研究方法,相反地,本书是关于各种方法的研究,我认为这些方法与文化研究计划在某一理论架构下可能想达成的目标相关,以及与确定文化研究之“可认识的主题”相关。

当关注于实证研究以及探索由生活经验所建立的社会世界时,其中可能隐含的危险之一在于:会暗示性地认为这是“真的”或这是唯一“可被接受的”文化研究观点。我并非希望如此,我也不希望学生们远离本书的主旨,而认为对于消费者的经验世界进行探讨以及消费者对文化形式的使用,是文化研究的必然部分。在文化研究的研究领域中,有许多绝佳的著作实例并非关注于生活实践。除此之外,在检视“民族志方法”时,我并不希望宣称:透过某些真正的概念,就能获得某些“真实的”真理,也因此,实证研究是唯一值得采取的研究方法。本书将对这个观点(以“真正的”这个充满疑问的概念为基础)持怀疑的态度。然而,就另一方面而言,也许我们真的需要质疑理论著作所宣称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并聚焦在文本的分析上。但是为何学术社群还要投注如此多的精力在这些思想实践上,甚至排斥其他诠译或其他关于世界的说法?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反思在形塑研究时,理论框架总被视为是主要叙事的事实。我坚持认为,无论是理论性的、文本性的或实证性的研究,所有的研究与学术性著作都应该以证明它的研究宗旨作为开始。即使(或者因为)我们拥有如此权威性的机构作为支持我们保持沉默的后盾,将本段开头所提的观点视为一个已定事实终究是不足的。

何谓方法

了解方法与方法论这两个词汇的意义是相当重要的。这两个词汇时常交替使用,但是他们所意指的却是非常不同的研究面

向与学术探讨。简言之,方法意指那些研究者用来建构资料与探询资料来源的不同研究技巧,而方法论所描述的却是整个研究所采取的知识论路径。与理解知识论相关的议题包括有重要的哲学以及政治议题,但是在教学上,却时常将这些议题与更为“实用的”方法议题区别开来。我认为,这些议题都与研究过程有关,而如此的观点也构成了本书的主要框架。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我们对于方法的选择,透露出我们如何接近所希望认识的对象以及我们认识世界的方法。

显然,所有的学科或多或少都同意某些方法论是他们进行研究的根据。注意这些方法论究竟有多少是暗示性地(或者相反地)或明确地存在于该领域中,是很有趣的。举例而言,在人文学科里,方法路径并未发展得相当完善或获得完善的论辩,但是在批判艺术史的领域里,研究方法在电影、文化与视觉研究的领域里,却已经构成非常重要的部分(Tagg,1988)。而社会科学则是完全相反,因为社会科学有一段很长的方法论书写史,而且对于研究方法也可能已存在着一个相当制式的观点。对于研究方法路径的描述时常出现在方法论的书籍里,而且某些研究方法课程都暗示着方法一旦被了解并掌控后,就可以被应用到任何研究主题与问题上。这是将方法理解为一系列“一般性”技巧,而并非将它理解为程序(这种程序应该被视为对研究主题、研究问题意识与研究领域是不可或缺的)。虽然访谈的进行或是样本筛选的思考显然都需要许多技巧,但是这些并非亘古不变的“规则”,它们也不仅是被使用的“工具”。相反地,它们本身必须透过研究计划的发展才能产生。因此,方法的问题无法在一开始的阶段里就被设定好或获得解决,而是不断地出现在整个研究问题中,不仅是关于研究是“什么”的问题,更是与研究“如何”进行的问题有关。如此对于研究路径的反思有助于试图探讨社会与文化过程之复杂性,以及其意义与实践的研究。

自从我自己关于录放影机的使用的研究(Gray,1992)以及发展目前我对于“企业文化”的研究(Gray,2001)开始,关于方法与方法论的问题就如此令我欲罢不能。我已充分意识到如此对于方法与方法论问题的迷恋与热忱并未为他人所共享,而且时常被认为是十分怪异的。就部分原因而言,这可能是因为关于方法的

书写与传授,时常被认为是相当枯燥且抽象的,所以才无法激起人们的兴致。基于这个原因,就我自己的观点而言,在许多状况之下,方法时常被视为是与研究无关的,而且学生对于这些文本的冷漠态度时常是可被宽容的。自从与学生相处的那些日子以来,我的热忱全都归功于一本书,即 C · 赖特 · 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Mills,1959)一书。这本书我最诚心推荐给正在从事任何一种社会或文化研究形式的学生所用。米尔斯强烈拒绝接受任何固定的方法,并坚持了解与学术工作有关之“技艺”(craft)的重要性。他坚持一种严格的研究路径,并认为“对材料的尊重、对目标的明确、对高度戏剧性的感知以及对学术生命的关切”才是成就有价值之研究成果的主要原因。《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的结论章节《论知识分子技艺》一章是极具启发性的章节,而且与书写该章节的年代,即 1950 年代,有很深的关联性。

文化研究、方法论与方法

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文化研究还因为忽视方法与方法论的考量而变得恶名昭彰(Tudor,1999)。所以,就某些方面而言,本书即企图对此缺点作出回应。然而,在探询一些学者时常采用的创新研究方法时,我却将此种方法论的折中主义视为文化研究领域的一项优势,并视为被我们描述为文化研究的活力与动态本质的一项证据。这是一个可改变的且不断改变的研究领域。主题、理论发展以及新作品的政治性时常被引述为这些动态变化的最佳实例。然而,我却主张,将学者为了要探讨新的研究议题所采取的方法论策略,视为文化研究发展与形塑的一部分,与将其视为文化研究中更加显著的特征,是同样有趣的。

当我开始发展自己的研究计划,并试着将米尔斯的建议诉诸实践时,我阅读到两本出自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最为有趣的文本,而这两个文本都同时论及了方法的问题。鲍尔 · 威利斯的著作历年来都在质疑文化研究方法的问题,并指出存在于研究中诸多令人感到“讶异”的元素。他同时也提及倾听他人话语、尊重他们的观点以及必须关注人类经验感受的重要性。无可否认地,一

般来说,这对我而言是一种理想的研究路径以及理想的学术工作。这同时也触及了方法论的最根本问题。同样地,安杰拉·麦克罗比的《女性主义研究的政治:在言说、文本与行动之间》(McRobbie,1982)一文在论及女性主义研究的政治时把其视为思想的发展、实证研究以及广义的“草根性”女性政治之间的妥协。这些作者都鼓吹一种创新的精神,并坚称方法必定是一种“策略”。他们以及其他的研究者都鼓励我持续进行我的研究,继续发展我希望用来探讨研究路径的问题,并鼓励我不要受限于某些特定的方法。除了这些作者给予我思想上的支持外,某些最具挑战性与高难度的研究部分,也都涉及了方法的问题。它们不仅一次地迫使我继续进行我的研究,并让我陷入绝望的深渊。正是在思考以及努力寻找我们的方法、形构策略以及澄清我们立场的过程中,有趣的问题与两难的困境才会显现。除此之外,当我们的研究面临该如何选择我们的立场时,无数使人不安的阻碍、沮丧与惊奇也由此产生。因此,当你期待能够产生创新性的时候,你必须对方法和路径的选择有清醒的意识,当你为了充分展开你的研究主题并产生好作品而作出特定抉择时,这些抉择所造成的后果也是你必须多加关注的。

本书概要

为了要阐释某些特定的方法与研究路径,本书涵盖了许多研究,同时也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在内。这些方法与研究路径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因为它们证实了特定的研究策略与路径,同时也是因为所有的作者都对他们的研究方法有所反思,尤其是关于研究的政治性含义。许多作者是从截然不同的学术背景出发来进行“文化研究”,例如社会文化人类学、心理学、传播与媒体研究、社会学与性别研究等。这些全都是极为有趣的批判性研究者,但是我也发现,我不断地回到两位学者的著作上,即贝弗利·史盖吉与莱斯·巴克。他们之所以不断出现在本书的不同阶段里,是因为他们都质疑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但也坚称民族志研究方法具有产生知识的价值。他们都论及他们的立场以及身为研究者的

角色,也论及他们著作的政治性意涵、他们的身份认同,并反思他们在以书写形式呈现的著作中所采取的方法。要发展出一个好的研究实践,方法之一在于阅读他人的著作,而我也建议读者能够阅读本书所提供的研究实例的完整观点。

这些研究实例也描绘了一些文化研究从事"生活文化"研究的轨迹或叙事,正如我将在第3章中指出的:文化研究的关键性特征或文化研究的"完整形貌"。这些特征一开始在当代文人研究中心的早期研究里,主要是以阶级与性别的主题出现,而近年来的研究则比较关注于多元、分歧、去中心性的以及分化的"身份认同"等主题。如此的研究轨迹可以放在较为广义的理论发展上来探讨,例如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等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发展所造成的行动,也可以放在文化研究的国际化发展现象上来检视。就许多方面而言,在撰写本书时,我试图要回应麦克罗比的建议:

> 就某种程序而言,我们必须挣脱仍缠绕着文化研究的二元对立关系,亦即:文本与生活经验之间的划分、媒体与真实以及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关系。我们现在急需一种方法论,一种将文化中的认同予以概念化的新范式,一种民族志路径,以作为探讨日常生活相关的互动特质的研究起点,而此种民族志路径可以借着将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整合至历史与连续性的强烈观念中,而将一种全新的严密性带入这种研究里。(Gray,1992:730)

我将此种介于文本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关系,视为一种方法论的议题,这个议题正是本书所试图进一步探讨的,而本书将借着提出不同的方法以促动与探索麦克罗比所指出之"文化认同"的主要特征(此种文化认同即是透过质性研究或民族志研究来探讨其中的复杂性),来达成进一步探讨的目的。

本书主要由两部分所构成:第一部分是"民族志方法",第二部分则是"研究的过程"。

第1章"捕捉生活文化"探讨文化研究如何援引社会学与人类学所发展出来的方法,并特别提及这两个存在已久的学科是如何处理文本"问题"的。在开始进入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发展之前

（社会学与人类学都受到文化研究的影响），将先提及民族志的批判，尤其先论及与“他者”的建构相关的议题。在此，反思的重要性以及一种适切知识论的发展，即是本章所欲探讨的对象。

第2章“构连经检”则聚焦在经验的概念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性范畴的含义。本章欲探索的是：在研究中我们如何使用这个不明确的范畴——我们的研究若引发知识论的问题，我们会使用上述范畴来解决。

第3章“想象的共同体：奇观与平凡”，将一个由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发展的研究当成一个“文化研究的个案分析”，并探讨某些特定种类的主题、议题与问题如何在这个特定的语境下出现。在追溯较为近期且较为分散的“生活文化”研究的发展前，本章先援引“想象共同体”的概念，界定出早期研究的“完整形貌”。本书所论证的即是：文化研究的研究与学术工作都是高度语境化的，而本章即涵盖了两个因其在研究中不在场而值得注意的“社群”：其中之一是强有力者的社群——它们在文化研究中几乎不曾被检视过；另一种则是学术性社群自身——它是一种重要的但通常是隐蔽的形塑力量存在于我们的著作中。

第4章“一个关于研究的问题”则是为本书第一部分做归纳，本章探讨我们是如何开始将焦点放在某一个研究主题上，以及在聚焦于某一研究主题上时，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知识论、效度以及研究的伦理、政治等问题都是本章涵盖并视为重要而待提出的问题，但是却可能是你现阶段的研究尚未回答的。

第二部分虽然关注于知识论的问题，但也包含关于研究过程不同阶段的一些更加实用且翔实的章节。

第5章“实例的选择与素材的产生”一章涵盖了一般所谓的“资料搜集”的内容。在探讨某些特定的观察与访谈作为搜集研究素材的主要策略之前，我们先透过文化研究的视野说明了资料搜集的概念。抽样以及关于权力与差异的议题也都是本章所讨论的主题。

第6章“我想告诉你一则故事”介绍了自传在文化研究与其他研究路径中日益显现的重要性。本章强调“说故事”的重要性，同时也援引了使用自传、证言、生命故事与记忆的研究，并探讨研究者的“自传”或文化批判在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7章“紧系文本”则探讨了当大部分的文化研究问及,在我们从事生活文化的研究时,我们可能会如何“受限于文本”,本章即深入文化研究的症结所在。首先,在我们快速地浏览文化研究所采取的不同文本路径前,我们必须先思考在一个日益饱和的文本世界里,我们所谓的“文本”究竟意指什么。本章的后半部分则致力于探讨某些完善的研究实例,这些研究从女性罗曼史的读者、新德里(New Delhi)的家庭电视收视、迷(fans)以及星舰迷(Trekkies)到“实境电视”(reality TV)节目(例如《大哥大》影集)的新闻听人种类等面向出发,造就了丰硕的文本研究与生活研究。

第8章“分析的策略与谋略”说明了资料分析的重要问题以及许多已完成的研究著作中鲜少提及的分析过程。本章探讨各种文化研究所使用的不同分析路径,并提出一些相当实用的分析程序建议。

第9章“书写”所处理的是与书写相关的问题。本书遵循其他论及“方法”的文本,将书写的问题保留在较后的章节里。但是在此,本章的立场并非认为,书写应该放在研究的最后一个步骤里。事实上,前面的章节全都强调书写是一种连续过程的重要性,同时在研究的发展过程中,甚至广义而言,在我们的学术发展轨迹中,书写也是一种实用的“思考工具”。我们何不反抗传统,将书写的问题放在首位呢?

第10章“知识的来源与认识的方法”是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本章将回到一些较为广泛的研究议题上,尤其是生活文化的议题。在探讨本书所涵盖的研究实例时,本章认为,为了要透过日常生活经验的说明来回应社会变迁,我们必须关注于主体性与认同理论的探讨,并问及洪宜安坚称研究的“激进语境化”所可能造成的后果是什么。为了要这么做,我将回到文化研究价值的适当评估标准的问题上。本章也指出一些关于“散居文化”的新研究,此种研究建议了一些构成此研究领域的方法,借此持续产生出适当的、暂时性的、中肯的及连续性的研究。

身为在21世纪开启研究之路的研究者,你正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中从事研究,无论是全球性的或知识论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环境里,社会变迁极为快速,同时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中,

方法与方法论本身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真理”与“真实”的宣称受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质疑，甚至到达“社会科学与民族志已经成为现实的诸多版本之一”(Denzin，1997：45)的程度。

至少这个“不确定性”与“短暂性”的语境已经将我们放于焦虑的流沙之中，就让我提出一些提问的方法，这可帮助我们为自己的研究实践寻得一点根基。这些问题与知识的政治密切相关，这意味着政治运作于各种层级里，而且一直是我们所作所为的一项重要元素，同样毫无例外地，政治也运作于研究之中。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必须开始了解的是什么，并宣称知识生产的权利，这中间涉及了什么以及我们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的本质究竟为何，这都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问题。本书中的研究路径即主要关切这些议题，当我们企图理解世界，以及当我们意识到这些议题的存在并处理它们时，这些议题就像错综复杂的丝线一样穿梭在我们身边。诸如“我该如何为这个知识命名?”以及“是什么赋予我可以研究人们生活的权利?”此类问题在你研究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你心中习以为常的问题，而且你也不得不处理这些问题。也许当你轻敲某个人的门，并询问是否能接受访问时，或者是埋首于堆积如山的访谈稿中，思忖该如何开始进行分析时，或是在你根本不知该如何着手形构研究主题时，这些问题都一再地侵扰你的思绪。

在你研究的各个不同阶段，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于，你必须专注于你的所作所为并对此充满自信。这个因素时常可以透过不断地回溯、重新思考你的研究目的以及当初你为何要从事此研究计划的理由，以及问问你自己究竟为什么会对此现象如此感兴趣等这些方法来达成。时常令人感到厌烦的是，研究常常会离你愈来愈远，从阅读大量的理论文本以及早期相关的研究计划开始，一直到资料的分析与书写的阶段，在任何阶段，研究都可能离你越来越遥远。你必须发展出可以持续(重新)建立与处理你的自信的策略。如果本书已经达到了它自身的目的，那么它将能鼓励你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找到优势的位置。这本书的内容并不都是浅显易懂的，甚至应该是极具挑战性的。文化研究中已经有一些很好的作品出现，这些作品是由像你们这类的人士所造就的，你们将一些关于文化世界、权力与主体，以及关于不平等与人

们置之不理的所谓琐碎议题等新的、重要的问题带入文化研究中。持续将新的问题带入你的研究中,你就会发现在众所皆知的“文化研究”这一持续成长的研究领域中,一直都会有可以探索这些议题的空间存在。

民族志方法

第一部分

第1章 捕捉生活文化
Grasping Lived Cultures

> 如果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我们希望发明一种可以捕捉社会生活之复杂性的研究方法，那么我们应该会期望发明出某种类似于社会人类学者所从事的民族志实践方法吧。(Strathern，1999)

“何谓文化研究?”毫无疑问地，对从事文化研究的学生与研究者来说，这是个非常熟悉的问题。正如一些好奇的朋友与家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它也可能出现在许多试图为此问题提出答案的书籍或期刊文章里。这个问题的必要性，以及为此而起的争辩与反驳，乃至于文化研究的构成要素，都指出了一些构成本书的关键性特征：文化研究缺乏明确的定义界线及学科的明确性。这意味着此一“研究领域”并非一个固定且稳定的学科。因此，“文化研究”的各种描述将有不同的面貌，而且也因不同的位置而产生特定的主题、议题与问题；换句话说，文化研究也会因为国家的文化语境的不同，而被不同的思想范式所形塑。事实上，造就文化研究不同面貌的辩论与讨论，也都产生不同的重点，以及强调不同的文化面向。然而，许多开设文化研究的大学与研究所(透过筛选与简化的过程)，却仅仅设计出某一种面向文化研究的课程。我所要强调的重点在于，构成此一研究领域的要素常是可以开放讨论的，而且是尚未确定的。我认为重要的是：能够去思考我们可以用来理解文化如何被制造的方法，并透过日常生活，即雷蒙德·威廉斯用所谓的“生活文化”来理解文化，这将是本书的焦点所在(Williams，1981：11)。我认为米根·莫里斯最近提出的问题(尤其与研究方法相关的宣称)，就是一个非常实用

的问题。她问及:“究竟文化研究在**做**什么?(粗体字是我所强调的)”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问题需要不同的响应,其中之一是需要更为实务的、更为实质的例证,借此显示此一研究领域所关注的焦点所在。为了要开始回答她自己提出的问题,莫里斯援引了亨利·勒费布尔及其“日常生活的批判”(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的观点。莫里斯强调此观点即是文化研究的核心所在(Lefebvre,1990)。她指出:“一种对于‘文化’的特殊使用方式的研究,以及对于处在特定社会语境底下的人们,将何物视为文化的研究,同时也是对人们制造文化的方式的研究”(Morris,1997:43)。如此的描述提供了一些指标,用以界定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所关注的焦点;如此的描述尤其指出了本书的主要面向:即日常生活的各种文化。除此之外,如此的描述也特别强调文化的物质性。就此而言,文化并非一系列自由流动的观念或信仰,文化也不是某个伟大艺术或文学作品经典的显现。文化的意义、过程以及工艺品都是在特定的物质条件下,被生产、分配与消费的。换句话说,文本与实践两者都是社会世界的产物,也是构成社会世界的主要成分。社会世界是由整体组织所构成,例如,由媒体机构以及其他文化生产者、家庭、教育以及各种不同的市民社会代理人,甚至特定社会团体的日常生活实践所构成。因此,任何试图了解文化与文化过程的努力,都必须仔细思考这些复杂的物质条件。关于权力与(使用权力的)途径的问题,也同样含括于莫里斯的观点中。所以,当问及谁有途径达到特定的、合法化的文化形式,而谁又被排除在接近这些文化形式之外时,这些问题引发了关于决定性以及含括(inclusion)与排除(exclusion)的动态性问题。构成文化过程与文化产品的力量非常强大,然而,文化研究也意识到,人们在了解他们自己与他人的生活时,不但可以也的确主动地参与了他们对文化工艺品的使用。

因此,莫里斯的描述已经道出文化研究关注的主要领域。文化被理解成是透过复杂的过程而被主动地生产出来的。广义而言,文化即是发生在社会的各个层级中,以及发生在文化过程的各个时刻里的意义生产或“表意实践”。这导致了关于人类如何生产文化、人类以何种方式生产文化,以及关于人类为何、为了什么目的而生产文化等问题的产生。或者更广义而言,这导致了文

化如何形塑社会关系,文化又是如何煽动或阻止社会变迁的产生等问题的产生。为了要开始探查这些出现在文化过程中的复杂关系,我们需要各种不同的方法,例如:文本分析、观察、从个人与团体中搜集知识与信息的不同方法,像日记、不同种类的访谈和参与观察。莫里斯在她的观点中特别强调"生活经验"的重要性,而这也将是本书关注的焦点。然而,"文本"不仅包括书写的文本,例如:文献、出版品,更包含视觉文本,例如,电影、摄影、广告、有声品(如音乐、广播),同时更包括其他种类的符号人工产品(例如时尚)。这些文本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中,将会被清楚地描绘。因此,重要的是必须界定出某些与文本以及生活经验相关的关键性议题,而这显然就是指这些文本的消费者。

1950 年代晚期,威廉斯撰写了一些关于文学正典(literary canon)具有高度选择性的本质的著述,指出哪些作品被含括在正典之内,哪些又被排除在正典之外,并质疑学术界处理这些文本的研究路径(Williams, 1958)。以文学正典的文本而言,分析的方法主要是指那些独尊文本并致力于界定文本所隐含根本意义的方法。就威廉斯的观点而言,来自文化研究此一新兴研究领域的研究工作,都在于寻找分析文本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却未必源于既存文学研究的研究路径。这些学者将不同的问题带入文本之中,他们对于在文本之中寻找其内在意义不感兴趣,反而是关注于文本内的不同元素可能建构出的多元意义。除此之外,他们也对评估的过程提出批判,因为评估的过程暗示着哪些文本将被筛选出来。其中最为重要的文本莫过于结构主义者巴特(Barthes, 1977)的著作,以及形式主义者的作品。例如,普洛普(Propp, 1968)的著作。普洛普提出一种较为"科学"的文本分析模式的必要概念。这是为了要探讨文本如何在不同元素下运作,例如,在叙事结构、角色功能、文化编纂等元素中运作的情形,同时也在于探讨文本所建构的究竟是何种"真实"。此外,巴特的选集《神话学》(Barthes, 1972)更将"文本"的概念扩充到诸如摔跤竞赛等活动,以及像是汽车、小孩的玩具等消费商品,还有广告的影像与语言上,借此彰显文本的意识形态本质。巴特的著作造就了许多早期关于文本分析的研究,尤其是广告、视觉文本与流行小说的分析。它提供一种有别于文本评估的研究方法,并将文本放在它们

所处的社会、文化与政治语境中探讨。巴特及其后继学者的著作,都是在可感知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语境下"解读"文本,但是对于如何理解文本及其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却未多着墨,尤其并未明确指出读者该如何诠释文本。正如麦克罗比(McRobbie, 1992)的观察:在文化研究中,仍存在着"文本与生活经验"之间的区分。现在,我想要进一步探讨为何如此的区分仍旧存在于文化研究之中。

社会与文本

社会(the social)与文本(the textual)之间的被认识到的区分,在学术结构中,是更为普遍被观察到的现象。广义而言,这区分可以界定为是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决裂。它们各自预设了不同的研究对象,并各自发展出特定的概念与方法。如此的划分已经造成文化研究这个新兴研究领域的分歧,也跨越这两个学科,而且许多学者也坚称:"真正的"文化研究应该超越文本分析本身。他们认为文本必须放在特定的物质条件下来理解,这些物质条件时常被界定为是构成生产、文本与读者等不同阶段的"回路"(circuit)。他们认为,无论分析的架构本身多么精密,也无论文本可以被界定的范围有多广,文本分析本身对于理解文化的循环传播与意义的生产而言,都有使用上的局限。换句话说,文本必须被视为既是特定社会、文化与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更是此一循环传播的主要载体。理查德·约翰逊继斯图尔特·霍尔之后成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他提出了一个较细致的主张,即厘清"文本"如何被理解是很重要的事情。他援引了一些学者的研究,这些学者为了他们的论述实践而探讨文学文本,并因此产生了如赛德之帝国主义(Said, 1978)的概念,并认为对于这些文本或文类的重新评估,"并未涉及文学文本本身,反而与'较大之社会文本'比较有关"(Johnson, 1997: 465),"较大之社会文本"亦即用来建构那些文本的权力论述,而此种权力论述已经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在思考"文本"在文化研究中所占据的地位时,霍尔的一番话显得受益匪浅:"对我而言,如果未注意到象征符号的

重要性，那么将无法完成文化研究，因为文本、语言、主体性以及再现正构成了文化研究的主要基础”（Hall，1996：403，引自 Johnson，1997：464）。因此，对约翰逊与霍尔而言，文本是文化研究中一个关键性要素，但是正如他们所言，构成如此研究的，是文本的一个扩充概念。

举例而言，让我们试着思考肥皂剧这种文化形式。肥皂剧是由电视与某些广播组织制作而成，其结构具有特定的类型公式，透过电视与广播来播送，并且拥有大量的收视、收听群众。此种文本本身可以成为分析的主题，其中多与国家认同、种族、阶级、性别与性欲特质等主题相关。但是，这些是否就已涵盖了所有的肥皂剧文本？辅助一部受欢迎之肥皂剧生成的诸多辅助文本，是否也是一种肥皂剧文本？八卦小报、八卦杂志及其他电视类型，例如，谈话节目、书籍以及影迷或该影集的临时拥护者之间非常短暂但却非常重要的聊天、八卦等，是否也称得上是一种肥皂剧文本？日常生活中关于电视节目的闲聊，尤其是对电视剧的八卦，都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交流。在此，我们将进入如何消费肥皂剧以及其他流行文化形式、身份认同的建构、自我与他人之间关系的议题中。如此一个简单的例子应该足以提醒我们，若将文本与社会区分开来，其所可能蕴含的风险会有多高。

因此，我们可以同意约翰逊质疑社会与文本之间二元划分的观点，并坚称这是一种“虚假的”（phoney）区分方式。甚至，他还声称社会是文本的，而且社会与文本之间的划分并不符合文化研究的意图，因为文化研究试图透过对问题提出响应、讨论、对话以及观察等方式，来挖掘文化的结构与形式。但是现在的状况却是，学术界把文本、文化工艺品以及使用与理解这些文化产品的方式的研究，都视为是为了特定研究以及为了特定分析目的而进行的。然而，对我们大部分人而言，大众媒体形式以及其他“文本”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它们提供一种共享的社会流行与文化流行，而且它们的影像、词汇与特征时常进入大众记忆之中。除此之外，我们也援引了丰富的叙事、影像与风格资源（这些资源流通于媒体的符号世界之中），来思考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即将成为何种人等问题。

文化研究经过 1960 年代与 1970 年代的发展，逐渐重视“生活

的”与“社会的”概念,这的确需要多种方法的引荐,以帮助研究者探讨文化文本与工艺品的生产与消费的特定实践与语境。(这些研究的发展将在第3章中有更为完整的说明。)就现在而言,我想要探讨的是:对1970年代的研究者而言,当时有哪些既存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对新的社会现象提出新的问题,例如,青少年亚文化、流行文化与媒体等社会现象。社会学与人类学即是两个与此相关的学科领域。在这个阶段里,社会学本身已开始朝向更属于质性方法、诠释方法的方向迈进,而威廉斯所提出的“生活文化”概念,所建议的即是一种人类学的研究路径。简要地探讨社会学、人类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几个主要差异,将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社会学、人类学与文化研究: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方法

也许当我们探讨方法与方法论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学科领域之间及领域内的差异。文化研究从不同的学科中借取不同的方法,例如,文本分析、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y)与历史分析、精神分析,将这些方法挪用至适当的研究对象上。尤其,当我们试图寻求探讨生活文化的社会实践时,即是借取社会学与人类学所发展出来的方法。因此,我们可以界定出许多被社会学标签为“质性”的方法,以及被人类学标签为“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之所以采用这些方法,有时是为了补足某些研究方法,使其更符合其他学科的需求,而在文化研究这把大伞下的研究计划,主要还是从社会学与人类学观点出发的文化批判。在这个阶段里,对于文化研究批判本质的概要检视,可以有效地彰显出文化研究在探究日常生活文化研究路径中的特殊性,以及必须改写既存方法的必要性。批判无可避免地将指出其中的阙漏及缺陷,而且可以用下述方法来加以归类:

1. 规模与广度。来自社会学最常见的批判为:文化研究是关注特定例子的研究,他们所采取的受访者数量有限,因此,时常不具代表性与概括性(这两个特性是社会学研究的效度标准)。

2. 深度与持续性。人类学的主要批判在于:文化研究并未将自己放进文化或社会场域或其受访者所处的世界之中。他们认为,文化研究甚少尝试提供涵盖主体及其文化实践的广义时空语境。

从这些批判所造成的冲击看来,以文化研究之名所进行的研究不仅无法在广度上获得有效性,也无法满足特定标准下所谓的"深度"。如此的假定认为:文化研究以与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路径相符合的方法来概念化主体、社会世界甚至文化。文化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当然受到既存研究路径所要求的形塑与影响,而本书即是要探讨他们如何采用这些方法以及对于这些方法的批判观点。但是现在,我想要过度简化社会学与人类学批判的意涵,这是为了要了解文化研究路径的特殊性。

幅度与广度

思考采用不同方法所可能造成的后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援引大量样本的调查法可以有效地彰显社会模式或整体趋势。举例而言,透过大量的数据组合,我们可以建立出究竟有多少人参与足球竞赛,或者有多少人正在观看《东区居民》影集的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可以进一步地辨识出哪些社会阶级参与了足球竞赛以及观看《东区居民》,而且就某种程度而言,也可以说明他们参与这些活动的理由。因此,一项采用这些方法的社会学研究,其实就已经是在从事"人口学"的研究了(Johnson, 1997)。虽然此种研究可以对现象提出许多批判性及分析性的问题,并透过各种方法(无论是质性方法或是量化的方法)发展出诸多用以理解现象的理论、概念以及范畴,但其主要还是致力于生产出某些具代表性且具概括性的结果,而且这些结果可以更清楚地显示出更广大母体的异动、形构、面向与变化。重点在于,实证研究使用质性方法(如深度访谈),试图从这些受访者身上发展出更深层的观点,并被当成是大规模研究所需的附属研究或初探研究。但是调查法所无法探讨的,却是对文化研究而言相当重要的问题,例如,为何要关注于这类文本与/或实践,这些文本与实践对人们的

日常生活而言具有什么意义,以及人们如何看待这些文本与实践的重要性等。除此之外,文化研究也致力于探讨这些实践如何与身份认同、自我观感以及社会关系有关,这些问题未必是较大样本能回答的。

深度与持续性

人类学者坚称,文化研究所采取的民族志方法,及其达成的研究成果并未能有效地处理他们的研究主题。这驱使我们去思考关于价值的问题,事实上即是指“浸入”(immersion)我们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的可行性。如此关于“适当的民族志”的假定,是由现今一些极具批判性、有胆识的人类学者所提出的,这些人类学者正在探讨某些特定时空地点里,迄今仍处于未知的“领域”与“文化”。但是,除却长期“观察”所必须涉及的侵入性问题之外,现在我们感兴趣的当代文化,(或多或少)即是那些我们身处其中的文化。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我们已经是自己研究的参与观察者了。但是,就根本而言,菲斯克(Fiske, 1996)认为,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批评未能理解那些主要对“意义生产”感兴趣的研究者的目标所在。对此我深感认同,但是我要更进一步指出,文化研究尝试达成的目标在于:探讨与社会建构以及文化认同相关的意义。这些关于认同与主体性以及生活文化之间关系的本质性问题,主要是出现在对于诠释、消费以及使用“文本”的理解上。值得争论的是,这需要长时间且密集地探讨意义的生产问题,而非长期地进行观察。相对于在亲密的对话访谈中仔细倾听人们说话,参与观察团体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观察工作,却未必能有较丰硕的收获。事实上,在此,扩大描述性观点的范围也许是达成此目标的唯一方法。对于社会与文化实践的丰富描述性观点,是相当有价值的,但是我们必须不断反问此种数据可能具有的知识论价值何在。也许采用一些更具创新性的方法,运用概念与分析架构,或许对我们的研究更为有效,而且也更符合研究的主题。

对文化研究而言,主要的问题在于:在各种社会层级与文化

过程中,有关意义及文化重要性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我们需要的是极具弹性的研究方法。人类学者玛丽莲·斯特拉森认为,一般而言,社会科学家总是“从某些特定、连结的方法(这些方法预期某些特定数据的种类)中仔细地筛选出”他们所要研究的主题,而且也强调研究方法要与研究的理论观点相关联。虽然这是一种可被接受的、极为严谨的研究方法获得方式,但同时也彰显出一些问题,是关于研究者可能感兴趣的问题与看法的种类。尤其,如果我们正关注的焦点是透过各种不同方法,“挖掘”文化与社会的形构及其过程。就此而言,重点在于:有许多与那些文化社会形构相关的元素,是我们一开始所无法认识的。因此,我们很难去预测自己研究可能进行的路径与途径。我们需要的是某些较具弹性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斯特拉森(Strathern,1999)的用语而言,是可以让我们“目眩神迷”的方法,就威利斯(Willis, 1980)的词汇而言,则是可以让我们对自己研究“感到讶异”的方法。这个获得方法的路径,彰显出文化与社会过程以及意义生产的动态本质,而且也能反映出形塑个人、行动者、或主体的独特形式、认同与主体性的复杂方法。身为社会学者,格拉泽与斯特劳斯也认为,即使是社会学中最具开放性的质性方法,也有可能在资料搜集的阶段,或在分析的阶段,倾向于在相当僵化且固定的范畴内,冻结研究主题的不同面向(Glaser and Strauss,1967)。

虽然当我们采用某些特定的标准时,很难发现真正属于文化研究的例子,但毫无疑问的是,仍有许多小型的研究都涉及了诸如青少年研究、媒体与传播研究等研究领域,而且也都暗示了可形塑进一步发展的新研究方向,尤其是与文化权力、阶级政治、性别与种族等相关的研究方向。此类研究的实例将在第3章以及本书的其他章节里做更细致的批判性评估。显而易见的是,就方法论而言,文化研究中关于“生活文化”的研究,都落在社会学研究路径以及与人类学相关的民族志研究路径之间。虽然这彰显出关于方法层面的特定议题,但是现在我却希望探讨两个与所有这些研究路径相关的问题领域,亦即那些关于政治以及实证研究的知识论等问题领域。

议题一：
建构“他者”——监控与展示

有一个相当严密的批判，其关注焦点在于探讨民族志与社会学在建构其宣称要描述的对象时，所扮演的角色。民族志实践与研究的历史相当悠久但也相当多元化。其历史可以追溯至早期的旅游书写，以及人类学者试图在他们消失之前“写下”文化，以期建立出人类学这门学科。如此的书写被视为是民族志者运用他或她的权力，将他们的凝视焦点放在某些不同的文化上，并且透过出版著作，让这些文化可以被他或她的社群中的读者看见。在这个过程里，人类学者试图将这些团体呈现为“他者”以及“异国的”，并强调“他们”（原始的）与“我们”（文明的）之间的差异。本章先前提及的爱德华·赛德即认为，人类学是诸多西方实践（与文学、艺术相关之实践）中的一种，在这些实践里，西方试图以它的“帝国”眼光看待东方的他者，并借此界定出何谓西方、何谓非西方（Said, 1978）。除了赛德杰出的著作外，许多的学者也都证明了在文化产品中，已经出现了所谓的殖民主义论述，包括旅游书写、小说、艺术、“种族”收藏品以及博物馆的展览等文化产物。米歇尔·狄塞托论及人类学这个学科的发展时，指出，人类学者作为一个温顺的且感激地主文化（host culture）的盛情款待的客人，以及人类学者作为撰写专题论文的作者，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断裂。后者的身份彰显出机构的背景（科学背景与社会背景）以及利益（学术上的、专业上的、经济上的利益等），为了取得这些利益，盛情的款待在客观上只是一种手段。因此他认为，巴西的波若斯社会（Bororos）已经慢慢地沉入集体死亡，而世界闻名的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也将自己划归至法国学派之中。

虽然这些都是过去民族志与殖民权力运作的最佳范例，但是我们却可以探查西方，界定出相似的权力机制，以及那些存在于民族志与社会学研究史中，可见的权力与监控机制，特别是与都市化过程相关者。

《另一半人们的生活》是雅各布·里斯于1890年对于新都市

化后的纽约贫民,所作的一项视觉研究。这本著作的标题与里斯的主要目标,提醒着我们有两个对于民族志研究实践最为显著的批判。“另一半人们”意味着一个社会中对于“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划分,那些属于“另一半人们”的成员是那些相异于我们的人士。其次,将焦点放在那些被当成是“他者”的贫民与弱势群体上,某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在将他们美学化成具有“异国情调者”,而且是透过各种不同的社会与文化文本来进行类似的建构。虽然这些建构典范本身已经遭受诸多质疑,但是这些典范却仍时常出现在早期人类学、社会学、纪实摄影等作品之中。举例而言,我们可以在优势劳工阶级或低下收入群体中发现这些典范的踪迹,而这些群体正是文化研究中大多数研究所关注的焦点。安德鲁·托尔森认为:“异国的文化种类可(持续地)在大型工业城市里的劳工阶级团体中被发现”(Tolson, 1990: 112)。他主张,这些研究实践具有悠久的历史,因而他透过诸多 19 世纪中期发展出来的重要机构场地,来追溯其历史。托尔森也提及一位新闻从业人员亨利·梅休,梅休在《伦敦晨报》中发表他自己的都市穷人调查与劳动状况的研究,结果在后来造就了 1851 年他的专著《伦敦劳工与伦敦穷人》的诞生。在这本著作中,他定义了何谓亚文化与都市亚文化。透过诸如梅休与里斯等“社会研究者”的著作,我们极有可能借此追溯亚文化、劳工阶级以及穷人在公共领域中出现的时期,并形构出一种 19 世纪中叶的特殊社会观点。托尔森称此观点为“社会学凝视”(sociological gaze),即是一种改革主义的社会干预机制,甚至透过各种不同符号与文本的建构机制,描绘出可见的“他者”。这种潜在性强而有力的“凝视”观点的形构,其历史面向应该提醒我们存在着一些令人头疼的议题与问题,而这些议题与问题普遍与研究“他者”的思想有关。直言之,这在本质上可能就是一种剥削。身为研究者,我们的任务在于赢得受访者的信任与信心,并鼓励他们能对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常规事务、他们的感觉,更包括显露一种最为私密的本性,以及吐露先前并未论及的故事。接着,我们试图再现从我们的受访者身上所搜集而来的素材,这些素材通常是流通于某些特定读者社群中的书写数据。因此,对于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以及我们如何进行的政治与伦理考虑,应该是我们最关注的议题,而且本书

也会不断地回到这些问题上。

议题二：真理的获得——经验主义的危险性

民族志方法时常会给人一种错觉，误认为此种方法极为简单。就部分而言，这是因为此种方法非常近似于我们的常识，也非常类似于社会世界的日常生活途径。我们借着遵守结构和规约来掌握世界的意义，以我们对于社会、文化的理解能力为基础，透过观察来理解世界，透过对话与讨论，建立起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这可能会造成人们以一种非反身性的、天真的方法来理解他们的生活，或使研究者记下观察结果。描述是建立在书写文本的各种声音的描述上，并被当成是真实经验的证据或生活方式的记述。民族志者在适当的时刻出现，而民族志文本则尽全力地说服我们相信民族志者所言。

然而，这个民族志的特征或许相当具有实用性。根据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早期所陈述的观点，他们对于“民族志”的兴趣，就部分而言，是受那些可能会被描述成民族志工作的弱点，例如，民族志的天真、“对抗理论化约论的优势”所驱使（Hall et al.，1980：74）。这对那些试图以更为纯熟的理论观点看待世界的研究人员而言，应该极具吸引力，但是一个好的实证研究却可能对这些理论假定提出质疑。然而，正如我们即将在第 3 章所探讨的，显而易见地，1960 年代与 1970 年代期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者，特别说明了分析性与理论性的问题，他们之所以特别说明这些问题，并非仅是着眼于以他们自己的观点（或为了确保他们的观点）提供“经验”的描述或记录。

在挑战“真实的宣称”、事实与“真理”的宣称上，语言理论备显重要。由于人们与他人之间的沟通并非以极为中立的方式进行，所以语言理论特别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与意识形态功能。语言以及语言的使用是相当任意的，它的运作犹如一套系统，语言并非简单地意指其所描述的对象，语言的使用还依赖于共通的社会与文化规约。因此，我们不能将语言视为是对于可被证明的社

会世界的描述、解释与观点的中立性媒介。如此发生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里的后结构转向，其实是来自于许多不同的学科领域与思想体系。因此，透过社会过程意识到知识的建构本质，已经在知识论思想以及整个“真理”的概念上，或者更确切而言，在对于真理的宣称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就此而言，一个极为关键性的词汇即是所谓的再现。很明显地，这些观点已经对我们用来理解视觉再现的方法产生极大的冲击，摄影是一个相当好的例子。摄影意指“真实”这个观点的历史相当悠久，这是因为摄影在诸如法律体系、报业以及广播媒体等领域里，一直占据着“证据”的地位。近年来与此概念相关的论辩即指出摄影的建构本质，即使是那些强烈宣称其真实，并直指他们的确呈现那个“外在于那里”的真实世界的文化纪实摄影，也都具有建构的本质。纪实摄影是经过筛选后的产物，亦即什么对象以何种原因进入摄影镜头。这个发展的过程绝非中立的，甚至受到各种愈来愈纯熟的操作技巧所宰制。当然，意义并非不证自明，而是依它们被陈列或展示的语境而定，例如，在报纸上或展览墙上，伴随着哪些语言文本出现。这些因素都在意义的生产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而且意义绝非固定不变或可预测的。如此，对于视觉再现的短暂转向意味着不同的“真理”宣称或获得“真实”的方法，都不断地遭受质疑。研究的成果也可能因为它们对真理的宣称以及它们赖以宣称的基础，而遭受质疑。正如米达尔（Myrdal，1969）所言，也许民族志实践的主要认知在于：“民族志涉及一连串真理的实验，而这些真理实验绝对无法单独地完成。”身为研究者，我们从来就无法真正获得任何社会与文化“完整真实”的面貌，相反地，从我们的特定观点看来，我们仅能产生一个关于真实的译本，仅能提供给他人一个我们视之为最适当的观点作为思考。

反身性、暂时性与适切性

上文所述对于再现的广泛批判已对人类学产生极大的影响。马库斯与费希尔（Marcus and Fischer，1986）即指出，诠释人类学所使用的描述方式，涵盖了“各种对于民族志实践与文化概

念的反思”。格尔茨(Geertz, 1973)将文化形容为一种文本的隐喻,已经开启了民族志研究中关于各个诠释阶段的重要时刻的论辩。格尔茨与马库斯特别指出,这些论辩来自于那些将民族志文本视为一种建构的重要著作。回到民族志实践的“观点”这个概念上,这即是在于强调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并且这种表现得到长远的承认。正是此种反思的可能性(反身性),让民族志方法得以被用来探讨及研究文化的过程和意义的生产。在此,还须对反身性多加解释,但若能思考反身性与我们更广泛的知识论立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将显得更为有益。反身性的研究路径质疑研究中的理论假设与其他假设。此外,此种研究路径会在资料搜集时,主动探查它的研究范畴(例如性别、阶级、族裔等范畴)。因此,借着仔细地关注社会行动者、文化以及社会过程,某些理论工作的过度宣称得以被质疑与研究。所以,反身性的过程允许研究计划得以继续发展,并追求特定的手段。这个过程极为开放,值得探索。在一项良好的民族志研究计划里,研究者可以被视为是进入到各种不同的对话环境里。首先,是与她或他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对话。在此,透过对话访谈及较不正式的会话所产生的对话,表现出开放性研究的可能性。其次,你可以利用不同的理论观点或架构,与你的研究数据进行对话。再次,你当然也可以透过与你的同僚讨论你的研究来进行对话,最后,当你在书写或呈现研究成果(通常是以书写文本的形式来表现)时,不妨进到你的对话中去寻求书写的依据。在这些过程的每一个步骤里,你都有机会反思你的所作所为,反思你究竟在生产哪一种知识,反思哪些概念过于僵化、哪些研究架构隐藏的意义比彰显的意义还要多。这些反思都非常重要,而且也都是相当实用的知识论问题,如果你能在你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提出这些知识论的问题,那么你就已经获得了一种弹性的、具反身性的研究路径了。

试想,你是一位研究音乐飨宴的民族志研究者。你在英国生活并工作,因而受邀至葛拉斯顿伯里音乐节,和参与该音乐节的人士进行对话、聆听音乐、进行观察与摄影。接着,试想各种不同的资料“片段”:一张黑白照片、一张传单、一个声音正在告诉你一则故事、一个观察者对于该音乐节的观点、一则对于音乐文本或

音乐表演的分析、一张音乐节赞助者的清单,以及一段对于空间、噪声、气味与氛围的描述。身为一位研究者,你可能会发现你正在处理各种诸如此类的素材,而你却没有任何可清楚、确实而快速地处理这些数据的规则可循。这些资料片段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加以组合与并置,这些数据可能是某一个事件的多元反映,因此,有可能不断地产生变化与流动。就像是万花筒一般,透过使用这些变化万千的数据,我们可以产生形状与颜色不断改变的复杂模式。这意味着,根本不存在着一种对于该音乐节的"真理"或真实故事,相反地,仅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因此,我们的第一个知识论观察在于,我们并非透过某些规定好的、固定的以及"逻辑的"方法(例如,自然科学所主张的逻辑方法)来认识我们的社会与符号世界,而是透过各种不同的实践,发现社会与符号世界所隐藏的意义,而这些意义是在特定的社会与文化场景中,被生产出来的。此外,发生在这些世界里的事情是无法预测的,我们无法得知我们即将发现的事物是什么。如此的认识方法,与实证主义获得知识的路径截然不同。知识及认识世界的方法并非如实证主义模式所宣称的如此明确,如今,即使是自然科学也开始意识到,当我们相信某种"科学"时,我们是正在(主要是对我们自己)运用某种诡计。

然而,仍然有一种对于"真实"与"本真性"的恐惧回荡在民族志里。某种程度而言,有人认为,比起透过文本分析或任何记录形式的分析,借着倾听与描述特定语境里人们的所作所为,比较能够让我们接近所谓的"真理"。巴克在《新族群性与都市文化》中关于方法论的讨论,对我们的帮助极大:

> 在此,我的意图并非在于将民族志视为"街上真正发生之事"的特权裁决者,也并非在于将这些文化理论中的新发展当成是不可改变的和缺乏经验基础的……这意味着接受一种偶然而适度的知识论,而且此种知识论试图依据一种对于编码、文本推移以及书写民族志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语艺修辞整合的反思性知觉,来达成严谨的报告形式。(Back, 1996: 5)

在此,巴克谈及民族志的局限,基于我们能进入"他者"的社

会世界的过度宣称，以及其中所隐含的危险性。巴克也指出，能对我们研究的书写观点进行反思，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

同样地，文化人类学者珀尼马·曼凯卡将她的工作描述为“探讨民族志潜能且能唤起感情（evocative）的一种文化分析类型，此种分析类型的目标在于，再现出感觉的特定结构”（Mankekar，1999：49）。

“唤起感情”（evocation）的概念以及“感觉结构”这两个相当模糊的词汇，其所意指的比较偏向于想象的或虚构的工作，而非社会研究工作，但是此种研究路径也许比较适用于民族志者所希望检视的现象种类；亦即，人类及其生产的意义和他们投入于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等现象。

我希望截至目前为止，对于民族志的研究路径的说明已相当清楚，虽然民族志的研究路径仍存在着某些问题与困境，但是此种研究路径也引发了诸多令人期待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都是目前学术研究氛围中最为迫切的问题。伊丽莎白·普罗宾指出：

> 就以上所述的这些（后现代）学术状况而言，对于许多人特别关注于民族志的“问题”，这一点也不会让人感到惊讶……就民族志的观点而言，某些问题似乎更不容忽视，尤其是关于再现他者的（不）可能性的问题、愈来愈难将白人男性建构为专家的问题以及科学逐渐失去作为主宰后设叙事的重要性等。简言之，关于人们可以从哪里发声、可以向谁发言以及人们为何而发声等问题，似乎比较能够在民族志里获得立即的解决，而非在其他领域中寻获。（Probyn，1993：61）

这些都是有关政治研究的问题，以及关于我们如何在自己的研究中再现他人并以何种方式再现的问题。我们身为研究者的身份为何？我们不仅具有干涉他人生活的权利，更具有使用他们的话语、经验以及自由发言，并借此形构我们的学位论文、论文与著述基础的权利？但是普罗宾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关于我们如何将我们自己视为知识生产者（与我们所选的研究主题相关的知识）的知识论问题，同时更是关于我们如何在研究中找到一个发声位置的问题。

一般而言，对于某些人类学支派的兴趣与关注，正不断地与文化研究汇流，尤其是关于文化的建构本质等概念。阿克希尔·古普塔与詹姆斯·弗格森认为，文化的建构特性及其作为某种处于进行中的概念，已经彻底挑战了人类学的假定，因为人类学假定："文化"就某种程度而言，是存在于特定的场景之中，局限在坐落于与连结于某些空间与地点的团体里。这些假定如今都已备受挑战，而且研究者也指出，文化本身是某一过程中的一部分，而非一个沉浸在某些团体或社会环境中便可寻获的既定的、固定的、可观察的实体。关于文化认同与差异的问题，如今也被放在全球资本流动与迁徙的语境下，以全新的方法加以空间化，因而这些问题再也无法被视为是固定并坐落于某个特定时空之中。正如古普塔与弗格森所指，这意味着"所有与地点、人物以及文化相关的事物全都是必须被解释的社会、历史产物，而非既定的自然事实。同样地，古典风格的'人与文化'民族志也是如此，甚至，此类的民族志在文化上是更为混乱的呈现"（Gupta and Ferguson，1997：4）。显而易见地，这个文化上混乱的呈现，其本质可能包含了人、文化与经济、全球传播以及意义生产实践等的跨国流动，这些跨国流动的复杂性让我们在试图"捕捉生活文化"时，比起关注某一个被假定为固定的、受限的文化社群，更具挑战性。然而，古普塔与弗格森却坚称，民族志将来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而人类学也仍与文化研究的研究领域息息相关。因此，对于文本与文化产品的解读以及公开的再现，可以补足人类学对于日常生活规约与生活经验的强调。这些转变令人兴奋之处在于，它们提供了结合理论与方法论路径的可能性，这不仅可以产生理论上的反思，更能赋予实证工作有力的基础，因为实证研究工作可以在过程与流动中，建构文化与主体性的概念。这即是文化研究所需要的研究路径。

在本章里，我试图指出民族志对文化研究的帮助，并摘要出对民族志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实践与政治的主要批判，借此引荐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这是为了指出，存在于社会学、文本与民族志的关注之间，对于"生活文化"这个充满争议的研究领域的论

辩。我在此主要强调的重点是:内含于各种方法之间的论辩,其实即是对于知识论的争辩,亦即世界是被发现的,知识与"真理"也总是暂时且偶然的。在下一个章节里,我将探讨民族志里一个极为关键且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即是文化研究中,尤其是关于生活文化研究中所谓的"经验"概念。

第2章 构连经验

Articulating Experience

> 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说生活(the lived)只不过是经验的另一种说法，但是我们却必须为它找到一个适当的字眼。(Williams, 1979: 168)

在前一章里，我们曾提及"经验"在文化研究早期发展中的重要性。在开始简述文化研究的研究设计时，本章认为，研究实践即界定出何谓文化研究(而本章是本书大论点中的一部分)。因此，"经验"在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以被视为是研究计划本身以及个人或集体研究者的"传记"中所处理的议题；更确切而言，文化研究可以被视为是来自于受访者的"数据"中所处理的议题。现在，我希望能够更透彻地检视这个概念，以及使用这个概念的可能方法，因为这可能对我们的研究有所帮助。就像所有可能引起误解的简单概念，"经验"这个概念也具有高度的争议性。经验的概念与浅显易懂、简单以及本真性等概念相关，也与民主精神有关。就像所有的概念一样，经验的概念也充满争议，而且对于"经验"及其地位的理解，也随着文化研究的发展而不断地产生改变。跟随着普罗宾的观点，我的目标在于：阐释经验属于实用政治与批判的范畴，而非仅是与本真性或"常识与意识形态"等概念相关的类目。甚至，我同意普罗宾所坚持的观点，她认为经验是一个重要的知识论范畴，而且经验可以被当成是一种"认识的方法"，亦即同时认识我们自己以及认识其他"存在方式"的方法。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为"经验"的概念提出理论。理论时常被视为是艰涩难懂且抽象的，是某种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必须克服的难题。在此，我想对理论(Theory，以大写 T 来

表示）与理论化（theorising）之间作出一个区分，这是一种研究实践，同时也是一项好的研究的一部分。为了要理论化经验，“构连”（articulation）将是一个相当实用的概念。经验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论述性的“构连场域”（site of articulation），透过此种构连场域，主体性与认同的概念得以被形塑与建构。这与我们如何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世界中的方法有关，也与我们如何反身性地发现我们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有关。因此，经验并非我们生存的真正原始起源，相反地，经验仅是我们生存过程中的一部分，透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构连出认同的意义。

我希望透过举例的方式来说明，尤其是以霍尔的例子为主，更确切而言，我将以霍尔的双重自我为例。身为一名作者与文化理论学者的霍尔，其身份认同是多重的，而且他在生活中经历过许多特殊的事件。霍尔在诸多文章与访谈中，透露出这种“双重身份”的特性。他在一篇名为《最少的自我》（Hall，1987）的文章中，曾在“附注”里提及他的“背景”：生长于牙买加、他的家人以及他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他家乡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他如何离开那里并成为一个英国移民者。关于他自己的流动身份（各种身份）等问题，也都出现在这一短篇著作中。我们对于人们告诉我们关于他们的背景与家庭感到熟悉，但是霍尔却不断反思其个人历史，以及这个历史如何造就他这个人。他并非直截了当地说明他的历史，而是透过特殊的论述方式（且时常是关于他某些苦痛的现实经验）来说明他个人的历史。霍尔透过自身的经验来反思认同理论，并提及：“但是我现在的经验正是后现代主义的论述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并非是一种全新的经验，而是一种对于过去一直存在的身份认同的认识”（Hall，in Gray and McGuigan，1993：134）。霍尔在此表现出一种有趣的双重特性。在透过理论阐述（后现代的认同理论）反思他汲取自经验、汲取自他的生存方式（本体论）的知识时，他已经在生产知识了（知识论）。因此，他的经验被认为是超越了个人观点，并以历史的面向，将自身经验放进一个更具理论性、更为广义的（后）现代认同建构的普遍概念中。

威廉斯也以相同方式论及经验的实用性：“如果我们想要定位在新研究中突然产生的认知震撼，定位那些特别且可被定义的

重要事件，那么确认个人经验的本体面向则是必要的”（Williams，1979：164）。

但是霍尔的认知告诉我们更多关于确认“经验”的必要性。他从“边缘”（margins）的经验谈起，身为从牙买加移往英国的移民者，经验赋予他某些先前未曾意识到的身份特征；在成为一个移民者的过程里，他第一次认识到身为黑人所代表的意义。他体验到现代的移民经验所时常提及的关键要素，即碎片化（fragmentation）与边缘化（marginalisation）。后现代理论才刚意识到生活经验的重要性的事实，正透露了西方理论学者的立场，以及忽视边缘化的生活经验所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些边缘化的生活经验很容易被贬抑或忽略）。

因此，关注于生活、关注于个人如何看待其生命，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与其经验之间的关系，可以产生新的知识以及威廉斯所说的“认知的震撼”（shock of recognition）。倘若文化研究要持续保持在一种动态的研究领域，并能避免变成一门因袭不变的研究学科，那么对于上述议题的关注，将是文化研究的根本所在。

在早期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研究里，经验（尤其是边缘团体，如青少年团体、年轻女性或女孩团体的经验）一直被视为是真实而有价值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在为研究寻找新的立论基础、在研究中引荐崭新而至今尚未被提及的声音时，彰显那些经验的陈述或表达的动力，才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正如普罗宾对于女性主义理论的建议：“（他们）要不是以经验本身来证实经验，就是不假思索地反驳其可能性”（Probyn，1993：5）。不假思索地反驳其可能性，是一种可行的方法。这仅仅表示，宣称“真正的观点”所可能隐含的危险性实在太高了，以至于“真正的观点”作为任何知识的基础，都该被怀疑。在普罗宾重新评估威廉斯的作品后，她发现“经验”是威廉斯作品的一个主要范畴，而且对普罗宾而言，也是一个极重要的灵感源头。她论及：“我希望将经验视为一个关键的词汇，并勾勒出威廉斯在本体论与知识论之间所建构的一种丰富的紧张关系”（Probyn，1993：18）。我同意普罗宾的看法，因为对我们的研究而言，经验仍旧是一个丰富且成果丰硕的研究范畴，而普罗宾也援引威廉斯的观点，并指出三种分析的可能性，或是三种可以用来保留或动员“他人”经验的方法，同时也

包括以社会文化的分析，来理解我们自己的经验。然而，重要且显而易见的是：威廉斯所致力于检视的，是他所谓的“无法解决的……连续性的社会物质过程”的本质。这个过程是由政治、艺术、经济与家庭组织所构成，并作为构成整体的要素。但是威廉斯所强调的重点在于，这些元素彼此之间无可避免地与生活经验密切相关。很明显地，威廉斯正试图让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模式与生产模式，成为主宰其他社会整体的主要模式。有趣但也同时困扰着他的是，他采用自己的经验来催生他的理论。他的三个分析命题包括：

1. 经验可以是全面性的，并且用来隐藏不同结构之间的关联性。

2. 经验本身涵盖了社会形式的组成。

3. 批判者本身的经验可能驱使他或她去分析他们与不同层级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关系（引自 Probyn，1993）。

这三个命题中的前两个有助于思考：当我们试图在自己的研究中处理他人的经验时，我们如何分析性与批判性地运用经验。第三个命题则引荐了批判者或研究者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仅对我们的理论与分析工作相当有帮助，更能应用于这些理论的分析工作之中。因此，身为研究者，我们自己对于日常生活与文化的经验，不但不会造成我们研究的困扰，而且也不会动摇或让我们的研究产生偏见，我们的这些经验应该被承认并应用到我们的学术工作之中。

为了要了解经验可能会在我们的研究中发挥什么样的功效，依序发展这三项命题或许将大有帮助：

1. 经验可以是全面性的，并且隐藏不同结构之间的关联性。这个命题在于警告，经验可能且很容易被当成一种常识与意识形态的类目。如此一来，举例而言，经验就可能意味着一种独特的、主动的人类主体性的存在，他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自由意志，并自由地进行选择。这是一个在西方社会与文化中，被高度接受且通常是被成功运作的个人意识形态，此种意识形态抹煞了结构的运作情形及其局限。因此，威廉斯如此说道：

在某些特定的时期里，经验恰好处于最不受重视的情

况,因为经验被视为是阻扰了这个一致过程的实现,并隐蔽了不同结构之间的关联性——这并非意指那些未被注意到的组合与从属关系,或是差异与不平等关系、残余与新兴等关系,赋予了这些不同结构之间关联性特殊的本质(Williamson, 1978: 138)。

2. 经验本身涵盖了社会形式的组成。换句话说,正如普罗宾所言,"虽然经验所描述的是日常生活或'生活方式',但是它也同时是分析那些构成真实的关系的关键所在"(Probyn, 1993:18)。如此一来,经验即是透过语言而得以表达与构连的。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己,我们如何"诉说自己的故事",或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向他人提及我们所生活的地方。作为独立的个体,我们并非阐释自己经验的真正来源,反而仅是在我们所处的特定社会、文化世界内所占位置的中介者。因此,当我们从他人身上获得一些观点时,我们正被置于知识、地位、论述与符号这个储存类目的游戏中,透过这个游戏,"个人"可以构连或表达他们"自己的"经验。威廉斯特别坚持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经验到的事物赋予价值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这么做将可获得对人类生活与社会的丰富理解,更因为分析若仅强调经济与政治方面,则会忽略了社会生活本身正是构成社会的要素。他主张,这即是他的经验所告诉他的。"人与社会并非受制于权力、财产与生产之间的关系"(Williamson, 1978: 138)。威廉斯回应当时的学术氛围:当时公领域与男性领域备受瞩目,但是私领域与家庭的私密世界却被学术界排拒于边缘领域内。

3. 批判者本身的经验可能驱使他或她去分析自身与不同层级社会形构之间的关系。身为研究者与学者,我们是自己感兴趣的世界中的一份子。简言之,我们以社会生存者的身份经验着世界,这样的身份时常提供我们"理论化"世界的切入点。在我开始攻读更高的学位前,在前往位于镇上办公室的公交车上,我不断思忖:为何成千上万的人,日复一日地踏上如此相似的规律旅程。这是一次相当贴近实证经验的观察,同时也立下我想解释社会以及解释我研究的学术好奇心之起始点。当我开始学习、阅读并进行思考后,我开始转向经济理论、劳动理论、家庭与性别理论,希

望借此分析我自己的生活经验,这些生活经验即威廉斯所谓"无法解决的"社会经验。对普罗宾而言,有一种危机存在:"生活经验"已经逐渐沦为学术著作中的"另一种咒文、另一种抽象的研究对象"。为了要赋予生活经验真实意涵,批评家与学者必须要"在理论的领域里",注入他们自己的经验才行(Probyn, 1993: 21)。

威廉斯所论及的是一种将经验予以概念化的方法,此种方法让经验去除其浪漫真实的起源,并将经验放入一个丰富来源里,成为可供学生与研究者从事生活文化研究的资源,这方法也为普罗宾所强调。威廉斯声称我们可以借由意识到我们自己的主体性与经验,以及承认他人的经验不仅具有本体论的价值,更具有知识论价值等方法,来生产知识并获得认识世界的方式。

在下文里,我将讨论使用经验的不同方式,以及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当经验以如此的方式被使用,而且可能成为压倒性的概念而隐蔽了不同结构之间的关连性时,究竟会造成什么后果?

记录"经验"

早期的文化研究学者坚称文化研究具有民主化的可能性,并能将不同的观点带入定义狭隘的知识领域内,因此,这些观点都致力于探求"生活经验",并以知识与经验本身作为探求的基础。人们究竟是如何或者是以何种方式,在特定的环境背景下(尤其是那些受限于不利的社会与文化因素下的人们)思考、表达生活的经验?如此的研究路径可能是早期文化研究的精髓,尤其是青少年亚文化的研究所特别关注的焦点。在此类研究中,研究者希望研究与探索劳工阶级青少年的"真实"世界,并提出如下的问题:究竟生活在如此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是什么样的滋味?阶级与不断改变中的劳工阶级生活文化,是如何影响这一个世代?年轻人如何能够理解他们自身的存在(其意义为何)?他们所投入的劳动与休闲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从这些行动者或主体的观点出发来看待世界,是这些研究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就方法论而言,为了要获得对这些生活与社会世界的丰富且完整的观点,他

们采取了质性的研究技巧，主要是对这些相关行动者进行参与观察与访谈。“如实诉说”（telling it like it is）并让底层人士（英国与美国社会中的底层人士）得以发声，是此类研究路径以及此种研究潮流的一致宣称。

女性主义社会学与文化研究中一些相似的研究，也都致力于彰显女性不仅被隔离在特定的家务生活中，也同时被孤立在“女性职场”的圈套中（Gavron，1968；Comer，1984）。此类的研究工作探讨了女性生活与经验的不同方面，例如，她们与医学专家的接触、“家庭主妇”如何使用广播与电视、女性的闲暇活动、劳工阶级女性如何获得关于柔性特质（femininity）的知识等（McRobbie，1978；Hobson，1981；Graham，1984；Deem，1986）。所有的这些研究都以经验为基础，也都使用了经验数据，无论是直接或间接的，这些研究都依据女性经验的表达来获得研究资料。关注女性经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她们的经验被大部分的女性主义研究视为是一种政治性的操弄。所以，这个时期的女性主义研究可以被视为由各种不同的干预主义研究计划所组成，这类的研究认为必须关注女性的生活经验，也必须如实记录女性的生活经验。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学科领域之间，那些被描述为具有民主动机的研究者，她们的主要目标在于，记录那些“隐讳”的生活与世界，“诉说各种不同的故事”，以及彰显出不同的观点。此种研究模式时常具有政治意涵，这些研究中的许多参与者都是良好教育机会下的受益者，他们将自己的背景与经验带入他们的学术工作里，而且也都致力于反对传统学科范式的限制。

这些证据到目前为止都还相当重要，而且若能策略性地、政治性地运用，也都还相当有力。近期的一个例子是克莱尔·亚历山大关于亚洲青少年男子的研究，在此研究中，她采用了他们对于自身生活与文化实践的观点，借此反驳英国大众报纸所呈现的“亚洲帮派”的刻板印象。这些报纸将他们视为是对都市与内城市稳定性的一大威胁（Alexander，2000）。除了社会与文化研究学者外，还有谁会以对他们有利的立场，从相关的主体身上，一点一滴搜集每一个重要时刻的资料？

然而问题在于，如此的“记录”或“实证”的研究模式，却存在着诸多严重的局限，而这些局限在早期的研究中就已显现。就部

分而言，这些局限可以回溯到此一研究事业的核心，即“经验”这个充满疑问的范畴。历史学家琼·斯科特在历史编纂学中巧妙地讨论了经验的地位。在历史编纂学里，经验是真实的来源，也是斯科特所描述的“早已存在于那里”的描述性证据（Scott，1992）。因此，同样地，在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研究里，他们的研究目的也在于，将迄今尚未被彰显出来的生活与未被认识的经验予以凸显，使其成为可见的（visible）事物。然而，斯科特却不认同可见性（visibility）这个隐喻本身，因为这个隐喻暗示着，我们可以对世界与通透可知的客体进行直接而无需任何中介的理解。她认为，在历史中，以此研究路径为基础所累积的更有力的证据观点，不过是提供了一个放大了的既存图像而已。

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研究途径更广泛的可能后果是，让主流的学术研究得以适用于此种研究主体。因为，虽然对于人们生活与经验的丰富记录扩大了他们的面貌，但是这些数据可能或多或少仅是未加质疑地“拴在”既存的研究工作上。于是，这些观点变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另一个研究面向，而非对该领域的理论与方法论假定提出激进的挑战。有许多极为激进的问题必须被提出来，例如：为何这些观点会被以隐晦的形式提出？既存的方法论是如何将特定的认识方法划分出阶级差异？斯皮瓦克（Spivak，1987）提出此一疑问，我们有可能借着使用既存的、“合法的”理论路径，让“主体立场的配置得以显现”吗？她认为这些理论与方法都应该被质疑，除非它们可以让我们“了解复杂的操纵情形以及不断改变中的论述与物质过程，借由这些过程，认同可以被归因、被拒绝或被接受，但是这些过程本身并未被注意到，甚至未能达成它们的功用，因为它们从未被关注”（Spivak，1987：214）。

在威廉斯的第二个命题里，他指出：“经验涵盖了社会形式”，如此的见解提供我们一个用来思考经验的有效方法，同时也满足了斯皮瓦克的某些研究要求。

构连经验

现在，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找到可以用来思考如何连结起他人与我们的经验，以及社会组织结构之间关系的方法。同样地，普罗宾的论述对我们相当有帮助，她提及："就本体论的层次而言，经验涉及了介于构连的与生活的社会面向之间的断裂；就知识论的层次而言，经验催生了一种用来分析介于构连的与生活的社会面向之间关系的方法"（Probyn，1993：22）。比起那些认为对于特定团体的社会、文化生活之有限范围，好像只能存在着一种主要解释，而将经验化约至"经济"或"父权"等因素上的研究，普罗宾的想法需要更仔细地思索。这即是意味着直接将理论置于实证之上的本末倒置，或是粗暴地对待研究资料。也就是说，例如我身为一位女性，是一个完全被我在父权社会中的位置所决定的角色，这注定是一个必须忽视诸多际遇、活动与实践的角色，而在这些活动与实践中，我的性别认同被强调也被忽视。举例而言，在我所工作的大学里，在我与主要是由男性所组成的委员会会议中，我可以感觉到我被当成是"一位女性"；但是在我教学时，与学生、同僚进行讨论时（虽然我很明显的还是一位女性），我却觉得我的性别不再那么重要。在家庭、朋友、异性恋与同性恋关系中，性别政治各有所不同。

方法论的问题主要在于发现一种分析机制，此种分析机制可以捕捉到细微的生活经验，以及经验如何透过语言与行动或表演而表现出来。此种机制必须能够认知到生活文化的动态过程，但却不能忽视那些构成生活文化轨迹、生活选择以及世俗日常生活的主要力量。

构连是一种用来思考当代社会与文化复杂性，以及如何将这些复杂特性当成社会主体的有效方法。构连的概念是由拉克劳所发展出来，再由霍尔详尽发展至文化研究中；此一概念提供了一种方法，让我们得以思考介于个人行动（主体性）与广义的社会结构（决定性结构）之间复杂关系的反本质主义与反化约主义。对霍尔而言，经验在此所扮演的角色是一种基础，可以用来调和

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论述(Hall,1996)。

所以,“经验”是处理“统合”要素之显明形式的基础,其中各种元素以某种方式被结合在一起。这个概念的价值在于:它避免采用一种决定性的、机械性的模式。在此种模式里,强而有力的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形构了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甚至,此一概念让我们得以探索主体与不同论述元素之间的关系,假使效用强大,还得以让我们探索论述元素间的关系。较为决定性的“个人”与“社会”模式,留予主动的人类主体极少空间,供其在特定的语境下运用发展,也很难透过此特定语境,建构出特定的主体性与认同的构连。这同时也确认了一件事,由于某种程度的原因,主体并非存在于某个特定的语境里,如同以往被动地接受事物,而是主动地生产他所处的语境。在此,我们有诸多的可能性,可以在我们的研究中,将经验的角色予以概念化,并构连所谓的经验。

许多早期发展中的文化研究都援引了主体的概念,并假定阶级与性别等社会“归属”范畴是“主要的”主体位置。构连的概念开启了理解后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经验之流动的可能性,从重新连结起主体(结构)之间关系而衍生出的概念,即是所谓的“认同”概念。

认同的问题

1992年于伊利诺伊大学举办的“文化研究的现在与未来”(Cultural Studies Now and in the Future)研讨会中所发表的论文,已集结出版,书名即为《文化研究》(Grossberg et al.,1992)。麦克罗比指出:“认同”的主题贯穿了整本书。同样地,在另一本选集里,保罗·吉洛伊也写道:“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体会到,我与英国文化研究接触的创新性文本几乎都聚焦在认同的主题上”(Curran et al.,1996:44)。

但是麦克罗比所问及的“认同”,究竟意味着什么?霍尔指出,我们并非将认同理解成一条用来了解我们自身存在的基本核心的线索,相反地,经验才是“主要的处理基础:才是‘统合’各种

要素的显明形式，其中各种元素以某种方式被结合在一起”。霍尔认为，主体与“分散形构”相关，亦即主体是透过构连的过程而形成的。所以，主体栖居在不同、多样，且与可选择的话语相关的位置上，这些话语在建构他或她的认同的时候也使他或她的认同为他或她而被建构。

麦克罗比对认同概念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做出如下的反应：

> 认同可以被视为将文化研究拉进 1990 年代的主要概念，它扮演一种指导角色，引领人们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方法。认同并非以阶级主体，也非以精神分析主体或是意识形态主体，或是文本主体来理解人类主体，而是把人们当成行动的主体，此种行动主体对于自我的观感会投射到不断扩大范围的文化实践上，同时也是在文化实践中得以表达，这些文化实践包括文本、影像以及商品等。(McRobbie，1992：730)

麦克罗比又进一步观察到，虽然在文化研究里，对于认同概念在理论上日益精致的发展已有所讨论与描述，但是却很少出现真正的民族志研究，或真正处理关于社会文化认同的研究，亦即很少有反思性地探讨认同建构的研究出现。究竟我们是如何建构我们的自我意义以及认同？我们所采用的话语是属于哪些种类，是音乐、时尚或是语言？而这些表达的形式又是什么，例如，风格、体现以及我们告诉自己与他人的叙事？

威廉斯所提出的最后一个命题，要求我们必须在自己的研究中，对自己的立场进行反思。

我们从何处发声

对我而言，经验的概念与唐纳·哈乐韦所描述的知识论观点，或从特定优势观点发声的概念相关。这意味着，我们无法不带任何观点地进行发言，相反地，我们的发言都与我们所处的位置有关，无论是社会、文化或政治性立场。哈乐韦是诸多女性主义学者中，坚称必须承认这一事实的学者之一（Harding，1986，

1987; Haraway, 1990)。他们认为,有太多的理论学者与知识分子都倾向于不带任何立场地发言,倾向于将自己的身份视为脱离现实的仲裁者,仲裁真理与知识。从女性主义的观点而言,这生产的不仅是阳刚特质(偏颇的说法)的(masculinist)理论与知识,甚至低估且贬抑了可能来自于某一特定、特殊生活经验的知识价值。对利兹·斯坦利而言,这同时也是一种"拒绝"负责的方法,是一种不信任你用以生产知识的方式的方法(Stanley, 1990)。最后,我们有可能会无视于真实的单调平庸,而采取一种伪客观的学术立场,毫无质疑地拥抱"真实"而不对其真实性有所怀疑。

哈乐韦宣称,我们的本体论立场(亦即我们对于存有的经验)可能会独尊某些特定的知识种类。霍尔"知道"被边缘化为一个移民者以及身为"黑人"意味着什么,因此哈乐韦可能会宣称,如此的经验形成他对权力与歧视过程的独特见解。举例来说,这些见识可能是"白种"英国居民所没有的。反之,白种居民知识分子总是能够意识到,他们在自己的学术工作中所抱持的立场,因此,社会立场究竟如何透过他们的理论来发声呢?难道他们真的完全承认他们有自己的发声立场吗?或者仅仅只是,如戴尔谈到"白人属性"(whiteness)(Dyer, 1997)的时候所申辩的:一种缺席的立场或许会被知识分子当成一种显著且自然的立场。

人们对于立场不明确(或无法明确)的知识分子的批判与挑战,可能是在于坚称:经验是构成个人自我的根本要素,以及经验主导某一研究议题与实践问题的方向。女性主义学者一再声称经验的重要性,这或许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而且他们也首次在他们的研究中透露自己的立场,同时也广泛地政治化他们的学术实践。举例而言,哲学家桑德拉·哈丁就是诸多女性主义者中特别关注方法论在女性主义社会科学里的重要性的学者之一。她将女性的经验视为论述的起点,并主张:"一旦我们允诺要将女性的经验当成产生科学问题、假说与证据的主要来源之一,并依此设计出专为女性设计的研究,并将研究者放在与研究主体相同的批判层级时,我们就不可能做出传统的知识论假定"(Harding, 1987: 181)。

所以,就这种情况而言,这为社会科学创造出一种女性主义

议题，此种女性主义议题问及：谁是所谓的“知者”以及什么是可以被认识的事物、什么是被认为是“合法的”知识？客观性的本质是什么？研究者与她（他）的研究对象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适当关系？追求知识的目的究竟是什么（Harding，1987：181）？也就是说：“谁可以认识关于谁的知识？又可以借由什么方法来认识？基于什么样的目的？”因此，思考“经验”被使用的方式，以及经验被给予的地位为何，所采取的诠释模式又是什么，这些都是必然且必须思考的问题。

透过构连来学习

要将经验予以分类是非常困难且棘手的。然而，就我的观点而言，正是“经验”的艰涩难懂，才能成就强而有力的立论。就某方面而言，这又回到经验具有“令人震慑”的潜能上，但这并非意味着经验是真实事件天真无邪的表现，也不是某些被理解为能动主体所在之个人所表达的知识。相反地，经验是个人直接参与或观察某一事件的再现与表现；也在特定的环境场景里，积累关于世界的知识；经验也是关于人们生活在这些环境下是什么样子，以及人们在其中所产生的个人感觉与情感。因此，这意味着，接下来我们必须先将“经验”理解为一个尚未统一的范畴，这个范畴在各方面可能是流动的，可能基于不同的目的，而有不同的知识论结果。这些多变的范畴以及不同方法所产生的“数据”，可能极具挑战性、不易使用而且也可能难以应付，但是我们还是必须意识到：经验的本质与地位为何，分析与诠释的来源依据为何，以及经验与方法论和任何研究所采取的方法之间具有何种关联性。

在上一章节里曾指出，借着在我们的研究中引荐入不同的观点以及生存于这个世界中的各种不同方法，可使我们那些较为抽象的理论获得挑战与质疑。这必然使得日常生活的文化研究成为必要的研究工作，但是针对经验、主体性与认同的本质与地位，则需要更为精细的理解。

因此，研究总是结合了理论化的过程，以及为研究主题寻找

最合适且最丰富的研究方法的过程。本章所出现的关键性理论词汇,即经验、主体性与认同,可以被理解成是透过“生活文化”所构连而成的。在下一章节里,我们将探讨这些元素是如何被运用在文化研究这个重要维度的发展之中。

第3章 想象的共同体:奇观与平凡

Imagined Communities: The Spectacular and the Ordinary

本章的主要目的在于检视特定主题与研究对象出现的原因。在本章里,将问及为何某些特定团体会成为文化研究探讨"生活文化"的主要对象、他们如何被民族志研究制造为"他者",以及研究者如何涉入这方面的研究,假如真有其事的话。正如我在先前的章节中所主张的,如果理论、经验与方法都能整合进我们的研究实践中,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理解这些不同层次的问题,是如何结合为特定研究所探讨的实例。同时,我也希望思考,这些问题是如何根植于文化研究这个发展得比较宽广的领域中的。为了要探索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历史性的观点,并深入探查文化研究的早期发展。任何建构历史的尝试都涉及筛选的过程,但是在讲述同一个主题的可能历史中,却仅会出现一种历史观点。在本章的第一个部分里,我将对某一特定研究团体或整体轮廓的出现进行说明,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对象。我的故事将着重在知识分子通过对于理论与政治的批判性处理,来达到自我理解的过程,而这些理论与政治转而将"他者"界定为研究主题。这些主题将通过方法、政治、经验及其理论基础的构连阐释而被检视,因此,我将检视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两者对于经验的构连,以及研究者如何使用被研究对象的经验,他们的目的何在以及试图达成什么结果。我希望探讨文化研究实践的敏锐度,文化研究的研究实践所处理的问题是:什么是重要的、甚至对其他人的自我理解有极大影响的经验;还有特定团体的经验或"他者",是如何被研究者(知识分子)这些"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所生产。在此,我应该仔细说明的

是,虽然这个词汇是来自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共同体的概念(这个概念是通过新闻报业所建构出来的),但是我却使用这个词汇来界定某些特定团体,这些团体被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早期研究指称为“研究社群”(research communities)。我将在这个基础上指出:某些主要的特征已经成为所谓的文化研究的特征,但是在我这么做之前,我希望探查研究者本身如何形塑这些特征,以及其身份如何使他们将特定的研究建构为“他者”。这些研究者包括有:(1)“学术男孩与女孩”(scholarship boys and girls)。这个广义的词汇是用来意指1960年代晚期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时所出现的一群学者,这个世代的学者没有严谨的社会学背景,且在这个时期也首次接受较高等的教育。(2)第二种团体则是女性主义者,他们挑战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学术实践、理论与方法,着重于阶级的议题上,并将阶级视为关键的社会范畴。(3)第三种学者团体则是黑人知识分子团体,他们批评某些研究隐含着白人意识,并将黑人历史与经验系统性地排除在外。(4)最后一种团体则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与酷儿理论学者,他们关注享乐、反抗、愉悦、消费与性欲特质等相关议题。本章对于这些团体的定义与简介,主要目的是为了指出:通过研究者将他们的经验带入他们的研究中,文化研究中这一研究领域因而得以发展,并生产了文化研究的景观中的看点(figures on the landscape)。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我自己和伯明翰大学的渊源,在此将显得格外重要,主要是因为比起现在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早期的著作对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与学术轨迹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身为1980年代早期的大学生,我发现当时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著作最能让人感到振奋,最具挑战性,而且也是我所阅读过的著作中最为适当的学术著作。《工人阶级文化》这一选集坚称:文化应该被理解为每一个人所拥有的,而非仅是某些特权人士所独有;而在《识字断文的用途》一书中,理查德·霍格特论及他在利兹(Leeds)度过的童年时期。利兹是我自己的家乡,与我的经验密切相关。在1963年

时,霍格特担任伯明翰大学英语学系的教授,因为深感现存的英语学系与社会学系无法适当地研究当代文化,所以他建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他拉拢了来自于英语系的学者、研究同事以及研究生,并致力于厘清他们的研究领域。他们将自身经验与学术背景带进该中心里,对因循传统的研究工作提出批判,并开始界定出他们认为的、为了探究各种文化问题的新路径的正统性所需进行的工作。在快速变迁的英国战后时期的社会里,这些学者对既存的学科架构提出批判,因为这些学科架构并未能涵盖这些变迁的重要面向,也未能跳脱既存理论与分析方法的桎梏。此外,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发展后,该中心的成员也开始致力于寻求与学界之外文化政治之间的联系。因此,在早期的发展阶段里,设想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政治以及一种潜在干预策略,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该中心的成员也关注并质疑学术的教条规范及个人在学术研究方式上的因循旧习。这意味着某些复杂的学术、机构与政治因素,促成并建构了该研究中心所特别关注的研究对象与主题;简言之,这些因素构成了他们的研究。关注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发展,让我们得以界定出何谓"文化研究的案例研究"(如果这个词汇不至于太过冗长),并依此检视它的研究面向与发展情形。我之所以提出如此的词汇,并非为了书写关于文化研究的"起源"的"真实"历史,而是为了要当成一个被认定为"做文化研究"(doing cultural studies)的特定结构的具体实例。

早期的提问

首先,从威廉斯与霍格特早期的著作中可发现,他们对于文化本身的定义虽充满疑问,然而,因为社会的各个面向不断地发生改变,例如,大众媒体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扩张等,也因为文化本身已经挑战了当时高级文化的主流观念,因此有必要对文化进行定义。如此造就了对于文化的物质性定义,亦即以社会关系、机构与生活方式等物质面向来建构文化,也因此文化的定义总是受权力所宰制。其次,对于既有学科(尤其是那些英语学与社会学等学科)持续不断地涉入与批判,正挑战着这些学科的界限、分

析方式与理论。第三,诸多的证据显示,他们正努力解决横跨于不同学科之间的理论与理论发展的探讨,以及重新检视社会学的概念。首先是阶级,接着是性别、“种族”与族裔等概念。最后,关注于某些先前普遍被学术界所忽视与排除在研究课程之外的研究对象,尤其是媒体、流行文化等研究主题。民族志研究路径的发展也证明了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广义而言,文化被理解为不仅是有权势之人与精英所拥有的财产,也是通过互动以及由每日生活的际遇生产而成的。在此,“生活文化”的概念非常重要。这个研究团体(Hall et al., 1980)采取民族志的方法,探究将文化视为生活文化的认知是如何运作于研究之中的。他们选择谁作为研究对象,以及他们所研究的主题,都不断地透露出实际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对于社会广泛的关注与关怀,同时也透露出他们的理论与政治关怀,例如对于青少年与青少年亚文化、工人阶级文化、青少年工人阶级女性的关注。在所使用的方法中,他们关注于对文化生产与使用过程的理解,以及这些过程对于身处其中的主体所具有的意义,这些主体对某一个特定的研究者世代而言,即是所谓的“小子”(the lads)。

青少年亚文化与“小子”(the lads):“马克思主义的英雄”

有一系列极为细致与壮观的研究(Jefferson, 1976; Willis, 1977; Hebdige, 1979)关注于工人阶级青少年。这些研究者将工人阶级青少年视为是被建构而成的或是想象的一个“社群”。他们关注于意识形态及其与特殊青少年亚文化形式或表现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理论源自于马克思主义,例如: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的概念作为一种物质实践,格兰西霸权概念作为一种动态的、协商的平衡过程,以及巴特的符号学;他们的方法论也受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影响甚深,尤其是怀特的《街角社会》,此书是一本关于波士顿意大利裔青年的研究(Whyte, 1943)。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面临的困难主要在于主流文化、“父母”(parent)文化、青少年文化、闲暇文化的崛起以及消费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模糊。这些议题

主要隶属于“阶级”的范畴，而青少年这个范畴在战后语境中已经成为一个本质不断改变的阶级象征。青少年文化被视为是一种附属于主流文化与父文化之下的一种亚文化，而且被更广大的社会当成一种“公害”（folk devils）或“越轨”（deviant）文化。当时的英国社会中，存在着另一种强而有力的话语，即是一种去除阶级与阶级之间划分的话语，而此种话语主要是在其与日益丰富且易取得的消费商品之间的关系中逐渐获得肯定。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者反驳此种社会共识的本质，并主张在与当代社会的变迁关系中，工人阶级青少年占据着一个极为不确定的位置。他们致力于证明，尽管 1960 年代的社会已极为富裕，但是阶级仍然是一种强而有力的社会划分。因此，此类的研究主张，青少年亚文化的外在表现，诸如音乐、服装、风格等，都显示出一种对于社会中较强势秩序的“象征性抵抗”（symbolic resistance）。此种抵抗的概念对亚文化研究者而言极为重要，因为在这个概念下，青少年被赋予了某些能力，而且在他们的努力中，文化生产得以化解他们在矛盾文化结构中的定位所面临的紧张关系。格兰西的霸权理论提供一种将权力关系理解成协商的、共识的关系，一种处于不断流动中的权力平衡关系。为了要探索亚文化而采取的方法极为多元，举凡参与观察法、访谈法、亚文化团体的文化产品（例如风格、服装、言谈举止与音乐）的分类一直到符号学分析等，皆是各种探索亚文化的方法。

斯坦利·科恩在他关于青少年亚文化的重要性回顾中（Cohen，1997），以不同于都市社会学的观点（例如芝加哥学派的都市社会学）定义出亚文化的“新理论”。他区分出存在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中的三种分析层次。他称这三种分析层次为结构、文化与个人传记，为了要更清楚了解青少年（亚）文化研究的意义，对这些分析层次做延伸探索的确值得一试。科恩指出：

- 结构意指那些参与者所无法控制的社会面向，一般是指在社会内还有横跨阶级与性别的权力结构。在此，言下之意即在于，人们的生活、他们的机会与局限或多或少都由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所决定。虽然个人的确拥有能动性，但是他们的能动性却都受限于特定的限制，而这些限制是他们所无法选择的。

- 文化则意指与结构条件相关的意义、传统、文化实践、行为举止与语言。因此,不同种类的青少年亚文化也都各自再现了特殊的象征形式。
- 个人传记意指个人所经验的文化与结构的轨迹。更确切而言,即是指所谓的亚文化以及亚文化对它的参与者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引自 Cohen, 1997: 150)

科恩认为:

> 大部分英国战后时期新兴的青少年文化研究,都源自于这三种层次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些研究或多或少都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对于结构、文化与个人传记的划分。马克思主义将这三种层次视为决定性条件("人们是被丢入这个世界之中,而非出于自我意愿"),而亚文化则是工人阶级针对这些决定性条件所可能出现的响应之一。("创造出你自己的历史",引自 Cohen, 1997: 151)

科恩对于诸多亚文化研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提出批判:

> 此类的研究最常使用的方法,让我们无法回答较为传统的、但当然不是指关于不同模式的琐碎社会学问题。亦即:为什么某些人在面临相同的压力时,会以某种方式响应,而不以另一种方式来响应,或者为何会有不同程度的情感投入?(引自 Cohen, 1997: 161)

亚文化理论的策略之一,是从一个已经建立好的而且自我认同的社会团体的立场出发,借以检视结构、文化与个人传记之间的交互影响。科恩探讨了与此关系相关的议题,并发现这类的研究都更加广泛地关注学校、街区与工作的议题,而这些议题最后都与阶级和风格之间更为复杂、但"较为松散的关系"有关(Cohen, 1997: 161)。

这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关于社会学者与文化研究学者之间,想要探究青少年文化的焦点的差异所在。一个社会学者可能会希望探讨亚文化的根源,借以了解某一阶级文化的广泛样貌,例如:"为什么是某些人产生此种亚文化,而不是其他人?"而文化研究的研究者则是观察到这些亚文化的产生,并问及:"为什么这

些团体会出现？在哪些过程中，他们生产出他们的认同、意义与文化？”他们试图“混入”（tap into）那些早已具有明确定义的团体里，借以了解不同分析层次之间的过程与关系，尤其是关于文化是如何在某些物质条件下产生的，以及如何透过这些物质条件而产生，他们反而不关注为何特定的个人会形成这些身份认同。这些扎实的研究让研究者得以连结起介于结构、文化与个人传记之间的关系，但却无法对广泛的社会、文化做出较为概括性的陈述。我并非企图为青少年亚文化研究辩护，因为科恩已经对他们高度挑选过的研究焦点做了明确的立论，但是，他们也强调他们研究中的政治性与理论性议题，借此研究者得以形构出他们的研究方向。

将科恩的批判谨记于心，同时进一步地探讨鲍尔·威利斯关于工人阶级男性青少年的学校教育的研究是非常具有价值的，此研究著作名为《学习劳动：工人阶级小孩如何获得工人阶级的工作》（Willis，1981）。在此研究中，他说明了关于方法的问题，并以他的研究为基础，试图做出一些更为概括性的宣称。虽然威利斯的意图很清楚地表现在他的研究标题里，但是他更关注于实际发生在课堂上的事，尤其是学校与教育对于这个社会经济范畴中的青少年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威利斯从一个可量化的事实出发，亦即工人阶级的小孩最后都进入特定的职业中，但是他更希望能够了解如此的再生产过程是如何产生的。他的研究是一个“微观”世界的研究，亦即一所学校的研究，然而却放在一个“宏观”的广泛社会语境下来理解。威利斯的理论架构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架构，但是也受到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的概念所影响，即意识形态在复制既存（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他的美语版简介里，威利斯说明了自己的研究路径：“我关注在某一相对独立的‘文化形式’中，特定的文化与象征符号的过程，尤其是关注学校这个文化形式”（Willis，1981）。威利斯建议应该使用“文化民族志”这个词汇来描述他的方法论。这个词汇极其特殊，甚至可能与“正确的”民族志有所不同，但是他却坚称，他的方法论并非试图全观性地捕捉行动主体的整个生活世界；相反地，他的方法论试图仔细地探查包含在特定场景中的特定过程。

正如我们所说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皆关注于发展出

一种对于文化的唯物主义理解。也就是说,文化是由主动的个人主体所生产,但是不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生产。就这方面而言,根据威利斯的观点,文化可以被视为对特定(压迫性)结构条件的响应,但吊诡的是,却是透过教育来再生产阶级的。

平凡女性:白人、工人阶级、女性

在我们的景观中接下来的看点体现在一群女性主义学者的兴趣上。麦克罗比批评青少年亚文化的研究欠缺对于他们个人兴趣与研究动机的讨论,另外她亦想论辩的是他们对于性别的盲点。他们的研究一开始毫无质疑地就将"青少年"的范畴以阳刚范畴呈现,因此,他们并未关注青少年工人阶级女性,即使女性时常被他们的受访者提及。他们忽视受访者所做出的性别歧视陈述,根据麦克罗比的观点,这些陈述透露出男性对于女性的压迫态度,以及工人阶级的阳刚特性是如何毫无疑问地与一种异性恋惯常的侵略形式相关联。同样地,虽然何柏第主要关注于风格以及对于主流文化的反抗等相关议题,但是他却无视这可能对青少年女性所隐含的意义,而且也未问及,为什么当时的女性都普遍无法获得这些反抗途径。麦克罗比的批判提醒着我们,我们对于论述架构的选择与我们的政治性,都可能在数据搜集的阶段里,蒙蔽我们对于某些意义要素的了解;先不论一些激进的证据与研究者的目的为何,这种蒙蔽可能会复制了性别的压迫形式。当亚文化研究关注于某些奇特的青少年亚文化(例如,以风格作为反抗的形式)时,文化研究中的女性主义研究则致力于理解"结构、文化与个人传记"与未被关注的女性的家庭世界之间的动态关系。

《女性议题》(此书是一本由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女性团体所集结出版而成的论文选集)的作者们(Women's Studies Group,1978)即是将女性主义观点引荐至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最佳证据。从这本选集的绪论中,即可清楚明白这并非一项简单的任务,为了要在文化研究中特别突显女性与性别的议题,使之成为学院中普遍受到关注的范畴,这还涉及了学术上与政治上的挣

扎。这项研究工作于 1970 年代开始进行，当时女性自由运动与一种强烈的草根女性主义的崛起，很显然是受到该团体的影响，但是这些运动的女性主义“政治”定位，却出现了诸多问题。该团体关注找到成为具有“智慧”的女性主义者的方法，但是仍然保持着对于政治干预的允诺。这除了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外，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环境也对女性主义研究无所帮助。“我们发现我们真的很难参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团体，甚至觉得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会是一个完全属于男性所主宰的学术研究，以及这个环境为何会产生以男性为主的研究”（Women's Studies Group，1978：11）。

除了那些检视早期女性主义研究的论文外，例如关于“个人”的概念、精神分析、性欲与主体性、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文本之间的关系（例如女性杂志与罗曼史）等面向的论文外，此本论文集也包含了两篇以女性实证工作为主的研究论文。多萝西·霍布森描述了被孤立的家庭主妇是如何使用广播与其他媒体来消除她们的疏离感与孤独感。她关注日常生活经验在建构与重新建构性别生活时所隐含的意义。她所采用的方法是在女性家里与她们进行对话访谈，然后在之后的研究计划中，研究她的受访者观看肥皂剧《十字路口》的情形。麦克罗比的论文《工人阶级女孩与女性文化》是一项针对当地青少年俱乐部中的年轻女性成员所进行的长达五个月的研究。在此研究中，她希望透过“她们特殊且独特的生活方式”来“探讨这些工人阶级女性的文化”（Women's Studies Group，1978：96）。她希望说明劳动阶级文化与阴性特质的概念，尤其是少女的生活经验。麦克罗比访谈了 13～16 岁的少女，主要是以“学校”、“家庭”与“休闲”等生活面向作为访谈要点。她混合了问卷调查、观察、访谈、非正式的讨论等方法，并要求这些相关的女孩书写日记。她的受访者都是具有阴性特质的女性，她们被期望、也被鼓励要从事婚姻与家庭中的“女性生涯”。

的确，“家庭主妇”与平凡的或工人阶级的女性已经开始成为文化研究工作的研究对象，而且在学术界里，也可以说是被建构成‘女性主义的他者’（Brunsdon，1993：2000）。但是最重要的是，女性主义研究者都坚称：性别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分析范畴以

及理解文本实践与消费实践的范畴。此外，她们更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关于流行文本的消费快感，特别是关于喜欢那些流行文本类型的女性的热忱，而这些流行文本就是为她们量身订做的。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早期关于女性主义的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在于，女孩如何蜕变成女人，尤其是关于她们如何开始变得具有阴性特质。因为流行文本被视为是传达特定意义的重要载体，所以研究者开始分析文本本身，借此向年轻女性说明漫画与杂志中意识形态的运作情形。从许多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采取的观点中（Brunsdon，1996；Hall，1992），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研究的发展动向时常引发争议。正如诸多的干预或争辩所示，这可能造就了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观点。但似乎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仅从她们的研究例子与主题出发，关于何谓文化研究的问题，可能因而隐含着产生一种狭隘且高度筛选过的观点的危险，但是，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仍不断地从事理论的发展，而这些理论发展也总是与社会经济及其政治语境相关。他们的研究语境虽然明显大部分都是发生在大学内，但也有发生在更广大的社会、文化下的。为研究寻找其基础是一件相当重要且必然的工作，但这项工作也同样具有争议性，女性主义就是其中之一。

黑人知识分子与帝国反击

1978 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一本选集《监控危机》出版了（Hall et al.，1978）。这是一项针对抢劫犯的形象所发展出来的道德恐慌分析。这项分析将当时英国政治史上某一特定时刻视为是引发种族政治的开端，同时，再现的形式与关于权力和控制的法律话语也开始以各种方法被动员起来，用以控制那些被视为是对主流白人社会的“威胁”。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种族与政治团体继续这项分析工作，而他们所出版的著作《帝国反击：70 年代英国的种族与种族主义》，批评英国左翼分子无视奴隶在资本主义发展与“工人阶级的构造与再造”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CCCS，1982：7）。在此论文集中，两篇由黑兹尔·卡比与普拉蒂巴·帕

马所著的论文都关注种族主义与父权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两篇论文也都挑战了“白人的”女性主义。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者采取了经验主义方法，此种方法特别重视在特定社会与历史语境下，政治与理论机制的基础与具体形式。但是，同样地，由于研究者对于特定议题的干预手段，造成亚文化研究与某些女性主义研究所假定的简单（马克思主义的）权力模式备受挑战，并且被当成是文化研究忽视了黑人的历史与种族和种族主义的问题。因此，当认同变得愈来愈复杂时，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工作的整体轮廓也就变得愈来愈不清晰、不明确。然而，我们还是书写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历史，而且此历史也颇具争议，但是我仍要主张：这些偶然的、探索性的以及暂时性的研究，仍提供了发展诸多研究的源泉。这些研究带领我们超越“伯明翰”研究，最终进入广泛的国际语境中。但是，现在我希望探讨的是，生活文化的研究是如何发展而成的。对于流行文化的兴趣，尤其是对于“媒体”文本、电视、杂志与大众文学的关注，点燃了我对人们如何诠释与使用这些文本的兴趣。意识形态的概念，以及已被感知到的商业媒体与大众媒体形式的“权力”，引发了关于流行文本如何影响那些永远持续增加的、消费这些文本的热衷使用者的问题，以及这些流行文本所造成的影响程度究竟有多深等问题。

“主动阅听人”

马克思主义理论架构所引发的不安，尤其是女性主义者以及女性主义本身在使用“女性”这个范畴时所出现的不一致，再加上黑人学者以阶级、性别与种族等面向为基础来思考压迫形式的作品，都不断地质疑马克思主义这个大叙事至今所提供给我们的确定性。理论性的挑战也来自于那些强调快感（特别是流行文化中的愉悦）的重要性的研究发展，以及关于那些必须反抗社会主流形式的团体所具有的反抗能力的研究。

从 1960 年代开始，当理查德 · 霍格特主张，商业文化的发展，（在他的想法里）已经开始产生吞没更真实的工人阶级生活文化

与传统的威胁时,文化研究即开始关注大众传播的议题。因为文化研究关注生活文化以及“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些产品等议题,所以由那些有权有势的机构(这些机构时常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所生产的媒体文本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焦点。于是,文化研究强调的重点开始转向探讨与理解关于读者、阅听人、使用者与消费者的某些观点上。关于大众媒体形式的阅听人研究,代表着文化研究中一股相当重要的研究潮流,尤其是 1980 年代的研究潮流。

霍布森说明了广播媒体如何在家庭世界中被使用与消费,她特别强调大众媒体形式中的女性阅听人。同时,夏洛特·布鲁斯顿与戴维·莫利则对当时流行的电视杂志节目《举国上下》的建构与消费进行研究,而此部分的研究将于本书第 7 章中作进一步说明。

这些研究试图在日常生活与生活文化中,尤其是在家庭的语境中探讨媒体使用的情形。莫利的研究计划(家庭电视)探讨了不同家庭成员在每日的家务工作中观看、喜好与厌恶电视文本与类型的情形。透过他对于一般家庭生活动态中的电视使用的探讨,莫利希望借此指出特定的类型吸引了特定的“大众”,这些特殊大众具有这些特定类型所要求的适当文化能力。莫利所采取的方法极为广泛,他对家庭成员进行录音访谈,在访谈过程中,他问及他们的观看行为、他们的喜好与厌恶,以及家庭成员如何在观看电视时进行协商。莫利的访谈分析指出,性别在家庭中是一个极为关键的组织要素,因为性别透露出权力的动态关系。

迷:盗猎者(poachers)与文化游牧者

现在,我们将从“英国”文化研究转向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出现的文化研究视野上,例如近 10 年来,部分源自于美国研究的美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就此而言,一个相当重要的文本即是贾尼丝·罗德葳关于罗曼史读者的重要研究。此部分的讨论将于之后的篇幅中提出。同时也包含来自于不同区域的媒体研究,这些媒体研究采取文化研究的研究路径,并逐渐关注阅听人、快感政

治与“迷”的议题。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分愈来愈模糊,例如,伊恩·安就将她自己界定是她研究的《豪门恩怨》中的一个迷。

有许多学者主张,审慎地看待“迷”的问题,可以告诉我们诸多关于“流行”事物的重要意义。因此,劳伦斯·格罗斯博格指出:“迷”的概念意味着某种特定的文化关系,而且,此种关系仅存在于与流行事物之间的关系中。他将此种关系视为“重要图谱”(mattering maps),这份图谱明确指出,流行形式对于它们的迷所产生的“情感联系”(affective alliances)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Lewis, 1992: 59)。

> 正是在他们的情感生活里,迷们不断地努力关注于某些事,努力地寻找生存的活力,以及寻找想象与实现他们自己的计划与可能性所必需的热情。特定的机制或许也能提供如此的可能性,在这些机制里,主流的权力关系可以被挑战、被反抗、被逃脱或被忽视。(Grossberg, 1992: 59)

这意味着情感联系可以将“迷们”的情绪、叙事生命与认同组织起来,同时也可以作为在逐渐强大的世界中进行反抗的一个据点。关于主动主体的主要研究则是约翰·菲斯克的研究,他曾工作于英国、澳洲与美国等学术机构。他的研究已经成为诸多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因为他被认为是在赞颂人们具有解读与使用流行形式的能力。

> 如此对于流行事物的区分主要涉及了文本或明星的筛选过程,这些文本或明星提供机会,让迷们了解他们的社会认同与社会经验的意义,而这些认同与经验通常是自利导向的以及功能导向的。那些意义有时成为被赋予权力的社会行为……有时却仍停留于排除任何社会行动的弥补幻想状态。(Fiske, 1992: 35)

菲斯克过度地宣称流行文化具有赋予主体权力的可能性,如此的宣称激怒了许多批评者,他们认为如此的宣称与社会批判的立场大相径庭,也无法关注在流行形式的流通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权力关系。然而,我们可以从上述的引文中发现,菲斯克特别声称这个极端的观点,认为流行文化具有赋予消费者权力的可能

性。或许我们从格罗斯博格与菲斯克的例子中所获得的大收获是:人们在使用流行文化时,所采取的方法是无法预测的,因而我们所采取的理论与分析模式也应该具有同等的弹性。

米歇尔·狄塞托的著作,则可以用来思考重新概念化阅听人的概念及其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亨利·詹金斯所提出的"盗猎者"(poachers)与"游牧者"(nomads)的概念可以作为有效隐喻,用以发展出一个针对特定类型或节目的热衷者或"迷们"是如何主动地、依他们自己的目的来使用这些文本的理解。因此,一个较为流动的、不固定的以及去中心化的读者社群与观者社群的概念由此产生。同样地,关于认同与主体性的问题也因此成为关注的焦点。先前阅听人的概念所假定的是一个固定的主体,而新的主体理论则开始质疑这些假定。

詹金斯在一些著作中已经定义了何谓迷的团体(某一特定节目、表演者、音乐风格、电影类型的迷)。他指出迷的团体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既相互分离却又彼此连结,无法被限定在某个地点或有限的空间或共同体里,而是透过多元的、无数的媒体实践所产生,这些媒体实践包括媒体文本、迷的杂志与网站。詹金斯认为,为了要理解何谓"迷",我们必须:

> 关注媒体的迷文化作为一种论述逻辑跨越文本与类型之间的界线,将各种不同的兴趣编织起来的现象。虽然某些迷们仅热衷于某一个节目或明星,但是有许多的迷却透过某些影集,进入一个更大的迷的社群里,借此连结至一个由诸多节目、电影、书籍、漫画与其他流行素材所构成的跨文本网络之中。(Jenkins, 1992: 40)

"关注于任何一个媒体产品——例如:《星舰奇航》或《拜金女郎》,即意味着疏忽了这些媒体素材所根植的较大文化语境,大型的文化语境最终也会整合进个别的迷的生活之中"(ibid: 41)。因此,关于迷们对于流行文化的投入的研究,又让我们回溯了这些实践如何更广泛地与日常生活的大文化相关连及其重要性。

正如詹金斯所主张,许多传统上所划定的界线,例如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商业产品与创意性产品之间的界线,如今都已瓦解。"在此,迷变成了一种参与文化,将媒体消费经验转换成新文

本的生产，甚至是新文化与新社群的生产”（ibid：46）。此外，我们还能指出，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界线也已逐渐瓦解，因为他们在流行文本的消费过程中共享了消费的快感。

那些研究迷与迷文化的学者已经观察到，特定的类型或文本格外能吸引个人的目光。身为一个“迷”，意味着对于流行文化具有异常的认识与认同。在此所获得的洞见，尤其是主体性的建构，实际上是非常有趣的观点，而且也彰显了此种认同过程的复杂特性。这些观点带领我们进入幻想、欲望的领域，让我们了解流行文化在我们理解自己是谁以及我们即将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过程里，所扮演的角色。显而易见的是，这是一种精神分析的语言，一种一直被文化研究视为充满问题的研究路径。因此，有趣的是，这让我们联想到一位相当重要的精神分析学家瓦莱丽·沃克丁所提出的论点。沃克丁致力于流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与孩童、年轻女性相关的流行文化。她关注于“了解流行文化与主体性的产生之间的关系……（我）关注于分析实践，以借此了解主体性如何在这些实践中产生”（Walkerdine，1997：122）。对她而言，流行文化充斥我们的生活，从一个流行的电视节目中获得的词汇、我们工作时所哼唱的一首流行歌曲、以“明星”宠物之名来为我的宠物命名，等等。她希望以此种方式来理解流行文化与主体性。正如她所坚称的：“若将此研究描述为‘阅听人研究’，将显得毫无意义可言”（ibid：122）。沃克丁的研究进一步引领我们探讨“社会与精神心灵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ibid：168），对于此种关系的探讨让我们得以跳脱宰制与反抗之间的二元划分，更能提供我们一些关于认同与主体性这些更复杂的过程的概念性获益。有趣的是，这个社会精神面向，在文化研究的领域里，仍旧是一个使人困惑和尚未开发的困境。事实上，将“社会阅听人”的概念重新概念化成迷、迷文化与盗猎者的概念是相当重要的，而且也已成为论辩的主题。有些学者认为，这逐渐向个人主义靠拢，因为个人主义舍弃任何政治性的概念，也排除任何社会批判的可能性。这些研究发展所具有的含义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作进一步说明。

我们的过去?
选择的理由:建构一个"社群"

我们已经探讨了一些"社群",这些社群集结了已经建构完成的研究计划,以及他们如何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造就一些特定的人物与辨识度极高的隐喻,而这些人物与隐喻也已成为部分文化研究所共享的知识。但是,在将某些研究者的相关形貌视为这些知识的建构者时,我们可以开始问及:研究者与这些在他们研究里被建构为"社群"的团体之间,其关系为何。举例而言,如果研究者与提供研究资料者之间共享了相同的知识背景,那么他们之间的连结点的本质是什么呢?研究者的生活经验与她的那些受访者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理解成既是属于政治性议题也是属于学术性议题呢?问题在于这些差异的重要之处何在,而且重要的是,该以何种方法论来处理?在上一章里,我曾提及"民主驱力(democratic impulse)"内在所具有的危险性,其中经验威胁要取代、隐藏或甚至消除压迫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这透露出理解研究者与他们的研究主题之间关系的最佳方式,即是作为一个倡导者,赞扬着截至目前为止尚未被发现的日常生活英雄(或女英雄)。在认可他们的经验与生活方式时,为他们发声或在学术社群中作为他们的发言人,其中仍存在着某些危险性。第二种关系形式则是指:身为"他们之中的一员"。在此,正如詹金斯所认为,一个研究者可能选择要探讨他或她自己的"迷"社群,或者一个学术研究者可能与他或她的受访者共享了相同的知识背景或社会认同,很显然地,在某些方面而言,他们是同一个团体中的"成员"。无论是作为一个倡导者或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研究者可能会妥协,并从事较不具批判性的实践、观点与日常生活。同样地,这也可能导致无法了解研究的较大语境。在此,应留意威廉斯的警告,他认为经验具有压倒一切的特质,亦即经验可能会隐蔽了矛盾与关连性,例如麦克罗比就指出,青少年研究中存在着对于性别的盲点。

巴克(Back, 1993)讨论到他自己的研究地位,并反对以他所

谓的“文凭主义”(credentialism)来赋予人们选择或研究区域的筛选的正当性。他生长于伦敦城外的一个白人工人阶级住宅区。1970 年代期间,他开始注意到种族主义的问题,以及他的同侪团体中所出现的一个英国全国前卫党。这个经验再加上他与黑人朋友之间的关系,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他所言:

> 当我面临博士研究计划的选择时,经验的组合造就了我的选择结果。当时,我非常确切地感到,我希望试着以人类学来研究那些我亲身经验的知识领域。最后,我决定对工人阶级区域进行田野调查的工作,这些工人阶级区域环绕在我曾就读的大学附近,距离我孩童时期居住的地方,大约有十哩多。(Back, 1993: 221-222)

巴克坦白地述说他之后难堪的经验,他提及:“我使用我自己的工人阶级根源,作为获得这个研究的可信度的一种方法,也因此虚构地化解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划分”(ibid: 222)。虽然他的背景知识与经验的确构成了他的研究,但是他现在却坚称:“要佯装我还是以前的那个我,实在是相当荒谬可笑的一件事。就某个意义而言,我掌握某一种语言与操作各种学术模式,这种语言与学术模式既是我所拥有的,但也不是我所拥有的”(ibid: 222)。巴克提醒我们,虽然我们可以界定出我们的受访者是谁,而且在某些时候,我们也能分享他们的经验,但是身为学术研究者,我们拥有大学的资源、理论性与学术性的语言以及概念思考的能力,这些都让我们变得不同于过往。

他提及在他从事田野工作时,所发生的一个实例。当时的情况让他感到震惊,他也因而开始意识到这些紧张关系与困难所在:

> 我记得,有一晚要回家时,在我穿过那个住宅区,往我所居住的公寓大楼走去的路上,我认出一位身穿着我哥哥的外套,以及身形与他相似的人走在我前面,但他的脸背对着我(在我从事田野工作期间,我的家人会定期地看望我)。我赶紧向前追去,那个人转过身来,面向我,我才发现那不是我哥哥。当时,我感到一阵困窘难堪。那个人本来就快变成我哥哥了。但是在此处,如同我对待我哥哥的方式一样,我正在

> 将其他人转化成人类学研究中的“客体”,我正位于建构“他者”的过程中,我也赤裸裸地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疏离的、分化的“自我”。这个经验让我陷入深层的思考,我开始质疑在进行这类型的研究时,个人的因素所可能造成的影响,对我而言,这些议题至今都尚未获得解决。(ibid: 223)

这些存在于研究者与他们所选择的研究主题之间的冲突立场,通常就是激励人们投入研究本身的因素。马克·珀斯浩斯成功地研究英国流行小报《太阳报》的读者,并提及他自己作为一名文化研究的研究生,却也与他的受访读者分享了共同的背景。“就许多方面而言,这个关于《太阳报》的研究计划,并非一个根深蒂固信念下的(政治)产物,而是这些‘学术认同’与其他‘种族’、其他经验、关系之间相冲撞的结果。这些因素已经构成了我的存在,也持续地成为我生存的重要元素”(Pursehouse, 1989: 27)。或者,正如他所言:“我早就可以轻易地成为《太阳报》的读者”。他的受访对象都是《太阳报》的读者朋友,而他与这些朋友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关系意味着,他的受访者都很乐意敞开心胸与他谈及他们的阅读实践。珀斯浩斯的研究为空间与社群之间开创出了一条新的路径,但如同巴克一样,他也乐意藉由“挖掘自己的私事”来检视那些时常是相互矛盾的关系。

社会精神分析学者温迪·霍尔韦探讨了性别主体的建构过程,她同样从她所认识的朋友当中筛选出她的研究参与者。她援引了扎根理论的研究路径,此种研究路径认为,理论与方法可以并用,而所筛选出来的朋友则是最能够反思他们自己的主体性与身份认同者,因为(以霍尔韦的观点来说)他们倾向于进行“自我分析”。他们习惯于质疑他们所处的处境、质疑他们自己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也对自己以及他们自己的生活感到好奇。他们不断地自我反思,而且也习惯于“进行”访谈工作以及从事与他们的认同相关的工作。霍尔韦如此说明:“因为参与者给予我复杂的动态关系、多元的以及相互矛盾的自我观点与经验,所以我有可能可以发展出一个多元的、相互矛盾的主体性理论……于是我致力于寻求适当的参与者,并试着发展出适合此理论架构的方法”(Hollway, 1989: 18)。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由于我先前的经验,致使当女性告诉我

她们的生活、她们的经验等时,虽然我不认识我的参与者,但是我会特别关注特定的"认知"。尽管现在我执迷于获得理解那些经验、生活方式及其观点的架构,但这些认知一直存在着。因此,实用的知识可以增加数据的丰富性,在访谈时也能发挥极大的功效。就这方面而言,对话将更具动态性,也更能掌握重点,甚至能发展出先前可能被忽视的重要观点。

不在场者才是有力的或值得"继续钻研"的课题

从最早期的文化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化研究将对于弱势团体的关注与兴趣,当成是首要的研究对象。这是因为研究者希望能为那些被边缘化的团体或弱势团体"发声",或是说,研究者至少要求这个研究领域能够扩充到对于日常生活的理解,以及对于"平凡人物"的热情上。因此,文化研究所强调的即是流行形式,尤其是透过电视、大众电影、音乐等商业形式生产而传播的文本,同时,那些界定亚文化的文本形式也将研究者的目光吸引至特定的团体上,而非其他团体身上。然而,这却忽视了某些重要的团体,亦即文化生产者、中产阶级文化或所谓的"高级"文化消费者、政策决策者等,这些团体以不同的方式形塑、建构文化景观。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可以在试图解释这些困难的过程里被简要概述出来。其中最为明显的困境之一即是,该如何进入研究场域。研究者已经开始着手从事一些需要进入电视组织才能进行的研究,只是,他们总是被拒于门外。大型的商业组织总是不信任研究者,而且可以理解的是,大型商业组织也受到当时社会的保护。然而,其中还是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霍布森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十字路口》的制作人身上(Hobson,1982),而戴维·白金汉与艾琳·梅杰都获得了接近流行肥皂剧《东区居民》制作人的机会(Buckingham,1987)。这些研究已经成为了解文化生产实践与过程的实用性研究。施莱辛格关于英国广播公司新闻制作的重要性研究,更野心勃勃地指出,在复制独特的新闻路径,并依循新闻制作工作实践、惯例与传统的过程中,

“企业的意识形态”如何运作于其中。同样地,利斯伯特·范佐南也在她关于媒体专业的研究中,探讨了新闻制作与新闻报业所隐藏的阳刚特质(van Zoonern, 1998)。近年来,乔治娜·伯恩也已完成了英国广播公司的“民族志研究”。在她最早的论点中,允诺要提出一些迄今为止,理解媒体创意与文化媒介的各种微妙方法(Bourne, 2000)。

然后,进入路径(access)的问题时常、但并非总是成为“继续钻研下去”的阻碍,因为当中还有其他困难存在。罗德葳试图研究每月一书俱乐部的编辑,但是她却发现这是不可能达成的任务,主要原因在于:她的读者对于阶级有优越意识。当我要寻找一些女性来向我诉说她们对于录放机的使用情形时,我却发现我很难与中产阶级女性取得联系,或说服她们向我诉说她们的经验;而当她们愿意诉说时,她们都会询问我关于我的研究的刨根究底问题。我都会提供这些相关信息给我的受访者,但是那些具有较高社会、文化资本的受访者,总是迫使我更进一步地去解释关于我自己以及我的工作。就此而言,研究者与受访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开始“转向”,这也显示出访谈与社会研究存在的动态关系,而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进一步探讨。

身为一位学者

诸如巴克与珀斯浩斯之类的研究者在研究他们自己的“社群”时,他们时常经历诸多痛苦冲突,因为这些研究工作时常伴随着另一组认同冲突的产生。认同也是在学术社群本身中建构起来的。正如许多的学生与年轻学者所经验到的,在学术界里存在着许多未被明文规定的准则,这些准则不仅存在于专业领域,甚至也存在于一开始对于“专家”的认定上。这总是造成他们对于自我的质疑与不适任的感受。珀斯浩斯与沃克丁曾提及他们在学术界中寻求一席之地时,所经历过的不安与困境;珀斯浩斯是一位来自于工人阶级背景、在政治上具有坚定信仰的学者,他提及:他遇到“一些独占文化形式的文化精英,或是以各种方式排挤他人文化的精英,而这些文化与我所经验过的当地同侪团体的亚

文化大相径庭”(Pursehouse,1989:28)。同样地,沃克丁也提及她对于她曾邂逅的一些学者的愤怒,这些学者笃信政治左翼思想,并研究工人阶级文化。许多她在大学里遇到的人士,都过着“有趣”的生活,这些有趣生活包括对于早期政治的信念与关注。对沃克丁而言,这意味着中产阶级或那些具有高度文化资本者,获得了某些选择与机会,而不像她自己:

> 我来自于这些人士可能会感兴趣的阶级,但是这并未让我先前的生活显得充满异国情调。的确,我真的觉得过去根本没有任何能引发人们兴趣的事物存在。我梦想着迷人的事物、阅读漫画、听流行音乐,在学校努力用功,而我的父亲却英年早逝。我无法在我的历史里寻得任何文化研究希望寻获的异国情调的亚文化的反抗。(Walkerdine,1997:19)

基于无数理由,这些关于自我的揭露显得格外重要。这暗示着存在于大部分文化研究工作里的矛盾特性。在文化研究中,那些具有政治信仰的研究者,至今都还致力于忽视或贬低工人阶级的生活价值,以及一位年轻的研究生可能会如何以不同的经验、生长背景来看待何谓生活。这显示出关于亚文化研究的浪漫主义特性,比起书写形式的研究本身,也许还要来得更让人感受强烈。这些学者从某一个观点出发,进行论述与书写,而这个观点透露出:学界是一个严格受限的社群,一个将它自己的研究主体(客体)建构成“他者”的社群。我已经在许多学生身上看到这些冲突的认同与信念,并开始认为,阶级的差异在英国的学术工作里(即便不是在其他地方),将持续成为一种痛苦的、时常隐而不显的经验。诸如珀斯浩斯、沃克丁与其他的研究者,在本书的整个论述语境中都指出:彰显他们在参与学术社群时所产生的各种认同冲突与差异,是一件相当重要的工作。

“我们”是学术偷窥者吗

在认识到“学术”仍是一个生产知识的权威场域后,我们可能会开始质疑,身为研究者的我们,是否具有检视他人的权利,无论

是透过观察,或透过长时间的录音对话而产生知识。我们从那些慷慨牺牲他们的时间,并愿意与我们合作的对象所汲取的数据,难道不是因为这主要对我们有利?我们的研究对象,几乎无法做出任何宣称或看到这些利益。因此,一个绝对正当并且应该提出的问题是,正在进行的研究到底对谁有利。关于将阅听人、使用者、消费者、亚文化团体建构成民族志研究中的“他者”的议题,都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就许多方面而言,将学者的地位视为偷窥者,这似乎是无法被接受的说法。对现今而言,在沃克丁一项非常著名的研究[关于她对于劳动阶级家庭收看电影《洛基》的观察]里(Walkerdine, 1986),她主张:精神分析提供“一套最好的工具可用来”理解“情感投入、意义、我的幻想与在电影中情感的投入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以及我的幻想与对于纳金高(Mr. Cole,译者按:一位美国黑人爵士歌手)的情感投入与意义之间的关系”(Walkerdine, 1997: 55)。因此她坚称,研究者的主体性(或是她自己的经验所扮演的角色)应该在研究过程本身中被检视,如此一来,可以明确地指出特定诠释的生产从何而来。对于精神分析学者沃克丁而言,对于该部电影的观看与她的诠释来源,主要都是来自于潜意识。那么这即是她所主张的:如果我们要了解在处理流行文化时所涉及的驱力、幻想与欲望,以及“布尔乔亚阶级”(bourgeoise)的学术研究者为何对劳动阶级的快感与流行文化的使用感到迷恋,那么我们就应该关注潜意识。

这些问题对文化研究,尤其是对民族志研究或实证研究(关于此方面更深层的讨论可参见第7章)而言,都是极端重要的问题。沃克丁对于《洛基》的研究成果已轰动一时(cause célèbre),甚至成为诸多评论批判的对象。在她的研究中,关于她自己的精神—主体性的分析结论里,她声称自己采取了一个激进的做法,亦即在诠释的过程中,真实地暴露她作为研究者的主体性。许多批判谴责她如此的企图犹如“自传”一般(Lull, 1990),并将她自己的研究当成“小产业”(small industry)的一个例子,以及当成“我”这一个世代的生活写照(Probyn, 1993: 10)。沃克丁指出,这些批评对于她的方法的强烈反驳,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大众的幻想假定,而她则是将大众视为“狡猾的乌合之众”(dodgy)。她主张这些反驳“与研究者的希望、恐

惧与失望较有关系，而非关于研究主体的主体性”(Walkerdine, 1997: 58)。然而，沃克丁仍“致力于实证研究的工作”(ibid: 60)。在关于“录像带回放”(Video Replay)的研究反思中，她指出她所批判的是：

> 我仍旧认为社会科学是一种偷窥主义，因为社会科学希望进入工人阶级的客厅里，制造出一种关于他们的真理，并且从“喔！原来他们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感觉中获得偷窥的快感，这是一种认识真理的欲望，但此种欲望却混杂着较不健康的情感。(ibid: 67)

你的社群

最后，在本章里，我希望提醒读者的是，你在学术界里所占据的位置，无论是你是大学生或研究生。米尔斯(Mills, 1959)提及：“我不知道最好的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完整社会条件是什么，但是有一群愿意倾听以及愿意与他交谈的人士环绕在他身边(有时候，这些人必须是被想象出来的角色)，无疑会是条件之一”。

与他人讨论你的研究是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往往就在你向朋友或同事解释正从事的研究时，你的研究焦点也开始逐渐清晰。交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而且也是学术工作中一项必备的元素。同样地，米尔斯也指出：交谈是一种认识，“你无法将你的工作与你的生活划分开来，你必须运用这两者来丰富彼此”。换句话说，你要让自己完全融入你的研究中，确定你随时能接受新的想法与见识。更要习惯于表达、解释新的想法，即使这些想法尚处于模糊阶段。这些想法是你自己的，除非你仔细探究，并深入建构这些想法，否则它们很快就会消失无踪。

许多的大学科系都存在着活跃的研究生研究社群，虽然这些社群的实际运作情形时常言过于实。然而，你可能被孤立在你自己的机构里，尤其当你的研究主题是周遭人士所不熟悉或不感兴趣时。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么你必须试着和与你在同一个研究区域里的学者取得联系。你可以透过搜寻网站、参加研讨会、不

断地阅读新信息，尤其是期刊文章，来建立起社群之间的联系。如果你有使用因特网，那么电子邮件将是一个建立联系的绝佳机制。在你的博士班研究期间，你可以建立一个学者社群，而这些学者未必要来自于同一个研究机构。就我自己与他人的经验而言，你的支持团体将会非常广泛，而且相当有助于你的研究发展、"新"学者社群的建立以及研究主题的发展，对于文化研究的发展也极为关键。

接下来的章节将带领我们进入更为实际的研究议题里，以及关于你研究主题的确立与发展的过程。

第4章 一个关于研究的问题

A Question of Research

在学校或大学里有一种隐含的假定，即当我们提及“研究”一词时，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意指的是什么。广义而言，这个词汇所描述的是：以系统性的、严谨的方法来探索某些现象，而且在当代社会里，已经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日益重要的研究活动。一般而言，研究构成了许多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知识产物的基础，这些知识可能是我们所称的行政管理的（administrative）知识或是官僚主义的（bureaucratic）知识，例如政府的统计、人口调查与社会趋势，但这同时还包括了媒体，尤其是广播与报业。研究同时也是一种学者所从事的活动，这些学者的主要工作是在他们的特定研究领域里从事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同时，研究也开始逐渐扩展其意义，变成一种“可测量的”商品。来自于各种不同学科的学生，也必须完成他们的研究工作，因为研究是他们能否获得学士或硕士学位的部分审核依据。然而，无论它所描述的意义为何，也无论它所造就的结果为何，一言以蔽之，研究就是一种实践。它发生在特定的机构与专业语境里，而且也总是社会关系下的产物。虽然许多的学生与学者都像“个别研究者”般地从事研究工作，但是他们都隶属于某一个大学学系，在其中，他们拥有同事、研究团队与指导教授。我已经在其他著作中论及机构语境对于形塑研究的重要性，例如获得特定种类知识的权利、鼓励某些理论而非其他理论的发展，或是对于特定种类方法的否定（Gray，1995）。显然，这些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对于研究的形塑与发展，时常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这即是在强调：虽然研究及其成果时常都被视为是很难领略的思想，但是，它们却是一种深度物质实践的过程与产

物,而且与社会、文化的物质面向息息相关。除此之外,如同所有的人类实践一样,这种实践总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进行方式。也就是说,研究的过程、研究的发展、它所采取的形式、对于特定方法与理论的选择类型等,都鲜少明确标示在既定的研究读本中,但是当我们实际进行研究时,我们开始面临各种不确定性的时刻,我们必须决定该如何进行研究、如何选择某种分析模式或决定要排除某一种研究方法。研究的过程、我们所做出的改变以及所做出的选择,甚至我们所做出的必要妥协,都应该被呈现出来。我们未必要将这些做法如实记录下来(虽然这一方面的讨论将进一步于第9章中说明),但是对我们自己而言,这些却是相当根本而且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呈现自己所做的选择时,必须诚实而彻底,如此一来,才可以对我们所做出的选择加以合理化。

颁授文化、媒体与传播研究学位的系所,也逐渐地将实际的研究技巧纳入它们的课程与单元里。因此,学生的研究技巧将会被进一步地发展,最终将成为评估其学历的依据。这可以透过个别课程的小型研究计划、大学或硕士论文,或者是较大型的博士研究计划来实行。追求任何一种或所有这些研究活动的学生,将被要求制定一个主题,思考该如何研究这一主题,并且要能够证明它们所选择的方法与研究程序。本章将探讨各种研究方法。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教科书上所提及的“理想”研究模式:

文献探讨→主题→数据搜集→分析→写作

这个模式指出:一项研究的进行必须经过特定与独立的阶段,从文献探讨开始,最后以报告或研究论文的形式撰写而成。这个模式时常被批评为仅是一个“理想”模式,一般都认为,实际的研究工作是很少能够完全遵照这些程序来进行的。但是对于完成一项研究计划所涉及的不同种类活动,能有指引的依据,当然是相当实用的,然而实际上而言,各个不同的阶段却总是会相互重叠。举例而言,何时该停止文献阅读的工作?何时又该开始进行书写?这两个位于研究时间表两端的活动,应该(实际上也确实)在整个研究计划中持续地进行。事实上,这两种活动对于反思(或者可能是重新思考)新研究或新近发现之研究工作所采取的研究路径,相当有帮助。书写(虽然时常意指着研究计划中

最后一个进行的“书写”阶段）不应该留到最后一个阶段才开始进行，书写的工作应该是整个研究过程中的一部分。书写有助于澄清那些尚处模糊阶段的想法，除非透过书写的过程，否则很难厘清这些想法。然而，书写却可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尝试在研究计划中以不同的书写方式呈现，却也是相当值得一试的。例如，研究期刊可能包含了与主题相关的特定事件或事物的描述、对于某一关键文本或论辩的讨论、针对某一视觉文本的分析；而最重要的，也可能包含了个人对于研究过程的反思。

从何开始与如何开始

我认为思考研究的最好方法在于：透过一连串的问题来进行。因此，建构一个可管理的研究计划的艺术，即在于界定出与特定理论、学术关怀以及那些与世界各面向相关的关键性问题，而这些问题可以透过实证的研究加以探索。

首先要思考的是，研究本身直接身处的学术语境。举例而言，大学生所进行的研究计划可能是作为特定课程或单元的评估依据。因此，此类的研究将会在特定的范围内进行，例如该课程的主题、他们被鼓励要发展的理论、方法论架构以及特定种类的研究技巧。该课程的教师将针对学生对于主题的理解与主题的内容、理论路径以及学生的能力来评估他们的研究，他们如何透过数据、文件或视觉文本的搜集与分析，应用到他们已经学会的实际例子上。这应该是思考与产生研究问题的起始架构。例如，对于特定的课程或课程评估而言，直接进入某些未出现在课程大纲里的研究领域，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因为，为了要熟悉这个主题，可能必须阅读大量相关的背景文献。选择一个已经被研究过的研究领域，以及一个已经被特别关注过的研究领域作为起始点，或许会是一个较好的策略。因此，与课程相关的著作将是最为关键的资料来源。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每一项作业完成所必须花费的时间。这需要仔细地规划与组织。虽然时间的规划或许令人懊恼，但是这对未来的研究计划（无论是在大学里或大学之外的研究）而言，却是非常好的练习机会与经验。

就较为独立性的研究计划(例如论文或博士论文)而言,主题语境的界定,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入门工作。因此,“文献探讨”时常被描述成最重要的第一个研究阶段。此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在于,将你自己的研究工作放进一个既存的研究语境中。例如,理论的种类支撑着在你所选择的研究领域里的主要作者,以及他们所提出的方法论问题。同样地,寻找特定的研究实例,也是一件相当重要的工作,因为这些例子有助于形成研究主题的发展。透过这些文献的搜集与大量文献的阅读,你将会发现,你希望在自己的研究中补足既存文献里的哪些空白与缺漏。必须谨记在心的是,你不能直接“空降”到你所未知的领域,而是必须在既定的研究领域中,瞄准降落的地点。因此,你会将你自己的研究放进既存研究的关系语境中,并将这些研究当成你研究计划的起点。

在此,使用图书馆与其他信息来源显然是很重要的。对大部分的研究计划而言,仅仅使用文本或阅读清单中所标示的参考书目是不够的。学生们被要求要能够列出更广泛的相关阅读数据,但是阅读数据的广度将视研究计划的规模大小而定。虽然这项练习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探讨与研究相关的既存文献,但是,能够非常准确地知道你的研究主题范围则相当重要。透过成熟的信息搜集技术,可能会获得很多参考资料,而且大部分的这些数据可能一点用处也没有。在界定出研究主题与各个组成部分或关键词后,可以透过分析而尽可能地找到许多相关的研究词汇。同时,对研究设定一些限制也是很重要的,例如:研究该追溯多少文献?你是否仅对你所处国家的语境的文献感兴趣,或者你的研究主题是否已经扩及其他区域?哪些种类的素材与你的研究有关?这些素材可能是书籍、期刊文章、报告、论文以及因特网上资源的结合。

决定某一个研究主题/处于疑问中

在书写研究中,近年来最受欢迎的发展之一(随着女性主义者的干预),便是某些研究者会基于某些理由,而追求特定的研究主题。这时常涉及对于某种研究兴趣(对于较为一般性研究的憎恶)

的宣称，以及对于某种偏好或政治信仰的接纳。举例而言，较为常见的后果是，研究者/作者透过第一人称的使用，去除客观、中立研究者的神秘感，同时也赋予他们对于该研究的责任感、所有权与作者权。有些研究者，诸如精神分析学者温迪 · 霍尔韦，已经对构成他们主题的情境有所讨论。她思索着："就何种程度而言，我可以说我已经开始着手进行研究?"(Hollway, 1989: 9)。她解释：她已经广泛地阅读了她所关注的主题，尤其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是她觉得她还是"处于疑问"之中(ibid: 9)，并继续做笔记。这条界线之所以模糊不清，主要是因为她基于自身的理由，在大学里进行心理学研究，而心理学的研究促使她对她自身与他人的问题感到好奇，也好奇于我们的动机以及人际关系如何涉及权力、独立与改变等问题。她自己与学术外的经验构成了她的学术好奇，以及她对既定的研究方法与可用的理论架构的不满。关于某一个学术的认同逐渐变得无法与其他认同有所区别，这个观点是相当重要的一点，而且这个观点有助于我们思考，身为研究者的我们究竟是谁，以及我们的研究究竟是如何产生的。霍尔韦说道：我们已经无法将"我"与"理论想法"以及"研究领域"分离。在相同的语境下，米尔斯也论及"个人的生活与学术生活之间的融合"以及"你是如何无法将你的工作与你的生活划分开来——你的工作必定丰富你的生活，反之亦然"(Mills, 1995: 215)，如此的观察必定是许多经验丰富的研究者所赞同的观点。

现在，回到你自己的研究上，并谨记上述关于你所处的特定研究语境的评论，你会发现，一个可以开启建构主题的绝佳方式是，让你自己处于一个可以进行自由、创意思考的氛围。虽然你这么做是基于自己的决定，但是能够保持放松、不焦虑的状态却是很重要的。在这个状态底下，你可以开始发展一些初步想法，制作一份"可能的"题旨、主题或研究路径的清单。在第一阶段的工作结束后，你会整理出一份清单，然后你可以与你的朋友与同事针对这份清单进行讨论。这个"讨论工作"是非常重要且有效的。你将很可能发现他们会提出一些建议，或是一些你不曾想过的研究方法。透过如此方式的讨论，能让你的想法更加犀利，也让你能够继续往下一个阶段迈进。冒着做出浮泛陈述的危险，你必须将焦点放在某一个你所感兴趣且可处理的领域上，并将此研究领域视为你必须与其共处一段

时间的研究。促使你选择某个研究主题的动机可能相当多变,但是研究的范围却相当广泛。你当然可以研究、检视与分析流行文化的某些面向,而这些流行文化可能是你长期关注的对象,例如足球或大众电影、青少年亚文化或流行音乐,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你会非常乐意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米尔斯(Mills,1959)指出,我们应该学习在我们的学术工作中,使用我们的生活经验,并持续不断地对我们的生活经验进行检视与诠释;当米尔斯如此建议时,他正响应了我们先前的讨论:使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是有效的。毕竟,在此你将成为你研究中的"局内人",因为你已累积了一些知识,而且这些知识可以运用到你的研究之中。同样地,你也会获得一个由"爱好者"、迷或参与者所组成的即时网络,这些人将成为你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

其他的选择动机可能被排除在(或不存在于)你自己的研究兴趣、研究领域的知识或你的特定课程之外。因此,你将必须探讨那些被忽视或缺席的部分,在此,你必须干预该研究领域(尽管是中立地干预)。

最近,霍尔(Hall, 1992)将文化研究描述为正面临着"某种紧要关头"。我认为,这有助于你思考自己的研究。当你试图证明或理解你正在从事的工作时,你理所当然会问自己"那又怎样?(so what?)"的问题,而霍尔的描述可以让你避免这个问题的产生。许多我所阅读过的、非常出色的学生论文,都是出自于一份使命感,认为检视或探讨某些文化面向是刻不容缓的,例如关于迷或批判的面向,但是他们对于那些具有威望的文本或形式的愤怒感觉,时常才是促使他们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刺激。举例而言,女学生时常倾向于研究或书写关于饮食失调或其他当代文化中女性身体的使用、滥用等相关的主题,这并非偶然之故。简单说来,这些主题对他们而言是相当重要的议题。认同的问题也同样不容忽视,而且当学生们探讨他们自身与他人的认同,以及关于文化形式如何形塑他们时,认同的问题就被当成是一个相当沉痛且急迫的问题。一些比较与"个人"因素无关的动机,则导致学生探讨都市再生、文化政策、学校教育等问题。例如文化研究这个可能成为一个跨学科的当代研究领域,要求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研究技巧,同时也要求我们要为自己,在研究中找到一个适当

的“位置”。当我们深陷其中、当我们历经其中、当我们所研究的事物也开始形塑、影响我们,将我们塑造成现在的样子或未来可能的样子时,完成这些研究工作又代表什么意义呢？为了要发展她自己对于工人阶级女性的研究,史盖吉(Skeggs, 1994)援引了格霸(Guba, 1990)的论点,格霸认为,有三个基础的研究问题构成了所有的研究计划:

1. 什么是可以被认识的事物？什么是可知的？
2. 认识者与被认识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如何？
3. 我们如何发现事物？

什么是可以被认识的事物？什么是可知的？

这是一个关于本体论的问题,其所指涉的是可待研究的社会真实面向,但是这个问题也处理了与真实的本质相关的假定。这个问题需要你在自己的研究计划中选择一种立场,并定义出你研究中属于“可被认识的部分”(knowable space)。你如何建构出你研究中的可知部分,以及你用来探讨、研究那些可被认识的部分的方法,都将完全仰赖于你用来研究社会世界、行动者或相关文本的理论路径。在《学会劳动》一书中,鲍尔·威利斯致力于检视:工人阶级青少年男性最后如何获得工人阶级的工作。他将学校、教育以及更广泛的国家视为形塑此一过程,以及主宰工人阶级青少年工作机会的主要机制。然而,他的主体性理论却将青少年男性视为他们自己生命的主体,而非仅是一个受压迫体系下的产物,相反地,他们是主动的、具有创造性的人类存有。因此,他选择在一所学校里,针对小学生进行长时间的参与观察以及访谈。就此方法而言,他可以检视并界定出教育体系是如何定位这些小男孩,而且他也发现他们时常以极具创意的方法来反抗那些试图“教育”他们的体系。威利斯原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检视他的研究问题,但是他所选择的方法论却让他得以发展出他自己的理论,以及他对于自己所希望研究的社会世界的观点。

认识者与被认识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如何？

这是一个关于知识论的问题,简单来说,这个问题质询:我们如何认识我们所认识的事物。这个问题的假定攸关于,我们如何

认知真实以及我们如何在自己的研究中将我们自己视为研究主体（虽然格霸对此并不表赞同）。我们将什么带入我们的研究工作里，以及我们自己的知识与经验，是如何被带入研究本身的，这些当然都会影响研究本身。这并非一个攸关于“主观性”的问题，也并非意味着我们仅能从自己的观点来观看世界的各个面向。相反地，这意味着：我们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带入我们的研究中，但是我们当然也将政治性以及我们的思想架构带入其中。对于个中涵义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与研究本身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者而言，都是相当关键的议题，同样地，这些问题也构成了诸多关于研究实践的论辩与知识生产的政治性论辩。在第 1 章里，我们提到，客观性或中立性的研究者角色，早已深植于社会科学与人类学之中，虽然你并不被期待要解决这些难题，但是至少你被要求思考这些问题，并表明你自己的立场。为解答这些问题而提出最令人感兴趣也最具启发性观点之一的人是霍尔韦，她认为：“若不论及我自己，那么根本不可能完全地表达这些问题：重点在于我的生活及其历史的各个面向、造就我的生命的文化、政治条件这些因素是如何形塑我对于某些当代社会理论领域的兴趣”（Hollway，1984：4）。

值得注意的是，霍尔韦如何论及她自己的生活，以及影响她、引发她对理论产生兴趣的政治、社会语境。这些面向都非常重要。理论时常被视为是研究者或学生必须处理与克服的一种“客体”。但霍尔韦的研究路径却以较为实用性的面向来看待理论，尤其当她以理论与主题的需求之间的关系来思考理论时。因此，寻找理论的过程可以是一种相当自由的思考方式，而非让理论主动找上你。

虽然在所有研究工作中的研究者都必定会被问及这些立场与主体性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当研究涉及了引用他人的生活与他人经验的观点时，这些问题将格外显著。我们当然应该要质疑、检视研究的政治性与伦理，关于这点将在下文中更完整地讨论，但是此刻，我希望探索的却是，研究者可能会如何看待他们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你可能会与你的研究对象分享你生活经验的哪些方面，是年龄、性别、“种族”、族裔、生理能力或是阶级？这些“相似性”或“差异性”可能会如何影响、形塑你的研究？它们

将如何影响你与你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如果你与他们同处于一个社会环境，为了要分析或诠释活动与过程，你必须置身事外到哪种程度？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权力关系，其隐含意义与明确意义又是什么？你该如何避免滥用你的特权？让我们看看一些研究者是如何处理这些难题的。我选择了史盖吉关于工人阶级女性的研究《阶级与性别的形构》（Skeggs，1997）、马里・吉莱斯皮关于居住于伦敦苏豪区（Southall）的南亚青少年的研究《电视、族裔与文化变迁》（Gillespie，1995），以及克莱尔・亚历山大关于伦敦的孟加拉青少年研究《亚洲帮派》（Alexander，2000）等作为探讨的例子。

史盖吉在一篇反思她自己对于工人阶级女性生活的研究文章中，提及她从事研究是为一股"从事研究的欲望所驱动，同时这项研究不仅能填补既存的关于工人阶级女性知识的不足，更能挑战当时许多的主流想法。为了要这么做，我觉得我必须与真正的工人阶级女性进行对话，而非仰赖现有文献的再现来完成此项研究"（Skeggs，1995：195）。她同时也将自己视为工人阶级女性。"我正学习着像工人阶级女性一样，从一个受限的、被学术边缘化的位置发声"（ibid：195）。她同时也坚称，热情与投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我的研究无论在过去或是现在，都是一项具有高度感染力的活动。我的想法极易激起情绪：它们可以启发人心、令人感到满意、引发愤慨与愧疚、惊骇等，它们深深影响着你"（ibid：194）。在一篇早期的文章中，她提及她的主要研究问题在于："这些年轻女性显然不仅是某些意识形态阴谋下的受害者，为何还会默认阶级体系与性别的压迫，这些阶级体系与性别压迫似乎提供了不多的奖赏与没多少的利益？"（Skeggs，1994：72）。史盖吉完成了一项民族志研究，此一研究针对某一年轻女性团体，做了长达三年时间的追踪。她与其中的一些年轻女性建立起社会关系，与其他的女性进行访谈，并从中获得不同种类的信息。她如此反思："从事民族志研究工作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导致我个人的生活与研究之间的界线逐渐瓦解"（Skeggs，1984：73）。史盖吉关注于"从下而上地观看"，亦即从青少年工人阶级女性的观点出发，并关注于"指出青少年女性的结构经验（他们的阶级与性别立场）与机构（教育与媒体机构）是如何形塑、构成他们的响应，以

及这个过程是如何组成他们自身主体性的建构”(ibid: 74)。

吉莱斯皮的研究即是一项证明,此研究是有关她在苏豪区任教超过七年的两间中学里,“印度”电影广受欢迎的情形(Gillespie, 1989; in Gray and McGuigan, 1993: 147)。她的主要目标在于:探讨第二代移民青少年团体的认同与族裔问题,并特别强调流行文本的消费与使用情形,例如电视节目、电影与广告等流行文本。吉莱斯皮谈及,“权力、独立、性别与族裔等议题”(Gillespie, 1995: 72)如何影响她的田野调查工作。在此项研究期间,她是该所学校中的兼课教师,而她的受访者即是该所学校的学生。如此双重身份的角色原本是有问题的,但是吉莱斯皮却意识到,她必须继续保留她专业教师的角色,而不让她研究计划的规则主宰一切。她身为兼课教师的地位使她可以在与学校权威以及学生之间的关系上扮演一个较为独立的角色。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她的权力以及权威之间的关系上,她才能占据一个较具协商性的立场。她与青年朋友之间的熟悉度,透露出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即她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在研究开始的前几年里已逐渐发展,她是否有能力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她发现她必须时时提高警觉,并再一次真正尝试将熟悉的关系转变成陌生。她的性别必定会影响该计划的进行。毫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或许是,在她的研究里,她发现要与少女保持一定的距离是相当容易的,但是要与青少年团体保持距离却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结果却造成她的女性受访者人数远远超过男性受访者,这一项事实相当值得我们关注(ibid: 72)。吉莱斯皮提及:“我身为戈里人(gori)或‘白人女性’的地位,对于田野工作与民族志研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ibid: 72)。无论是就她的受访对象如何认知她,或是就她如何认知她的受访对象而言,这个身份都是相当重要的。她拥有旁遮普人的背景知识,这一个事实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似乎是她对于“‘该文化’的尊敬与认可的最佳表现,换句话说,让她更可被接纳与被接受”(ibid: 72)。然而,吉莱斯皮相当清楚一个事实,亦即:“没有人可以宣称,对种族中心主义或种族主义完全免疫”(ibid: 73)。但是她在自己的整个研究里,都审慎地、不断地警觉她自己的认知、语言与分类方式。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介于吉莱斯皮与她的研究受访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这项研究的形塑而

言相当重要，而值得赞扬的是，她也在关于方法论的讨论中澄清了这一点。

身为亚洲年轻女性的亚历山大，已经完成了一项关于孟加拉青少年的研究，这项研究同样是以伦敦的孟加拉青少年为主要研究对象（Alexander, 2000）。有趣的是，她发现与这项研究有关的年轻女性才是最难取得联系的。她将此归因于研究的“文化”，在这一研究文化中，年轻人被鼓励将年轻劳工视为“大姊姊”（older sisters）。因此，年轻女性也如此看待亚历山大，与她相处始终保持礼貌的距离。所以，她最后归结，这是性别、族裔与年龄之间综合产生的结果，并因此造就了她与年轻女性之间的藩篱，而并非因为她是一名研究者的关系（ibid：31）。她的研究实际关注的是亚洲人的阳刚特质，而且她也与该研究中的年轻男性团体建立了良好有效的关系。某些人类学者声称，研究者应该保持中立的或天真无邪的立场，并假定她自己不具有任何知识，更应扮演“学生”的角色，以团体或文化的（不可思议的）方式被“教导”。对亚历山大而言，“天真无邪”的立场，造就了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巨大鸿沟。这是一个相当不真诚的、甚至自私的策略，因为此种策略完全否定了上文所述的研究者的相对权力、他们的机构立场以及从事该研究的价值（ibid：28）。

这些研究者让我们关注于且意识到“我们”是我们所研究（尤其是在文化研究里）的世界中的一份子的重要性。我们不仅参与文化世界，更是由这个文化世界建构而成的。这即是让文化研究如此让人兴奋，又如此让人失去信心的原因。因为正当我们试图将我们自己放在研究者的位置上时，放在这个我们都太过于熟悉，且试图批判性地、分析性地探索世界的位置上时，我们才发现，这是多么令人兴奋又沮丧的一项研究。

我们如何发现事物

这些是关于方法论的问题，为了要了解或者为了要将我自己放在一个可以诠释、可以分析这个社会世界面向的位置上，我应该要在我的研究中采用什么方法呢？那么这就是你可以开始思考你需要哪些资料，以及为了要开始探讨你的研究问题，你该如何搜集你所需资料的起点，也是接下来的章节里所要处理的主题。

在团体里从事研究工作

与其他研究方法的文本相同的是,本书也倾向于假定:研究是由个人所完成的。这是学术工作以及你即将参与的评估研究工作的一般情况。然而,在你的学位课程里,你可能也会参与团体的研究工作,而且未来当你进入职场,你会确实发现你所参与的几乎都是团体的工作。讨论进行团体工作的方法是相当值得的一件事。在此,我将介绍我在一项关于教学与学习的计划进行期间所发展出来的研究工作。在这项研究期间,我与我的同事在我们的课程《文化分析模式》里进行一项团体的研究计划(Hanson et al., 2000)。这项计划要求学生组成小型的研究团体,并针对伯明翰这个城市中的某一个文化场景进行研究。

学生们被要求要建立他们自己的主题、理论架构以及适合于他们所选择的场景的研究方法,最后要在该系里以视觉呈现的方式做展览,并且在上课时间对全班做提报,同时每个人还要针对团体研究过程做一次个人的报告。这项研究计划的指导方针如下(见图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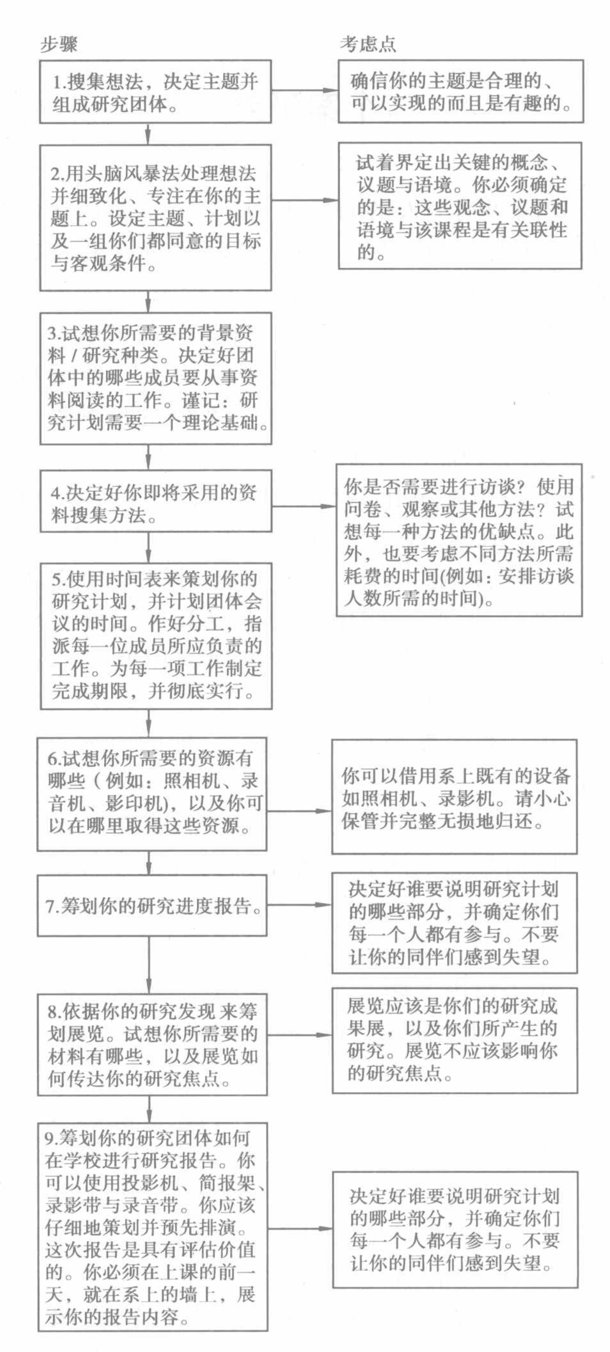

步骤
考虑点
1.搜集想法，决定主题并组成研究团体。
确信你的主题是合理的、可以实现的而且是有趣的。
2.用头脑风暴法处理想法并细致化、专注在你的主题上。设定主题、计划以及一组你们都同意的目标与客观条件。
试着界定出关键的概念、议题与语境。你必须确定的是：这些观念、议题和语境与该课程是有关联性的。
3.试想你所需要的背景资料 / 研究种类。决定好团体中的哪些成员要从事资料阅读的工作。谨记：研究计划需要一个理论基础。
4.决定好你即将采用的资料搜集方法。
你是否需要进行访谈？使用问卷、观察或其他方法？试想每一种方法的优缺点。此外，也要考虑不同方法所需耗费的时间(例如：安排访谈人数所需的时间)。
5.使用时间表来策划你的研究计划，并计划团体会议的时间。作好分工，指派每一位成员所应负责的工作。为每一项工作制定完成期限，并彻底实行。
6.试想你所需要的资源有哪些（例如：照相机、录音机、影印机)，以及你可以在哪里取得这些资源。
你可以借用系上既有的设备如照相机、录影机。请小心保管并完整无损地归还。
7.筹划你的研究进度报告。
决定好谁要说明研究计划的哪些部分，并确定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参与。不要让你的同伴们感到失望。
8.依据你的研究发现来筹划展览。试想你所需要的材料有哪些，以及展览如何传达你的研究焦点。
展览应该是你们的研究成果展，以及你们所产生的研究。展览不应该影响你的研究焦点。
9.筹划你的研究团体如何在学校进行研究报告。你可以使用投影机、简报架、录影带与录音带。你应该仔细地策划并预先排演。这次报告是具有评估价值的。你必须在上课的前一天，就在系上的墙上，展示你的报告内容。
决定好谁要说明研究计划的哪些部分，并确定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参与。不要让你的同伴们感到失望。

图 4.1

个案研究

现在让我们回到个人的研究上,从第 3 章所摘述的研究以及本章所检视的研究,可以清楚地发现:个案研究的路径对文化研究而言,是相当实用的。现在,我将试着指出,一项设计完善的个案研究可以提供什么帮助。就其定义而言,个案研究关注于某一个案例或例子,并将其视为一套"有限的体系";罗伯特·斯特克认为。"个案研究是指对于某一个单一案例的特殊性与复杂性的研究,并在重要的环境下,了解该案例的活动情况"(Stake, 1995: XI)。个案研究可以在量化的研究中完成,不论是当成某一说明性案例的"建构"依据,或是作为初探性的探索研究,为更进一步的研究找出关键性议题。针对上述功能,个案研究都能提供有价值的、中立的研究,并产生实用的知识以及概念性与理论性的研究工作。个案研究是时常可在教育性研究以及其他社会文化研究中发现的一种研究模式,除此之外,它作为检视"议题"与研究问题的功用,也一直是斯特克所强调的。他的研究工作主要都是在教育场域里进行。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是用来检视与学校教育以及其他教育语境相关的议题与问题。借着专注在某一个议题上,研究者可以清楚焦点所在并界定出研究的主要范围。文化研究领域中的许多学生可能会发现:将他们的研究计划设定在个案研究上,或是关注某一议题的"优势点"(例如,与再现、文化差异有关的议题,或是与进入路径的问题有关、与政治斗争、传播团体有关的议题等),如此的做法对于他们的研究工作而言,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方法。

贝尔描述到:将个案研究设定为"对某一'案例'的界定,通过提问、观察与研究,你可以探讨个案研究过程的各个要素,亦即:它是如何运作的"(Bell, 1987: 8)。举例而言,尼克·康尔德里在他关于"一般人"与英国媒体之间关系(Couldry, 2000)的研究里,筛选出许多足以证明存在于媒体组织之间的特定冲突"个案研究"。例如:格里纳姆·康芒:《加冕街》的工作室,吸引了许多游客,以及"大众",并将这些个案当成是"社会领域里的特殊优势领

域”。

然而,使用个案研究还有另一个优点,这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研究路径及其对于检视社会文化过程中不同要素的关注有关。让我们回到约翰逊的描述上:他认为文化研究试图要“混入结构之中”,而对于某一特殊、独特案例的界定,可以让研究者揭露某一特定案例的多重复杂性。一个好的个案的选择有助于产生研究的“强度”,以及产生密集的多层意义的范例,而通过仔细的分析,密集的多层意义可以产生对文化过程的洞见。正如我们即将在下文所看到的,此种研究工作值得进一步地研究,而不仅只限于表面上的“个别的个案研究”。

由鲍尔·杜盖伊与霍尔所完成的关于索尼随身听(Sony Walkman)的个案研究,堪称是具后续研究价值的个案研究的代表(du Gay et al., 1997)。在这项研究里,其分析过程探讨了为了理解一个商品(例如:随身听)的特殊性,所需要的复杂元素。因此,他们探讨了设计与生产的方法、该产业与工作地点的文化、营销与广告影像以及人们实际上使用该产品的方式。学生们在我所教授的“消费文化”的课程里,阅读到此一研究,因此,我要求他们进行小型的个案研究,以作为该课程的评分依据。以下是我为修这门课的学生所做出的指导方针:

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味与认同

“个案研究应该要能捕捉到单一案例的复杂特性。”

■何谓个案研究?

在本课程里,我们已经看到一项非常突出的个案研究,亦即索尼随身听的个案研究(du Gay et al., 1997)。此一分析过程探讨了为了理解此一个案的特殊性所需的复杂元素的例证。例如:随身听的研究带领研究者去探讨设计与生产的方法、营销与广告影像以及人们实际使用该产品的方式。他们探讨了商品是如何与它所处的语境进行互动的。

明显地,你们的个案研究无须达到如此完善的境界。然而,我希望你们做到的是:将一个“案例”放到我们现在理解为消费社会与文化的语境下来研究,并使用理论路径、方法以及探讨商品与消费实践的方法来分析这个案例。

■决定好一个研究主题

你可以在不同的范畴下思考你的研究主题:

- 商品:例如,运动鞋、即可拍相机、香烟、来自于秘鲁的芦笋、运动用品、“设计师”品牌、意大利车、零售商场中各种不同的食物。关于这些商品的杂志/媒体文本。
- 零售业:百货商场、服饰店、艺品店、购物文化、市场、特价花车、城市的主要街道。

这并非一份非常完整的清单,你们还可以再增加些内容。重要的是,你必须选择你们要研究的焦点。然后提出一些问题,例如:

- 这些商品是为了谁而设计的:是谁在使用这些商品,以及如何使用?
- 这些商品或活动提供什么来作为它的使用者的特征(设计、品味、代价)?
- 这些商品是如何出现在广告中?这些商品被赋予什么样的意义?
- 这些商品来自何处?

除了特定的对象之外,你也应该探讨某种实践的意义?例如:

- 购物。
- 沉浸于俱乐部/饮食/饮酒(就研究的立意而言,无须对此进行太多的田野调查工作)。
- 逛艺廊/进戏院/观看电视以及(或)录像带。

■决定好研究的路径或方法

一旦决定好你的研究对象或实践,接着就应该赶快决定你的研究方法。例如:如果你选择了运动鞋,那么你必须要拟出一份关于这项商品的各种元素清单,而这些列举出来的元素是最具重要性的,诸如:不同品牌之间的差异,它们是为谁而设计的?它们如何出现在广告中?它们如何被使用?以及它们对它们的使用者而言,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如果你希望探讨的是某一个消费场地,例如:某一家购物中心或百货公司,那么你必须实地去参访这家购物中心,去探查它的设计与摆设、谁在使用这家购物中心以及如何使用、不同的商店是如何“吸引”你的目光、它位于何处。

如果你选择的是某一种实践,例如:逛艺廊或购物或是饮食,那么你必须进行某些观察工作,如果时间充裕,你甚至必须与使用者进行访谈/讨论。

评估的标准

虽然诸如信度、效度与代表性等评估的词汇，是设计用来探询社会研究对于不同种类研究方法的使用的结果与宣称。例如：统计调查法或量化的访谈方法，但是这些问题却都与那些以质性研究方法为主的研究有关。经过审慎的检查后，这些研究都被视为不符合社会研究的要求。研究对象的响应可能既匆忙又极具防御性，反驳这些问题背后的假定，并坚称质性的研究无须宣称其是否具有代表性或是否具有概括性。然而，重要的是，质性研究必须要能被评估，也因此，为了要了解这些熟悉的评估标准是否能够应用在本书所关注的研究上，对于这些标准的背后预设的检视，则相当值得一试。

信　度

信度似乎是最适合应用在量化研究上的评判标准。它主要关注于研究设计的机制是否能够产生可信的、一致性的结果。举例而言，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中，问卷的使用的可信度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评估标准。其目标在于：透过标准化的研究技巧，确保不同的研究者在执行相同的研究时，能获得一致性的数据，而这些数据以后可以作为测量的依据，并产生可以证实的"研究发现"。截至目前为止，大部分我们所探讨的研究计划都混合使用了参与观察法与对话访谈法或生命故事访谈法，目的都在于希望能够在访谈的过程中，自由地进行讨论，发展出研究主题，并期望可能偶遇某些新的、非预料之中的结果。因此，任何试图将"问卷"或访谈程序予以标准化的做法，对本研究之目的而言，都是不恰当的。

效度、代表性与概括性

乔克·赫米斯观察到：质性研究倾向于强调其"效度"，但是却无法达成"概括性"。在此，效度被视为意指主题所呈现的图像与研究语境的准确性。民族志者或质性研究者相当亲近于行动

者,而且可以从相关行动者身上获得第一手的观点。甚至,如果你所寻找的是关于人们所作所为的主观观点的数据,以及关于他们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热情、他们对于自我的观感,那么最有效的研究方法即是能够让研究者倾听那些观点、那些叙事、那些日常生活故事的方法。普卢默(Plummer, 2001)指出:对于这些方法的一个普遍批判在于,这些研究所可能呈现出来的无数偏差。这些偏差可以在受访者、研究者她/他自己的表现中发现,以及在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的互动方式中发现。所有这些元素的确都是无法预测的、具有各种影响力以及“感染力”(contamination)。但是,正如普卢默所指,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任何一种研究计划,可以完全消除这些偏差。我们最好能够意识到:研究者是他/她所研究的世界中的一份子,有各种不同的因素会影响受访者,你必须在你可能做出的宣称中,考虑到这些因素,因为你的宣称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必然无法预测的、而且时常是不稳定的、令人困惑不解的过程。

虽然受访者的立即反应能够保证某种程度的“效度”,但是在小型的、单一研究者的研究中,被视为有问题的却是关于诠释数据的有效性问题。关于此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一些已被认可的处理方法存在。最明显的是,反思你的方法论策略,以及你试图从你的数据中作出的宣称。另一种方法则是关于受访者的有效性问题,亦即受访者对于研究者在访谈中的书写观点的反馈。毫无疑问的是,这个程序在研究政治(研究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否能保持开放的关系)领域时相当具有价值。然而,反馈的目的却比较不明显。它的目的是否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为“真实”或更为“准确”的观点?如果果真如此,谁具有宣称真实或准确性的优先权?数据将会被进一步分析,因此,不会被逐字地记载在研究里,如果无法清楚地理解分析架构,那么就很难分析这些资料。更进一步的策略则是指“三角交叉法”(triangulation),亦即“检查一些推论方式,这些推论方式是援引自某一组从他人身上搜集而来的资料来源。”(Hammersley and Atkinson, 1993: 231)。除此之外,“技术性的三角交叉法”(technique triangulation)(ibid.: 231)则可以用来比较不同方法之间所搜集的数据,例如:关于书写日记的访谈。人们对你说了什么以及他们在日记上写下什么,这两

者之间可能完全不同。比较个人访谈与团体访谈，对于同一个研究主题，可能产生相当迥异的响应。之所以要进行此种对比过程，其主要重点并非在于完成三角交叉法本身，而是为了要：①面对分析的效度所带来的威胁；②产生差异性与矛盾性。第二个理由非常重要，而且在研究过程中，这将是一个极具生产力的阶段。

然而，对于研究规模与技巧而言，这些似乎不能构成理由。你可能是一个独立的研究者，能够只采用一种研究方法就完成研究。同样地，许多关于"效度"问题的背后假设以及"三角交叉法"，都假定一种相对稳定性的研究语境与环境。关于社会与文化实践的研究以及过程都不断地在改变。确实，民族志的原则、反思性都预先假定主体的动态本质。赫米斯在她关于"效度"的讨论中如此响应：研究者应该毫不隐讳地描述变化或语境的中断，以及他（她）对于那些变化的响应。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应该不断地进行反思，如此一来，才能试图达到一种"内在的效度"，亦即温迪・霍尔韦所描述的："在整个资料搜集与分析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发展出理论架构，而这个理论架构也不断地回过头来形塑我的数据分析，形塑在我与参与者之间的讨论中所提及的产生研究题材的方法"（Hollway，1989：4）。

对质性研究而言，概括性又突显出一组完全不同的问题。赫米斯对于研究过程的反思，在此同样极有帮助。概括性、信度或者代表性的要求，实际上都是在于研究的"结果"或"发现"，应该要能应用到不同语境中的相似现象上。在赫米斯关于女性杂志读者的研究中，界定出许多文化类目，透过这些类目，她的研究中的不同读者可以体会或了解不同杂志类型所代表的意义。这些类目随着不同的受访对象而有不同的结果，但是有许多类目是共享的，而且随着杂志的类型（次类型）而有不同的分类方式。因此，赫米斯主张：要转换类目的范围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它们时常与不同的类型、不同的语境有关，但是要将不同受访者获得不同文化类目的机会与他们所拥有的普遍文化资本之间关连起来，却是非常可能达成的。这是理论概括性的一个例子，主要是以赫米斯的读者样本之间已感知到的差异或区分作为基础所做出来的理论概括化推论。同样地，霍尔韦在她关于性别认同的研究中，并未试图将她的样本予以概括化。如果她试图这么

做,那么也是在理论的基础上,而非以统计的原则为主。她的样本是建立在比较方法的基础上,比较方法是“扎根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此种方法是透过面对差异性,产生描述这些差异性的概念,然后再将这些概念应用到其他现象上(Hollway, 1989: 17)。小规模的质性研究采用反思性的、创新性的方法,这些方法对于研究的问题而言是恰当的,并能产生有价值的见识,而这些洞见也可以被转换到不同的语境里,而且的确时常能够为新研究者提供资源与启发。然而,当像是赫米斯与霍尔韦此类的研究者开始如此详细地发展研究过程时,他们也能够提供一些可以被转换的研究路径、方法与策略,虽然这些路径、方法与策略未必能为一个新的研究计划所全部采纳,但是它们当然能够成为未来研究设计的一个暂时性蓝图。

理查德·约翰逊曾经论述过关于评估的主题,并主张:语境性的以及文本性的文化研究超越了“代表性”这个社会科学的评估标准(Johnson, 1997: 464)。约翰逊甚至主张:这些小规模的研究是非常“扎实”的研究,而“这让意识的矛盾形式,以及在不公平的权力情境下可说的与不可说的事物,可以获得复杂且多层次的分析”(ibid.: 467)。对约翰逊而言,文化结构与型构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也因此,小型的但却相当翔实的研究能够深入探讨这些共享过程。这些研究与“个人”的态度完全无关,而是与共享的(或非共享的)形式有关。从这个观点出发,这些小型研究“比起个别的例子所呈现的,发生的范围似乎更广泛”(ibid.: 467)。同样地,普卢默也以“代表性”这个标准来思考什么与主导以生命故事为基础的研究有关。他的作法是:将代表性的概念从它的统计基础上分开来,并问及:这个概念可以为身为文化与社会研究者的我们带来什么。对普卢默而言,研究各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数据种类,需要不同的评估模式(Plummer, 2001: 153)。首先,他指出:在特定的领域里,例如:口述历史的领域里,重要的是生命故事的独特性,而非概括性或代表性;在具有独特性的生命故事里,人们的反思可以说明过去事件的重要性,或者可以创造出不同的历史。同样地,生命故事可能是由某一个“关键的告知者”所提供,他对特定文化世界的理解可以提供丰富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可能是任何大型研究都完全无法提供的。鲍勃·康奈尔在他

关于阳刚特性的研究中，使用了生命故事的方法，并透过他的分析主张：要搭起文化、社会、个人与历史之间的桥梁，是非常可能达成的。在生命故事里，社会结构、叙事与理论共同发挥作用，当他开始进行反思时，“生命史的方法总是关注于随着时间而产生的社会生命构成，它在根本上就是历史”（Connell, 1995：8）。约翰逊在他试图重新评估“代表性”这个概念时，他将这个概念视为一个关于权力的问题。对他而言，代表性的概念意味着在场，并致力于探询相同的现象可以在何处，以及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被观察到。他主张，如果我们从“边缘”或从“文化的底层”出发，那么这时常能够彰显出更多主要的范畴，而非仅是关注于“在场”。例如：代表性的判断应该以被宰制的弱势团体的观点是否被排除在外，作为其判断的依据。小规模的、适当的研究总是将焦点放在受宰制的文化、日常生活的实践上，如此一来，可以“重新排序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景观秩序”（Johnson, 1997：470）。

这些关于评估标准的问题都非常重要，但是正如普卢默所言，他所主张的并非一种适用于任何研究的研究路径，恰巧完全相反。一旦我们承认社会知识的建构本质，我们就更能够意识到，在运作的过程中，决定性的范围如何。研究者对此的认可程度以及对于过程的反思，以及她或他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研究者角色，都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效度”标准，但是很吊诡的是，却可能被“信度”的标准给排除在外。普卢默严正地质疑：任何一种研究计划（信度、效度与代表性的外在标准所依靠的研究），都能够达成一种“去语境化的”知识的可能性；借此质疑，他摘述了他对于代表性这一概念所持有的想法。

客观性与主观性

同样地，当我们思考我们的研究过程时，客观性与主观性也是相当重要的词汇。客观性的问题在第一章里已经讨论过，尤其是“科学的”研究路径所假定的中立客观性，是无法达成的。清楚可见的是，在任何研究者所进行的研究中，研究者都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有可能建构一个可说明自身架构、方法论的研究计划，并反思研究过程中的变革与发展，但是却永远也无法达到中立客观性（Hermes, 1995）。然而，何谓“主观的”，却也

是一个相当值得探索的问题。关于主观面向所引发的议题,在自传书写中尤其重要(参见第7章),但是也同时存在于那些作者试图"将他们放入研究之中"的研究例子里。虽然这些并非都是成熟的自传,但是此种研究例子却可能使用特殊的生命经验或知识,透过这些生命经验与知识,文化或社会过程的特殊面向则可获得进一步的探讨。这个来自于伯明翰学生的例子,已经涵盖了建构阳刚性与阴柔性特质的探讨;亚文化与认同的分析、工人阶级认同也都使用了家庭相簿。那些致力于这些研究工作的学生,时常表现出焦虑,他们担忧他们的阐述是否"太过主观"或者是否"仅是个人的主观意见"。区分何谓主观性的意义,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在我的字典里,主观性的定义是指源自于思考主体的心灵(或与思考主体之心灵有关)的特质,而且并非意指被思考客体的本质,而"主体理论"则透露出个人作为一种本质主义的概念,正如霍尔所描述的,"这不再是一个很好的思考对象"(Hall and du Gay, 1996)。主体理论挑战了统一的、中心性的"个人"概念。另外,主体理论主张:主体是由话语实践所构成的,而论述实践构成了主体性本身。因此,我们自己的主体性是由我们在特定话语里偶然获得的立场所构成的,而我们再将这些立场与话语带入研究中。当然,当我们思考我们的研究实践时,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观点。霍尔韦提及与她研究对象相关的一个论点:"一个主体的社会理论意味着从任何参与者身上获得的信息都是有效的,因为那些观点是社会领域的一个产物(即使是相当复杂的)"(Hollway,1989: 15)。因此,如果我们反思研究过程中我们自己的主体性(与认同),或者至少将之视为历史、社会与文化论述下的产物,那么当我们在探讨文化的过程时,使用我们自己的(与他人的)经验,我们就有可能超越"主观性"。

研究的伦理与政治

当我们试着进行与"出行"(going out)或"进入田野"(into the field)相关的研究,并且为了要建构一些对我们分析有利的数据形式时,我们就必须审慎地思考关于伦理的问题。研究的语言,诸如其他的"科学"论述形式,都存在一种净化与合法化的习性,并借此习性判别什么应该是被高度质疑的行动与决定。我认为,我

有幸能与许多学生共事，无论是大学生或是研究生，当他们在建构他们的研究计划与方法时，他们必定会问及：“我/我们到底有什么权利可以这么做?”这个问题必定会阻挡在我们的研究道路前，让我们暂时停下手里的工作。毕竟，“我们”都试着说服人们参与我们的研究，试着从他们身上“套出”信息与故事，我们这么做，并不求任何报酬，而且在大部分的案例中，他们甚至没有机会可以阅读到研究的成果报告、文章或书籍。有些人认为，与访谈者之间的邂逅是一种愉快的经验。毕竟，人们对于你必须说与必须想的事物，以及必须排除所有其他干扰的事情，并非总是有兴趣。当你被邀请对一个感兴趣的倾听者表达你自己或你的生命史时，这样的经验当然会让你感到愉悦。但是这却必须耗费相当多的时间，而且可能挖掘出许多令人不安的生命故事元素，无论是过去的或是现在的生命故事。研究者可能根本无法提出任何一种后续追问，以期让谈话继续下去。

在你认为你有权利入侵(就如同科尔斯与他的学生认为他们正在从事的行为)他人的生活之前，你必须仔细思考这些重要的议题。重点在于，你目前所处的机构定位，它的传统、例行程序与假定都赋予这项实践合法性，它“假定”学生、研究者与学者具有研究他人生活的权利。因此，至少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心照不宣的假定，并在我们的研究中，以参与者的角色研究我们的研究对象，而非以被研究的“客体”来看待研究对象，并且我们要扮演一个尊重别人且心胸开阔的角色。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关于你的研究的问题、关于你计划如何使用资料，以及最要紧的是尊重隐私权的要求。当人们欢迎你进入他们家中进行访谈时，这些提醒都是相当重要且必须谨记在心的。我曾有过一个经验，那时我发现：我无须做太多的努力，女性们都非常乐意与我交谈、向我敞开心房诉说她们的故事。我的受访者总是将她们从访谈中所获得的乐趣归纳成一句话：“能有个人讲话实在是太好了”。他们提及：能针对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规约与挫折，以及他们对于未来的计划与期望，发表他们自己的观点与意见，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身为一个访谈者，我要求人们谈及他们自己，我是一个乐于倾听的倾听者，对于他们的谈话感兴趣，而且我也鼓励他们以情绪性的字眼来表达。在离开我的一些受访者的

家时,我自己则不断地思考这个过程是否顺利:“那是一次很好的访谈……与她之间的互动没有任何的问题……她似乎能够完全地放松”。但是,在某些女性详细谈及他们生活的私密部分时,访谈似乎进行的不太顺利,因为这些私密生活对他们而言,必定是一种创伤的经验。有一些人说到:这是第一次,他们详细地描述他们的忧虑、不满以及受压迫的感觉。而有些人则表达了他们生活中的深层焦虑与寂寞。就如同科尔斯的学生一样,我也急着离去,希望赶快进行录音带的抄录工作,并将这些数据加入我的分析“数据”中。虽然我会重新拜访一些女性,但这只是为了让我不致于感到良心不安,因为我无法“收回”受访者的生活经历,除了倾听之外,我也无法为他们做任何有益的事。普卢默如此说道:

罗伯特·科尔斯在《从事记录工作》一书中,对这些问题做出响应:“从事记录的工作是否真的是一种剥削,是否是到达一个既定的场景里,要求人们合作,付出他们的时间、精力与知识,以配合某个人的研究或计划,然后在不久后,感谢他们的合作,接着马上离开。我们如何能够受人敬重地进行这样的工作?”(1997:76-77,引自 Plummer,2001)。

以下引文是一位学生试图进入某一户人家家里拍照的情形:

> 我将坐在某人的家中,我已经打扰了他们的生活,我的行为真是鲁莽啊!我不断地反省,这真是一次错误的举动……为什么那个家庭会让我逗留其中呢?……我设想我可以贿赂他们,付给他们钱。但是这么做是不对的,然而,真的是错的吗?为什么他们不应该收钱?他们相当贫困,他们的确需要钱,而我也一定会从中获得什么,这是当然的……我们对此都有一定的认知,而且我们也建立起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事业,但是他们呢?他们无法从中获得什么。他们只能忍受这一切!(Coles,1997:82-83)

> 诉说一则生命故事的过程是一个深深充满疑问且攸关伦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研究者完全深陷其中。在一个实习研究者的手中,尤其是一个急于为论文搜集生命故事的学生,可能鲜少警觉到这点,他们可能因此铸下严重的错误。(Plummer,2000:224)

我完全同意那些对于适当地扎根实证研究的要求,它们关注于实际的人类主体及其生活,但是这种坚持实际造成的结果却往

往被忽视了。然而，我们也很容易会认为，思考这些问题是完全不恰当的。但是，透过仔细地思考这些问题，你将会发现你被鼓励做下面这些事：思考你对于你的受访者所应负起的责任，你应该尊敬、谦恭地对待他们，尽可能开放地使用你的研究题材，将逐字稿或者你完成的研究计划寄给你的受访者。此外，相对于许多已获得承认且成功的研究者而言，你必须更进一步地处理这些重要的议题。

第二部分 研究的过程

第5章 实例的选择与素材的产生

Locating Instances and Generating Material

现在,你有了一个研究焦点与主题,如果你已阅读过前一章,那么你将会意识到学术性的、政治性的、伦理学的以及个人的议题,这些在你研究的催生过程中,将是非常重要的议题。下一步,你必须决定好你研究素材所要探讨或产生的场域或定位。我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所有社会学文本所使用的"数据"(data)一词,也避免不要像哈默斯利与阿特金森(Hammersley and Atkinson,1993)在他们关于民族志的著作中,使用到这一个词汇,例如:他们的一个章节就命名为"记录与组织数据"(recording and organizing data)。"数据"一词与"证据"(evidence)、"信息"(information)以及"证明"(proof)之间具有强烈的关连性,同时也与传统社会学研究方法下的研究结果有关。如此一来,我知道你们这些比较倾向于采用文学与文本取向来从事文化研究的研究者,将会立即地"转向"。但我并不希望失去你们,所以,请你们继续阅读下去。

我比较倾向于使用"研究素材"(research material)一词,这并非仅是基于语义学上的考虑,也不只是用计划来留住"人文学"的学生。"素材"一词的定义涵盖了以下几个面向,而这些面向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相当有趣的基础。

1. 除了涵盖"数据"一词所指涉的一般性意义,"素材"一词还包含了诸如信息、笔记、著作,也就是说,它所指的是研究的"东西"(stuff)。因此,这可能扩充了我们对于实证研究的理解,并认为它涵盖了访谈"资料"、在参与观察时所记下的笔记、个人的研究日志、自传、梦等,同时也包括了文学、视觉文本分析的结果。

2. 如果我们说某个事物是一种素材,那么这就意味着它是实质的、“世俗的”(worldliness),亦即它是现实的(grounded)以及具体的(embodied)。这恰当地涵盖了我们所生产的研究素材的种类以及我们从事研究的方法。因此,这与一个具体的研究者有关。也因此,无论是研究素材或是研究者本身,都不是自由而独立的,也不是非具体的。相反地,研究素材与研究者都必须是体现于某个场地,而且也是可以被定位的。

3. 因此,就定义而言,所谓的素材即是指有意义的、意义重大的东西。所以,可以将一套实用的标准应用到研究的素材之上。

4. 这个词汇的最后一个面向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相当实用的问题,亦即:它应该是可以应用的、恰当的以及贴近于正在进行中的研究主题与研究目的。

因此,“研究素材”这个标签囊括了所有研究的“东西”,无论是参与观察的结果、访谈或是文本(例如:电影、漫画、电视节目)、文件(例如:史料、日记、照片)、政府的报告、新闻报导等详细分析的结果等,都涵盖于其中。除此之外,研究素材也提供关于我们进行研究的研究路径一些良好建议。你所获得的研究素材将是你研究的核心,而且也造就了你研究的独特性。它可能具有不同的功用,但是你的特定研究方法将会界定、形塑素材的本质,也会局限或帮助你的诠释与分析。必须谨记在心的是,当你着手开始进行你的研究时,你所搜集的素材必须实现你所要求的功能。

就文化研究的观点而言,你可能会感兴趣的研究种类应该会有:流行文本的诠释与使用、某一个迷或亚文化的成员、不同媒体对于名人的建构、在一个国家的与全球的语境下认同的运作情形、性别在不同的公领域与私领域中的表现、市场的建构、媒体对于“绿色”议题的呈现、文化与政治行动主义等。最后,还包括了文化生产者、文化机构与文化组织,虽然事实上,这个“文化”面向早已被文化研究给忽视了(Born, 2000; Meijer, 2001)。

让我试着详细地说明隐含于上述面向中的不同关系或形式下的各种面向:

1. 诠释与流行文本的使用。这仍旧是文化研究关注的主要领域之一,此一面向关注于“文化”所能到达的范围,所以它时常

体现于大型文化产业所生产的流行文本之中，决定或形塑了自我的观感与更广义的社会意义。如果这是文化研究所关注的主要领域，那么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以探索文本或类型之间的关系如何被实际使用者与读者诠释和使用。贾尼丝·罗德葳在她一篇现在极为经典的罗曼史读者研究（Radway，1987）中，确实界定出一个轮廓十分鲜明的流行罗曼史小说的读者团体，而且透过问卷与访谈，探讨他们对于罗曼史小说的诠释与解读。她更大的兴趣在于：女性如何被父权定位；阅读罗曼史所产生的宣泄作用；以及阅读行动本身如何提供女性关注的焦点。换句话说，她广泛的研究议题主要在于探讨在当代西方文化中，作为有力话语的罗曼史是如何被商品化、流通与消费的。

2. 某一个迷或亚文化的成员。这需要与研究所关注的团体做贴身的参与观察。亨利·詹金斯对于《星鉴奇航》的影迷所进行的研究采取了民族志的观点，而且是从一个“局内人”的观点来探讨这个团体。虽然，这项研究的主要焦点在于，探讨一个长期的流行文化文本及其迷们之间的关系，但是詹金斯的研究还探讨了他们的诠释策略、社会组织与文化实践，以及这个文本与大众媒体、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鲍尔·霍金森自己就是歌德亚文化（Goth sub-culture）的成员，他进入他的“社群”里，使用参与观察和访谈作研究，另外，还在他的研究中进行文本分析。虽然霍金森对这个特殊文化与社会现象感兴趣，但是他（Hodkinson，2002）却主张一种研究认同建构与社群的后现代研究路径，并将此一路径连结到物质性的实践与虚拟社群的存在上。

3. 在不同的全球与国家语境下，认同的运作情形。马里·吉莱斯皮探讨了旁遮普伦敦人的认同问题。他通过长期的民族志工作，与当地人接触，进行访谈、讨论，同时也对特定的电影话语以及其他被家庭使用的文本进行分析（Gillespie，1995）。虽然她的研究主要是以某一个特定团体（这个团体具有特定的社会性与地理性位置）为主，但是她却是通过诠释她的素材，来探讨流行形式（尤其是电视与录像带）在认同形构过程中的重要性。

青少年俱乐部与其他“公众的”团体，时常提供关于身份认同的互动与实验、归属感与疏离感以及关于你如何寻得你所属身份及所属定位之实例（这些例子时常是高度浓缩，但却是实际体现

的例子)(Back, 1996; Alexander, 2000)。

4. 文化生产者的组织与机构。正如我们在第 3 章所提到的,很少有研究会将精力放在这个文化面向上,但是近年来,乔治娜·博恩已经完成了英国广播公司某些生产语境中的民族志研究,而艾琳·科斯塔·梅杰也访谈了荷兰三部黄金时段肥皂剧的制作人,探讨他们如何在肥皂剧中建构族裔(Bourne, 2000; Meijer, 2001)。

无论你的主题领域为何,你可能都希望进行某种形式的"参与观察",现在,在探讨某些特殊的例子之前,我希望先概略地讨论这套方法的应用。

"纯粹观看"与参与观察

威利斯(Willis, 1980)区分了下列构成参与观察的各项技巧:

- 参与。
- 观察。
- 作为一个观察者所进行的参与行为。
- 作为一个参与者所进行的观察行为。
- 纯粹"走走看看"(being around)。
- 团体讨论。
- 记录的团体讨论。
- 没有焦点的访谈。
- 记录的没有焦点的访谈。

你可能会发现,你正在探究的事物正需要上面提及的某些或全部技巧。举例而言,当你关注于人们之间互动的方式,以及在既定的场地或空间里(例如:教室或夜总会、家庭或工作场所)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时,你就会需要上述的技巧。这即是一般所谓的"参与观察法",而此方法是民族志研究的主要方法,事实上哈默斯利与阿特金森(1993)即指出,民族志与参与观察这两个词汇是同义的。借着引荐这个方法,你将能够通过所谓的访谈或团体讨论,与相关的行动者进行对谈,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所收集到

的素材，也可以用来补充你的访谈或团体的讨论。就这方面而言，这个方法能够为你的读者在设定行动场景时，提供一种“描述性语境”。这时常能够丰富或填补你的受访者的特征，而且可以说明许多未必能在某一次单独的访谈中显现的特征。在这里的例子有：外貌、穿着、风格与行为；场景：家里或是工作场所；某一个人出现在他们的场景里时他是轻松自在的还是紧张的，他是否能够自由地在他的空间中四处移动，等等，诸如此类的特征。有些人可能对似乎是隐蔽的或甚至是偷窥的行为感到不自在。然而，我之所以希望你能注意到这点，是因为：无论如何，你都会在你的不同研究中，搜集这些种类的线索，并对这些线索进行诠释，而且时常必须对你的某些受访者进行评估或判断。这即是贝弗利・史盖吉所指的“默示的知识”（tacit knowledge），亦即我们对于特定社会过程或语境的默许的知识（Skeggs，1994：70）。借着在你的分析中明显地表达此点，不只是在数据搜集时，使用你的所有感官，在与你的受访者与读者面前，你更应该真诚地表现自己。亚拉苏塔立论及媒体文化的研究，并进一步指出：“我们拥有一段非常长久的个人田野经验优势”，在这些经验里，我们居于构成我们研究背景的相同文化（Alasuutari，1999：8）。正如你所见，我刚刚描述的例子并非许多研究者所采取的那种发展完善的、长时间的参与观察法，这种正规的参与观察需要对特定的场景或团体做长时间的观察工作。然而，当你可以“感觉到当中的脉动”或想探究某些你想要进一步探索的人或地方的数据时，威利斯所描述的“纯粹走走看看”，就是研究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当你要着手进行这种田野工作，并试图理解你自己在你的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时，你必须非常清楚你的研究目的为何。可以在不同的研究阶段里，学习质疑你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这将对你帮助良多。就此而言，你可以提出以下也许对你有所帮助的问题：身为一个参与者，我究竟要涉入这些活动多深；也就是说，我应该在研究期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该如何将我自己呈现在我的研究对象面前？揭示以及/隐藏的重要性何在？我应该如何清楚地说明我的目的？信任、保密、伦理等相关议题，又该怎么做？

这些并非特别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有一个问题却是非常根本

的,亦即在你开始着手进行之前,你是否能够清楚澄清你的意图。当你开始接近你的研究"场地"或团体时,为了要能够厘清研究的走向,对于意图的澄清将是必然的工作。如果你能够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那么你就能够获得更多更可信的、可使用的研究素材。

萨拉·桑顿在她关于"俱乐部文化"的研究中采用了参与观察法(Thornton, 1995),并且借着区分民族志的两个相互冲突的方面,来讨论她的田野工作的复杂性,这两个面向即是:参与与观察。前者依赖于人们所说的事情,并赋予这些言说正当性;而后者则依赖于研究者的所见。比起桑顿的建议,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主张:研究者身为一个观察者,他们看到了人们的所作所为,而非看到了他们所说的事情。江克(Junker, 1960)更进一步地区分"完全的参与"、"作为一个观察者所进行的参与活动"、"作为一个参与者所进行的观察活动"以及"完全的观察者"之间的差异。这个区分的光谱从研究者完全暴露他自己的活动,到研究者作为一个观察者所进行的活动,前者是指研究者伪装成团体、文化、社群的成员,并"进入"其中;后者则是指研究者完全与该团体保持距离,而且作为一个明显的观察者角色。这意味着每一种不同的立场都需要特定的研究表现,而且也会产生不同的研究素材。

与本书所使用的大部分例子一样的是,在桑顿的研究中,她有意识地表现出"双重移位"(double move),也就是说,在她试图从俱乐部成员的观点出发,理解那个世界时,她所采用的是一种"主观的"模式;但是,她也同时采用一种较为客观的研究取向。

因此,作为一个团体中的参与者/观察者,我们可以描述出人们如何看待他们自己所投入的活动,也可以描述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所选择的场景的氛围等,但是为了要诠释以及更完整地探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必须寻求某些分析架构的帮助。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开始"客体化"(objectify)我们的数据。简言之,要分析某些事物,即意味着要将它划分开来,因此我们必须进入抽象的领域,我们必须采用概念与理论以便进行分析。在此,我们会采取"客观的"模式。然而,我希望让事情变得更复杂,并认为:虽然它们都是有用的知识论区分,但是这些模式都不是在一种纯粹形式上运作的。研究的"真实"世界总是与情境有关,而且

也都能够被置放于某一个语境之中,而这个语境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即是研究者本身。我们自己的主体性与社会认同,在任何特定的研究计划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不仅决定了我们主题的选择,也相当确实地决定了我们的所见所闻。

空间隐喻/介于熟悉与陌生之间

正如我们所见,在使用参与观察相关技巧的研究中,在观察者的"外在"观点与参与者的"内在"观点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研究者的目标正是在于连结起这两种观点。同时这也引发了关于你与该团体,或你与你所研究的文化之间关系的相关问题。就传统而言,人类学致力于通过长期的参与观察,"发现"特定文化的生活方式。人类学者使用了一个无疑是充满争议的词汇:"在地化"(going native),在其中,民族志者变成了该团体与文化中的一份子,而且也将自己融合进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他/她变成了他们当中的一个成员。就诸多面向而言,从事文化研究的工作时常与此种模式大相径庭。其中之一即是,研究者对于所选择的研究领域的认识,以及通常是对于参与者本身的认识。显而易见的是,这是因为文化研究致力于分析与理解文化实践过程,而这些文化实践与过程就像是发生在"家乡"(home)。因此,至少,研究者与他或她的受访者之间,是采用相同的全面文化架构。然而,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身为一个大学生或研究生,因为受时间与经费所限,你们当中很多人必定会选择一些早已熟悉的文化面向与社会团体成为你们的研究主题。这是从事文化研究几乎无法避免的部分,而且这时常不仅是现实的问题而已。举例而言,这也可能是一个关于政治允诺以及亟需改变的欲望问题,或是受到对流行文化的投入与兴趣所产生的决定问题。以你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所得到的知识有很多显著的优点,你可以将这些知识带入你的研究计划中,但是正如第 2 章所讨论的,如此的做法,并非毫无疑问或没有任何困难。你必须意识到你所属的背景以及身为该领域当中的一员,可能会如何产生一种偏颇的观点。也就是说,虽然你"明了"该领域,但是你可能也会无视于其他不同

观点的存在。“过度的认同”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尤其是当研究者认同于某一个团体时,这可能导致研究者无法批判性地分析他们的活动、观点或实践。马克·珀斯浩斯在他关于《太阳报》读者的研究中,论及他的冲突认同立场,内在于他的主体性的认同轨迹让他成为《太阳报》的一员。他也有一群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朋友,而且他们也是《太阳报》的读者。他认为,这对于他的小型研究计划(对于朋友进行的访谈),非常重要,而且对他也相当有利。“当我开始与我访谈的对象见面时,我渐渐庆幸我已经有了一些背景知识可以进行访谈”(Pursehouse, 1989: 32)。在此,珀斯浩斯意识到他的经验以及对于特定文化社群的认识,这个社群正是他的读者所身处的社群,而且他也能够在进行访谈时,轻易地援引他对于这个社群的认识。他进一步指出:

> 我认为,就某些方面而言,认识他们或是被他们认识,对我而言有很大的优势。最重要而且也最明显的优势是,这让开始进行对话的实际过程变得相当顺利,而且当提及某范围的主题时,也让双方觉得自在。这同时也意味着,“研究者”与“被研究的对象”根本无法在一个真空的社会环境下相遇。我对于他们的立场与可能生活的文化有所认识,而他们也能够将我当成一个“研究者”,同时也是某个具有其他关系的人。简言之,他们从来就不仅是“太阳报的读者”,而我也从来不只是一个“学术研究者”。(ibid.: 33)

珀斯浩斯这么做是为了以性别与族裔为基础,对他的小型样本进行语境化的工作,同时也将他们的地理位置、区域性以及他们所处的地理区域的就业模式等语境纳入其中,借此提供较为广泛的语境,但是这并非概括性的语境,而是理论化的语境。他对于《太阳报》所进行的文本分析与对话访谈,显示出《太阳报》及其读者(1980 年代晚期)之间的复杂性,而这复杂性通常具有矛盾的本质。

正如哈默斯里与阿特金森所言:“民族志者必须在熟悉与陌生之间保持一种思想上的平衡;在公开的参与观察中,他或她经常会被社会性地定位在介于陌生人与朋友之间”(Hammersley and Atkinson, 1993: 112)。这是为了要强调反身性的重要性,并彰显

出:你,身为一个社会研究者,将会在你的整个研究计划中具有不同的“身份认同”。一个正式进行访谈的研究者,或与一群音乐家“厮混”(hang out)的研究者,都与一个坐在书桌前思考研究素材、书写学术文本的研究者截然不同。

当然,在一些场所或领域里,你的出现并不会引起他人的注意,例如:开放的“公共”空间。然而,当你希望研究某一家电视台新闻室的工作情形时,很显然地,能否接近该场地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的出现将引起众人的瞩目,而且这也需要经过协商。但是,应该谨记在心的是,即使你能够“暗地里”进入该场所,但你还是一个凝视的主体而已,你所能做的仅是透过你独特的眼睛,观察那个世界。你总是而且已经拥有你自己的架构,这些架构决定了哪些事是会引起你的注意,而不会引起其他研究者的关注。显然,我们所看到的事物非常重要,但是,那些我们没看到的事物也同样重要,例如,那些我们无法用既存的范畴分类的对象或行为、我们无法认识的经验观点以及我们无法诠释的事物。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我们的研究能力与潜力将视我们的理解能力与既有的分类范畴而定。因此,为了要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反思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必然要能(而且也能够)显现这些能力。这么做是为了使我们自己理所当然的假定与偏见不再自然而然(denaturalise),因为这些假定与偏见时常显露在我们的研究之中。

身处其中

大部分关于使用参与观察法的研究的专题研讨会,都无法解决“研究者对于研究的场域能发挥什么作用?”这个问题。这很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但是支撑这个问题的基础假定则是:就某种程度而言,某些地方一定隐约地存在着可以被研究者“理解”的互动社会存有的“自然”场域。当然,有许多传统的民族志书写已经建构了此一场域的观点。这些书写试图说服我们该场景的“真理”与“真实性”:“事实就是如此”。你身为一个研究者,是该场域中的参与者。问题是:无论是对该场域中的行动者或是你自己的

研究书写而言,你是如何看待你自己在该场域中的位置。无论你做什么,你的出现都会影响你所努力进行的观察工作。你是你研究的世界里的一份子,就"宏观"而言,你是该文化中的一份子,但是就"微观"而言,你也同时是你所选择的场景或场地中的一份子。现在,回到我们对于"素材"的定义,你根本就体现在你的研究之中。

通过观察,你可搜集到的信息,比起仅是向该行动者问及他们的兴趣、感觉与对于行动的态度(无论是工厂工人或商店工人或是购物者、在夜总会里的人士),还要来得丰富许多且更富启发性。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些视为"原料"(raw material),或甚至将这些纳入你正尝试获得接近真理途径的研究里:我曾经身处其中(being there)的这个明显的事实本身,其实是一种危险的谬论。你透过观察所获得的素材以及你之后做出的重点,都必须被当成一种来自于特定来源以及以特殊方式搜集而来的数据。就如同所有的数据一样,都需要进行分析与诠释。

较为实用的事项

为了要进行你的观察工作,你必须获得进入你所选择的场所的权利。在此,提供多种众所皆知的策略。例如:莱斯·巴克在他的研究期间,身为某一个青少年社群的辅导者,这个身份让他可以进入不断改变族裔的青少年都市居民的场所中(1996)。其他的策略可能是,你必须要说服某一个团体,让你可以坐在他们的会议或讨论场合里。无论你所采取的策略为何,重要的是,你必须熟悉该场所,并与你的受访者建立和谐的关系,且在那里要耗费你大部分的时间。这可能需要你主动地倾听、与当地的人们进行对话,并对人们向你诉说(或未向你提及)的事情负起责任。以下是当你"进入该场域"时,一些较为实用的思考面向。

自我表现

你正在扮演一个角色,而且需要思考的是:你应该出现在哪一种人面前。这能够帮助你融入那个环境里,但是你身为一个研

究者，可能也需要顺应你的受访者对你角色的期待。访谈或其他种类的参与观察可能都必须要乔装或刻意地让你的穿着显得轻松自然。这并非意味着要愚弄或欺骗人们，而是要让他们觉得自在，同时不要因为穿错衣服，而吸引他们的目光。例如：在我的研究中，大部分的女性，在我拜访她们家时，她们都非常在意她们的外表。基于尊重，我也同样在意我自己的外表（Gray, 1995）。

一旦身处你要进入的场地时，以下是你身为一个参与观察者，应该注意的事项：

- 场景与空间元素：这个地方看起来像什么？什么赋予这个地方特色？以及这个空间如何"组织"起人们（例如：教室，教室里的家具摆设如何聚集行动者）？这个地方给人什么样的"感觉"？以及它可能带给它的居住者什么样的感觉（试想图书馆与书店之间的差异为何；一间昂贵的餐厅与麦当劳的差异是什么；一间博物馆与购物中心之间的差异）？以及最重要的，是什么造就了这些环境？
- 社会互动：人们如何在这个场景里"行动"？例如：人们如何透过身体语言来表达他们自己？身体空间的符码是什么（试想游乐场与舞厅之间的差异）？人们如何在这个环境里移动，例如，以团体、临时聚集、各自分离的方式，以及哪些人是被孤立的？人们如何彼此沟通，例如，是通过打招呼、特定的礼仪（谁向谁说话以及在何时说话）？"论述的规则"是什么？谁在倾听、谁在说话？是否存在着冲突与解决之道？哪些范畴是重要的：性别、族裔、年龄、能力、阶层（正式的阶层：教师；非正式的阶层：领导者、帮派首领等）？
- 不同时间中的模式：随着时间一直在移动；局限与限制；移动的节奏；叙事者/行动者/控制者/跟随者；无时间性；一时没有自我意识。
- 阈限：某些空间与场所是高度受时间结构所限，最明显的即是工作场所，在工作场所里，时间被视为商品：它构成工作实践，并决定工作时日。但是有一些场所主要是设计为休闲之用，在这些场所里，时间的装配形式非常不同：在这种空间里，人们被鼓励进入一种无时间性的世界里。例

如:像是迪斯尼这种主题乐园,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沉浸于它们所提供的“完全体验”里,需要我们暂时对自我进行一种搁置,包括在时间中的自我概念。购物商场同样也具有一种无时间性的特质,在购物商场里,人们被鼓励漫无目的地闲逛于该建筑里。这是通过某些特定的空间组织,以及一种(极其吊诡的)受控制的环境而达成的经验。

珍贵的日记:保持写日志的习惯

由上我们可知,在从事田野工作期间,有许多值得观察与参与的工作。因此,随时写笔记或日志就变成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尤其是你的“田野笔记”(field notes)。如果你正身处你所研究的场景中,那么唯一能够记录下你的经验的,就是你的笔记了。这些笔记时常是在你拜访该地后所写下来的。在你的笔记里,应该记下你的想法、观察以及任何你想要记下的人们对你诉说的引述。尽可能地马上记下这些详细的观察,但不要试图在这个阶段里,组织这些想法,当你在书写时,你就已经在从事筛选、建构与编辑的工作了。这同样也可能是你分析来源的重要数据。同样重要的是,你还必须从你的观察中找出你想要继续研究下去的资料。这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信息(例如:关于工作实践的信息)或做更深入研究的建议,例如:与某些“关键”行动者进行访谈。你的观察同样也可能与某些理论工作或既存的研究工作有关:观察可能与理论的推演、概念的证明、其他研究的证实或质疑有关。正如C·赖特·米尔斯所言:这些概念是属于你自己的,你必须记下它们,并在研究过程中加以发展。身为一个社会世界与文化过程的研究者,你必须对概念抱持开放的态度,并对任何引发不良后果的原因负起责任。

要了解这个方法,最重要的是:虽然事情本身的进行总是看似“自然”(你正在观察的社会世界的某些面向,都自然地发生在你面前),但是你身为一个研究者,应该将它视为“不自然的”,抱持怀疑的态度,并将此视为你研究里一个被建构的部分。因此,这种做法必须要在你的研究过程中彰显并加以解释,作为研究过

程的一部分。当然,如果你选择的主要方法是参与观察法,那么这更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学生们为了要了解他们的研究主题或"充实"他们的研究,有许多研究时常无法明确地运用参与观察法的观点。清楚表现这些元素的最佳研究实例,将会是那些具有严谨观点与分析,而且对他们诠释基础相当清楚的研究。而最糟糕的研究则是滥用素材,对素材抱持不够开放的态度,甚至"规避"这些素材。时常因为研究者无法清楚明白其所面对的对象的"状态":它是否合法、我可以这么做吗?这是否"不科学"以及不精确?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是的!"除非你对你使用的方法能有系统性的了解。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是你最希望完成的研究种类的最重要特征,除非能找到一些可用于研究的方法,否则将会危害到研究的进行。这需要足够的自信,同时对于你的研究基础(本体论)以及你与你的研究之间的关系(这即是指关于知识论的问题)有明确的理解。此外,这些也是关于政治与伦理的问题。这些问题和你对自己身为一个研究者的反思有关,也和你看待受访者的态度有关。你如何与他们进行互动?你如何赋予他们的陈述以效度?关于你的身份所引发的议题为何?亦即:你,作为一个研究的发起人,对于你的研究具有某种特定的权力,但是对于被研究的对象,有无潜在权力呢?其他的差异性或相似性呢?例如:性别、族裔、年龄可能是你与受访者之间关系的重要指标,而这些指标可能是你所致力描述的。你最好能够在研究一开始时就意识到这些差异与相似性,因为它们时常会在研究过程中浮现。关于这方面的细节将在下一个段落作进一步的讨论。

实 例

现在,我将简要地说明一些采用这种方法的研究实例,尤其要说明的是两位研究者对于参与观察所提出的问题种类,以及他们是如何对这个过程进行反思的。

桑顿:俱乐部文化

桑顿的研究"关注于那些社会生活环绕着俱乐部与狂欢舞会

的青少年,他们的态度与想法”(Thornton, 1995: 2)。桑顿尤其关注于“主流”这个概念;这个隐喻如何运作于青少年亚文化之中,媒体如何建构所谓的主流概念以及为何早期的青少年亚文化理论未针对此一主题进行研究。在这个研究里,它很简单地被假定为一种地下的“他者”或特定的亚文化团体。在这个研究里,这些亚文化被描述成:比主流文化更具有本真性、活力与“真实性”。除此之外,正如桑顿所指:“主流”文化被再现成商业的以及与阴性特质有关的,而“他者”则是指阳性的亚文化真实世界。同样地,在主流文化里,也存在着“文化”的多样性。为了要评估“主流”文化与俱乐部文化是如何被媒体所再现,她援引了媒体分析的方法。她的著作也提供一段关于迪斯科舞厅兴起的简史。

桑顿描述了她的研究中与参与观察相关的部分,即:“在1988年与1992年期间,我在超过两百家的迪斯科舞厅、俱乐部与狂欢舞会中进行参与观察的工作,同时也参加了至少三十场的现场音乐演唱会,以作为两者之间的比较”。她坚称:她著作的目的并非在于赞颂舞蹈文化的创意。“尽管我曾经是一位热衷于俱乐部文化的人,但是对于这些文化而言,我仍是一个局外人,基于诸多理由,我开始对这些文化进行研究”(Thornton, 1995: 2)。她将这些文化定义为:

- 工作与休闲:在俱乐部里,她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行动,但是其他的每一个人(包括吧台和员工),却是为了休闲而来的。她指出:如果你正在进行研究,你很难“专心致力于”你的工作上(这就是俱乐部文化迷人之处)。
- 年龄:她从二十三岁开始着手进行她的研究,而且“慢慢地,她开始比她所研究的同侪团体还要年长”(ibid.: 3)。
- 国族认同:身为一个研究英国俱乐部与狂欢舞会的北美人,“我真的是一个身处异地的陌生人”(ibid.: 3)。

在她的研究中,桑顿遵循芝加哥学派所致力的观点,芝加哥学派认为:为了要了解某种特定的社会行为,我们必须先了解我们的研究对象所身处的“符号世界”(symbolic world)。因此,她的研究策略的目的在于:通过某一个关键的信息员(informant),以获得进入俱乐部的机会,借此成为其中的一员,同时将这些俱乐部

当成文化场域般地进行观察。

在她著作中的第 3 章“探讨主流文化的意义”（Exploring the Meaning of the Mainstream）中，桑顿以“主观模式”说明了她的田野工作。此一章节的完整标题为“探讨主流文化的意义（或为何莎拉桑顿与崔西在他们的手提包附近跳舞）”，其副标题为“一个研究的夜晚”（a night of research）。一点也不教人感到惊讶的是，她在某一个段落里描写了迷幻药以及她与迷幻药的邂逅：

> 一个怪异的白人男孩，在我面前停了下来，在胡扯一段话后，说道：“想要来点‘E’吗？”他所指的正是“迷幻药”，此时他也开始收回他所说的话……他是一个失败的贩卖者，拙于宣传他的商品。从他挑衅又徨徨不安的举止里，我认为他真的是嗑了一些兴奋剂混合物，或者这根本就是他第一晚在俱乐部里卖药（ibid.：88）。

桑顿并未明白告诉我们她是否接受了迷幻药，然而，之后，她却接受了她俱乐部“信息员”所提供的快乐丸（MDMA）：

> 我们进入洗手间，挤进一间厕所里，凯特打开了胶囊，将里面的成份分成两份。我将我那一份放入杯子里（香槟），一口饮下。我并非一个沉迷于药物的人，我甚至开始担心我的脑细胞。但是这却是存在于这种青少年文化中的一个事实，所以，我完全以研究为名，将我自己送进一个实验里（也因此证实亚文化社会学者的每个刻板印象）（ibid.：89）。

桑顿并未描述快乐丸在她身上产生的作用，但是在数页后，她描述到她造访了另一家不同的夜总会。大约凌晨四点时，她遇到一位 DJ：

> 他告诉我，打从 1979 年开始，他就一直在俱乐部里混，接着在一个角落里，用他朋友的信用卡吸了一点古柯碱。他的湛蓝眼珠犹如旋转的迪斯科聚光灯般目眩，而他的对话更如一团混乱的物体般语无伦次。迷幻药让平庸无奇的事物变得目眩神迷。我看到了俱乐部的筹划者、DJ 与新闻从业人员（专业的俱乐部成员）如何迷失在青少年的脱轨与不负责任的行为之中。由于并未区分工作与休闲，那些正在创造夜晚

的迷幻世界者,时常变成他们自己的受害者。

桑顿的研究是一个对于青少年俱乐部场景的沉痛分析观点,她不断对她作为一个研究者角色所得到的观察进行反思,也对建构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架构,并借此架构来理解舞蹈文化的特征与差异的运作情形。除此之外,她批评早期的青少年亚文化研究,而她的研究设计与路径,主要目的即在于提供一个可以说明此现象的更加合适的方法。

史盖吉:阶级与性别的形构

正如我们在第 4 章之所见,史盖吉完成了一项针对英国北方八十三位白人工人阶级女性的纵向民族志研究,她指出:她的研究动机始于"为什么那些显然并非某些意识形态阴谋下的被动受害女性,会赞同阶级与性别的压迫体系,这套体系很显然提供了鲜少的酬庸与利益?"这个问题。她主张:责任感与信赖感是身为一个研究者的指导原则,而她的民族志研究"受到政治的启发,并致力于提供边缘团体阐释他们经验的空间"(Skeggs, 1997: 23)。她与那些女性之间的关系相当矛盾,因为她与那些她所研究的女性拥有相似的背景,尤其是具有相似的阶级,而且早期的教育背景也极为相似。然而,她并未宣称她与她们是"相同的",尤其是在她研究的期间,她已经从大学里毕业,并攻读博士学位。她如此描述她的方法:

> 我以各种不同的方法进入少女的各个不同生活部分里,有时是透过社交的方式,有时则是透过聊天的方式,不同的人际关系也产生不同类型的信息。我非常密集地进行民族志工作,以致于我在研究内的生活与在研究外的生活之间的界线,开始消解。(Skeggs, 1994)

史盖吉在她的研究一开始时,就相信:如果她能够了解这些女性,并成为她们生活中的一份子,那么她就能够"了解她们的'真实'(甚至'真正的')经验"。她的研究路径是基于一个"自然的"信念,相信观察具有显现真理的能力。但是,她的研究发现却完全与此大相径庭。当她花愈多的时间在这些女性身上时,她就变得更加困惑,而且这些女性的生活,尤其是她们身份认同的形

成，并未如同她所预期地完整呈现在她面前。这是了解参与观察过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识，也是了解参与观察作为一种可以有效挖掘社会、文化过程以及主体性的深层结构的方法。因此，史盖吉在她的整个研究过程中，她不断地分析她从这些年轻女性身上听到的故事，而且也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不断地阅读相关理论。

巴克：新兴族裔与都市文化
——青少年生活文化中的种族主义与多元文化

巴克完成了一项关于青少年生活中的多元文化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民族志诠释，这项研究主要是以伦敦的两个区域（即战后时期地方政府所建的住宅区）中的青少年为主要对象。该研究从 1985 年开始，结束于 1989 年，而且主要是以参与观察法进行。这两个区域之一主要是白人工人阶级住宅区，另一个则是一个多元种族形成的住宅区。在研究期间，他居住在该研究区域的邻近区域里。他选择了青少年俱乐部场所，并在这些青少年俱乐部里进行研究工作。

除了参与观察法，他同时也采用了录音访谈与团体讨论等半结构化了的研究方法。巴克对于他的方法论推论做出如下的说明：

> 不仅要试着欣赏青少年朋友如何阐释他们的认同与族裔的概念，也要观察认同如何在与成人互动的语境之内发生作用。在这之下，种族主义是如何进入到这些青少年朋友的生活之中，这尤其显得特别重要。在访谈语境中所获得的想法，时常与其他场景中的行动与陈述，相互矛盾。通过使用一个较具弹性的方法论，我发展出一种方法，既可以就近欣赏青少年对于种族、族裔与种族主义的说法，同时也可以了解他们在与同侪之间的互动语境中实际的做法。（ibid.：22）

巴克坚称，他在该社群里，试图突显他作为一个研究者的立场：

> 我想要强调的重点在于，接下来的研究应该要在一个研究关系的语境下来进行，而这个研究关系是由一个白人男性民族志者所发展出来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对我来说，在田

> 野关系中,明确地表达我自己的立场是必要的,因为这会让我的研究更容易进行。我正在要求读者去判断所谓的“真理宣称”是出现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试着指出:我的社会认同,对于某一个特定事件或访谈摘要的意义诠释,尤其重要。我在我的著作中发展出来的立场是:我在此所引用的观点构成了互动性样本,而且这些观点也是特定社会环境(访谈者—受访者之间的关系、团体讨论或与许多人相关的某一个戏剧性事件)下的产物。(ibid.:22)

巴克的研究是一个完整民族志研究的示范:它在特定的场景里发生,耗费许多时间,并援引了各种方法,包括:参与观察法。在此,研究者确实地了解他所研究的团体,并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甚至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这项研究的架构按主题划分,但有两个主要部分是处理不同的住宅区问题的。在之后的一个章节里,他探讨了伦敦南方青少年所创造的音乐文化。

这三个研究实例各代表着非常不同的研究种类。他们对于参与观察法的不同使用,很明显地,是反映了不同的研究目的。桑顿希望探讨的是一个流行音乐文化的范畴,以及主流文化是如何运作于青少年文化之中,尤其是亚文化之中。因此,她必须探讨定义“主流文化”的方式,并以相关的媒体作为分类的依据,同时也必须找到一个理解主流文化对那些沉浸于俱乐部者所具有的意义的方法。

另一方面,史盖吉希望探讨的是:阶级与性别的形构,亦即:我们是如何成为现在的样子,这可能是最广泛的一个问题。她同时也关注于弱势团体,以及他们的主体性是如何被建构成她所谓的被消减了权力的主体性(disempowered subjectivities)。因此,她的研究持续进行很长一段时间,并针对八十位女性做“个案研究”,借此思考主体与认同形构的复杂性。而巴克对于检视建构都市认同的欲望,则意味着他必须在行动中、在青少年社群中心的公共空间里找到一种观察认同建构的方法,同时也必须在不同住宅区的街道上找到观察认同建构的方法。因此,为了要在他们的研究中获得理解人们符号世界的见解,这三个研究者都能够采用参与观察法。他们每一个人都进行了一些反思,亦即,对他们的立场与他们所选择的场地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操作研究时所引

发的议题进行反思。

建构对话(访谈)

在这个段落的一开始,我希望重新思考"访谈"这个概念本身。部分原因是因为,正如我们在第 1 章所见,访谈的历史悠久,而且在我们允许这个模式成为我们研究过程中一个自然的部分之前,诸如托尔森与其他的学者,都会要求我们先停下脚步思考这个问题。然而,我却不希望单独思考访谈的概念,也不希望在我们的研究中将它当成是不能使用的。事实上,我应该坚称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并鼓励人们去思考这个方法所具有的各种潜力,而且足以用来进行文化研究工作。但是这个可能性却仍未实现,部分原因在于访谈的使用总是缺乏想象力,而且不具有反身性。本章将探讨一些进行访谈的创新方法,而这些方法与我们可能希望在我们的研究中提出的各类问题有关。重点在于"访谈"已经进入我们的常识世界,而且大部分的我们对"访谈"的构成要素已略有概念,甚至对于构成"正确的"访谈的要素,我们都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试着思考看看。你可能会想象:两个人面对面而坐,其中一人手拿着问卷板或者列有问题表的笔记本。大部分的时间,这个人"控制了"整个场面,而那个被问问题的人,则被认为是被动的、只要回答问题,并等待着访谈者通过他们的问题来设定对谈的议题。另一方面,访谈者虽然具有主导权,但是他们却不被预期要对他们的受访者透露任何关于他们自己的信息,他们也不能提出"引导性问题",或是对他的受访者表示赞同或不赞同。访谈者不仅主导访谈的开始,也主导访谈的结束。现在,根据你接触过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你可能会认同这样的描述,但你更可能将它视为一个"理想的"访谈类型的范例。此种访谈种类主要是用来完成如下的目的:例如,大型的调查研究、市场研究等。受访者的回答数据必须经过计算机软件的数据处理程序来编码与分析。此种研究方法需要一组可信的、可以测量的以及可以量化的数据,而这些数据正是来自于受控制的访谈所产生的大量数据。在此种高度受到掌控的模式里,存在一种社会科学方

法所定义的“渐变”(gradation),但是我认为,当在筹备研究及实际执行访谈之际,我们当中许多人都会采取(甚至毫无意识地采用)这种模式。我们对于所谓的“正确的”访谈方法有一定的认知,因此,如果我们悖离了上述访谈者的角色身份,那么我们可能会破坏规矩,也因而让我们的研究失去其效度。

让我们开始试着寻找理想访谈这个概念背后的假定,并指出:与其要思考理想的访谈形式,倒不如应该问问我们自己,究竟我们的研究试图要达成什么。我们希望从受访的对象身上,导引出什么样的论述?一旦我们能清楚界定此问题,那么(也只有在那时候)我们就能够开始进行访谈的设计与策略。在此,回到理查德·约翰逊对于社会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区分上(尤其是关于我们的研究方法必须产生哪一种研究素材),将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约翰逊主张,社会学研究主要还是与“人口学”以及“质性的”访谈方法有关,这些方法是设计来检视“态度、意见、行为等”概念的。另一方面,对约翰逊而言,文化研究对于此类方法(例如访谈)的关注,主要是为了要“探讨文化结构与形式”,并且透过研究者对于某一特殊个案的研究,来探讨文化结构与形式。文化研究的研究计划具有一定的强度与深度,并将研究的对象视为被社会与文化形塑的个体。这些形塑的形式“在根本上,都是社会性的或是共享的形式,而且相较于那些简单的样本所显示的,这些形式出现的范围可能更加广泛”(Johnson, 1997: 468)。这个观察隐含着“代表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研究者(参见第4章)。

访谈:反思性与深度

对研究者而言,一个重要的原则在于,应思考以下的陈述:“如果你希望了解我的想法或我正在从事的事情,那么直接问我最清楚了。”然而,如此开放性的访谈并非仅是闲聊而已。此种访谈的目的是为了与受访者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如此一来,她或他才能获得自信,并且能够自在地响应问题。此种开放性访谈最好能够理解为一种具有良好结构的对话方式,但是它同时也是一种话语事件,

在此种话语关系中，进行对话的两个主体才是主角。

在此，我们可以发现：文化研究的访谈意图或许比较类似于民族志的访谈工作，而比较不同于社会学所言的访谈。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可以舍弃所有的结构、程序与惯例，而单纯地草率行事，并与某些人闲聊。确实，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不具结构的访谈形式；相反地，所有的访谈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而且都与特定访谈目的以及整个研究计划有关。哈默斯里与阿特金森主张："调查"访谈与民族志访谈之间的差异在于："标准化的访谈与反身性的访谈"之间的不同。因此，"虽然民族志者通常会在进入访谈时，随身带着一份他们准备要提出的问题清单，但是他们却未必能事先设定好要提出的明确问题，而且也不会问每一个受访者完全相同的问题"（Hammersley and Atkinson，1993：152）。借着使用这些技巧，访谈者必定能成为一个主动的倾听者。思考你自己在访谈中所扮演的角色，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参见 Holstein and Gubrium，1997）。

女性主义研究者所发展出来的研究，挑战了访谈的严格规范与模式，尤其是访谈法具有一种阳刚特质的信念，认为研究应该达成其客观性，并拒绝在研究中涉入任何情感。女性主义者已经发展出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论及了较为广义的知识论问题，以及女性主义研究实践的可能样貌。关于这些问题存在着许多值得探讨的议题，而不同的女性主义者也宣称一种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Stanley and Wise，1993），虽然其他的女性主义者也主张：研究应该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观点或立场出发，而这些观点与立场仅能被女性主义者所认识。换句话说，即是指：一种女性主义的主观立场。在此，这些知识论的立场也反映在实证研究的研究路径，以及研究素材的搜集上，亦即：这是一个关于研究政治的问题、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访谈方法的开放性等问题。

现在，关于反身性的问题开始变成更为广泛的议题，例如：霍尔斯坦与盖布莱恩所谓的主动访谈（active interview），也许对你的研究目的而言是相当实用的。在这个模式里，受访者被当成一个有意义的主动生产者，而非如同在较为传统的模式里被视为一个信息、素材或情感的来源。他们认为：此种访谈是一种"生产意义的协同

计划”(Holstein and Gubrium, 1997: 121)。通过访谈的过程本身,受访者得以建构出他们的主体性,亦即:建构出他们的个人特质、他们的故事、情感等。“访谈及其参与者都不断地处于发展之中”。“客观的目标并非在于产生诠释,而是在于提供一个环境,可以促成相关议题的复杂意义和各种意义的产生,而不被局限在早先决定好的议题上”(ibid.: 123)。

这个研究路径跳脱了访谈是“什么”(what)的问题(研究的实质主题),而是直接进入关于“如何”(how)的问题,也就是关于主体性的问题之中。一个研究计划的架构将构成访谈的取向以及实证素材的搜集。有趣的是,这个架构是如何在访谈里产生极具生产性的信息交换的。在我与女性进行访谈的期间,许多人都表示:她们以前从未谈论过这个话题,或者甚至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性别的划分以及家庭生活固有的权力关系,构成了我的研究及研究取向。因此,我与这些女性的对话产生了一个架构与一些概念,透过这些架构与概念,她们可以讨论她们的生活,并表达她们对于自己的观感,以及在那些特定架构里的经验。这其中的一些架构与概念,显然是来自于某些议题的知识,但是就大部分的状况而言,很多皆是来自于对话的结构。

如此进行访谈的模式及方法,直接与分析的方法密切相关,或是在整个访谈的过程里,这个模式与方法让整个研究架构变得更清晰可见,因为在这个过程里,它连结起访谈与理论、实证经验以及分析之间的关连性。以下所列举的研究实例即是采取了这些种类的访谈策略。

许多研究使用了访谈法,并将访谈视为搜集研究素材的主要方法。其中,那些致力于探讨媒体消费的媒体文化研究,也因为它们采用这个方法而备受争议。关于这些研究的批判很少讨论的是,这些研究所实际采取的访谈模式,尤其是通过采纳一种生命故事的方法所可能探讨的深度种类以及所可能产生的意义层次(参见第 6 章)。

借着例子的说明,现在我要回到露丝·弗兰肯伯格关于白人女性与种族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上,在这项研究里,她采取对话的方式来进行访谈,在访谈过程里,她鼓励女性诉说她们的生命故事,但是“我同时也在提问时明确表明我的立场,并且在研究的

过程中，与我的受访者分享我自己的生命信息，以及我自己对于种族主义的分析要素”(Frankenberg, 1993: 32)。

她的研究主题相当敏感，而且需要小心翼翼地寻访潜在的受访者，对于访谈本身的掌控也需要审慎而为。她主张，她所采取的开放、对话式的研究路径让研究的过程变得相当民主，因为她让女性们可以探讨她们自己对于种族的观感，以及对于种族的分析与政治的想法。

她所访谈的三十位女性皆是白人女性，但却是来自于不同的社会背景，而且对于种族政治与女性主义的自觉程度，差异非常大。因此，她的访谈路径必须将这些差异纳入考虑。虽然她的目的仅在于搜集三十种“生命故事”，但是没有任何一次的访谈结果会是相同的。她申明，她主要采取的对话方法是：“提供关于我自己铭写于种族主义内的信息，以及我对于种族主义的系统性与个人分析”。借着诉说她自己身为白人的故事，她有效地打破了白人论述对于肤色与权力的沉默，她“允许”那些女性们开始论及种族与种族主义的议题。此外，她也有意识地在与这些女性的对话里引用了对于“种族”的不同分析观点，以期让她们可以表达、阐释她们的经验。因此，她提供她们一种安全无虞的论述立场，并借此检视她们自己的经验与感觉。她使用如下的例子：

> 艾薇莲，一位五十多岁具有强烈自我风格的保守党员，但是她却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任何偏见的人”，在访谈即将结束时，她谈及了她的朋友：
>
> **RF**：最后一个问题，而且也该是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这个问题有点回溯到我刚才所说的，当我想到关于白人女性与种族时，以及当我接触到不同的族裔团体、不同的种族团体时，我究竟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我知道对我自己而言，我在白人环境下成长，几乎百分之九十九是白人的环境底下……
>
> **艾薇莲**：嗯。
>
> **RF**：……而且我也知道，我的生活方式已被设定好，也许大部分人的生活方式都是被设定好的，例如我们花时间相处的人，一般而言，都是来自于相同的收入背景，相同的……

艾薇莲:嗯!

RF:……同一种人。所以,我在想,你是否也是一样?你的朋友大部分是不是也和你一样拥有相同的收入背景,而且大部分是不是都和你来自相同的种族团体或族裔团体?

艾薇莲:应该是的。但是我不认为这是经过选择后的结果,我认为这只是……嗯,你必须这样想:你一开始就与这些人拥有共同的背景……

RF:对。

艾薇莲:……而与女性在一起,通常第一件事就是,你是不是结婚了……于是,你们有了共通点。你有没有小孩……然后,你们又有了一些共通之处。接着,则是关于先生的问题……他们会跟对方聊天吗?所以这是个事实,大部分我的朋友,她们的确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经济能力,我们的经济程度都差不多,她们大部分都有大学学历。她们当中很多人是工程师、生意人。确实如此,但我并不觉得这是我们刻意造成的结果。我认为,我们的生活全部碰在一块只是刚好发生罢了。

RF:不!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用这个方式来说明。

艾薇莲:是。

RF:因为在很多时候,我觉得,当我问某些人这个问题时,她们会觉得备受挑战……

艾薇莲:嗯。

RF:……她们会批评这个问题。但这并非我的意图所在,因为我真正感兴趣的正是,我认为一切就是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艾薇莲:嗯,嗯,我也这么认为。

RF:而且对我而言,我的过去经验也是如此,我的朋友们也都是白人朋友。

艾薇莲:嗯。

RF: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如此,你的朋友是不是也是……

艾薇莲:嗯,我有一个阿根廷的朋友。(笑)看吧,我在哪里能认识这些其他朋友呢?就像我说的,这并非刻意造成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所身处的环境。

RF:对。

艾薇莲:而且,当你有朋友时,这些朋友都是你可以谈话的对象,她们可以了解为何你对于某些事会有特定的感觉,因为你们具有某些共通点。就算她们的肤色是黑的、绿的、黄的或粉红的,也不会有任何差别。事情就是……这样啊……他们……(音量逐渐变小、双手一摊)。我们有来自于不同宗教背景的朋友……无神论者、虔诚的天主教徒以及很多的新教教徒。也有共和党的和民主党的。现在,这就有所差别了。(笑)

(Frankenberg, 1993: 36-39)

这个访谈引人注目的是,为了要让她的受访者感到自在,弗兰肯伯格刻意透露出自己的经验。她称此方法为“话语之战”(battle of discourse)(ibid.:39)。就此而言,“在与这些生命叙事的关系中,受访者具有多重的立场。就一方面而言,她们是叙事的共同生产者;另一方面,当她们复述、重新评估已消散的过往时,她们既是环境的观察者,也是自己的观察者”(ibid.:42)。

这些访谈是弗兰肯伯格研究计划的重心,除了访谈外(虽然访谈持续了三至八个小时,而且时常进行两回合),她并未与那些女性有任何接触。重要的是,她进行访谈的方式。她坚称:访谈并非仅是一种诉说或表达经验的工具,而是一种社会性建构的交会。访谈是一个“关于问题的不完整故事,而每一个女性对于自我以及对于世界如何运作的看法都不断地在改变”(ibid.:41)。

倾听沉默

弗兰肯伯格的访谈立场是一种“全知型的”(knowing)访谈者立场。她有意识地引荐话语策略,这些话语策略让她的受访者能够论及“禁忌”的主题,例如:种族与种族主义的议题。另外一种非常不同的对话访谈面向则是迪佛特(Devault,1990)所讨论的女性主义语言理论。她坚称:许多日常生活的实践构成了女性经验的实体,但是日常生活却缺乏明确的语言与概念,可以用来表达经验。她开启了一个关于定义研究“主题”的问题,而且为了要纳编女性的经验,此问题的讨论也涵盖了许多可被接受的主题或是一般社会研究与其他种类研究的传统“主题”。迪佛特的研究检视了家庭中的例行事务,例如三餐的准备、烹调与供应。这是一项每日必做的活动,而且也是每一个人都会相当确实地承认是家务中最根本的一项活动。但是她所采用的这个范畴(家务工作)却太过广泛,以致于无法使用在“张罗食物的工作”这个特定的活动中(Devault, 1990: 90)。一开始,她就告诉受访者她所感兴趣的事物,也告诉她们想要讨论的是“所有与食物相关的家务工作,例如:煮饭、准备、采购、清扫等”。她发现,这些女性们无论她们喜欢下厨或厌恶下厨,她们还是都能自然而然地谈及这项工作的

各个面向,就是因为正如她所主张的:"我粗略地界定出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对我的受访者而言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是组织起她们日复一日必做的活动的一个范畴"(ibid.:99)。

从这个研究的经验中,她主张:没有任何一个字永远"适用"于描绘女性的经验,她更进一步主张,访谈者必须仔细聆听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的或许是,正如迪佛特所坚称的:我们或也应该倾听那些"沉默"的声音。当"受访者有口难言",并竭尽所能试图寻求她们认为适当的字句时,耐心倾听她们的沉默。借着一个例子,她讨论一个特殊的访谈状况:

> 有一位女性谈及,为何她会如此辛苦地每日规律地为她的家人安排的三餐,她告诉我:"我的先生视食物为生活所必需。但是(我真的不知该如何描述),我也的确特别强调了这个社会面向。我的意思是说,食物的确是相当重要的部分,但是,似乎只有在那个场景底下才是重要的"。

另一位女性试着界定出,下厨这个工作的规律及"单调乏味"与你可能从中(从准备好一餐丰盛的食物中)获得的满足感之间的差异,她称这份满足感为"好的部分"。同时,

> 我的多位受访者都提到,当她们在进行采购时,她们脑中会做出一种立即的、即兴的思考。她们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个过程。其中有一人告诉我:"大部分的时间里,当我在店里时,我好像正在做计划的工作,你知道吗?就像是,好,我们星期一吃鸡肉、星期二吃猪排,当我在进行采购时,我就有点,你知道的,我会在心里先厘清,应该要买些什么"。(ibid.:103)

对迪佛特而言,访谈中最有趣的是那些"辞不达意"、支吾其词、那些当受访者说出"你知道的"(you know)的时刻,因为这些时刻正是人们试着为她们的行为与对于生活的感觉寻求适当词汇的时刻。尚未有"合适的"描述或词汇或概念可以用在那些时刻上,因此,那些时刻被认为是"可被谈论的"(speakable)。这是此种密集访谈的会话或对话特征的另一个例子。在此,我们可以了解:在一合作完成的研究中,访谈者与她/他的受访者是如何聚集在一起。访谈者所希望获得的是问题的解答,这让受访者愿意

且乐意阐述其经验，而且如果能仔细聆听，这可能产生一种攸关丰富论述的杰出“搜索引擎”，可以提供观看世界的新方法。就这方面而言，我们的标准研究主题就可以被开启、延伸甚至为新的研究问题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知识。

有策略地进行抽样

当我开始进行关于使用录放机的研究时，我轻敲十一号的大门，却感觉好像也扣及了二十五号门里的人。当时我正处于建立“阅听人”或使用者社群的过程里，这些阅听人或社群的主体属性是用来界定和区分女性之间的差异。因此，这个研究中的受访者或参与者，就代表了某些（通常是）社会范畴。这是一种形构研究的方式，或是赋予数据深度与意义的方法。这个方法让研究者可以比较与对照位于不同主体性与生活阶段中的个人，而非让研究者可以将其概括化。许多小型实证研究的文化研究，都是由研究生所执行，并将这些小型研究当成她们日后博士研究的基础。这立即替研究可能达成的成果设下限制。首先，其中一个限制是地理位置。研究者似乎都会在他们容易进入的场地里筛选他们的受访者，因为这能减少旅游的花费与时间。其次，关于抽样的进入路径（access）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关于我们的“样本”的筛选是研究中一个非常困难的部分，而且在筛选的过程中，某种程度的妥协是必要的。

对于研究是否具有代表性的恐慌，总是出现在当我们思考该如何建立我们的“样本”时，亦即我们希望在我们的研究中所希望研究的那些人。也许，第一个问题就在于“样本”这个词汇上。同样地，这是一个意指不同研究模式的概念，正如这个概念所隐含的意义，这个概念是设计来代表整个研究。这当然为研究计划的设计带来一些问题。在研究计划的讨论中，最为常见的问题之一便是：“我需要访谈多少人？”这是一个直接来自于“样本”这个概念的问题。受访者的数量、种类、位置、认同与组合，全都依你所希望探讨的事物而定。你的研究与她们接触的目的为何，以及你希望产生的数据种类为何？在小型的研究计划里，主要的受访者

应该视其能否提供一组足够丰富而可被操控的数据的能力而定。举例而言,在我对于女性使用录放机的研究中,我访谈了三十位女性,虽然她们都具有文化同构型,但是她们的年龄、阶级、教育程度、职业以及拥有孩子的数量却都不同。必须一再强调的是,这份访谈名单并非意图作为英国白人女性的代表性样本,相反地,这份访谈名单提供一系列复杂的对照关系,亦即:这些女性与诸多研究主题之间的关系。鲍勃·康奈尔对其选择受访者方法的讨论,对我们帮助良多,他将此过程称之为"有策略地进行抽样"(strategic sampling)。他关注于"一些能够高度生产理论的情境"(Connell, 1995: 90)。我们可以借着问及"理论性抽样"里存在什么可能性,以及一个数量非常少的访谈可能提供多丰富的数据等问题来思考我们的实证研究。

访谈本身

建立访谈

访谈的程序将依你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而定,但是在建立访谈的过程里,这些程序总是可以被修正以符合正规的访谈程序。一开始必须先勾勒出你的研究雏形,以及访谈的目的,接着透过电话确认适当的时间与地点,好将你的研究置于适当的立足点。无须赘言的是,你必须准时出席,而且不能超过你先前约定的访谈时间。虽然,安排访谈的过程时常被认为是非常实际的,而且是研究里一个非常繁杂的部分,但是并非总是如此。

在关于女性艺术家的研究里,当考夫曼(Kauffman, 1992)发现要在纽约安排与这些女性的访谈是多么困难时,她简直失望透了。许多原本答应要接受访谈的女性都失约了,或是重新安排时间,甚至让访谈延宕了数日、数周之久,而有些受访者则是拒绝在她们的工作室进行访谈,而这却是考夫曼比较偏好进行访谈的地点。在一篇反思此访谈过程的有趣文章里,她解释道:要揭露她所希望探讨的女性艺术家的社会认同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而这种经验是在费城的女性艺术家团体身上不会经历到的。她假定:

纽约女性应该会在她们自己的领域里感到比较舒服自在,也因此能转换研究者与受访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她们的工作室大部分都在她们的家里,因而工作空间时常与家务、家庭空间相互竞争,而大部分的女性都希望在比较开放的空间里进行访谈,例如:在艺廊或餐厅。她因此如此归结:这些女性一再确认了她们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公众个人特质,而她的方法论却无法适用于她们的经验与自我认同。这些女性艺术家所采取的规避策略,也因此成为考夫曼最后用来理解她们自我认同的一个关键元素。考夫曼的经验提醒我们,找到适当的地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她所做的是遵循一种方法论上的"惯例"(truism),这是她作为一个研究者所受的一部分训练,这套训练告诉她:在受访者自己的地域里进行访谈,将使她们倍感轻松自在,而且也能转换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权力关系。

访谈的准备工作

仔细思考你所能获得的各种访谈种类,并思考你所希望促成的讨论与信息种类为何。无论你所采取的访谈模式为何,你都必须先拟定好一份你希望你的受访者回答的"主题范围"清单。最好能以提出一个概括性的问题来作为讨论的开始,例如:"在开始时,你能告诉我你为何会对……感兴趣?"或是"你能告诉我你一天的例行事务吗?"这一类的问题可以让你的受访者从一个她感到自信的知识立场开始发言,并让她们有足够的时间"适应"访谈。如果你希望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这是非常重要且必需的),那么你必须先向你的受访者清楚说明,而且也必须检查录音机是否能正常运作。确定你已经将麦克风放在靠近受访者而非靠近你自己的位置,如果你无法确定麦克风的位置是否恰当,那么你就必须在访谈开始前,要求进行麦克风"声音测试"。当我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时,我发现对话的情形时常因此而改变,而且当关掉录音机时,对话开始变得比较放松。因此,必须准备好要记下在这些比较不正式或"关掉录音机"的时刻,所进行的对话(Goffman, 1972)。

访谈进行期间

我们已经讨论了访谈的动态特质,而接下来将讨论的是:在访谈过程中,所触及的性别、族裔、阶级与年龄差异等重要性。在此,我仅想提供一些重点作为你思考的依据:

- 在决定你的研究路径、你的问题以及你的主题是否恰当时,讲求礼貌性的访谈是不必要的。这可以用来检视你的访谈计划,以及你问问题的方式。
- 允许多元性的产生,并试着当一个主动的倾听者。这对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对话性访谈尤其重要,但是对那些更具结构性的访谈也同样重要。
- 在访谈时,试着透露出你自己的一些想法,时常会有出乎意料的收获,正如下文所提及的:桑与帕克之间的讨论。但是,这也开启了讨论的大门,让你的受访者对你、你的研究以及你所考虑的主题的观感有所认识。
- 试着参与受访者所希望你参与的活动。他们对你及即将“访谈的内容”当然有所期待。视访谈的种类而定,你可能可以借着摆脱本章一开始所描述的“正式访谈”模式的概念,来开展你的访谈。当你向你的受访者确定,这将是一场没有对错答案的非正式讨论,那么这会让你的受访者感到轻松自在。
- 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尊重你的受访者。她们慷慨地牺牲她们的时间,而且将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因此,你必须准时出席,而且在访谈结束后,感谢她们的配合,并问她们是否有任何问题,并允许她们看访谈的逐字稿以及/或是你研究的最后成果。

团体“访谈”

团体访谈或团体讨论能够提供一些有用的素材给某些研究领域与研究路径。然而,正如在方法的选择时,你必须清楚知道为何团体访谈是有用的、你所期望他们产生的数据种类为何,也必须清楚意识到团体访谈所可能出现的特定问题是什么。选择

进行团体访谈最明显的理由是，因为你希望探讨的是：在你所研究的主题下，人们如何与他人进行互动。举例而言，对于某一部流行的电视影集或者关于成人男性，或是他们对于他们工作的态度，人们可能会如何表达他们的观点。这是为了要认识与促进互动在社会认同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人们在与他人进行讨论时，她们是如何看待她们自己的。这可能与在一对一的访谈中，我们对于自己的看法截然不同。使用此种方法的研究者包括了莫利（Morley，1980，1986）以及利布斯与卡茨（Liebes and Katz，1993），他们都关注于团体如何进行流行电视的讨论，以及他们的理解与诠释是如何被当成意识形态形构下的结果。吉莱斯皮在她关于伦敦南方旁遮普的青少年研究里，关注于她的受访者间的“团体对话”，而非关注于他们与她这个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因此，她仔细聆听这些“朋友团体”谈及他们的喜好与厌恶、他们所喜欢的电视节目等，并借此方法，进一步进入更加“自然的”谈话中。她在讨论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开始就放弃了发话权，让他们的谈话可以尽可能地进行下去而不会受到我的干预”（Gillespie，1995：67）。另一位关注于思考团体谈话的动态性的是戴维·白金汉，我们将在第 7 章中，进一步探讨他的研究。

团体讨论也可以用在研究计划的早期阶段。在研究的初步阶段，你可以找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团体，以及和你研究主题相关的人士进行对谈，对产生一些观点与概念有极大的帮助，这些观点与概念可用来阐述你日后更进一步的访谈。当然，团体讨论的使用也透露出一些与任何团体互动有关的问题。例如：某些团体的成员将主宰了讨论的进行，他们依他们自己的方式引导讨论的方向，而且仅关注于他们所感兴趣的主题，而排除了其他可能性观点。团体可能会假定：你所期待的是共识的产生，因此，他们可能会将讨论的目标设定在，对该议题达成共识，而非让不同的声音以及相互矛盾的声音出现。因此，讨论的进行必须获得完善的管理，而且身为一个诱导者，你必须发展出最能够引发团体讨论的策略。

阶级、性别、族裔、年龄:造成差异的各种差异

在女性主义学者眼中,访谈时常被当成一种权力关系的场域(Roberts,1981)。这意味着,无论是在访谈期间,或通常是就她所获得的社会、文化资本而言,比起受访者来说,研究者总是(虽然并非永远如此)处于一个较具权力的位置上。那些致力于调查工作、纪实与探索女性生活与经验的女性主义者,主张并实行一种"友善响应"的策略。举例而言,上述所讨论的开放性对话访谈类型,"允许"受访者决定访谈的议题或方向,也允许受访者可以不回答问题。莱斯·巴克提供许多关于男性研究者的例子,这些男性研究者反思他们身为一个男性研究者与民族志者的角色。他主张:在他的田野调查工作期间,他与他的男性受访者以及女性受访者之间所发展出来的关系,"受到性别的参与形式所主宰"(Back,1993:230)。巴克意识到他自己不太愿意主动与女性联系并对她们进行访谈,他借此开始反思他的田野工作。这是女性主义研究政治的基础策略,这项策略坦承男性研究者不适合探索女性的生活。对巴克而言,这造成两种结果。首先,男性研究者被允许可以漠视性别的存在;其次,这个策略意味着,性别对于男性与男性之间的访谈,或者我们还可以加上女性对女性之间的访谈情况,并不构成问题。我们对于男性/女性、黑/白、年长/年轻研究者的身份认同,严重地影响了研究的结果,也影响了我们的研究对象以及受访者是否能敞开心胸接受访谈。我们必须要能够意识到这些复杂性、性别与族裔关系中的不平等关系,以及权力与权威所可能产生的差异。

米里·桑与戴维·帕克在访谈期间,针对他们对于研究者立场的转变,发展出流动的认同理论,并借此进一步思考这些问题。他们各自在自己的研究计划中,访谈了英国的华裔青少年,并发现他们对于"中英混血与美韩混血的经验,被研究者放在一个与受访者之间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上"。(Song and Parker,1995:241)在感知他们的受访者时,他们的文化认同产生转变,而

此一转变转换，举例来说，与他们的背景、他们的第一语言、他们对于种族主义的经验、他们的外貌等有所关联，同时也发现他们对于自我的揭露有助于对话的发展。帕克因此概述：

> 我与我研究中的其他华裔人士的接触，深深地影响了我对于认同形构的概念。这些共享的经验鼓励我更勇于说出我自己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是我不曾向那些非混血的受访者提及的。结果是，对话的进行显得比较不矫情，而且也能在盛行的黑/白、华裔/非华裔等范畴体系外诉说过往回忆。许多我所访谈的华裔混血人士概述了他们对于认同的观感；而且这些观感十分符合我所努力发展出来的词汇。（ibid.：246）

桑认为，差异的相似性概念，未必将访谈形塑成可以用任何一种可被预期的或系统性的方式来进行。相反地，“每一次访谈的方法，都随着不同的时刻与状况而难以预料”。“受访者对于我的文化认同的假定，攸关于受访者将选择透露什么讯息给我，也攸关于受访者是否透露关于他们自己的讯息”。（ibid.：248）然而，对帕克与桑而言，他们与他们的受访者之间所共享的经验背景主要是关于种族歧视的经验。他们的经验对于访谈的动态性特质而言，有助于他们进行反思。另外，他们的经验对访谈的高度难预测性质（会随着不同的情况而有不同的进行方式）的反思，也极有帮助。

埃伦·塞特针对电视这个流行的大众媒体形式所进行的访谈研究中，探讨了其中所隐含的政治性问题，她在她的讨论里，提出了关于阶级差异的问题。她成功地详细分析了某一次她与她的同事所进行的访谈，并将此次访谈当成肥皂剧观看行为研究的一部分。她界定出研究者与受访者之间的阶级、性别与世代之间的差异，但却因此造成了对于两名白人男性的访谈的“失败”纪录，这两名男性在一项关于肥皂剧的研究中，对他们的广告进行如此的响应：

> 在整个访谈里，在这两个男性眼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身为学者的身份。对他们而言，与我们进行对谈是一件相当光荣的事，而且他们的言谈能够被某些具有权威与地位者听

> 到,也是一件令他们感到荣耀的事。他们努力地表现出他们学识渊博与成熟的思想。对他们而言,我们的造访提供他们一个展现他们个人知识的机会,也让他们得以表达他们对于社会、媒体的意见。他们并不关注于提供我们任何诠释,以及任何对于电视节目的文本解读,即使这是我们希望他们做的。事实上,他们表现出他们对这方面的“无能”。(Seiter, 1990: 62)

塞特认为,在此处重要的是:学术研究者与他们的访谈对象之间在社会认同上的差异。她的受访者冒犯了她的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政治。他们是顽强的而且也拒绝“表现得像是一般的、日常的观赏者”。举例来说,其中一个男性针对他们的报纸广告做出响应,并要求要访谈肥皂剧的观众,可以理解地,塞特对此当然感到气恼。虽然她考虑了阶级差异以及学术研究者所具有的不同价值的文化资本,也考虑了各种会影响、形塑访谈的方法,她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由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个访谈文本。我们可以提出许多与大众媒体形式、区辨以及阶级差异等议题高度相关的问题。对这个访谈的分析,可以彰显出这两位男性的社会形构:他们的工作生活、他们的阶级与性倾向,也能探讨主体性和认同与流行形式之间关系的问题,同时更能探讨学术界对于“一般的”观赏者的理解。在此,我认为最有趣的应该是:那种致力于关注特定解读以及肥皂剧的使用的访谈方法,这些访谈方法试图脱离研究者的控制,以揭露出更多关于阶级、性别与大众媒体形式的丰富信息。因此,访谈以及塞特颇受欢迎的反思(关于她对访谈经验的反思),正为受访者那难以控制的本质提供了最佳的写照(如果他们决心要控制受访者,他们就会发现他们难以被控制的本质)。

访谈很显然是一个具有极高价值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却需要小心地执行,因为这个方法总是与本章所探讨的各种问题有关。同样地,我们也必须小心谨慎并时时警觉,以避免过度宣称这些建构出来的事件的基础,因此,重要的是,必须彰显出这个方法的局限,特别是它的偶发与暂时的特性。在下一章里,我将检视自传在文化研究里的影响力,并借此探讨其他种类的“访谈”形式。

第6章 我想告诉你一则故事

I Want to Tell You a Story

> 关于世界的叙事是数不尽的……叙事是国际性的、跨越历史与文化的。它就简单地存在着，如同生活本身一样。(Barthes, 1997: 79)

在我们关于对话访谈的讨论里，我们指出受访者是如何建构他们的故事。现在，我希望能进一步思考文化研究中"故事"的使用，以及这些故事如何变成我们研究实践的重要部分。的确，许多学者诸如巴特都认为：叙事即是生活的一部分。举例而言，格雷厄姆·道森即主张：说故事的文化重要性不仅可以在流通的文化产品中发现，也存在于我们告诉他人和我们自己的故事之中。"这是一种深植于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一种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创造性活动"(Dawson, 1994: 22)。我们不仅向他人说故事，也说故事给我们自己听。为了要了解故事无所不在的特性，我们就必须思考自己可能会如何在研究中处理这些故事。一般而言，最普遍存在的文化实践形式通常就是最难以掌握的形式，但是一旦我们掌握到了，它们往往最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的过程与社会的意义。

首先，我想告诉你们一则关于我研究录放机的故事，这个故事将明确指出故事是如何通过我们的研究际遇而产生的。我的研究是一个质化研究，并使用民族志访谈法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在第一阶段的访谈里，我发现：我所对谈的女性想要说故事给我听，或者更确切而言，她们想要告诉我关于"她们的"故事。

我发现我们开始逐渐离题，我们的谈话完全与她们使用录放机无关，而我也开始担心，正如戴维·白金汉所言："这不是构成

重要研究所需要的……”(Buckingham,1985:159)。然而,当我开始回头听那些录音带时,我才发现,基于三个理由,她们的生命故事是每一次访谈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首先,这些女性开始掌控访谈,并告诉我她们想要说的,而不仅是回答我的问题。其次,她们透过自我陈述,揭露并阐明她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借此向我建构出她们的自传故事。这时常涉及她们的家庭史,从她们父母之间的关系,一直到对于家务劳动、科技、电视、阅读等事物的看法。有些女性对她们的历史表现出一种目的论的观点,以一种必然如此(无法逃脱)的立场来看待所有导致她们目前处境的事件与经验;有些女性则明确指出她们与其历史之间的决裂,而如此的决裂在某些方面已改变了她们的生活。不同的家庭文化,以及存在于权力与权威结构中的关系,都跨越了性别和年龄而延伸到当前世代之外,而这许多女性提醒了我,在理解电视与录放机的社会性使用上,此文化历史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最后,此种响应模式还具有一种潜力。从社会阶层的观点来对女性加以分类的问题,一直是女性主义研究中所探讨与辩论的主题。那些自传所揭露的是性别和阶级中错综复杂的状况,以及在不同的社会地位上,女性所拥有的选项与“选择”中,这些复杂事物明显交错的方式。透过这些观点,产生了一种不同阶级文化的印象。

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透过开放性问题(关于录放机的使用)所产生的故事,都迫使我去思考那些关系到女性及其对流行文本的消费的完整与相关领域。问与答的形式可能会破坏“经验”的完整性,而说故事的形式却能让女性生命中不同区域的相互关联性产生。因此,例如在思考女性观看电视的方式及时间之前,就有必要先思考关于家务劳动的问题,同样地,在问及录放机的使用方法之前,也必须先将录放机视为一种科技等。

这件事让我相当吃惊,而且也引发了一些重要的知识论与本体论议题。首先,女性们正不断地重新思考她们的经验。她们正告诉我关于她们自己的生命故事、她们的过去,也常常诉说她们对于未来的抱负和欲望。这些故事倾泻而出,超出了我的“访谈计划”之外,也超乎我对于一份合格的、“好的研究实践”的理解。访谈实际进行的当下是属于话语性的:这是一种主动的、具生产

力的对话方式，对话中我们共同建构出一则故事。在此，我们正步入知识论的模式里，这变成了一种认知事物的方式，不仅是认知某个人的生活细节，也认知到可以用何种方式、以及如何诉说生活故事。斯蒂德曼（Steedman，1997）认为：诉说或书写一则生命故事，即是在制造一个“自我”。这个对于自我的主动生产常伴随着对于她们故事的反思。许多女性开始反思，在她们生命的某些关键时刻里，她们的处境和感受，这些时刻时常与婚姻、小孩有关。她们开始反思过去的“自我”，而且时常迷恋那个自我。于是，这些女性不断地游移在她们生活的世界、她们的物质存在，以及她们对于存在的认知之间，这个存在指的是她们位于世界的哪个角落，以及她们是如何到达那里的，就其中一两个案例而言，也包含她们对于未来的抱负。

自从 1980 年代中期开始，在我所进行的研究里，我发现了非常有趣的工作，这项工作是关于故事的本质以及理解故事的方式。倘若我们更广泛地思考说故事的实践，就会发现其中显而易见的元素是：一个说话者、一个说故事的人、故事本身以及一个倾听者。这些元素之间的关系是多变且复杂的。更确切而言，有各种不同类型的说故事者，他们各自占据着一个（发声）位置，也各自拥有不同理解经验的方式和不同的说故事方法。故事本身可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它们所涵盖的主题或话题相当广泛。故事是透过不同的口语、印刷与电子媒介而得以被诉说出来。这让我们想起广播媒体中各种“说故事”的方式，例如告白、谈话性节目以及纪实类型里对于“平凡”生活的记录。当我们将焦点转向倾听者时，许多问题将会开启另一个重要的面向，这些问题包含他们的接触管道、他们的社会位置以及他们诠释故事的方法等。这整个过程是不断进行且处于流动之中的，但是故事是在特定的语境、特定的历史时刻里发生。然而，由于本书是一本关于研究方法的书籍，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过程里另外添加一个角色。此角色就是寻找故事或“诱导”故事产生的人，也就是研究者。我已经指出多种介于不同元素之间的关系，这些元素将在每个研究题材的产生、诠释与分析时刻里扮演重要的角色。此观点可用以下方式表达（引自 Plummer，1995）：

- 研究者：可能是故事的诱导者，也可能是说故事的人可能

直接使用自传,或是建构研究的观点。

- 说故事的人:被引导说出故事的人,以及说故事者与故事之间的关系。
- 故事本身:叙事、形式、话语以及用来表达这个故事的所有技巧。

故事所扮演的社会性角色

普卢默(Plummer, 1995)近年来以符号互动论的观点写作,并将其焦点导向故事在理解社会上的重要性,这是为了理解个人以及那些广泛流通的社会故事。同样地,邓金(Denzin, 1992)将故事的概念用作一种探讨人们如何利用社会上现有故事的方法,例如:他们如何透过叙事电影来理解他们的生命意义。就这方面而言,故事被视为认同、日常生活与社会变迁中的一部分。对普卢默而言,社会是由故事网络所构成的,因此抽象的“个人”与“社会”根本不存在,仅存在着一种“由对话与会话的广大协商网络所构成的社会秩序”(Plummer,1995:20)。然而,他却也坚称这个网络充斥着权力关系。这意味着某些故事比其他故事更有权力,而某些故事根本无法被提及。当然,人文学科以及其他话语实践都无法断绝或脱离这个过程,而是镶嵌于其中,诉说着它们自己的特殊故事,其中有些故事对于叙事的形塑与形构可能具有高度影响力。

普卢默在提出一种故事的社会学时,界定出故事的不同面向:

- 故事的本质与内容是什么?这是一个关于文本的问题,它关注叙事的结构以及所采取的所有技巧或符码,同时也关注说故事者在故事之中的定位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 生产与消费故事的社会过程为何?这个问题问及故事被生产出来的方式,以及人们如何在特定时刻里建构出自己的特定故事。说故事者是否拥有自己的故事,或者这些故事的作者权被转移到不同的作者身上?哪些情况有碍于诉说故事,哪些情况又可鼓励诉说故事?为什么人们要诉

说这特定种类的故事，而不是其他故事？又是哪些社会与文化形式构成了这个故事？

- 故事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为何？这个问题在于质疑特定故事的重要性，以及这些故事如何与广泛的历史和社会变迁有所关联。在特定故事的诉说里涉及了哪些权力面向？谁能够侃侃而谈，谁又保持沉默？为什么某些叙事变成了主流，其他叙事却总是处于边缘？

因此，普卢默在故事的社会角色方面，提出五个问题（引自 Plummer，1995）：

1. 哪些种类的叙事可以赋予人们权力，又是哪些叙事贬抑、控制与主宰着人们[病理学叙事、迫害叙事，这些故事检测出人类的能动性与存活……不同群体以不同的方式来说故事（阶级的发言可能被边缘化并被排除在外），“专家”的言谈赋予故事优越性与可信度（亦即有权力的故事）]？

2. 故事的构成：哪些策略可以诱发故事的诉说，而哪些策略又压制故事，使之无法被说出来（诱发者所扮演的角色）？

3. 消费：谁具有接近故事、文化与经济资源的权力？

4. 策略：发言权的轮换、风格、模式等。

5. 更广泛世界里的故事：关于议题的权力运作情形——哪些故事可被诉说，并以何种方式诉说。

普卢默的这些见解，发展自他的口述历史与他对生命故事的研究，当我们要思考如何连结起文化文本与生活文化之间的关系时，这些见解将能产生极大的帮助，这正是下一章节所要处理的主题，但现在我将继续探讨自我的概念与说故事之间的关系。

言说自我

另一种思考此过程中“角色”的实用方法，就是视之为“自我”的集合。“自我”的理论以及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处理关于“我们是谁”的问题的方式，已经造就了一些相当有趣的研究，而且也强调了在我们的研究中探索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我是谁？”听起来像

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哲学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却时常在研究的过程中困扰着研究者。不仅是“我是谁?”的问题,还包括“在此研究中我究竟是谁?”的问题,我该如何在研究中发现自己的位置或定位,是身为一个理论学者、故事的诱导者、文本的诠释者或作者?身为研究者与作者,我们不可能“不带任何立场发言”(speak from nowhere),相反地,我们总是从特定的“言说立场”出发,进行发言与写作,而此言说立场总是与物质性有关。因此,这种情况呈现出真正的难题,亦即在研究工作上我们该如何定位我们的“自我”、又该定位于何处。为了要探讨这些关系与问题,我将检视“正进行探究的自我”、特定的故事种类以及它们与言说者之间的关系、自传/传记、生命故事以及证言,最后我将针对我们研究中的叙事提出一些反思。

在此,最为重要也最具疑义的概念即是自我的概念,以及我们对它的理解。由于深受福柯的影响,近年来的研究已致力于将自我概念化,但并非将自我视为具有中心性的以及稳定核心的统合个体,或是实质的存在,而是将它视为一个断裂的、去中心化的主体,且这个主体正持续处于生产的过程中。此主体与主体性在何种程度上由社会所建构,又是透过社会建构到什么程度,这个议题一直是众所争辩的焦点,然而,从吉登斯的观点出发,我们至少可以将自我视为一种投射,因为我们可以反思自己的过去与现在,并将自己投射至未来。但是,将我们的认同与主体性聚合在一起的潜力,总是由我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所形塑与限制,或是因此而被赋予能力,我们经由阶级地位而取得的教育机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若以此方式来概念化主体,就可以认识到社会中个人经验的复杂性,并意味着社会是透过主体来发言。以下的例子将可以证明这些主体概念与研究过程之间的关系。

斯蒂德曼(Steedman, 1997)指出,自传数量的激增如今已超越了其身为一种文学类型的定义。她提及,“当某个文类变得超越它本身时——当它变成各种不同的认知形式、一种学术书写模式、一种存在于世的方法时”(ibid.: 107),我们就必须问为什么。斯蒂德曼主张,目前自我已变得愈来愈重要,“因为它是许多后福柯主义式理解的融合,而此种后福柯主义式理解已形塑并持续地形塑后现代主义的思想”(ibid.: 107)。她继续检视“自我的叙

事”是如何透过创意写作中的特定教学实践，而变成一种“教授与学习的活动”（ibid.：109），它在特定的历史时代里，生产出特定的叙事种类。她认为，书写自我可让自我得以存在，因此当然也可以透过有权势的机构（诸如国家）成为一种学科策略。对普卢默而言，对生命故事重要性的讨论，以及故事的确实诉说，确立了我们的身份与角色。正是这个过程、关于自我的言说与书写，才是理解文化与社会的重要依据。

研究者

取自上一章节里，我自己和他人的研究例子，已清楚显示：故事的诱发者，亦即研究者在研究题材的建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史盖吉指出：为了要确立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的位置，研究者可以有效地问及一些与她或他自己有关的自传性问题（Skeggs，1995：4）：

- 为何选择此研究领域？哪些制度性、经济性与社会政治因素支持了这个选择？
- 哪些既存知识的架构被使用、被提及、被挑战、被忽视了？原因又是什么？
- 哪些方法被选择以进行研究？为什么要选择它们？为什么不使用其他的方法路径？
- 最初的问题与研究，和最终的结果之间有何关联？
- 书写的过程是如何影响最终的结果？

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拿这些问题来问自己，需要一种反思式的觉醒，以了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每个阶段作出特定决定的原因。我们有责任在研究的第一阶段，就为自己确立一个合乎道德且公平的研究路径。当然，这些问题并非都与我们所要讨论的特定研究相关，我们也无须在“最终的”文本里提到它们。一个过度着迷自我的研究文本，对读者而言可是相当冗长乏味的！

瓦莱丽·沃克丁是一个不断在研究过程中反思自己定位的研究者，她使用精神分析的架构来理解研究过程中所发生的事

(Walkerdine, 1989)。她"借着严格检视研究者对研究主体,以及研究主体对研究者所投射出的议题",指出田野调查工作中的转换与反转换的过程。沃克丁继续写道:"我想要主张的是,来自于研究者与研究主体双方的幻想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最后这些幻想变得与研究资料无关,我们也不能低估这些幻想的重要性。"她认为,即使我们可能会想否定它,但这是一个不断持续进行的过程,因此我们不应忽略它,而应该将之视为研究过程本身的一个重要部分。沃克丁进一步声称,这意味着资料的收集并非简单或肤浅的,而且数据本身并未告诉我们任何讯息。从她自己的研究中举例,沃克丁讨论到访谈实践与数据的诠释,并告诉我们:三个进行同一项研究的研究者,如何将他们自己的恐惧与幻想投射到受访者身上,以及投射到他们诠释数据的方法上。虽然沃克丁的论点非常重要,但是当中的含义却问题重重。她所提供的例子指出,研究者本身并非能够全然控制她自己的感觉、关于她自己的认知、以及她的欲望与恐惧。精神分析告诉我们,潜意识正在运作中,但这并未考虑到在此种研究中所涉及的智识化与理论化的过程。身为学者,我们已经"共享"了特定的架构与概念,而这些架构与概念极可能反映在我们对于自己的认知上。这些重要的元素可能提供我们一些距离,但这些距离并非指客观性而言,而是指在研究过程中,在一段距离外来认识我们自己。沃克丁关于田野调查工作的记述,指出了我们对于自己的感觉与情绪几乎是毫无招架能力的。我将此观点理解为一种潜在的错误认知,这种错误认知是针对在此正式场景中对于人类行为的理解。我不认为,我们是如此极端地自我折磨。我们可以找到意识到该过程存在的方法,以及我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我们绝不能忘记的是,我们所研究的主体也时常能准确地意识到他们在此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沃克丁建议,在书写关于我们的主体性时,我们必须将自己放在研究的中心阶段里。然而,必然的情况却是,有许多关于我们主体性的故事可以被建构出来,且并非我们所有的经验都和研究有关。

沃克丁与霍尔韦曾经写下关于其迷人的研究实践的论述。然而,他们的精神架构与研究主题,也许有助于他们在此特定的精神分析种类之下来反思转移、投射、幻想与恐惧。正如布鲁丝

顿（Brunsdon，2000）所指，沃克丁对于科尔斯一家人观看《洛基》的描述（于第 3 章中讨论过），是用来强调与探索方法论的议题，并充分揭露研究者对于自己和研究主体之间关系的关注与焦虑。正如布鲁丝顿也指出的，关于认同与幻想的重点在于，沃克丁对身为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以及希望科尔斯一家人能将她视为工人阶级的欲望与失落。沃克丁对于研究主题的选择，以及她想要在其研究中提出的问题种类，特别聚焦于劳动阶级女性特质的建构。每一次选择都已隐含在她自己的认同与欲望之中。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自己的研究里反映出我们自己的主体性与所处位置。上述讨论已经将焦点放在研究者用以反思自我的各种架构与方法上。

说故事的不同模式

将上述观点谨记在心，现在我将要进一步提出四种不同的说故事模式，它们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研究里，那就是：自传、证言、生命故事与记忆。

自传/传记

正如斯蒂德曼所言，自传/传记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里一个愈来愈具有影响力的文类（genre）。一直以来，它在女性主义研究中就尤其重要，伊丽莎白·普罗宾检视了性别化自我（gendered self）的概念及其可能性，或是其在文化研究中的“发声位置”（Probyn，1993）。她关怀的焦点是如何在学术研究及批判分析中，找到一个与我们自己相关，而且我们的生活经验又能派上用场的研究方法。普罗宾注意到自我如何在某些情境与位置“获得合法性与必要性”，但却无法在其他情境与位置获得。她想要详述策略性言说的方法，在这些策略所处的语境中，自我的声音是不被预期的，而且可以“自我将被呈现为经验与情感的拥有者，并作为一个将有效拥有予以概念化的管道”（ibid.：87）。她援引斯蒂德曼的《造就一个好女性的景观》一书作为此观点的例证。斯蒂德曼回忆她的过去，尤其是她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并透过不同

的理论观点去深思其自传以及理论观点的适切性。普罗宾将此一方法描述为介于本体论与知识论之间的一种双向移动,前者是指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存在方式,后者则可让该存在/经验借此变成一种认知的方式。普罗宾的研究,有助于文化理论学者与批评家在他们自己的分析里寻得发声的位置,而不必落入狭隘的主观模式里。明显地,自传对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而言,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形式,它促使我们将自己的经验用作一种资源,也让我们得以更具分析性地思考自传如何在我们的知识论计划中寻得其定位。同样地,经验范畴对于女性主义或文化研究的教学实践也极为有效,因为它鼓励学生去深思自己对于世界的认知。普罗宾的见解可以当成一种实用的策略,有助于我们超越经验进行思考,并促进我们对于公共领域(社会文化)与私人领域(私密的/主观的)之间互动的理解。

普卢默在其重要著作《生活纪实2》一书中,区分了生命故事的不同模式或功能:生命故事作为一种资源以及生命故事作为主题两者之间的差异。如此的区分有助于我们思考,我们希望从生命故事中获得什么,以及我们可能如何将之运用于研究当中。

倘若我们将生命故事当成资源,那么我们最关切的就是它如何增进我们对于事件的理解,或是经历过特定事件之后、或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或是在特定的时期中,生活是怎么样的。它可以丰富我们对于那个世界、那个社会、那个文化的知识,并让我们了解身处其中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当我们将生命故事视为主题时,我们所关注的焦点就变成:它自身作为一种话语或话语性事件的正当性。我们可能会问及,这个故事是如何、以何种方式被诉说出来的,在诉说这个故事时,又使用了哪些技巧。我们可能也会问:那个人一开始是如何诉说这则故事的,她的哪些社会与文化生活形式让这个故事得以产生。因此,故事的形塑与诉说变得比内容还要重要。当然,也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来使用相同的故事(参见 Summerfield,1998)。

证言: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人们经历过特定事件与见证某些事件后,他们会想诉说相关的故事,这些故事常是具有急迫性的。此种强而

有力的"眼见为凭"叙述模式,即是所谓的"证言"。在 1982 年 1 月的某个星期里,伊丽莎白 · 伯格斯迪博莱倾听瑞葛蓓塔 · 曼祖(一个意大利女性)诉说关于她在危地马拉的生活及奋斗故事,并将这个故事记录下来。虽然曼祖的动机引人质疑(Stoll, 1999),但是我们仍有必要思考这种说故事的形式。在介绍这个叙事时(Menchu, 1983),伯格斯迪博莱这样描述曼祖:"她的生命故事是关于当代历史、而非关于危地马拉本身的一个记述。就此意义而言,这足以作为范例:她为美国次大陆的所有印第安人发言……她是一个具有权威的见证者"(Burgos-Debray, 1984: XI)。

我们应将这个权威的概念理解为,一个有意识地为受宰制者发言的人。曼祖透过详细省视自己身为基切印第安人(Quiche Indian)的生命经验,来为人们发声;基切印第安人历经了数个世纪的暴政,长久以来一直生活在文化歧视的阴影下。诸如她所做的这类证言是诉说经验的有力例证,而这些经验是与口语传统以及说故事者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关。本雅明将说故事者的角色描述为有能力"以明确、实用且独特的方式,塑造他自己或他人的经验素材"(Benjamin, 1973: 108)的人。伯格斯迪博莱致力于"如实地复制"此说法,而不受制于它在发表形式中的诠释或分析。显而易见的是,此种说法就广义、外在于学术的政治与文化语境而言,具有其重要性,但它也应该能清楚明白地提醒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人们正痛苦地承受着暴虐的政治与经济政权所造成的后果,对他们而言,"断裂主体性"是一个既痛苦又活生生的概念。这里引述曼祖的最后一些话:

> (因此)我坚持奋斗下去,这是没有界线也没有局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游历了这么多地方,并在这些地方把握机会谈及我的族人……但是,我仍然将自己的印第安人身份视为秘密。我仍然将我认为没有人应该知道的事隐而不宣,即使是人类学家或是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拥有多少著作,都没办法发现我们的所有秘密。(Menchu, 1983: 247)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认知的确有限,但就我的观点而言,我们的研究中一定可以含括这个经验模式。

生命故事:资源与主题

在口述历史中,生命故事是一个发展已久且建构优良的研究方法,这个方法主要是用来催生关于世界的“另类”观点,换句话说,就是作为一种资源。生命故事的搜集在女性主义的研究工作中相当重要,因为女性的经验时常是隐而不宣的。首先,我们必须坚称:生命故事并非某个人生命的直接表述,因为这根本是不可能达成的。它总是一个被诉说出来的故事(tale),亦即它是被建构出来的,并具有一种叙事形式与模式,但它未必是静止不变的。它会站在过去的立场来诉说现在,也就是说,它会使用约定俗成的方式,但内在却是不稳定且不固定的。

后结构主义者坚称,经验作为可让人们直接接近“真理”或“真实生活”的本质是值得怀疑的,而这样的宣称引发了女性主义史学家之间的论辩(参见第2章的讨论)。许多人相信,女性的经验以及她们对生命故事的记述都是真实的,也应该被视为是真实的。虽然经验不应该被遗漏,但是凯瑟琳·坎宁却认为,倾听这些记述的重大责任在于,“透过探索主体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场景里传递或转换话语,以拆解话语与经验之间的关系”(Canning, 1994,引自 Summerfield, 1998: 17)。

一个引用这个观点的绝佳例子,即是第5章中曾提及的露丝·弗兰肯伯格的研究,她采用女性对于她们生命的记述,作为分析种族化社会的资源。弗兰肯伯格主张,解释和理解这些生命故事时,必须将它们“绘制”到较广义的社会过程里。她的论点很清楚地表明生命故事的复杂性,以及其所能涉及的数据之饱和度与丰富性。弗兰肯伯格捕捉到访谈期间不断转换的动态性与立场,同时也掌握到受访者在谈及自己的故事时展现的自我反身性(self-reflexivity)。正是在这个自我反思的空间里,自我的生产工作不断地进行,也正是她的研究主体的自我意识,才未认知到一般对于生命故事与对话访谈的使用。弗兰肯伯格继续讨论访谈的叙事:“它们是具有自我反身性的(self-reflexive),不仅确认该计划之外社会世界的其他记述,也同时与其他记述相互矛盾。广义而言,它们与其他在地的以及全球的历史相互影响”(Frankenberg, 1993: 42)。撇开其他的贡献不谈,弗兰肯伯格的研究可以

“让某些方法变得更明确具体,这些方法说明了白人女性的生命经验如何在种族基础上建构起来”(ibid. :22)。

虽然我亟欲主张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需要持续地努力,致力以更为成熟的方法来处理“生活文化”,但其主题必须是可被认识的、丰富的主题。以生命故事和叙事概念来进行分析,将使我们得以把经验概念化为〔借用劳拉帝丝的话〕:

> 一种过程,对所有的社会性存在而言,主体性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被建构出来的。透过这个过程,人们得以在社会现实中定位自己,或是被置入社会现实中,并因此以主体的身份(意即源自于自我),去感知并理解那些关系(物质性、经济性以及人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这些关系是社会性的,宏观而言,更是历史性的。(1984:27)

关于经验的观点,正如它们以往被认识的,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而言,仍旧是一个丰富且必要的来源。女性主义与文化研究两者都已经以相异或相似的方式,认知到这个事实。就我的观点而言,后结构女性主义所形构而成的方法论始终屹立不摇,它坚称应该要质疑所有的分类范畴,也应该要在方法上、在路径上保持明确且开放的态度,更应该要具有反身性,如此的方法论可以持续地启蒙并丰富文化研究的过程。

跟随着普卢默的脚步,鲍勃·康奈尔对于阳刚特质的研究也援引了生命史的方法,并主张这些历史“记录了丰富的个人经验、意识形态与主体性……但吊诡的是,生命史也同时记录了社会结构、社会运动与机构。这意味着它们提供了关于非个人的集体过程,以及关于主体性的丰富证据”(Connell, 1995:89)。他更进一步主张,生命史对于理解社会变迁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生命史方法总是关注不同时代里的社会生活,它在根本上就是历史。”然而,康奈尔也意识到,这是一个耗时又劳力密集的方法,虽然这个方法无法扩及到更大的范围,却能在研究深度上获得相对丰硕的成果。其诀窍就在于对许多情境的关注,他希望这些情境能够提供丰富的“理论产量”(theoretical yield)。这意味着,他界定出所谓的“性别秩序的危机倾向”,并区分出一些男性团体,这些团体因为不同的理由,以致“男性特质的建构或整合处于压

力之下”(ibid.:90)。这些男性包含了那些与女性主义者共事者,在这些工作场所里,“性别阶层已经失去了一切的合法性”;也包含了身处在同性恋与双性恋网络里的男性、没有固定工作的年轻劳工阶级男性,以及拥有“新”职业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这些职业缺少“资本家与旧专家所拥有的社会权威”。康奈尔的研究策略极度关注生命史这个方法,并赋予这个方法高度价值,当研究者向那些男性要求“你们的生命故事”时,他们关注的是,在生命的不同场景中,实际发生在这些男性身上的事情,因此:

> 我们使用机构之间的转换(例如,进入中学)作为记忆的依据;但是我们也问及机构(例如,家庭与工作场所)之中有关各种关系的描述。我们致力于从不同的生命时期里,寻求关于每一种性别结构(权力、劳动力与精神贯注)的证据。过去在实地访谈里,是不可能探索潜意识动机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致力于透过询问早期的记忆、家庭成员组合、关系危机以及对于未来的期许,来寻找情感动态的线索。(ibid.:91)

由此我们可发现,康奈尔的访谈并不是为了诱导天马行空的一般生命史,对康奈尔而言,访谈是为了要产生“丰富且迷人的叙事”。我们将于第8章中分析他所采用的策略,他强调,虽然语言、叙事权的转换、言说者与沉默者显然是故事的重要特征,但是“自传故事是超越它自身语言的一个丰富证据。这个证据未必易于使用;而且我们也需要时间与努力,才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检视故事,并比较此证据与其他证据之间的差异”(ibid.:91)。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种社会学的想象,一种想象力的跃进,才能看出故事所彰显的意义。

萨默菲尔德(Summerfield, 1998)曾论及,生命故事访谈的过程可能会导致全然不同的议题,她也强调在生命故事访谈期间,研究者与受访者的经验的不稳定性。她引用道森关于组构(composure)的概念,以有效地描述言说或诉说某人的生命故事(Dawson, 1994)。组构意味着将故事正确地组合起来,为了听者或读者而组构出自我,另外也意味着说故事时一种较为心理导向的过程或自我掌控,这是一种透过详实地诉说一则故事所达成的平衡状态。道森与他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大众记忆团体的研究同僚,

将此种故事喻为"安全的故事"(safe story),并将之对照于"高风险故事"(risky story)。当然,访谈者或故事诱导者的角色,是诉说生命故事时,潜在转变的重要关键。萨默菲尔德界定出访谈的特征,并视之为能够引发组构(或解构)产生的要素。首先,在访谈者的研究架构与受访者的记忆架构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着某些断裂或非吻合。在访谈期间,研究者对于她所希望探询的领域会有清楚的概念,但这些领域在记忆架构中未必占有一席之地,而此架构却形塑了故事在被说出/被记得时的样子。因此,研究者可以干涉记忆架构、插入一个新的话题或是鼓励受访者以不同的角度来诉说她的故事。生命故事访谈的第二个特征在于,它可以挖掘先前被隐藏起来的感觉或隐藏在记忆里的事件,而这个特征即是"访谈内在世界"的过程。这是为了要鼓励受访者诉说更多关于个人的、私密的感觉,这显然可以引发组构(或解构)的产生。最后,萨默菲尔德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到访谈本身的人际动态关系上:访谈者的衣着、行为举止与身体语言等,都可以鼓励(或阻止)受访者对不同的话题做出告白。这也可以导致非预料中的表白,并从"安全的"故事转变成"高风险的"故事。

我的访谈中,有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这种转变。我与"珍妮特"的首次访谈历时两个小时。她将自己定义为"家庭主妇",而在访谈当时,她的三个小孩分别是十二岁、十岁与七岁。她的先生是一位电子工程师,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到国外出差数周。珍妮特十五岁就离开学校,直到二十二岁拥有第一个小孩为止,她都在博姿担任柜台助理的工作。在访谈的过程中,珍妮特开始说她的故事,然而,现在我回过头来看逐字稿时,才发现当时的我非常努力地导引她回到我的"研究架构"上,并针对录像机、观看电视与家庭休闲时间等问题作出响应。她的故事一开始是关于一位被"组构"出来的全职母亲与家庭主妇,但随着访谈持续进行,她却开始组构(或解构)这方面的自己,并为自己开启另一个更为矛盾的身份,根据道森的"组构"概念,有趣的是这之间的转变如何发生。在我所有的访谈里,一开始我都会问及他们的日常工作,从他们前一天的生活谈起,直到对他们一周的生活作息有所了解。珍妮特描述了她一周的生活:照顾小孩、带小孩上放学、打扫与下厨、再加上两天的购物工作,其中一天的购物地点邻

近她父母家,所以她会顺道去拜访他们。我们一直谈到星期五,在回答我此次访谈的第三个问题时,她说:

> 接着就是周末了,你知道,我真的觉得自己根本没时间去上班工作。这可能听起来很蠢,但你知道的,当人们说"喔,难道你不觉得在家很无聊吗?"时,我真的不这样认为。因为总是会有事情要做,你知道,我的意思是,我并不是不喜欢当家庭主妇……你知道,我一直都喜欢做那些事。

接着访谈开始问及关于广播、电视与录像带的问题:她喜欢收听什么广播节目、观赏什么电视节目,以及她如何使用录放机。不久之后,她开始提及当她坐下来观赏电视节目时的罪恶感,尤其是一天当中她开始录下节目的时候:"我不是那种整天开着电视的人,除非我真的很想看一些节目,因为我认为你可能会对看电视上瘾,如此一来就会荒废其他事情,所以我一天不会看太多电视。"

但有一个例外,有一出白天播放的美国影集《鹰冠庄园》是她一定会收看的节目,而且如果她出门购物,她会将它录下来。于是,我开始问她关于《鹰冠庄园》的事,但她却打断了我的话:

> 如果现在回去看一整天的录像带、电视,我想我可能会充满罪恶感……我的意思是,并非我先生回来后会说什么……我不是这个意思,纯粹是我自己会觉得我在偷懒。就某种程度而言,我将它视为一项工作,你知道的,这是我的工作,真的……就像是你外出工作一样,而这是我的工作,我觉得只要我一坐下来,我就没有做好我的工作,这纯粹是我自己的想法……我想这真的是种罪恶感。

在此,珍妮特一再宣称家庭主妇是"她的工作",并将她的工作与我的工作相比较,且暗示性地和我的奉献精神与责任感相比。然后,我又再次回到她录下哪些电视节目,以及她何时抽出时间观赏录像带的话题上。她再次以同样的答复来响应这个话题,提及她根本很难找到时间去观赏录像带,因为她必须尽到完成家事的责任。接着,我们稍微谈了一下有关阅读的话题。然后,我又将话题带回电视上,问她当她的小孩们从学校回来时,她是否会开着电视。

珍：他们会转到儿童节目，对啊，他们会转过去。

我：如果根本没有人在看，电视也会一直开着吗？

珍：嗯……如果孩子们在家的话，电视会开着……但是如果他们出去了，大多数的时间我都会把它关掉，然后我会听唱片或广播，你知道的，如果没有我真想看的电视节目……我习惯……我不是那种可以边烫衣服边看电视的人，这样我没办法专心……看电视会干扰我烫衣服……我没办法，有些人喜欢一直开着电视，但是现在我没办法同时烫衣服跟看电视。

珍妮特又再次回到她面对工作时的专业精神，她坚持她的工作必须优先于电视。接着，讨论的话题开始转往她所喜欢的电视节目与电影上。她是《豪门恩怨》与《朝代》的迷，而且非常乐于谈论剧中的角色与目前的剧情等。然后她又提到喜欢某些机智问答节目，并透露了其他信息：

珍：我喜欢某些机智问答节目，我曾经喜欢一个儿童机智问答节目《脑力激荡》(*Blockbusters*)……现在我觉得那真的很棒，也许是因为我可以回答某些问题……我也喜欢《大师头脑》(*Mastermind*)……

我：你喜欢它什么？

珍：我想是因为当你可以回答其中一个问题时，你会觉得非常棒……你也许可以回答很多问题(笑)……但是我现在喜欢《大师头脑》。我是如此地……嗯，你知道，就好像当那个小伙子上周获胜时，我是真的希望他赢，而且你知道吗，他只是个……我不是说他只是个救护车司机……但是你知道的，当你面对其他对手……你知道，诸如学校老师这类的对手，我想这真是一件非常棒的事……就好像当那个出租车司机赢得比赛一样……但是很明显的是，他一定读了很多书、学了很多东西才能达到那个程度……你打败了非常聪明的人，并赢得比赛……我想这真的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我觉得……嗯……他真的有所成就，你知道的，我真觉得他们有所成就。

珍妮特再次提到我——“你也许可以回答很多问题”，但是，

她接着开始谈到某些没受过正式教育,却成就了某些事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打败了学校老师以及非常聪明的人。这令她振奋不已,而且当她开始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提到自己时,那些人(即让她清楚产生认同感的人)感受到的成就感又再次出现了。珍妮特继续将处于目前状况的自己,和她所欲求的自我(一个"有所成就"的自我)相比较。我们的对话转向她先生的个人计算机,她说她曾经拿一些她先生所订购的计算机杂志来看,但"我就是看不懂",她接着说:

珍:……嗯,就像我一直对我先生说的,我总是告诉他,我要写一本书,然后他就笑了,他们全都笑了,我接着说,我告诉你我要写一本书……所以买一台打字机给我吧……接着他说,你不需要打字机,只要一台文字处理机就够了,还有一台打印机……你知道,无论我会不会去做……我可能会这么做。你看,我有了这些想法。

我:那会是本什么样的书?

她告诉我,那可能会是一本童书,因为她常带小女儿到图书馆去,而她觉得自己可以写出比图书馆馆藏更好的书。她已经把这件事告诉她的小姑(她拥有一家托儿所),她的小姑告诉她,她应该写出那本书,而且她可以帮她在小孩身上做测试。珍妮特又说到:

珍:我说我总有一天会证明给你们看,我真的会这么做……我真的想要这么做,而且想要成功,想想看,嗯……因为当你全心全意在家照顾小孩,就没有太多的……就好像,我去找我的小姑……她有全职的工作,你知道,就是照顾小孩,天知道,那些小孩全都没被好好照顾,诸如此类的……而且……你真的已经在生命里获得了某些东西,你可以说……你知道,你真的已经拥有了某些东西,而我却一无所有。她说,我真佩服你可以满足于一直待在家里照顾小孩。我真的很想做些什么,只是为了说,嗯,我已经这么做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还是,这其实很愚蠢?

接着,珍妮特继续谈及她感觉被轻视的事实,并着重在诉说家务的琐碎特性上,以及她觉得自己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事实,"我

跟自己的朋友们在一起时很好……嗯……对啊,我跟他们在一起时很好,但是我不喜欢一些事情,你知道,例如,若我先生希望我跟他工作上的同事一起出去,或是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我可能会因此得心脏病……因为,你要跟他们说什么呢……你知道,真的,你到底能跟他们聊什么?"

珍妮特显然开始变得沮丧焦虑,我知道我们正进入"高风险故事"领域里,于是我问她是否想要出去工作:

> 珍:不会,因为我真的没办法,因为,我的意思是说,他不在家,而且照顾他们是我的责任。我生下他们,他们是我的……我是这样觉得啦,你知道……我不觉得他们会感激我出去工作……我不知道耶……我一直威胁说要离开,但我不知道我可以去哪里(笑)……你知道,当我生气时,我只想……他们只认为我顶多就是发一顿脾气……而且……还得清洗,我受够了清洗的工作……我想这就是我待在这里的原因,完全受制于清洗的工作,我真的很想,噢……我不知道耶,一走了之,然后找份工作……我会做给他们看,诸如此类的……(笑)

这真的让人感到沮丧,她坦承自己的挫折感,以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无力感,于是我说:"也许写作是一个不错的点子"。

> 珍:对,对……因为我觉得……你在自己家里能做些什么?这是一件你可以在家做的事情……而不必出门……我是说,我没办法出去工作,因为我必须配合学校假期……但是当我看到图书馆里的某些书时……有些真的是垃圾……这就是我会有这种想法的原因。
>
> 我:嗯……许多著名的女性古典小说家都是因为受困于家庭,才会从事写作的工作。
>
> 珍:是的,但她们想要寻找写作题材时,就会出门,例如,当她们写到某个地方时,就会到那里去搜集资料……但我没办法这么做,我没办法出去搜集资料……
>
> 我:但是很多女性写的是她们自己的经验……
>
> 珍:就像是芭芭拉·泰勒·布拉德福德……事实上,她过去与我母亲住在同一条街上,我母亲总是阅读她的小说,

因为她们,你知道,我是说因为她认识她……

我:你会读她的小说吗?

珍:会,而且我曾经在电视上看过,我非常喜欢。

我:你会把它们录下来吗?

如此一来,处心积虑的研究者又可以将访谈带回她研究架构下的"安全"领域。这些取自我与珍妮特访谈内容的冗长摘要,显示了她一开始在"成功母亲与家庭主妇"论述下的平静心情,一直到罪恶感、挫折感、愤怒与抱负等种种感受。站在"写实主义式"的角度去解读这篇访谈,可以将之视为某人对于自我矛盾的论述,而且在她所吐露的言谈中,确实存在着她将自己与他人、与我做比较的证据。然而,珍妮特以不同样态的自己,来展现她的改变。访谈中曾有一处,她进入了高风险的领域里,当时我觉得她无法令自己重新平静下来。因此我将焦点回归到写作上,并试图对可能发生的事表达正面的想法。这提供给她机会去重述家庭生活对她所造成的限制,却也让她可以正面地思考一种不同的未来,一种她可以"向他们证明"她能够达成的未来。

记 忆

正如我们所见,生命故事、自传与证言或多或少都涉及普卢默所谓的"挖掘过去",这个活动主要是发生在特克尔(Terkel,1978)所说的"记忆场景"(memory sites)中。这个隐喻暗示着记忆是充满疑问的。因为记忆并非仅是简单地存在于那里,等待某人将它再现于他对生命的反思里,而是必须经过筛选、建构并向倾听者诉说的事物。对于何谓记忆的理解与概念化过程已历经了数次转变,大部分是从个人的、个体的记忆(个人所储存的关于过去的记忆),转向某种集体的、社会或文化面向的记忆。在此,记忆的叙事被理解成是在某个架构里表达出来,同时也是透过此架构才获得表达的。在此一架构里,特定的叙事才得以产生。就这个观点而言,在个人故事得以被诉说之前,特定的条件必须事先存在。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关于虐童的故事,这些故事出现在一种社会与文化的认知架构里,在此认知架构中,某人回忆或是遗忘过去所经历的事件与创伤。在此,叙事或故事变得公开,可以流通,也可以如实地诉说。特克尔称这些架构或文化知识为记

忆技术，这些技术促进了故事的发掘，并使得特定故事得以被诉说。于是，这一切皆呈现出“真理”的问题，或者较保守而言，呈现出正被诉说的是何种“真理”。普卢默因此归结出几种看待生命故事中真理问题的不同路径：现在的普遍认知是，生命故事并非仅被“诉说”（told），而是被“组建”（composed）出来的：“我们的生命故事确实是被建构、编造、创造、制作出来的”（Plummer，2001：238）。对研究者而言，问题在于故事是如何被组建出来，以及哪些故事正以何种方式被“编造出来”。这并非意味着生命故事是虚构的，而是指它们总是“人为的、多变的且有选择的”（Alessandro Portelli，引自 Plummer，2001：238）。

取自梅杰霍夫的最后一段引文清楚地归结出生命史技术所涉及的事项：

> 当某人提及另一个人的悠久、详细的生命史时，主体与客体之间会产生相当复杂的变化。创造与扭曲在其间发生，主体与客体也不再相同。当以两种观点来检视同一个生命时，就会产生一种新的创造。这全新创造出来的故事本身有其内在完整性，但它不应被误认为就是那个人曾经验的、自然的、未加框架的故事，因那人在访谈开始之前就已存在。我们可称之为“民族代表者”（ethnoperson），也就是凭借着对谈者与主体之间的共谋而诞生的第三者。（Myerhoff，1988：281）

文本性

在倾听个人的叙事，包括我们自己的叙事时，诠释的过程显然正不断地发生，而且在分析题材组织时，诠释是必然的过程。下一章将着重探讨一般理解下的“文本”问题，就好像以威廉斯“对于文化的记录”为例，这里的记录就可解读为文学著作、摄影、电影、电视或广播节目、广告等，但是依据我们在此的讨论，可以清楚了解到：在发声者进行一连串活动的过程中，个人的叙事拥有一种“文本性”，该过程涉及筛选、排除、结合、叙事形塑等，这些

活动可用以描述更为正式的文本的生产情形。

然而,普卢默(他的著作激发了本章节的成形)却坚称:生命故事与个人叙事既不能、也不该被视为是诸如其他文化产品般的“文本”。在他的著作《说性的故事》里,正如书名所示,普卢默着重于诉说私密的个人经验,他这么说:

> 这些故事并非仅是“语言”或“文本”或甚至是“话语”。我企图跳脱目前大部分几近偏执的分析,它们倾向于将人类生命中的丰富经验简化成文本。社会现实或许可以隐喻性地被视为一种文本,但它在实际上并非文本……我将要探讨的性的故事,必须被视为在社会语境下,透过具有日常生活思维与感觉经验的人,经过社会性的生产而出现的。(Plummer, 1995: 16)

“倘若它们是‘文本’,那么它们就是由那些生气蓬勃的、热情洋溢的人们在社会生活的流域中体现出来的文本”(ibid.: 16)。这是一种对人文主义的狂热诉求,而鲍尔·威利斯也采取相同的立场。然而,这个值得尊敬并具有高度道德立场的观点,可能会造成对某个主体的过度认同,而且就某些状况而言,会导致研究者与其研究主体之间缺乏批判性的距离。在我们亟欲尊敬与认同具说服力的生命故事,以及个体所诉说的个人叙述时,还必须与想要分析并批判性诠译那些故事的欲望作出协商,那些个体时常处于弱势,他们的故事既无所听闻,也不会被仔细聆听。换句话说,让我们回到普罗宾的观点,本体论与知识论之间既不简单也不具有直接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必须孤独面对的问题。然而,我们可以采取一个异于普卢默的文本观点,他对文本的概念是源自于文学理论。文化研究对于文本的分析则是致力于将文本语境化,把文本置入生产、分配与消费的过程中,并坚持理解文本的世俗性,或是了解导致其生产与形塑其消费所需的条件。杰姬·斯泰西研究大众对于1930年代与1940年代期间的好莱坞与电影的记忆,她的研究仰赖于电影观众与影迷的书写记述,她主张“这些对于好莱坞明星的记忆必须被视为文本,因为它们是在特定文化惯例下所生产出来的再现形式”(Stacey, 1994: 76)。她继续讨论这些记述的立场:

> 然而，采用这样的路径，并非是为了主张受访者写给我的故事是虚构的，也因此它们只和其他虚构故事有相对的重要性。考虑到阅听人记忆的叙事形构，并非是要窃取他们的特殊性，或是将他们视为如同他们所观看电影般的虚构叙事。这将混淆叙事与虚构这两个类目。（ibid.：76）

让我们再次援引康奈尔的话：

> 在最近关于方法的讨论里，倾向于将任何故事都视为"虚构的"……任何严谨的研究者，在使用生命史时，都必须注意到故事的这些特征。但如果我们只注意到这些故事的语言，就会遗漏生命史的一个重点，并摒弃受访者为说出真相所做的一切努力。（Connell，1995：91）

对普卢默、斯泰西与康奈尔而言，关于生命史与经验的叙事记述应被视为文本，这些文本是透过再现的惯例，并在特定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但其生产方式总是尊重说故事的人为方面"说出真相所付出的努力"。

关于文本性的议题将转往下一个章节里探讨。

第7章 紧系文本

Tying in the Texts

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找探讨构成生活文化之日常生活实践的适当方法论与方法。关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他们如何表达活动以及那些活动对他们的意义，都是许多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然而，文化研究也对生产、流通与"文本"（书写、口语、广播、视觉、音乐等的文本）的消费感兴趣。作为一项跨学科的研究，文化研究能够将对于生活实践的理解纳编至消费的探讨以及文本的使用上。文化研究坚称"文本"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在经验观点的生产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正如我们所见，本章所援引的研究实例试图寻求文本及其使用者之间的关联性，并且在某些案例中，试图将文本放入它们的生产场景之中。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我们无法从详细的文本分析中有所收获。举例而言，有许多重要的研究已经从"旧的"文本中获得"新的"解读。这在后殖民研究（可参阅第1章）中发展得最为完善，在后殖民研究里，文本的论述被放进广泛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中。例如，在思考19世纪的西方文学"正典"与艺术生产如何与殖民主义的词汇（"东方"、"他者"等）相关联，以及它们是如何复制殖民主义时，如此的探讨具有极高的价值。这即是指在文本的广泛社会政治历史语境中，探究文本的意义。同样地，对于视觉文本（例如早期摄影）的检视，可以彰显出非常重要的排外与宰制模式，而这些模式在当时却被视为是"自然的"（Tagg，1988）。女性主义批评家也已将全新的视野带入性别与性欲特质在诸多大众媒体形式中的再现，例如电影、电视、广告与报纸。在之前的章节里，我们探讨了生命故事与自传如何作为让我们连接过去的

重要机制,但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根本无法于在世时诉说他们的故事。他们留给文化历史学者的,仅剩文本和在某个文化/权力母体中分析文本的路径(例如官方档案、报纸与其他官方报告、教育政策档案以及日记、书信与家庭照片)。

因此,我们该如何在文化研究中探讨文本?如果必须在文本分析中,找出某个从事文化研究的关键因素,那么我会再次提及斯图尔特·霍尔,他宣称分析之中必然存在着“某些真正重要的事”(something at stake),或者借用洪伊恩·安的词汇,这项分析工作应该涉及一种“文化政治”。因此,我们决定探讨某个文本,一定是有原因的,文本的选择取决于以下问题:针对这个文本所提出的问题为何?提出此问题的意义何在?该文本及其生产、消费之间的关系为何,以及应该采用哪些方法来检视这些关系?在第 1 章里,我们指出文本充斥在晚期现代社会里,并逐渐渗透至其中,这种情形不但需要理解文本与文本性(textuality)的全新方法,也需要理解“文本”及其“消费者”之间关系的新方法。这些挑战即是本章的主题。一开始,本章将探讨文化研究如何处理文本与文本分析;接着探讨企图将“文本”与生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连结在一起”(tie in)的研究。

文本及文本分析是人文学科的重心,但是从文化研究早期的发展阶段开始,它们处理文本的方式就已分道扬镳。举例而言,雷蒙德·威廉斯指出,构成“英语”文学正典的文本是经过精心筛选的,而且具有排他性(exclusive)。他认为文学文本时常被视为具有跨越时间与普世性的价值,而且也具有不容质疑的“质量”,它们其实是社会与政治形构下的产物,其被筛选并认可为“正典”的过程,也是在社会与政治形构下产生的。如此不仅将正典解构为是经过筛选的,而且也具有排他性,但是就方法论而言,这却质疑了“文本”的重要性及其作为关注焦点的地位。理查德·霍格特坚称,文学科系不应该仅关注于文学本身,更应该关注各种传播形式,例如,大众报纸、女性杂志以及大众文学,并应寻求分析这些传播形式的适当方法。支撑早期文化研究在文本路径方面的两个因素,就是视觉文本与大众流行文本。我们必须找到分析视觉与大众流行文本的方法,这些方法与这些文本的特殊性息息相关,而且不带有“正典”的价值判断。

符号学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提供“科学的”文本分析模式，这种模式避免了分析的印象主义形式产生。这里主要的目的在于指出潜藏在文本里且不断出现的叙事结构。文化研究援引了弗拉迪米尔·普洛普对于神话故事的分析研究，该分析指出：我们可在广泛文本中发现潜藏的根本结构(Propp, 1968)，这些文本既是“文学”，也是“通俗”的文本，例如戏剧、小说、电影、民间故事等。另外，巴特(Barthes, 1977)对于视觉与其他再现形式的符号学分析，则采用了神话与意识形态的概念，让学者得以分析许多极为普遍的再现形式，例如广告。透过这些理论的发展，文本本身可以被视为是具有意义的，而非仅是外在真实的反映。符号学所提出的问题在于，文本如何制造意义，而非寻求意义本身(这个意义构成了先前的分析)。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巴特及其后继者致力于探求这类文本中意识形态的运作，例如这些文本在被理所当然化了的社会阶层以及其他社会与文化生活面向上，意识形态的运作情形。因此，“家庭”和异性恋罗曼史、阴性特质以及阳刚特质一样，都被描绘成“自然的”生活单位。然而，对“普世”叙事结构的探求，却必须冒着丧失任何一种文本语境的危险。这个语境可能包含了历史、社会与政治语境，同时也包括生产模式与文本接收的语境。虽然文化研究采用了较为形式主义的文本分析模式，但是其中有一些行动企图探索符号的历史、社会与政治面向，以及存在于文本或文化记录中的文化镶嵌性。下文将特别强调分析方法，以窥探文化研究中文本分析的梗概。

决定性文本

意识形态典范认为，文本是由运作于主要结构中的强烈意识形态所形构，而这种意识形态主要是为了蒙蔽剥削体系中的劳工阶级，无论这个剥削体系是否被理解为资本主义与劳工剥削或是

父权与女性剥削。因此，文本分析主要是用来指出意识形态的讯息或文本的假定，而在某些研究中，阅听人与读者只被简单地假定为安于文本的意识形态架构中；在另一些研究里，其所探究的问题在于阅听人/读者是如何诠释或理解文本的。如此强烈的文本决定观点造就了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研究计划，尤其是那些致力于分析“大众”媒体文本与其他大众（流行）形式的研究。早期经由文化研究对文本分析所进行的实验性研究，坚称大众文本应该被审慎地看待，并应建立适当的分析模式。那些援引结构主义发展而成的分析架构，致力于找出文本中意义的组织原则，这些原则多被界定为意识形态的，举例而言，就是展示与赞颂资本主义价值、父权与白人宰制，并将这些价值视为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这些分析主张文本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运作的，而它们的“流行”或“受到大众欢迎”正是维系与复制资本主义与父权社会的最佳证明。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政治造就了这些分析研究，而且倾向于假定这些文本定位读者或使用者的方式，这些方式将进一步对读者或使用者造成影响（Williamson, 1978; Winship, 1987）。一开始，很少有研究会将焦点放在实际读者身上。在这些研究与其他分析之中，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连结产生了，亦即传统阴性特质与阳刚特质与文本的再现产生了连结，因此显示出某些价值与信仰体系是如何经由通俗文化而被视为理所当然。大众文本与广义社会之间的关系时常被简单地假定，而非透过对于实际读者与观者的理解来加以阐释。

显而易见的是，对于社会中大众文本的理解、它们被消费的方式以及人们从中可能获得的意义，对文化研究而言，都是适当的研究领域，但在设定一个用以检视此关系的研究计划时，则需要面对某些非常棘手的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

制码/译码模式：“符号学”模式与“社会”模式

在如今被认为是“首度尝试”建构出传播过程中的“意义生产”模式里，霍尔主张文本的解读过程必须被视为至少由两个相

互关联的状况所组成。首先,涉及一切实践与程序的意义生产过程,都与文化文本的集合有关。霍尔对与此相关的电视文本生产尤其感兴趣。第二种状况则是指观者对于文本的“解读”。第一种情况与特定意义的制码有关,制码过程是透过符码的使用和既有的惯例来进行,且适用于特定类型的编制程序;而第二种情况则假定阅听人是一个由社会建构而成的主动角色。霍尔是基于策略性的考虑而发展出这个模式的,因为此模式挑战了主流的传播模式,也挑战了既存的实证主义内容分析概念以及对于阅听人的理解方式。霍尔的模式坚称:意义是多层次/多元指涉的,因此能将符号学与结构主义这些崭新领域引入大众传播的研究中。同时,对霍尔而言,这个模式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这个广泛论辩中的一部分,并意味着从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过度武断,转变到格兰西霸权模式所主张的更为复杂的概念。然而,制码/译码模式主要与权力有关,尤其是与媒介产品的“优势意义”(preferred meanings)的制码有关。这些都是制度过程下的产物,它们在广泛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世界中运作,霍尔更主张它们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运作。

霍尔所提出的模式为开创性的《举国上下》研究(Morley, 1980)提供了理论架构,这项研究结合了建构性文本(Brunsdon and Morley, 1978)的优势解读以及读者团体对于他们的诠释所作出的决定。《举国上下》研究致力于将文本建构与诠释结合在一起,它赋予观者们诠释的地位(但总是受限于结构决定),并发展出各种方法,将阅听人设想成是由社会建构而成的,借此主张解码并非同构型的。采用此种阅听人是由社会建构而成的观点,莫利与布鲁丝顿先前已经完成一项对早期晚间杂志节目的文本分析,并指出该文本的意识形态领域与其所产生的主流或优势意义。该文本被来自 29 个职业团体的成员观看,这些团体的成员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莫利与布鲁丝顿并透过访谈的设计,彰显这些团体在译码的过程中所接受、协商或反对的优势意义。这项计划不但挑战了主流的阅听人概念,重新将阅听人建构成一个主动的、社会建构而成的角色,而且也挑战了那些将文本视为意义场域的理论,那些理论并未留给主动解读主体任何空间。

这项研究不仅引人注目地试图达成一种“双向进展”(double move),亦即社会建构而成的阅听人以及意识形态建构而成的文本,它对《举国上下》的理解,也从“纯粹的”新闻与时事,转变成一种对较为流行的“娱乐”杂志形式的解读。因此,它挑战了既存研究对于“硬性新闻”(hard news)的关注,并将文本性置于传播的动态过程中,同时更主张读者具有不同的解读立场。

莫利在该研究的后记中,明白指出《举国上下》研究的局限,这些限制分别是:观赏团体在他们“人为的”、非家庭式的工作场合中进行观赏;主体在不同的文本类型与不同的语境中,做出自相矛盾解读的可能性;以及特定的阅听人次团体对于特定文类的偏好。

在此,文本与读者的关系是早已决定好的而且是相当静态的,并假定读者的诠释以及解读立场与文本分析“相符”。这个模式同时也暗示着文本与读者或阅听人之间的区别,前者是一个可被孤立、可被分析的客体,而后者则是此一模式的另一个面向。这些问题极为有趣,而且在允许我们对这些理论或概念模式进行协商的同时,它们也提醒我们实证研究的价值。译码模式的缺点在于:

1. 文本的优势意义概念应用于“实际的”产品上:在此概念与其他文类(例如肥皂剧)产生关系时,我们该如何理解它?

2. 这个模式过于线性,因此类似于先前的传播模式(传送者、文本与接收者模式)。同时,此模式类似于运送内容的输送带,在这个输送带上,“优势意义”被送达至解码者身上。

3. 解码的过程意味着对于文本的“单一解读行动”(Morley, 1992: 121),而非促成认知、关注、相关性、选择与理解能力多种过程的混合。

霍尔坚称,倘若这个模式“与现在、未来有任何关联,那么它之所以成为一个模式,是因为它所暗示的意义。这个模式暗示着一种研究路径;它引发新问题的产生;它绘制出该研究领域。但它是一个必须被深耕、被发展以及被改变的模式”(Cruz and Lewis, 1994: 255)。霍尔将此制码/解码研究视为一个转折点或典范的转移。他认为此研究具有如同巴特所做研究的特性,该研究

“从符码的诠释开始,到文本性的概念,然后再到欲望及文本快感的概念”。霍尔视之为一个重要发展,因为它“将文化研究从传播研究带到文学理论、电影文本、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的起始之处”(ibid.:271)。

正如同此过程中制码部分的概念充满疑义,我们发现用以理解读者、观者或译码者的方式也不够充分。这被认为是社会学的局限,因为社会学强调意识形态透过阶级划分来建构阅听人,如此一来将忽略了其他不同的面向,例如性别、族裔与年龄。霍尔所提出的三种解读立场并未提供足够的变量,或是解读立场的次变项(sub-variations),这三种解读立场无法适用于不同的语境,也无法说明阅听人之所以想要观看某节目/文本的初衷。

莫利对于这些缺点的响应是,试图找出在文本及不同语境之下,探索阅听人选择与文类权限的方法,同时也试图寻找它们形塑或催生不同诠释与解读的方法。如此的研究方向带领他从解码的概念(他的《举国上下》阅听人研究主要即是以此一概念来进行的),迈向他在《家庭电视》(参见第3章)研究案中的观看语境,在《家庭电视》的研究里,他援引理查德·戴尔在试图诠释《受害者》时,充满洞见的主张:

> 我们无法从某人的阶级、种族、性别与性倾向等来推断她或他会如何解读某个文本(虽然这些因素的确指出她或他可近用的文化符码)。这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她或他如何思考、如何感受她/他的社会情境的问题。(Dyer, R. “Victim: Hermeneutic Project” in Film Form, vol. 1, no. 2. Autumn 1977, 引自 Morley, 1986: 43)

莫利更进一步解释萨特所言之“这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形塑了什么样的历史,以及该历史又是如何造就了我们”(Morley, 1985: 43)。于是,这个问题变成是对某一种方法的追寻,这个方法能够用来探索历史中复杂的社会主题,以及探究她/他占据其生活文化面向的方式,此种占据方式一方面无须透过与深层结构之间的机械性与决定性关系;一方面也不会掉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中。换句话说,此研究计划变成在寻求一种理解社会决定因素,与主动的人类主体之间辩证关系的方法,这里所指

的社会决定因素与主动人类主体都被绘制到文化领域之中。那些开始探讨与大众流行形式（尤其是电视）相关的语境与社会实践的研究，也开始将他们的焦点从“文本”移开，研究工作变得更为“阅听人导向”。这促使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关注于文本的消逝，而布鲁丝顿（Brundson, 1981）也坚称，研究应该探讨“社会读者与社会文本之间的互动”。

暗示性文本

社会读者与社会文本之间的紧张关系，即是文本研究路径的重心。此一关系表达出文化研究之所以得以横跨人文学科（以文本为主）与社会科学（以经验世界为主）的原因，也可被视为是目前关于文化研究的主要论辩。现在，在检视更进一步的研究实例之前，我希望能先回到文本分析的发展上。

霍尔指出，布鲁丝顿对于《举国上下》研究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因为布鲁丝顿开始从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来进行流行电视类型的分析（Cruz and Lewis, 1994：272）。制码/译码模式受到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的影响，同时，流行娱乐类型的文本分析也来自于文学与电影理论，尤其是来自于女性主义的观点，这些文本分析界定出文本所提供的读者/主体位置。过去三十年来，女性电影理论所造就的极具挑战性与重要性的研究，大部分都是以电影文本分析为主。女性电影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产品以及文化研究所关注的焦点，倘若能简略地探视电影文本分析所采取的不同文化路径与理论，那么将获益匪浅。

精神分析造就了诸多重要的女性主义电影研究，而这些研究主要是以文本分析为主。在此，重要的是这些批判分析用以坚称视觉特殊性的方法（参见 Rose, 2001，就视觉方法论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实用的文本）。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密切地关注视觉文本的惯例与特性。这些研究路径探讨了电影的精神结构，尤其是好莱坞电影。他们强调这些大众流行文本在性别划分的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虽然这些分析非常有助于彰显电影形式的“潜意识”，但是这些分析的主要倡导者却对“实际的观众”（actual audi-

ences)一点也不感兴趣。因此,鲜少有研究试图检视电影对不同观众所造成的实际影响。在杰姬·斯泰西关于女性主义电影分析的讨论里,她特别注意到两位作者如实地坦承对此类研究缺乏兴趣。玛丽·安·多恩提及:"我从未将那些坐在屏幕前、用力咀嚼爆米花的女性,与所谓的女性观众(female spectator)等同而语……因为女性观众仅是一个概念,而非一个人"(Doane, 1989: 142, 引自 Stacey, 1994: 23)。同样地,吉利安那·布鲁诺也指出:"我对于女性观众现象的经验分析不感兴趣……我无法忍受古老符号学对于任何一种经验'真理'概念的缺乏自信"(Bruno, 1989: 106, 引自 Stacey, 1994: 23)。

对于电影社会面向的忽视,以及忽略不同电影观众可能会产生的意义与诠释,实在教人感到意外,这可能也是导致文化研究学者开始反对电影理论的原因。然而,这些文本分析所引发的重要问题在于,此文本研究路径能界定出文本中的观众,正如多恩所言,观众是一个概念,而非一个真实的人。其他的女性主义学者则将他们关注的焦点转移到诸如电视的大众流行形式之上,但我们可以见到的是,即使她将焦点转向文本外的读者,她还是坚实地存在于文本之中。

举例而言,摩德勒斯基(Tania Modleski)对美国日间电视节目进行一项文本分析,此分析假定一种理想读者的存在,此种读者被视为是受到干扰的、无法专注并集中注意力地进行观看(Modleski, 1983)。根据摩德勒斯基(Modleski,1982)的说法,她对于肥皂剧结构更为细致的分析(例如肥皂剧的多元故事线索以及界定多元角色的可能性),将"理想(ideal)的观者/读者刻画为'理想的'母亲"。欧洲学者也是以强烈的女性角色,详细地检视肥皂剧(Dyer et al., 1981),但是关于文本与读者快感较为复杂的构想,却是来自于布鲁丝顿的研究,布鲁丝顿认为,肥皂剧所提供的快感需要特定的"女性"技巧与能力才能获得,例如"解读"情绪上的焦虑,以及理解家庭关系的复杂性,换句话说,这些都必须要在文本(例如对于家庭与日常生活的强调)之中才具有正当性。

在她较为近期关于肥皂剧的女性主义分析研究里,布鲁丝顿指出:精神分析理论的幻想、快感与欲望是如何被例行性地套用到"非写实"(non-realist)文本的研究当中,例如奇幻类型、通俗剧

等非写实文本，但是对于英国“写实”产品的分析，则被限制在写实主义的分析模式上（Brunsdon，2000：66）。这也可以应用到关于这些形式的观者或读者是如何被概念化的研究当中。因此，电影的观赏者被赋予幻想、欲望与快感，而电视的观赏者则被假定与电视这个文本之间，保持着一种理性的关系，尤其是一种比较社会性的关系，无论是就她们身为女性的角色而言，或是就她们使用文本、故事线、剧中角色以理解她们的世界、来与他人进行交谈的方式而言，都是如此。布鲁丝顿坚称：“倘若幻想的观点让我们得以理解读者/观者是如何将他们的感情投入到虚构的叙事里……那么，在让这个情感所投入的类型/模式变得独特时，存在着一种贫瘠的直译主义（literalism）（ibid.：67）。”布鲁丝顿紧接着继续讨论有所成就或成功女性的幻想之重要性，而这种成功女性的幻想正是英国肥皂剧所能提供的。然而，我们可以透过布鲁丝顿的论点，拓展我们对于大众流行形式的观者/读者/使用者之间关系的了解。

在早期文化研究学者所采纳的文本分析形式里，读者/观者不断进出文本，因此他们可被视为是文化研究发展里相当重要的跨学科“时刻”。因此，虽然文本被理解为提供“优势的”解读观者/诠释立场，但是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是关于实际读者如何并以什么方式占据那些立场。许多研究都将这些问题放入流行的文本类型里，例如霍布森针对当时流行的英国肥皂剧《十字路口》提出这些问题，洪宜安、卡茨与利布斯则针对《豪门恩怨》作出探讨，而白金汉也针对《东区居民》作此类研究（Hobson，1982；Ang，1995；Liebes and Katz，1993；Buckingham，1987）。在本章的第二部分里，我将更详细地探讨近年来那些以不同方法来“紧系文本”（tying in the text）的研究。这些研究方法与实践代表了“阅听人”研究的发展。正如我们即将从这些例子里看到的，这些研究再现了不同的问题与疑义，以及将“阅听人”概念化的不同方法，尤其是在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领域上。这些研究也反映出国内与国际媒体景观的重大改变。

罗德威:解读罗曼史

在贾尼丝·罗德威关于《解读罗曼史》(*Reading the Romance*, 1987)一书的英国版简介中,她提及在她开始着手进行美国女性罗曼史读者的研究之前,她根本对英国文化研究毫无所悉。她的研究是由一股亟欲研究罗曼史这个大众流行类型消费的欲望所引发[此书在美国由哈勒根出版社出版、在英国由米尔斯与布恩出版社所出版]。她的学科——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拒绝审慎看待这些文本、不去寻求分析这些文本的适当方式,也不愿研究"真实"读者对这些文本所作的诠释,她在简介中也针对此现象作出了响应。

> 为了要了解……人们所作所为的背后原因,例如他们阅读罗曼史的原因,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他们的行为结构,以及他们对自己的行动所作的诠释。一个好的罗曼史文化研究,不仅应该明确说明女性如何理解小说本身,也应该阐明她们如何看待自己当初拿起这本书的行为。(Radway, 1984: 8)

除了这个目标外,罗德威更坚称,了解罗曼史出版与营销的过程与策略是很重要的。在她关于大众罗曼史出版与营销之文化产业的研究语境里,她不但分析了罗曼史这个类型,而且也探讨了这些小说如何被一群定义为罗曼史"迷"的团体于日常生活之中使用。

正如我们于上文所指,布鲁丝顿与莫利透过制码/译码模式,完成了对于《举国上下》电视节目的符号学分析,并界定出可用以测量阅听人解读过程的偏好意义。文本与阅听人/读者之间的桥梁,已经由文本的学术或"专业"解读,以及由读者所产生的相异性解读所搭建起来。罗德威的策略与此截然不同,在她的策略里,她首先透过问卷、团体讨论以及个别的访谈,在研究中指出哪些罗曼史是"好的",哪些又是"坏的"。透过这两个文本类目,她完成了每个团体的文本结构分析,并试图界定出这些文本中所隐含的叙事功能次序。此外,因为认知到纯粹的结构分析所具有的

弱点,她更界定出女性本身所察觉到的、出现在这些文本中的角色种类。罗德威之所以从事这项分析,主要目的是为了要更深入地探讨阅读罗曼史文学所获得的快感。罗德威仔细倾听女性们诉说她们的好恶,并让这些声音成为她的分析架构。但是,相对于这些女性所能提供的表述,她希望能获得更有力的解释。"因此,我透过这个架构来探寻此类型对其读者而言所具有的精神重要性,并进一步指出那些支持与强化有意识动机的潜意识需求,这些稍早前被检视的有意识动机,驱使他们去寻找浪漫的幻想"(Radway, 1984: 120)。

此处的重点是,她的分析主要来自于她的访谈资料,而非来自于学术或理论观点。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罗德威试图在其受访者的解读,以及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中所发展出来的一种理论架构之间,创造出一种对话。罗德威让她的受访者决定哪些文本应被纳入此研究当中,同时她也采纳她们自己对于这些文本本身的分析与诠释。她强调"实际解读行动"的重要性,并借此主张此类大众流行类型的消费,不仅在这些文本中处处产生功用,在文本之外也有其功能。对于她研究中的女性而言,这是一种反抗的形式,反抗传统异性恋家庭生活带来的义务与限制。她的研究混合了多种方法:文本分析、对于出版产业的研究、问卷、团体讨论与访谈,同时也包含了如何与该团体中的主要受访者(告知者)建立友谊。下一个我所要讨论的例子,采用更为密集的团体讨论,进行关于"谈论电视"(television talk)的论述分析。

白金汉:孩童谈及电视

白金汉对于孩童与电视的持续关怀与研究,主要是源自于他对媒体教育与媒体识读的兴趣,他尤其对批评家与教育者如何贬抑孩童的媒体识读能力深感兴趣。他指出,这导致人们开始独尊教育,并引发过度保护的教养策略。因此多年来,他一直试图寻找阐释青少年如何主动地了解电视的方法,以及他们如何将复杂的范畴与标准运用在他们的解读里。白金汉的研究策略是创造出让孩童们愿意谈论电视的情境。他并非将"谈论电视"的社会

行为与过程视为是“产品”导向的,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建构认同与主体位置的场域。电视的使用与诠释并非仅仅攸关于孩童占据不同主体位置的方式而已。

> 社会地位与生物范畴很显然是由物质因素所决定的,但是他们的意义却是在谈话的过程中,被主动建构与协商、定义与重新定义而成的。男性或女性、劳动阶级或中产阶级、黑人或白人、成人或小孩,这些意义并非既定的,也不是预先决定好的。(Buckingham, 1993: 268)

所以,对白金汉而言,“谈论电视的不同方法,因而并非仅是反映出孩童的既定社会关系与认同;相反地,至少有一部分是透过谈论电视的过程,才使那些认同与关系本身得以被建构、被定义出来”(ibid.: 269)。白金汉想要探讨电视论述是如何同时形塑与主动参与文本中所生产的意义。在1993年所出版的一项研究里,白金汉与同事对五个七岁至十二岁的孩童进行访谈,同时也进行了一些较为重要的焦点活动。这些访谈与活动主要是在这些孩童的学校里完成,而白金汉也适当地反映出这个语境的重要性以及研究者在与这些孩童之间的关系里所扮演的角色。然而,在这项研究的早期阶段中,研究者只对孩童们说:“我们想知道你们对于电视的看法”,然后接着问:“你们喜欢电视什么?”如此没有焦点的路径让研究者不仅可以界定出孩童们所观看的电视节目种类,还可以借着讨论去了解孩童们如何“栖居于”(inhabit)这些电视节目。正如上文所指,白金汉主要感兴趣于谈论电视对于孩童认同与主体位置的发展的重要性。此种数据提供给白金汉线索去了解孩童所栖居的文本世界,并让他得以了解他们的文本策略,从这些文本策略里产生了一些重要的范畴,例如类型、形态、阅听人、叙事、角色。白金汉及其同事探索了这些策略与范畴,以期能彰显孩童们主动参与电视观看的方法。

罗德威与白金汉提供了一些试图概念化大众流行文本与使用者或读者之间关系的最佳例证,他们援引了各种实证方法,这些方法提供了各种不同分析架构的丰富数据。罗德威所采取的方法是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与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而白金汉则是采取论述分析与认同理论。以下所列举的三个例子可称之为“媒

体民族志”(media ethnographies),在这些研究里,研究者采取了较为偏向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策略,并对他们的受访者进行长期的研究。

吉莱斯皮:电视、族裔与文化变迁

玛丽·吉莱斯皮关于“伦敦旁遮普青少年”(Young Punjabi Londerners)的民族志研究,详细探讨了电视作为这个团体中认同形构与转换的主要方法。她的主要目的在于,借由在地以及家庭的观点来检视文化的“跨国化”(transnationalisation)此一广泛问题(Gillespie, 1995)。吉莱斯皮一开始先对伦敦绍索尔(Southall)地区的青少年进行普遍的调查,并从此调查中界定出目标团体中的特定电视使用者,但是就整体而言,她还是借由倾听青少年的“言谈”,让特定的、他们所偏好的电视类型得以产生。这些类型主要是出自该团体成员在谈及“你是否曾经看过……”此一般性的社会会话模式。尼尔对“类型”所下的定义非常实用而贴切:“类型并非被视为是编纂文本的形式,而是流通于产业、文本与主体之间的偏好、期待与对话的体系”(Neal, 1981: 19)。三个被视为特别值得思考与最引人兴趣的类型,分别是电视新闻、肥皂剧与广告。吉莱斯皮对不同类型节目看待青少年的方式感到兴趣,“新闻将青少年视为公民,肥皂剧将他们视为社会行动者,而广告则将他们当成消费者”(Gillespie, 1995: 26)。如此对于文本类型范畴的广泛关注,让她得以探索青少年在谈论电视时,是如何处于不同的解读立场,也让她得以探讨这些文本所引发的主题、话题与议题,是如何透过他们的个人与集体认同而获得协商。与白金汉相同的是,吉莱斯皮也深信,对于“谈论电视”的关注可被理解为“娱乐接收”(recreative reception)(这个词汇源自于 Cheesman, 1994)的场域:

> 谈论电视并非仅是构成同侪团体之普遍认同的一种社会互动形式,它提供并改善英国旁遮普族青少年一些共享的文化资源,以使他们在与其同侪、父母与其他长辈,以及与广大世界(例如英国或旁遮普散居族群)中的“重要他者”进行

协商时,得以利用这些资源来进行比较与批判。谈论电视是一个提供“新”“旧”认同竞争与论辩的主要论坛,也是形塑万国主义思想的主要场域(Gillespie, 1995: 24)。

吉莱斯皮倾听一群流离至伦敦的印第安青少年,诉说电视接收是如何在他们的日常言谈中造成主体位置的转变。她的研究中也有一个章节特别着重于观看“神圣文本”(sacred text),并探讨这些文本是如何被家庭所消费,同时将其视为传统世代之间转译的重要机制。吉莱斯皮坚称,她的研究路径需要一个完整且长期的民族志研究。

曼凯卡:影视文化、观看政治

珀尼马·曼凯卡也对大众流行形式的诠释感兴趣,这里所谓的大众流行形式是指流行娱乐电视,尤其是在家庭生活语境下的流行娱乐电视。她在印度新德里(New Delhi)进行民族志研究,并分析印度国家广播组织杜达山电视台的流行娱乐形式,是如何致力于透过“发展”与“消费”等隐喻来建构一种“崭新的”国家认同。她的论文主张,印度女性是此认同建构的中心,而她针对那些观看电视的家庭所进行的民族志研究,则关注于这些再现是如何在阶级与性别认同的形构中相互协商:“我变得愈来愈想去理解,杜达山电视节目的叙事,和观众为自己所编织的生活故事之间的关系,也想要了解大众流行文化,和观众对自己与对印度男性、女性的观感之间的关系(Mankekar, 1999: 8)。

她的研究路径致力于将研究主题放在它们的社会文化语境里,而她的分析则“强调意义是不稳定的这个事实:意义时常是观众之间竞争下的结果,而这些观众是生活在特定论述形构下的历史性主体,而非由单一文本所定位”(ibid.: 8)。

“话语形构”(discursive formation)概念的使用,以及此概念所提及的意义不稳定性,指出了曼凯卡对于文本性及诠释的路径。她期望能探讨当印度女性试图(重新)建构国家与国家认同的概念时,国家广播组织是如何动员她们的各种不同概念。根据印度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对于消费文化与“中产阶级生活风格”的鼓

吹,在决定这些新政策是否能成功推行上,变得益发重要。因此,国家广播频道开始播放一些激发人心的幻想影集,尤其是关注于女性生活议题的影集。虽然曼凯卡对文本本身感兴趣,但她还是将它们视为源自于、流通于特定话语策略形构下的产物。当然,这些相当流行的影集的阅听人也同样全然接受这些论述。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曼凯卡的"文本"并非只与读者/观众有关,更与广泛的性别、阶级与国族之社会文化论述有关。她的研究问及:"也就是说,处于国家主义论述之中心的女性,究竟拥有什么样的主体地位?"(ibid.:16)。当曼凯卡试图"强调霸权论述的不稳定本质",并关注于观众对于电视叙事的协商情况时,她使用了格兰西的霸权概念(ibid.:19)。

她主张,一个大众流行文本就如同一出播放已久的影集,能够"透过记忆与遗忘的行动,而重新安排集体记忆的次序"。她的研究计划试图指出"可能被我们错误归类为'内心深处'的主体性认同领域,事实上是如何由大众媒体,诸如电视所建构"(ibid.:18)。

曼凯卡的研究特别着重在文本上,她不仅指出文本扮演着道德说教的角色[例如:巴西的电视小说(televela)在医疗与教育上所扮演的角色],更指出在(重新)建构国家的叙事里,出现了认同的新形式以及主体性、国家概念的新意义。曼凯卡坚称,文本与其消费语境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她所选择的方法应该让她得以探索这个语境。她对于民族志的选择让她可以在研究里与不同家庭成员一同观看电视,也让她得以进行个别的访谈。她坚称:"对于电视的分析不能仅仅关注于屏幕上的文本,而必须延伸至电视所占据的日常生活空间与观众的实践上"(ibid.:20)。

曼凯卡透过她的民族志研究,将女性观众建构为国族主体与性别主体,她的目标在于"将女性的叙事与实践,再现为电视论述召唤下的表现(enactments)(ibid.:23)"。因此,她的目的在于超越观众所理解的意义与诠释,以探讨文本是如何被编织进日常生活之中与日常生活之外。但她是如何将文本整合进日常生活之中的?虽然她把观众的诠释与分析视为研究的核心,但她仍将特定的电视叙事视为话语的一个节点,并且在电视叙事试图呈现统一的性别、阶级与国族之主体位置(尤其是女性观众处于此种主

体位置)时,将它们视为断裂(discontinuities)的再现。所以,文本本身并非固定而稳定的,而是可以被理解成相互交迭与渗透的广泛的话语。曼凯卡分析了许多由杜达山所制作的电视节目,并特别强调那些她所谓的"以女性为主的"电视节目,试图在不同的文本叙事里寻找共通的主题。因此,所有这些叙事都与"家庭"有关,而那些诸如:性别与阶级、身为女儿的未婚女性、身为媳妇的已婚女性、教育与女性的"抬头"等主题,也都一再地获得曼凯卡及其观众的认同。所以那些处理印度女性同时身为现代与传统女性的主题,时常在叙事里试图将处于高度矛盾的主体位置加以统一,而这些主体位置是身处劳工阶级的印度女性所占据的位置(ibid.:104-162)。曼凯卡的研究路径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她的文本分析充斥着其民族志研究中进行观察或对话的"景象"或"时刻",而这些"景象"或"时刻"与分析中的话语相互呼应。因此,她坚称我们在定位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的方法上,必须将文本与观众思考成是一体的,借此避免落入将文本与观众予以二分的一般分析模式里。除了强调文本,曼凯卡也访谈了某一出流行影集的作者与导演。她坚称,这并非是为了赋予制作人权威感,而是为她的研究提供另一种层次的题材。她明确指出构成他们对该电视影集制作观点的研究路径话语(该观点也包含了他们制作电视影集的过程),并将此话语视为"论述节点"中的一个重要元素,而文本与观看实践即是从这些话语里产生的。因此,文本与民族志是交织在影视文化、观看政治里,而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则持续努力,尝试满足布鲁丝顿对于社会生产文本与阅听的研究要求。

塔夫特:《与垃圾女王共同生活》

在一项同样复杂与多层次的研究里,托马斯·塔夫特主张,媒体民族志作为一种方法,可以用来掌握媒体无所不在的本质。他曾针对巴西电视小说做研究,探讨其在巴西三个不同区域的历史、生产与接收,此研究令人印象深刻的原因在于,他使用了许多方法,包括量化调查法、质化访谈与参与观察法,也包括摄影,借

由这些方法来检视那引人注目的、独特的大众流行文化形式——电视小说。塔夫特提供读者特定的拉丁美洲/巴西语境之相关信息,并援引马丁-巴贝罗的观点,指出:

> 无论通俗剧是以探戈、肥皂剧、墨西哥电影或是廉价的犯罪故事等形式出现,它总是能开发并激起一种集合文化想象力的浓厚色彩。而且若非通过此种文化想象,根本无法获得历史记忆或对于未来的梦想投射。(Martin-Barbero,1993)

在坚称文化研究必须根植于在地性时,塔夫特的研究工作认知到诸如甘力尼此类的学者,在谈及"存在于拉丁美洲的另一个现代性"时,他们所意指的意义为何。塔夫特的结论是,身为一个丹麦的研究者,重要的是他必须探询那些由"西方"阅听人与接收研究所提出的假定。举例而言,艾琳·潘纳奇欧尼就关注于巴西电视的公共化本质。潘纳奇欧尼指出,电视存在于一个"声音空间里,此空间没有内外之别,一方面没有私密与沉静的私领域之别,另一方面也没有凝聚与沟通的集体公领域之别(Penacchioni,1984:340)。

潘纳奇欧尼论及她对巴西东北部福塔力沙(Fortaleza)的观察,而昂迪纳·法什尔·利尔关于东南部阿雷格港(Porto Alegre)的研究也指出,在这个社会中电视的独特地位(Leal, 1990)。她指出电视机的公开展示对于劳工阶级家庭的重要性。因此,电视机总是在街道上随处可见,而且总是被一些工艺品给美化,例如刺绣的服饰、花瓶等,她将这些工艺品描述为电视的周边物品,它们的展示对路过的人而言,意味着现代性、都市理性以及对未来的期许。

塔夫特的研究主要是在巴西的不同区域里进行,同时他也指出在这些邻近区域里,公领域与私领域之间的界线已逐渐模糊,以及电视是如何在这个他所描述的意义之"混杂领域"(hybrid sphere)里被构连出来。伴随着日常生活中各种不同时间、空间的组织,这些划分彰显出西方研究所提出的假定,并提醒我们此种理论、方法论架构的独特性。

塔夫特在三个不同的邻近区域里所进行的"微观社会学"研究,关注于观看、时间与空间的组织,以及八卦网络(以电视小说

为主的八卦网络）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他指出，电视小说具有建构与构连出他所谓的“文化公民权”（cultural citizenship）的潜力。在他的受访者所展现的恶劣社会经济条件下，以受访者的社会与文化实践为例，他们的宗教信仰、志向、梦想与对未来的希望，以及塔夫特的分析都指出：电视小说是这些私密与公领域之间进行协商的重心。

这些媒体民族志的研究实例，已经对通俗文化形式（例如电视与电影）根深蒂固的本质有所响应，并试图寻找探索其中动态过程与实践的方法。曼凯卡、吉莱斯皮与塔夫特都拒绝将文本与它的完整语境相分离，即使就分析的目的而言也是如此，他们也都坚称，如此错误的举动将会丧失媒体使用的实际复杂性。除此之外，罗德威、曼凯卡与塔夫特都针对大众流行形式的生产提出批判性的观点，而这些观点都是他们研究读者/观众的重心，借由此种批判性观点，他们都呈现出一个多层次、复杂的文化过程的分析。

就不同的面向而言，这些研究都关注于将媒体解读与使用放进复杂的决定网络里，不仅是文本及其消费语境，更关注于那些深层的结构决定要素，例如阶级、性别以及较无关紧要的种族与族裔。这些研究也关注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之间的交互作用，并在日常生活的私密、例行实践里实现。此外，所有研究者都仔细反思他们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研究者在她或他的研究里所占据的位置，而曼凯卡与塔夫特也从不同的观点出发，在“知识场域”（knowledge sites）的定义以及西方思想架构的假设下，提出关于西方宰制的问题。因此，尽管他们的研究规模相当狭隘，这些研究还是透过了不同的方式，提出在实践与主体性的社会建构世界中，关于结构与能动性的问题，其中有许多问题都仔细思考研究本身的机构语境。支持这些研究问题与疑义的，即是那些关于能动性与结构的观点。这些研究显示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是如何被吸纳至日常生活、俗世与平凡生活之中。这些研究也认识到微观与宏观之间、文本及其生产与消费语境之间的错误区分，并指出论述是如何流入认同、自我、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国族、在地与全球的建构之中，又是如何源自于这些建构。因此，界线是可穿透、不稳定以及不稳固的（uneasy），我们需要一种新方法去思考

与看待"阅听人"、使用者、文本以及围绕此新方法的复杂关系与相关论述,这些关系与论述也是此新方法的一部分。

特寇、詹金斯与《大哥大》

或许上文所举的例子比较接近于人类学的"人与文化"模式。虽然这三个民族志研究者都意识到文化的建构性角色,不受空间与地点限制,但是他们的研究都关注在一个受限的社群上,或者以塔夫特的例子而言,主要是关注在他们实证研究的那些社群上。我希望透过简短地检视其他种类的社群来为本章作出总结,这些社群先前已于第 3 章中提及:迷社群。随着逐渐普遍的新传播科技与娱乐科技的出现,现在已产生了新的文本(和互文)形式与新的"阅听人"种类,在此姑且以"阅听人"这个词汇来描述因特网的使用者或是迷次文化的主动成员。阅听人这个词汇现在看来,似乎还未能完全掌握各种与特定大众流行文化形式相关的复杂活动。

谢里·特寇已经对过去十年的计算机使用者进行研究,她最近期的研究则是关注于因特网的使用者。在此,使用者不仅与"虚拟文本"进行互动,更与其他不知名的个人进行互动。身为精神分析师,她所感兴趣的是关于认同的问题,以及"机器"这个隐喻是如何逐渐被用来描述人类的活动,尤其是她所主张的,与计算机之间的互动。她探讨了人类如何与机器互动,以及网站如何(例如,聊天室与多人使用的网域)提供多元认同展演的可能性。显然,此种实践的发展与潜力能够跨越各种界线(时间与空间、地理疆界),更能跨越我们所假定的、介于"文本"与"读者"之间的界线。此外,对特寇而言,"进入虚拟世界的全新实践,引发了关于我们的社群与我们的自我等根本问题的产生"(Turkle, 1995: 232)。她指出,她的受访者在他们使用因特网时所获得的快感,既不是一种"逃脱"的快感,也不是一种"反抗"的快感,而是一种涉及建构"另类真实"(alternative reality)的快感。因此,菲斯克如此描述大众流行形式之迷的活动(Fiske, 1992: 35):

- 符号学的生产:意义的生产(本质上属于内在性的意义)。

- 话语的生产:迷们在地社群里的言谈。
- 文本的生产:电子杂志、网站以及较为炫耀性的制品。

亨利·詹金斯在关于星鉴迷(Trekkies)的研究中,将迷的解读描述为一种社会过程,透过此社会过程,个人的诠释得以成形,并且透过与其他读者的持续讨论而获得强化(Jenkins, 1992: 45)。为了要支持此论点,他援引迷作家琼·劳拉所言:

> 星鉴迷……是朋友、是书信、是工艺品、是杂志迷、是各种琐事、是服装、是艺术品、是民谣、是徽章、是录像带、是习俗——是每个受到某电视节目所启发的人,所共同拥有的某样东西,这东西的成长速度超越它在电视与电影中的化身,并成为世界文化中活生生的一部分(ibid.: 45)。

正如詹金斯所言,许多传统所假定的界线,诸如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线,以及商品与创意产品之间的界线都已瓦解。"在此,迷(fandom)变成一种参与文化,此种文化将媒体消费的经验转换成新文本的生产,事实上是转换成一种新文化、新社群的生产"(ibid.: 46)。

特寇与詹金斯的研究指出,阅听人、文本、日常生活等问题是如何随着科技与其他媒体机制而获得转换。虽然早期的阅听人研究致力于检视读者对于文本的理解,但是现在的研究者却必须探讨阅听人如何涉入文本之中。虽然文本本身长久以来都被视为是互文性的,但是主动并参与其中的"阅听人"概念,现在才被视为在大众流行形式的生产中,提供了另一种文本。一个独特的当代研究范例,即是近年来的一出电视"实境"节目——《大哥大》,这个节目源自于荷兰,却在英国、欧洲与美国以不同的语言播出。《大哥大》是一个"多元平台"(multi-platform)下的产物。它是一个复合性电视类型,结合了游戏性节目与"记录片"(fly-on-the-wall)等纪实性节目,在此一节目里,许多人被限制在某个房子中,同时借由网站的连结让观众票选哪个成员应该离开。最后留下的人也就是最受欢迎者,可以获得高额的奖金。在英国,这个节目花了一些时间才建立起收视观众,但透过八卦小报与其他媒体的曝光,这个节目却变得充满话题性。即使你没有看过《大哥大》,你在2000年的夏天一定知道它的存在。蒂克纳尔与拉古拉

姆指出,“有许多非常容易找到的网站可以看到《大哥大》,例如在线日志、网络摄影机、官方网站、聊天网站以及其他较为传统的媒体”(Ticknell and Raghuram, 2001)。如此的现象混淆了任何试图界定、找出或说出谁是此产品的阅听人之企图。与此“文本”相关的活动与行为都是多元的,而且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持续发生。至少,这些发展让我们重新思考阅听人与媒体之间的关系。

在文化研究里,这项研究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将文本孤立于语境之外、或是离开文本的语境来处理文本。“文本”与“社会”之间的错误划分当然是学科划分下的结果,但是跨学科的研究路径,例如文化研究,有利于在生产意义的社会与文化过程中逾越此界线。正如理查德·约翰逊所言:文化研究可以跳脱这之间的划分。然而,如何达成此目标肯定也是相当重要的议题。

仔细探讨某些例子将使我们辨识出,从我们所谓的“意识形态”典范转换至“话语”典范的过程。这意味着文化研究中,“文本”的研究路径永远是文本广泛语境中的一部分。而且重要的是,对于那些文本的分析与理解,在关于读者/阅听人使用的研究中,是以读者/主体作为开始而且也是透过读者/主体来实行;无论是关于广泛的社会历史语境,或是关于生产那些文本的机构与组织,都是如此。话语的研究路径意指:对叙事或文化类目的理解,而文本即是透过这些叙事而建构的,同时读者/使用者也是因为叙事而得以建构出他们自己的诠释以及对于文本的解读。本章所探讨的研究都产生了极为丰富的、引人兴趣的数据/题材,而下一章节将转向分析的问题上。

第8章 分析的策略与谋略

Strategies and Tactics in Analysis

现在有许多的研究者开始论及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所占据的位置,尤其是如同我们所见的,在各种不同种类的“田野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关于研究者如何组织、分析他们的数据与研究题材,却鲜少被讨论。这相当奇怪,因为这部分是最具创造性的过程,在这些过程里,研究者透过他们的诠释与分析,将他们自己独特的观点放入研究中。但仍有一些值得注意、颇受欢迎的例外出现,例如乔克·赫米斯与鲍勃·康奈尔在他们的研究著作《解读女性杂志与阳刚特质》中,即囊括了他们对于分析方法的讨论;温迪·霍尔韦的论文《主体性与心理学方法》也反思了她自己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本章将进一步讨论这些作者。

我们在此将关注于研究题材的分析与诠释。简言之,要分析某事,例如分析访谈数据、文献或视觉文本,意味着要将它分开来,而诠释是指透过理论来反思数据并提供解释观点的过程。然而,这并非仅是发生在一个“举动”里,而是一个犹如旅程的过程,并在最后获得不同的结论。民族志或质性的研究是一个不断进行诠释的过程。在此我们所关注的研究阶段是一般所描述的分析阶段,资料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诠释与塑造(当然,前提是这些数据的质量要好),而不断审视你的数据也是很重要的。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当你面对你的数据时,你往往不知该从何开始,这也是许多学生常有的经验。

我该从研究题材中提出什么问题

肯·普卢默将生命史归类为“数据”或“研究主题”（参见第6章），这可作为本文的起点。在此，这个区分最好被理解为“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受访者所说的实质内容，必须与他们用来形构自己观点的方法相比较。这意味着你可以用非常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你的研究题材。

首先，举例而言，你的受访者已经提供对于某些事件的特定观点、关于日常生活的新信息，或是挑战主流观点之思考方法。从某个特定的观点来了解一个熟悉的事件，或是如同我们在瑞葛蓓塔·曼祖的例子中所看到的，某人的证词是为了要为许多人发声。这对于开启新的研究领域，并形构出不同的、常是受压制事件的观点而言，是非常重要而关键的，而且需要加以“记录”下来。

其次，你感兴趣的并非仅是人们说什么，也关心他们怎么说。你想要问及受访者的主体性与主观立场、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以及为了要阐明自己的经验，他们可以使用的诠释架构或文化项目。然而，虽然我是个别独立地分析这些议题，但我们还是可能在研究题材里同时处理这些面向，并借此形构出最为密集的访谈，这些访谈构成了我们的研究实践。

就我的经验而言，开放性的对话访谈通常能够鼓励受访者说出生命故事，即便不是非常完整的生命故事。此外，我们已经看到许多人主张应该采取主动的访谈路径，将访谈对象视为具有创造性与生产力的研究部分。根据托马斯与兹纳涅基（Thomas and Znaniecki，1958）的观点，生命故事不仅对社会学而言非常实用，它们更是“完美的社会学题材”。借着采取这些访谈策略，受访者被鼓励要表现自我。让我们再次援引托马斯与兹纳涅基所言：这些访谈策略可以鼓励受访者吐露一些他们变成“社会存有”的过程及其条件。这正是文化研究所关注的焦点，因此，让我们探究一些分析题材的方法，这些方法构成了此一多层次的研究路径。

哈默斯里与阿特金森（Hammersley and Atkinson，1993）界定出数据处理的主要阶段：概念的产生与类型（typologies）的发展。这

对于提供实用的建议而言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根据哈默斯里与阿特金森的观点,我们的目的在于打破文本(逐字稿),使其成为不同的片段,然后再重新将它们组合起来,并形成不同的主题。这是处理"质性数据"的一个相当制式化的路径,而且我在关于录放机使用的研究中,也是采用这个研究路径,下文我将从中援引我的第一个例子。

我如何组织我的逐字稿

我曾经完成两个录音访谈并逐字记录访谈内容,我也与我的指导教授一同聆听这些录音带,在这期间我们将问题界定出来,并讨论该如何修正我的访谈路径。当开始进行我的"样本"访谈时,首先我试着从我的逐字稿中筛选出一些段落,但我很快发现,这么做的限制实在太多了。我一边进行誊写,一边加以编辑,在这初步阶段里,我还不清楚这些资料能透露什么、不能透露什么。因此,我决定逐字地记下我的访谈内容,直接将它们输入我的计算机里,并使用一种由脚来控制且有耳机设备的声音重读机器。幸运的是,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录音带,而且录音带的使用真的是一项非常容易学会且非常实用的技巧。最后,我总共有长度接近六十小时的录音带,但是在进行誊写时,我自己定下一个黄金法则。这对于该研究的发展与未来的访谈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誊稿的工作也许相当繁琐,却有如下好处:在进行誊写时,我非常仔细地聆听访谈内容,并且非常专注在该研究题材上。这时常极具生产力与启发性,因为在此过程中我对于受访者与自己常会有新的发现。举例而言,正如我们从迪佛特的著作中所看到的,回答问题时的停顿与尴尬气氛时常是意义深远的。

我将这个处理题材的过程谨记在心。我发现每一次访谈都还停留在"我的脑海里",声音、访谈的场景、每个受访者如何表现他们自己、访谈中的干扰(电话响或小孩的打扰),以及如何处理这些干扰等,都在我聆听录音带时又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眼前。因此,在我脑海里,我开始对整个访谈有全面的认识,并且以它们各自不同的面向来检视整个访谈。

在誊逐字稿的过程中，我开始做出连结，以便为观点概念的发展提出洞见，同时也做出可暗示相关理论主题的连结。就这方法而言，分析与诠释变成了研究过程的一部分。这时我可以运用我的想象力去敏锐地探查题材，并在我的分析中进行试验。这为我的“测试”与分析架构发展之间提供了重要的过程。倘若我的观点无法奏效，我就尝试其他想法。

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论及组织研究题材的重要性，但正是在这个阶段里，一种文件归档的系统才会于焉而生。当研究持续发展，而搜集题材的阶段尚未到来之前，关键概念、主题、议题开始慢慢成形。重要的是，这个成形的过程被赋予了“物质性的”存在。最好且最可靠的方法，则是从一个好的归档与检索系统开始着手。这将为此研究提供一个有助于进一步的阅读与研究的结构。进一步阅读更多文献、累积更多影印资料、写下更多笔记的同时，这些数据在必要时都应该归档并交互参照。

我将档案的存在视为是可靠的。它们之所以可靠，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失去方向或丧失对整个研究的了解。许多研究者都试着将整个研究记在他们的脑袋里，他们害怕去书写或形塑研究，他们让自己变得极度没有信心与魄力，这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组织与建立一个文件归档系统是非常重要的扎根实践，而且，档案与文件归档系统可以为你提供反思活动的基础，反思活动同时也极具生产力，但却不具“挑战性”。把档案分类、重新检视档案与增加档案等过程，是进行反思的时间，这个反思过程时常能够再次确认某一研究的地位（Plummer，2001：151）。

除非你认为这个任务听起来太过一般而无须谨慎对待，否则你都不该忽视它的重要性，以下是 C·赖特·米尔斯关于如何重组文件归档系统的观点：

> 当你重新整理一个文件归档系统时，你时常会发现，你开始失去你的想象力。显然地，当你试图结合各种不同概念以及关注不同主题时，这种现象就会发生。这是一种结合的逻辑，而“机会”有时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你试着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将你的智识资源和新主题整合起来，正如文件中的例证一样。（C Wright Mills，1959：221）

这两个活动——誊稿与归档——是非常实用的,即使前者是非常耗时的工作,但它们都极具创造力与智识性,而且对研究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在此我的重点是鼓励你去思考你研究的各个面向,并将它们视为对研究发展有特定的贡献,而非仅将它们视为在进入令人兴奋或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之前,所必须经历的“琐事”。以下是我在关于录放机的研究中,所采用的分析与诠释策略。

我的策略

首先,我将三十个受访者纳入不同的“阶级”团体里,并赋予每个阶级一个符码,透过 A、B、C、D 来区分。这立刻赋予了该样本一些轮廓,但我却发现,我必须依主题的不同来划分这些团体,让每一个团体都能以不同的方式共享不同的特征。

接着,我打开每一个主要主题的档案(这可以在计算机里完成,虽然当时我发现以手工来完成也是相当容易的),所谓的主题也就是我所寻找的实质题材的种类,这些题材后来成为我论文的主要章节,如下:

- 时间与家事的组织。
- 休闲:外出与待在家里。
- 决定购买录像机。
- 关于科技的问题。
- 观看电视:与谁一起观看、何时观看。
- 租借录像带:录像带店。
- 观看录像带:与谁一起观看、何时观看。
- 文化品味与喜好。

接着,我开始聆听每一次访谈内容,从中撷取每位女性在不同类目里的谈话(直接抽出该段落),确认已加上标记。

接下来,我关注于从中产生的模式,然后重新将抽选出来的段落归类到阶级差异的类目里。透过这种方式来处理研究题材,让我得以改变我的类目,并依照主题将女性放进我的分类类目

里，同时跳脱性别、阶层的划分。因此，阶级将随着“观看喜好”（关于选择节目与租借影片时的文化品味问题）而有极为不同的变化，但是当讨论到家务劳动与家庭科技的使用时，变化却显得相当少。尽可能让我的类目具有足够的弹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足够的弹性让我能够意识到我的样本中的这些差异。

有时我会回到整个访谈里，并不断地尝试保留每个人回答的完整性，如此一来，特定的形式就不会消失或被踢出整个过程之外。我们注意到迪佛特的策略有助于访谈对话产生概念与类目（参见第 5 章），而且当分析数据对受访者的言谈而言非常重要时，就可以借着这个数据来挑战你的社会学与文化类目。迪佛特提醒我们，为了要让我们的数据能够符合我们预先定义好的类目，我们可能会冒着“篡改”数据的风险。因此，她指出：在访谈期间，聆听描述经验的新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并主张分析的路径也必须具有足够的弹性，才能产生丰富的数据：“当我在进行誊稿的工作时，我发展出一个用来保留‘杂乱无章’的日常生活谈话的系统雏形”（Devault, 1990：109）。因此，她将许多类语言的元素涵括其中，例如停顿、重复、矛盾、笑声等。佩吉特提醒我们，在把停顿、犹豫与错误的开端删去时，其中可能具有的危险性，因为这些事实上可能非常重要。停顿、重复、犹豫与强调语气等都可以提供我们关于情绪与意义的线索，而这些元素也应该反过来成为分析的重要基石。因此，一个较为敏锐的分析应该注意到“那些被说出来的话语的动态结构”（Paget, 1983：87）。

从重要的主题里，我发展出一些概念，可以有力地解释受访者所提供的日常生活观点。这些女性自己引荐了许多必要而不可或缺的概念，或是思考家庭对于科技使用的新思维。这些女性如何描述自己对于不同科技的态度，以及她们如何协商自己在科技与其家庭成员方面的立场，这些都需要有组织的概念来加以理解。某些女性假装她们对科技一无所知，诸如此类“刻意表现无知”的情况，是为了要避免自己多担负一项任务；对于“蓝”与“粉红”科技的形塑，不但在访谈期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而且在复制特定家用科技之间的细微差异与区分时，也变成了一个非常实用的组织策略。其次，这些女性提及许多关于“时间”的话题，以及她们对自己在家事上所花费的时间有何观感。这需要一些

细致的概念才能区分“感到罪恶的时间”、“偷来的时间”以及“我自己的时间”之间的差异。当我开始分析电视观看的偏好时，我开始援引布迪厄对于大众美学、批判距离的概念，同时也从不同类型的文本建构中吸取一些洞见。

发展这些概念的目的是为了要能思考不同的受访者，并已界定出她们观点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方式，并借此组织她们的观点。

然而，能不断地反思并连结起概念、主题与数据之间的关系却是很重要的，如此一来，我才不会强行让数据符合我的概念。在此，能够意识到数据之中与数据之间的矛盾性，也是非常关键的。

经历这个过程后，我接着面临该如何呈现题材的问题。首先，为了要展现一种非常不同的“家庭文化”，我考虑做“肖像画”(portraits)的工作。显然，我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如此对待我的每一个受访者，因此，我以“组构”肖像画的概念做试验，这个概念可以反映出诸如阶级所定义的不同家庭文化。然而，我却觉得这个策略可能会遗漏非常特殊的细节，以及家庭对于媒体与新娱乐科技的使用面向，这些是我们先前在思考电视与录像带“阅听众”时，未能顾及的细节。对我而言，重要的是要能阐明这些领域，尤其是它们与女性日常生活议题相关的部分。我们可能很轻易地忽视这些无聊、例行而普遍的活动，或是在生命故事或肖像画形式里遗漏它们，但它们能够有力地形塑女性的生活及其对于媒体的使用。我也受到我的小样本中阶级重要性的影响，而再次想要指出在这些女性的叙述里，性别与阶级之间的复杂性。为了要保留文本中女性的独特声音，我甚至决定要大量引用我的访谈内容，以期让读者可以获得更多的访谈题材，也希望能够增加此书的可读性，让更多的读者可以阅读此书，而非仅限于学术读者。

借由举例，我希望引荐我访谈过的一位女性，并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题材。

“希拉里”的例子

正如上文所指，我的分析模式是来自于片段/主题的模式。我以诸多类目将访谈数据组织起来，这些类目关系到年龄、阶级、

职业、小孩的数目和年龄，以及其他重要的变项。虽然这提供机会让我讨论我认为重要的女性生活面向，例如，家务劳动与时间组织的重要性、她们对于自己休闲时间的观感以及观赏习惯等，但是这却无法让我完成关于主体性与认同形构过程的分析，而这些类目却是极有可能从我的访谈题材中产生。

因此，在我的研究中，女性的声音与表达是片断的，而且她们出现在许多类目的标题之下。这里遗漏的是她们作为完整个体的意义，以及她们所描述的家庭。

以下是取自《录像带娱乐时间》索引的摘要，这份索引标示出“希拉里”出现的页数。由此看来，从我们非常漫长的访谈内容里摘要出来的片段，不仅出现在所有的章节里，也出现在许多章节的副标里：“希拉里”38，44-45，46-47，55，69，85，89-90，151-152，154-155，167，175，180-181，192，205，208-209，228，229，231。我与希拉里访谈的片段交错出现在所有与研究之关键主题相关的章节里，在此，透过比较的方式，我的访谈是以一种“肖像画”的方式呈现，其中我试图含括所有关键性主题。以下是我对希拉里所做的“肖像画”，而这是我在重新整理我为《录像带娱乐时间》所写的论文时完成的。

以下是引自“空闲时间的组织”一章的简短摘要：

……希拉里回想她的个人史以及家庭背景，并将它放在社会与历史的语境中来思考：

> 我的意思是，你知道的，我并不是说我从事很多妇女机构的工作或编织的工作。我并不是那种标准的家庭主妇，我想你说的完全正确，除了我认为人们有点……你看，我真的有点老了……你知道吗，我上大学时是1960年，当时真是全新的开始，我觉得其他人都比我年轻十岁或是比我更前卫……我是说，我根本是不前卫的，因为我的成长背景很狭隘，是很典型的北方人，而且我发现我根本很难脱离这样的成长背景……我怀疑那些比我年轻十岁的年轻人，在他们年少时是否曾受过挫折，因为事实上……他们和伴侣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而心理却真的是非常传统的。（希拉里）

接着，她又继续说到，这与她成为一个研究生，以及她与她的丈夫成为"大学人"(university people)的事实无关：

> 我想现在我已经到达一定的年纪了，我已经变得非常受限于此(就像过去一样)，回头看看过去，却很难了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想，当我还是小孩时，这些事早就发生了，但我也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我对于男女所扮演的角色有非常根深蒂固、非常传统、刻板的观念，而这些观念是你很难真正破除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就是不会期望你嫁的男人会帮你泡茶，你根本不会有这样的期许……我时常会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时常怀疑有谁会像我一样，变得如此受限……我是说，我真的渴望拥有自由，想带着莎拉(女儿)远走高飞，但除非我能自己谋生，否则我根本不可能这么做。(希拉里)

这位女性四十四岁，她的教育与物质状况将她放在一个显然具有特权的位置上，并在她对于自我的观点中展现出其经验的复杂性。来自于她家庭背景的强烈意识形态已经形塑出她对于男性与女性的假设，而且无法透过她所受的大学教育来反思这些预设观点。但是仍有其他重要的因素影响着她的生命。因为缺乏适当的避孕，国家也缺乏法令让母亲为照护小孩而申请育婴假，她几乎是无可避免地必须接受身为全职母亲与家庭主妇的角色，以致于建立出一种现在看来几乎不可能改变的生活模式。她对于家事的付出毫无疑问地成就了她先生在事业上的发展("他从未换过尿布或想过帮小孩洗头发")，因为他总是不用照顾小孩，也无须担负家事的责任。她想要回到全职教书工作的企图，展现出女性对于自己所处地位的无力感，以及她们对于劳动市场的遐想。正如她所言，经济上的自主是她"寻找自由"的关键，让她得以依自己的意愿行事。和她处于相同地位的女性，虽然嫁给成功的、收入优渥的丈夫，却也生活在各种并非那么明显的限制里(Gary，1992：44-45)。

希拉里的肖像画

> 我不是那种标准的家庭主妇。

十一月的某个下午，我在下午三点时抵达希拉里的家，那是一幢豪华的爱德华式住宅，她带我到屋后的餐厅并招待我喝茶。我所访谈的诸多女性曾招待我喝各种不同的饮料，我时常婉谢她们的好意，因为我实在讨厌喝速溶咖啡，我比较喜欢不加奶精的

淡茶，但有时我察觉到拒绝可能会得罪对方，我也只好接受了。然而，当时我却没有拒绝希拉里的招待，餐桌上已准备好茶盘，上面有烤饼与果酱。除了我一点都不饿之外（我很快就学会在访谈前快速进食，如此一来才能避免饥肠辘辘的困窘，以及疲惫与无法专心的情形），我发现要同时拿着盘子、烤饼、奶油、果酱、餐巾纸、茶以及录音机、笔记本等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一方面，希拉里是位非常亲切且好客的主人，我几乎可以想象当有访客在下午茶时间到访时，她通常会怎么做。另一方面，希拉里在这种场合里如此有效率地布置好茶盘上茶点的作为，也正建立起我们之间的特殊关系，亦即将我牢牢地固定在她家中的访客与身为一个学生（就社会地位而言是次等的？）的位置上。

希拉里的先生是一位大学教授，访谈进行时她正值四十四岁的年纪，她毕业于 1960 年代早期，拥有英语系的学士学位，并且在获得教育系的硕士文凭后，就开始在中学里任教，直到她的第一个小孩出生为止。她在大学时期与她的先生相识，当时的他们对婚姻有某种期待：

> 我是说，我想另一件影响我们的事情是，我先生比我们所预期的还要成功……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因为他只有硕士学位（笑），他从来没有想过最后会成为一名大学教授。

根据她的说法，这意味着他的事业已经超越了她的事业与他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对话中，她不断试着解释一个人是如何“像我一样如此受限”，而扮演一个显然非常传统的妻子与母亲的角色。她的两个小孩分别于 1970 年与 1973 年出生，第一个小孩出生后，她必须辞掉学校教师的工作。她的期望是，当她的小孩到了上学的年纪时，她能够重返教职。她观察到在那段时间里，职场已经完全改变了，当时她正从事一份兼职的教书工作，但她发现那是一份没什么报酬，也没有刺激性的工作。虽然她在家事上有人帮助，“我雇请了一位清洁妇，她一个礼拜来两次——这真是一间挺大的房子”，但她显然也完成许多家务。她先生的工作时数相当长，而且要求她要能“招待”和他工作有关的访客。在这个家里，粉红色与蓝色的符码很清楚地划分家务科技与家务执行。

当我们谈到录像机的操作时,希拉里告诉我,她不太会去使用定时器,并指出有人会帮她使用。她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关注科技的人,但她觉得自己之所以不使用定时器的理由是因为"懒惰"。她称自己的先生为"科学家",但他不会操作洗衣机或烤箱上的定时器,而她却说他不会使用是因为他没有时间,同时她还指出"厨房里有很多东西他都不知道在哪呢!"这个男人从未下过厨或讨论过"要吃什么食物或计划菜单",但是"他不喜欢东西乱七八糟,也不喜欢脏乱,如果地板上有一些垃圾,他会吸地板……他总是会清理流理台,我是说,如果真的很乱的话……诸如此类的。"

当我们的话题进行到休闲活动时,她先生同样是不太喜欢这些活动的。她认为全家人一起外出是很重要的,但最后时常发现都是她与小孩在规划;"我先生讨厌在白天外出,三点之前我们通常都待在家里"。虽然希拉里告诉我这些事时脸上都带着笑容,但显然她对于全家人出游常常不够欢乐感到失望,她也说她已经决定带着女儿到西班牙度假,"来趟真正的自由之旅"。这点她可以做得到,因为她自己会赚钱,同时"这也意味着,我可以买衣服和诸如此类的东西给小孩,也可以做一些我以往不会做的事"。

她告诉我关于她的工作,她曾在多所学校里教第二语言——英语,并解释这是她九年来第一次只在一所学校里教书。一般的情形是,她有一些在不同学校念书的学生,她可能在某个学校教一学期,然后又转到下一个学校:"这是非常寂寞的,虽然就某些方面而言有所报酬,但这并不是一份真正的社会工作"。我问她是否曾经考虑过尝试不一样的工作:

> 嗯……我试过,我试过很多次想要回到多所学校,但这真是糟糕(笑),真的很糟,它让我变得很难相处,我想我在这里有太多义务必须达成,即使我不是非常满意,而且我年纪也有点大了……(她女儿刚放学回到家,并走进餐厅里)……这是莎拉……那里有些汤你可以热来喝,冰箱里还有些火腿、起司。今天还好吗?有没有功课?我做了一些好喝的汤,看你要喝多少就热多少,那里有一些法国面包,你可以在里面夹一片火腿和起司,然后我会来带你出门(莎拉含糊地答应一声就离开了,希拉里转向我)。她五点要去溜冰。

这次访谈的中断相当有趣，虽然先前希拉里对于她在职场上有一搭没一搭，以致于最后不能自己掌控的工作情形，作出合理化的解释。但现在她却说她的确尝试要回到学校教书，而家务责任却让她无法做到这点。女儿一回到家，她就好像马上转换立场，立刻转换成一个“好”母亲的角色；准备有营养的食物（自制的汤与法国面包）、提出有关学校与家庭作业的问题（莎拉只作出含糊的简短答复），以及可以带她到溜冰场，而这座溜冰场却是在三十几里之外。因此，希拉里的定位并非是完全被决定好的，她很显然已在她的责任、她对家庭的责任和事业之间作出选择，但她自己却似乎没看出这一点。虽然我们可以将这种典型的两难，视为拥有小孩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所共有的主要特征，但是我认为此一观点的精髓在于一个事实：全职的教书工作对她的家人而言，会让她变得“很难相处”，但这也同时削弱了她身为一个母亲的概念。

在重新诠释一项关于母亲与女儿的研究时，瓦莱丽·沃克丁与海伦·卢西指出，中产阶级母亲及其家人的特征之一，在于她们很明显缺乏冲突；权力关系、各种冲突、挣扎与困境都被女性们运用各种策略来加以隐藏。“举例而言，权力冲突不可能不发生，但她们总是不在场。然而，她们消失的秘密在于这些冲突被解决的方法；处理权力与冲突的特定策略，让它们看起来就好像不存在一样”（Walkerdine and Lucey，1989：104）。

虽然我的研究并不是关于母职，但母职对许多我所访谈的女性而言，却是她们身份认同的一个主要焦点；那是她们生活中一个很根本的面向，因此对于她们使用、消费诸如小说、电视、电影等文化产品，尤其是他们对于使用这些文化产品的观点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聚焦于此面向之前，我希望能探索沃克丁与卢西所界定出来的其中一个关键策略与希拉里之间的关系，亦即“智识化”（intellectualization）的策略。

我们已经看到希拉里如何提及她对于职场的“外在”想象来合理化她的立场，但她也同时提到另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她论及她与她先生之间一种非常传统的关系。简言之，她提供了一种说明，解释她们进入刻板性别角色的社会化过程，但是更复杂的是，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引文中发现，她也意识到存在于她自传

里的矛盾:

> 我的成长背景很狭隘,是很典型的北方人,而且我发现我根本很难脱离这样的成长背景……我怀疑那些比我年轻十岁的年轻人,在他们年少时是否曾受过挫折……他们和伴侣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但我与先生的关系是非常传统的……除了我们都曾是大学生这个事实之外……就许多方面而言,就拥有较进步观念的这个意义而言——前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三——但我们还是拥有一种非常传统的东西……早在我有小孩之前,这种东西就已经存在了,但我还是觉得,这是因为我对于男性或女性角色有一种非常根深蒂固、非常僵固的旧思想,而这些观念是你永远也不可能打破的,所以你的行为模式就是,你会自己去泡茶,而不会期望你所嫁的那个男人会做这样的事……我的先生家里只有两个男孩,我觉得一个男人在一个没有女孩的家庭里长大,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觉得这决定了他对女性的响应方式。当他非常年幼时,他的父亲就已过世,所以他只被女性抚养长大,因此他期望女性所做的事、对女性角色以及他的女主人的期望……诸如此类的事都是非常根深蒂固的。我的意思是说,我先生的态度是被形塑出来的,同样地,我的态度也是如此,但如今却很难打破这类早期的行为模式。我是说,他的工作非常复杂困难,需要很……我的意思是,我期望他能做家事,这其实不太好……他并没有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晚上十点,我是指这的确会让我感到愤怒,我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觉得无所谓,我有时的确会感到无力又愤慨。

沃克丁与卢西将"智识化"视为中产阶级母亲鼓励她们女儿用以面对冲突的策略,这些冲突常常与性别/权力关系有关,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希拉里的叙述中看到一个相似的策略,这个策略被她应用来理解她自己相当狭隘又相当受限的生活。她不断地试着合理化并解释她先生为何不参与家务与家庭生活:他的成长过程、他在工作上的努力造成他对于自己与他妻子的角色有特定的期待与预设。她的说法"我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觉得无所谓",很清楚地指出她对于自己和他之间关系的期许。她觉得她应该接受

这样的状态，但是她的生气与沮丧转换成了"坏脾气"，她显然试着控制她的脾气，并淡化这些潜在的问题。她不断地透过智识化与合理化的过程来化解自己所面临的困境。

> 那么，该如何调和之前的不和谐、该如何以理性代替脾气、以平等关系取代恶劣的权力关系？因为这正是许多中产阶级女性努力想达成，却是永远也不可能达成的，这完全是因为追求和谐就等同于缘木求鱼，它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除非是存在于幻想中（Walkerdine and Lucey 1989：104）。

除了访谈期间那短暂的相遇之外，我根本没有其他渠道可以了解她与女儿之间关系的本质，但是她对于女儿观看电视，以及她对于电视与录像带的态度的观点，却确认了某种她不断宣称的智识/理性精神。她女儿曾经观看《豪门恩怨》与《朝代》：

> 我想他们是一种团体精神，我认为他们的确进入剧中角色，虽然他们知道那是相当荒谬的，但是大部分的小孩会回答你："因为他们看起来很迷人，他们喜欢那些衣服、简单的生活风格以及剧中的浪漫情调"……他们的确都进入那些角色里，但是荒谬的是，他们无法总是很认真地看待这出剧，我觉得他们看这出剧只是因为它很迷人。他们的确进入那些角色里，但他们却明白那是很荒谬的。

她女儿的观看行为似乎仅是团体精神的一部分，因此，虽然我的问题很明确地是针对她女儿而发问的，但是她却直接开始以较为一般的面向来说明，并将他们建构成"理性的"观众。她儿子和先生在晚上看一些"可悲的垃圾节目"，以借此释放他们的工作压力，而且在描述他们观看电视的情形时，她并未提及他们的理性，反而是说明他们需要在工作之余放松心情。关于她自己的观看情形，她的回答是，她是很少看电视的，电视开着时她时常不在房间，她比较喜欢看一些有"质量"的节目，主要是电视剧。但是他们全都看了《迟来的乐园》、《出类拔萃》以及《笼罩大地》，这些影集都改编自她以前曾阅读过的小说，作者分别是给翰·莫蒂默、杰弗里·阿彻以及托姆·夏普，而且有时候，他们会使用录像机将他们错过的几集录下来。她坚称她总是在观看这些影集之前就阅读过那些著作（并快速地解释阿彻的小说是"我们在苏格

兰旅馆中发现唯一一本可以阅读的小说”)。录放机是在四年前的圣诞节买来“犒赏”自己的,当我们又将话题转往她所租借的影片时,她说:

希:嗯,我想要借《蜘蛛女》,因为我还没看过,但这还必须看时候,有很多你想看的电影当时还没办法在录像带店里租得到。而且还要看它的来源……也要看它是不是所谓的高质量电影,我才会想要看。例如,我曾经错过《写信给布利兹涅夫》,我想它现在应该已经有录像带了,我想要在菲利浦(她的先生)出远门时,去试试看能不能租得到。

我:所以你比较会租你读过或听过的电影?

希:噢,对啊,我从来不会租我真的不知道的电影。

我认为,这是她对于自己的观看行为之另一种智识化方式,我们将看到她也用此种方式去智识化她的阅读行为。这种知识提供她一种智识距离,这种距离是布迪厄所提的“布尔乔亚美学”(bourgeoise aesthetic)的必要条件,此美学赋予观者或读者驾驭文本的能力,而且它和“大众美学”截然不同。希拉里试图借着重申她对于她所消费的文本所具有的先决知识,以维持一种强烈的“自我”观感。

希拉里宣称,阅读是她的主要休闲活动,她一周大约可以阅读两本书。她很少在白天阅读,除非她生病了,她总是在晚间阅读。她透过阅读报纸上的书评,以及参考布克奖(Booker Prize)来选择她所要阅读的书籍,而且她也与她先生同事们的妻子(她在晚上的“晚餐聚会”中与她们见面)形成一个非正式的书籍交换网络。希拉里在整个对话过程中,多次提及她的“社交圈”,但并非每次都是正面提及,显然,特定书籍的阅读提供了她在这个网络里非常重要的文化“交流”。她提到安妮塔·布鲁克纳与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诸如此类”的作家,并说她时常重读这些“经典著作”。我问她为何大量阅读,以及她从这些书籍中获得了何种快感:

这让我非常放松,因为它带你走出去——我不会使用“逃离主义者”那个字……它带领你走出你所生活的环境,以及我孩提时期的环境,即便是现在,身为一个成人,要维系一个家仍是非常受到限制的……这就好像让我成为椅上旅游

者;这是你可以独自完成的事,也让你不会……我是说,你知道……上帝禁止我们变成某种人,那种人只会思考要买哪一种洗碗机,或是该穿哪种衣服,以及最好的方法是……总之我没有办法忍受这些事……我所接触到的人很少能与我进行智识对话。我没办法阅读垃圾书籍,而这些中等市场的书籍真的可以让你思考……它们催促你往前走,这些书都写得相当好,因为,毕竟,我是受过训练的……我无法成为那种完全以小孩的成就、完全以先生的成就或家庭为生活全部的人……但一个人的生活必然是相当受限的,也许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此,当然……而唯一能跳脱这种生活的办法就是阅读。我想这就是我从事阅读的原因。

希拉里的评论显然与贾尼丝·罗德威关于罗曼小说之女性读者研究有关。罗德威指出那些在“传统”婚姻与父权结构中的女性,在阅读罗曼史时,存在着特定的反抗性,而希拉里则将她的阅读实践理解为一种补偿作用,让她得以替代性地体验一种她认为她所缺少的生活面向。虽然罗德威将罗曼史结构与她研究中女性的实际地位等同而语,并主张罗曼史一再地验证女性在父权婚姻中的生活,同时提供她们无法从主要关系中得到的照护与关怀,但是希拉里的例子又更为复杂。例如,她不阅读罗曼史小说,因此无法完全“符合”罗德威的观点,但毫无疑问的是,正是父权婚姻的局限,令她感到自己的“知识”受到限制,而在阅读她的“中品”(middle-brow)书籍时,她感到如释重负。相较于她的忙碌生活,希拉里似乎是一个相当寂寞的人(这个词汇我用来描述许多我所访谈的女性),而她的阅读实践就某些方面而言,似乎是为了补偿她的寂寞感。

我与希拉里的访谈刚开始时,她简短回答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关于她的休闲活动与阅读、观赏电视的习惯。在她表述自己时,我们的话题之所以有所转变,是因为我问及是谁在操作录放机定时器的问题。就此,她提到自己并不关注科技的问题,“当我嫁给一个科学家,而且拥有一个科学家儿子,自己却是文学院毕业生的时候,我想这是无法避免的。”于是她开始谈及她的过去,对于我突然提出的问题也开始回答得较长、较能表露出她的疏离感与寂寞感。然而,就在访谈快结束时,希拉里开始将话题

指向我,并问及我的研究。她说她想要看看我怎么处理我的研究数据,尤其是这些访谈的资料。她尤其对我样本中的劳动阶级女性及其阅读情况深感兴趣,她假定这些女性并未阅读太多书籍。我说,在我的样本里有许多女性的确有阅读的习惯,并提到米尔斯与布恩,以及其他种类的大众小说。她问:"她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阅读吗?"我告诉她一些解释阅读实践的例子,而她说:"她们阅读的时候,不会认为书里的事情即将成真吗?"我说:"不会"。

在我的研究中,透过女性的肖像画过程,诸多关于阶级与性别、母职、世代的特定经验、品味与权力关系等主题将一一浮现。我采用此方式去呈现题材,是为了让读者对于中产阶级家庭的整个文化,以及其中母亲/妻子地位的复杂性有所了解。此外,正如希拉里在她的自传里反映的,我们还可以将这整个文化置于广义的社会历史变迁中。借用康奈尔的词汇,此种数据可能具有高度的理论性产出。

然而,此种呈现形式本身并非完全没问题。在解读这份肖像画时,我想要思考两个缺点,重新考虑它们和此书所实际采取的格式的关系,并将它们放进关于权力与尊严的问题里。首先,我似乎真的在叙述中忽略了"希拉里"的洞见;其次,我在分析时使用的概念架构,将我定位成文本的作者,这使得希拉里成了任由我宰割的俎上肉。换句话说,我认为:我比希拉里还清楚明白她的选择与行为的动机。就这个模式而言,我变成了一个全知的叙事者。但吊诡的是,透过《录像带娱乐时间》的解读,比起希拉里,我更强烈地明白这个肖像画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我能够较客观地通过理论去仔细思考她的观点。肖像画模式的采用(在此种模式中,受访者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个体")未必是最中肯的,也不必然是最具生产力的分析与呈现模式。

因此,借着采用不同的分析策略、架构,相同的访谈若是够开放,就能以不同的方式被使用。而可用来问你自己的最重要问题是:

- 此访谈对我的整个研究而言,究竟有何作用?
- 另类的策略是如何定位受访者的?他们是否能维持他们的尊严与诚实?抑或我的声音在文本中,被视为较具权威?

最后我决定将数据打散并加以分类。此一方法让我得以界定出某些家庭主妇的使用模式，并指出在各个领域里的差异与区别，例如在进行家务工作、使用科技以及阅读与观赏的乐趣等领域。

关于分析策略的一些想法

分析中的僵化现象将使你的分析方法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而且你也将花费很多时间在一些浪费时间的访谈上。你应该让资料在研究中充分发挥潜力。退一步仔细看看你的分析、你的提问到底在分析些什么、在问些什么，这是相当值得的：

- 架构是否太僵化？倘若你正要浓缩或除去题材的某些面向，你就能够发现这个问题。
- 分类的项目是否具有足够的弹性？或者研究题材是否迫使你开始质疑你的分类假设？
- 倘若你做出一些调动、增加你的主题与类目的多样性，使其更为复杂，又会有怎样的改变呢？
- 你能将样本分类，或是重新分类成不同的群集吗？你的原始群集可能无法适用于每个主题。
- 你在访谈中所获得的回答种类是否有差异？这可能需要不同的分析形式。
- 你可以透过什么方式表现出样本中的矛盾、差异以及相似性？

其他策略

温迪·霍尔韦宣称："透过研究问题来了解逐字稿，是所有的研究过程中最令人烦心的一部分。逐字稿的结构愈是松散，就愈令人感到焦虑，也因此无法严谨地进行分析"。像我一样，霍尔韦试着将她的逐字稿编码，并界定出不同的主题：她先界定出六个

主要的理论范畴,再划分定出次标题,接着再从这些次标题中定出小标题。但是,与我不同的是,她如此归结:

> 如此得出的结果在许多方面无法令人满意。最重要的是,它让我意识到我尝试要了解的对象,就整体而言,是多么地复杂,而且类目也只是具有解释的功用。借着划分类目,我破坏了类目之间的关系,那是一个整体的内在关系。于是,我对某个人或某对夫妻的个案研究就失去了完整性,而这种完整性却是让我可以阐释这些面向之间的关系。(ibid.:21)

她认为,重要的是在某些特定状况下,类目之间的关系,而非根据其中一种类目来为逐字稿进行编码。她必须要在分析里证明这些关系,她的结论是,逐字稿不应该为了符合某些方法论上的"严谨"而被"切得支离破碎"。

赫米斯(Hermes,1995)指出,当她借由类目分析来分析她的访谈时,出现了一个相似的问题,其中她遗漏了某种日常例行事务的全观结构,以及女性们在不同时期里使用杂志的转变之复杂性。有鉴于此,她进行了两个为时较长的"生命史"访谈,希望能借此发现女性阅读杂志的行为,是如何相关于日常生活的例行事务。她的结论是,为了要解释女性杂志是如何被使用的,就必须了解读者的日常生活、历史与例行事务,这些事项应能指出流行文本类型的意义与消费的复杂性。

赫米斯的观点颇有帮助,尤其是她结合了质性访谈(她做了无数次的访谈)与两次较长的生命史访谈,以期能掌握阅读杂志在她们的生活、记忆以及女性身份的成就里所占据的地位。为了要从访谈本身呈现出"完整的故事"以及较为民族志的观点,就必须对杂志的使用做出详尽的"肖像画"。她所访谈的人屡次指出,她们对于杂志的使用在根本上早已与她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而且也形塑了其阅读习惯及阅读杂志所获得的快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当中受访者促使研究者去采取一种不同的方法论策略,以"掌握"研究的现象。当然,这是由于她反思自己的研究实践,以及亟欲证明她的研究主题(以及她所付出的心力),因此做出的修正。我想要多探讨这个现象——亦即倾听我们的受访

者在研究过程中所做出的要求以及可以打破界线的方式。我已讨论过这个议题和说故事的相关性，现在我想要就研究题材的分析来讨论此议题。

康奈尔的生命史分析程序

康奈尔在他的著作《阳刚特质》一书中，仔细地描述此一研究过程：

> 在分析的第一个阶段里，我聆听录音带、阅读逐字稿、作索引并誊写每一次的访谈，将其视为一个研究个案。在每一个个案研究里，我都从三个观点加以检视整个访谈：
>
> - 事件的叙事顺序
> - 由三种性别关系结构所提供的结构分析表
> - 一种动态的分析方式，追溯阳刚特质的形塑与未形塑的过程，以及尝试掌握当中所涉及的性别形塑计划。
>
> 将每一次个案研究誊写出来，是为了要对某个人做详细的肖像画，也是为了要反思此肖像画作为社会变迁的证据，及其所代表的意义为何。
>
> 在第二个阶段里，我以群集的方式重新分析这些个案。就此阶段而言，目的是为了要探索男性在特定社会地位的轨迹中所具有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同时也是为了要了解他们在大规模变迁之下的集体地位。同样地，我再次使用一个由性别理论所推衍出的表格来完成这些比较系统。我撷取一些个案并重新做出索引，以至于当要分析每一个主题时，就必须检视整个群集，但是每一种生活的叙事形式仍被保留下来。我分别对每一个群集写下分析的结果，尝试让每一份报告都可以成为对处于特定变迁过程中的男性的集体肖像画（Connell，1995：92）。

从康奈尔的观点里，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分析历经多种不同的阶段，在这些阶段里，访谈的题材隶属于不同的分析架构，这些架构分别对不同的题材提出不同的问题。在重新分析的阶段里，他又再次地将个别的访谈加以分类成不同的群集，以便让差异性与

相似性得以出现在故事里,而且他再次强调,他使用某个理论架构是为了要更清楚地了解生命故事以及它们所产生的"结果"。

他坚称:"这四个研究本身并非要作为大规模变迁的地图",换言之,康奈尔并非宣称:这些观点代表了更为普遍的社会变迁,"它们的目的是为了要阐释特定的状况,这些状况可能是极具策略性的。在这个基础上,当我在讨论更大范围的议题时,我会采用这些研究发现……当然这些研究也对理论主张有所回馈"(ibid.:92)。

在一次讽刺性的评论里,康奈尔承认,并非所有的研究者都能被这个路径的实用性给说服。他的田野调查工作是由国家资金团体——澳大利亚研究奖助委员会所赞助,而且"在任何研究发现被出版成册之前,这个计划就已受到联邦议会,以及自由国家党派的"监督委员会"所攻击……他们认为此计划明显是浪费公帑"(ibid.:92)。

话语分析

上文的讨论重点在于以不同的方式划分文本,而我们应该一直谨记在心的是,我们处理分析的方式完全依赖于我们想要从文本中揭露什么数据。正如我们所指,这有时是无法预测的,而且好的反身性实践将能够通过分析与诠释完全地彰显出此种质性资料。因此,一种具有想象力与弹性的分析路径是非常重要的。

近年来,许多文化与媒体研究者皆在他们的资料诠释里采用论述分析。吉尔(Gill, 2000)指出论述分析的四大主题,如下:

1. 话语即是主题——所有谈话的形式与文本皆是话语。话语分析关注于文本本身,而非为了要获得一些潜藏的"真理"。

2. 语言是建构出来的。话语源自于先前存在的语言资源,叙述则是由许多选择组合而成的,虽然这些选择并非无限多的。各种不同的文本建构出我们的世界。

3. 话语视情境而定。它是偶然的、随语境不同而有所改变。

4. 文本是经过修辞组织而成的,而且可以提供关于世界的竞争性观点。

对于文化研究计划而言，话语分析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应用于各种不同的研究题材里，因为“话语体制”（discursive regimes）不但可以在“微观”的层次以及较广泛的社会层级里观察得到，而且就“宏观”的层次而言，这些论述体制还可以被视为权力的话语。

因此，话语与沟通都具有微观与宏观的面向，它们的分析可以提供分析复杂社会与政治问题领域的新方法。这不仅提供小规模或“微观”研究的背景，更可以证明那些广泛的权力话语是如何在社会关系里运作的。同时，借着检视特定或在地语境里的话语关系，我们还可以探索话语关系是如何在社会结构与文化等较为全球性的层级里获得复制的。

在文化研究中采用话语路径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对构成某个研究计划的所有文本，使用相同的分析架构。因此，文化产品、流行文本、姿态、访谈对话以及会话、手写的档案等都可以采取话语分析的研究路径。当我们检视曼凯卡（Mankekar）的研究时，可以发现这个研究路径的实用性，以及论述集合是如何被视为既支撑起流行文本的生产，也巩固了观赏这些流行文本的家庭的生活经验。

萨默菲尔德（Summerfield，1998）在关于女性战时生活的研究中，采取了话语研究路径，其中她致力于了解“官方”话语是如何被假定为是从男性的观点或视野所生产而成的，并提供了理解经验的特定观点。这些话语倾向于边缘化或忽视女性们如何并以何种方式经验战争。换句话说，对萨默菲尔德而言，话语是有性别之分的。相反地，女性对于她们经验的叙述，则是透过不同种类的文化项目来诉说的。萨默菲尔德的生命故事访谈是设计来检视性别、主体性、相互主体性与话语之间的连结，借此在下述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关系：此二者指的是我们对于自己的观感（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经验特殊事件或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拥有哪些文化项目来建构我们对于事件的观点。萨默菲尔德的研究路径因此不但免于落入“经验的真实声音”此概念的陷阱中，而且将我们的注意力从话语本身移开。她关注于访谈作为资源与主题的重要性。

文化的语汇库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概念,源自于话语分析工作中,此概念也被赫米斯应用于她对阅读杂志的研究。赫米斯采用波特与韦斯雷尔对于项目的定义:"目前所普遍使用的词汇体系,用来标示出行动、事件与其他现象的特征与评价"(Potter and Wetherell, 1987: 149)。社会主体被理解成文化项目的使用者,并且被视为是主动的、创造性语言的使用者,而非预先决定的语言体系下的主体。此外,根据波特的观点,将诠释性文化项目思考为"一系列具有系统相关性的词汇组合"的优势在于(Potter, 2000: 131),它们可以被视为是构成文化"常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个"常识"时常被假定为是访谈者与受访者所共有的,因此分析首先必须将此常识标示出来,以期能彰显出这些时常根植在话语集合里的常识。根据波特的观点,这个概念考虑到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首先,它们可以被视为是"现成的"资源或话语,这些资源或话语可在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中,被不同的个体所使用。其次,它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语境与场景,而被选择性地引用或再利用。显然,这还包括访谈本身的语境。波特认为,为了要获得这些被普遍使用的文化项目,访谈是非常实用的机制。他针对资料提出一些问题:"某种特定的世界观点是如何变得如此具体而无疑义的?(例如常识、理所当然的、显而易见的观点等)"以及"社会类目是如何被建构、被实现于实践当中?"(ibid.: 131)

我们可以相当仔细地、以语境化的方式,来探查特定的世界观点是如何根植与合法化于言说与实践当中(ibid.: 131)。赫米斯致力于界定出她的受访者是如何使用与理解女性杂志。她对于访谈数据的解读开始建立起特定的诠释项目或诠释立场,而她的读者们在阐释自己如何使用杂志时,则采用了这些诠释项目或立场。这些是属于"实用知识"与"情感学习以及关联性认知"的项目。虽然这些项目之间的界线并非如此明确,而事实上它们也都拥有次项目,但是它们为赫米斯的研究受访者提供了一个共享意义立场的结构。正如在萨默菲尔德的研究里,这让她得以说明

特殊与特定的状况，也让她得以将这些状况连结到一个更广泛的意义生产场景或常识假定上。这两个研究者皆在其研究里，更普遍地采用建构主义路径，以理解语言、论述与社会世界，但是她们两位却都未涉及某些话语分析（例如对话分析）会采取的语言特性。对赫米斯与萨默菲尔德而言，重要的是社会与文化语境，因为在这些语境里，以及透过这些语境，她们的受访者才得以被定位在主体位置上，并获得特定的文化的语汇库。

赫米斯主张要采纳诺尔-赛蒂娜的意见，认为微观当中存在着宏观：

> 宏观结构似乎存在于……微观结构当中，它是主体在结构实践下的产物。这些实践的结果是再现出来的，这些再现与它们所再现的物之间有着符应的关系，但是它们同时也可以被视为高度情境化的建构产物，这些建构涉及多种不同层次的诠释与筛选过程……主体借着实践，例行性地将情境化的微观事件转换成再现，在这些实践当中，他们说服自己已经完成了适当的再现。（Knorr-Cetina，1981：34，引自 Hermes，1995：26）

换句话说，在微观层次下筛选出来、重新利用并动员的文化的语汇库，是指涉较广义的文化。同样地，这又呼应了曼凯卡的研究路径，并意味着可以从特定的例子中产生理论的概括化。赫米斯形容她对于文化的语汇库分析的使用既不中规中矩，也不特别严谨，而是包含了以下步骤：

> 在文本之间来来去去，根据不同的标准将访谈逐字稿摘要出来，以有意义的结构将这些片段组织起来。我寻找重复出现在不同访谈里的论调或言说方法，一旦找出这些关键要素，重要的就是要试着将它们整合在一起。（Hermes，1995：27）

科技的使用与滥用

如今许多软件包的问世，让质性资料的分析更得心应手，随着这些软件包不断地更新以及新版本的引进，想要详细地描述任

何一种软件包的信息都是不智之举。然而，我能说的是，根据你的目的而使用计算机，而不是将它本身视为一种目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于质性数据的掌握而言尤其重要，并且应该避免让软件局限或削弱分析的丰富性。

哈默斯利与阿特金森曾作出如此的警告："没有一种归档或编码以及撷取的系统，可以取代我们对于言说与行动语境的敏锐性"（Hammersley and Atkinson，1993：194），而洛夫南（Lofland，1971）也主张："就分析类目的例子而言，分析必定会'杂乱无章'，也必定会涵盖很多项目，然而这却是值得一试的"。

早期有一种软件包称为民族志（ethnograph），这是一种"编码与撷取系统"，主要在于界定与撷取各种资料片段。特斯克（Tesch，1990）认为此一过程"去除资料区块的语境"，并"重新将它们语境化"成主题档案，而且"在本质上，编码的策略是一个相当'粗浅'（flat）的策略"。因此，软件无法辨识出某些符码是包含特定类目的一般性类目。此种软件有效率而广泛地取代了徒手的搜寻工作。但是它的编码程序将那些所谓的"碎片化的文化"（the culture of fragmentation）（Atkinson，1992）视为是处理质性数据的一般路径。也就是说，它反映出一般的假定，也就是数据的化约与整合是数据处理的核心。但这未必是所有民族志与其他质性研究所采信的观点，尤其是那些关注于社会互动的详细因果关系的分析（Hammersley and Atkinson，1993：200）。那些软件包已经超越了一般的路径，例如 NUDIST 可以建立起符码本身之间的系统性关系。因此，许多符码可以依照研究者想要的方式被组织与整理。而 KWALITAN 则让研究者可以进行"扎根理论"，所以分析的片段与方法论文本可以被涵盖进特定的数据区块里。因此，现阶段的软件包都倾向于直接跳过编码与撷取的过程，而直接进入分析的阶段。然而，超文本（Hypertext）和"编码与切割"的基本路径截然不同，超文本软件让分析者可以在数据库里发现复杂的路线与途径，而不再是采取切割的方法（Fischer，1994）。超质量（Hyperqual）软件则证明，我们有可能对一项研究计划的所有题材都进行探查：这比质性研究的编码与划分方法更接近于民族志的研究工作。就此而言，笔记、访谈、观察、理论比较或其他手写的数据都可以被视为是研究的题材。当然，这正是具有想象力的民

族志者或社会学家或文化分析家，在他们的研究里所持续进行的工作。计算机计算的能力让它能引领潮流，不论在过去或未来，它或许都比任何一个人更来得可靠。然而，即使如此，这个“多层次”的软件程序无法取代那些狂野的思想与想象的时刻，但是它们仅能帮助我们善用其功能。请小心科技上的困境，尤其是当科技取代、替代或引导研究过程的时候。哈默斯里与阿特金森提醒我们，旧符码的编码以及民族志撷取系统的编码，将所有数据等同视之，虽然我们还是可以重新编码，但这却是相当耗时的工作。因此，这些软件所带来的危机在于，符码将变得固定，而数据将变成静态的。如此一来，我们将失去质性研究的丰富性与多元性。

因此，你可以采取的分析策略有许多种，其中有些策略将是你的研究架构与研究方法所能预测到的。然而，在这个阶段里，不断地修正与试验将可以持续开拓你的研究视野，并让你提出不同的问题。正如在研究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善加利用研究题材的关键在于反身性。你大部分的决定将影响书写过程，也会受到书写过程的影响，而书写的过程就是下一章节中所要探讨的主题。

第9章 书写

Writing

书写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黑暗秘密。(Plummer, 2000: 168)

想象一位歌剧歌手,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学习歌剧的歌词、舞台走位、角色的特征,但直到表演的前一晚才开始学习歌唱的部分。书写是研究者沟通他们观点的方式。诸如歌剧歌手、音乐家、木匠、新闻从业人员、厨师等拥有技艺的人,他们必须做的就是规律而持续地练习他们的技术,以磨练他们的技巧,借此精练他们的"表演"并寻找更好、更有效率的表演方式。我怀疑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经如此思考过书写?

有一些和书写有关的议题,而我希望以三个截然不同的方式来思考这个研究面向。首先我将务实地讨论如何进入书写的大门,或是该如何避免光说不练。其次则是探寻一些有趣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关于我们如何向他人呈现或沟通我们的研究,以及关于我们所使用的模式与风格,同时也包括使用这些不同模式所可能产生的各种意义的相关问题。我非常能够理解,对一个学生或研究者而言,当他们在空白屏幕面前奋战,几乎写不出什么东西来的时候,后面的这些问题与议题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奢侈、放纵或甚至是一种折磨。最后,我将提到我们的书写必须能够触及更广大的读者群,那些超乎一般学术论文所假定的读者群。因此,让我们先从与书写相关且较为务实的议题谈起吧!

何时该开始“书写”或为什么我不早点开始

正如温迪·霍尔韦所发现的，我们很难准确地说出自己是何时开始进行“真正”研究的，所以从事长期计划的研究者在回顾的时候，应该也觉得难以判定“书写”开始的时间。情况当然并非总是如此，因为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总是不断地拖延开始书写的时间。身为一名教师，我们很难从学生那里取得手稿，而这通常是因为这些手稿尚未成形。而且，大家对于书写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态度，这种态度往往会造成恐惧与焦虑。我们总是可以找到各种理由，认为我们还没准备好要开始书写；总是还有一本新书或文章是我应该要阅读的，或是有种模糊的感觉，不清楚该如何着手进行手上的工作。当我面对计算机屏幕时，我发现许多日常事务变得格外吸引人。举例而言，当我进行写作时，我会发现厨房的地板已经很久没有清理了。这些“干扰战术”（distraction tactics）有时候虽然能提供一些良好的思考时间，但也可能消耗掉你的时间，在你的截稿期限逼近时造成压力与恐慌。在这本书里，我一直主张，书写应该要随时出现在每一个研究阶段中，而不是等到最后已经搜集好所有的数据、读完不同的理论文本以及相关研究等之后，才来进行书写的工作。正如迈克尔·格林所言：“研究者应该时常书写，无论情况如何，都应该将书写当成一件例行的事务”（Green，1997：201）。一个普遍的错误是，将书写视为一种单一的过程，并期望能够在透彻了解概念与找到最佳或最适当的表达方式后，才书写出一个完整的文本。书写应该是暂时性的，一直持续到你已经要生产出最后草稿的阶段。我同意格林的观察：“应该要持积极正面的态度，因为在书写的期间会发生许多事（关联性、洞悉、隐喻），而这些事只有在书写的过程中、也只有透过书写的过程才会发生”（ibid.：201）。因此，完成最后的草稿之前需要历经数个阶段，也必需花费时间对每个阶段进行反思。你必须多次检视你所书写的文本，从你的指导教授，或任何一个愿意阅读你的作品并给予评论的人那里取得回馈。幸运的是，就像其他

事一样,随着不断地练习,书写会愈来愈上手,所以尽快着手进行书写吧! 对大部分的学生而言,书写是因为师长的要求才偶尔为之,但是倘若你能将书写视为你研究的例行活动之一,那么你就不会将它视为某种你必须非常努力才能克服的神秘魔力。你还记得当你终于开始书写一篇文章时的感觉吗? 你是否会自问"为什么我不早点开始?"通常这时候你已经没有多少时间,或是已经快到截稿期限了。能避免这种感觉再次发生,并击倒你最坏的敌人是非常值得的,当然有很多大型的研究计划是无法如此简单地完成的。

随手笔记与撰写成文:如"工匠"般进行书写

在提及民族志的实践时,鲍尔·阿特金森经常会指出书写民族志研究的差异,有关民族志研究的书写一般被描述为"随手笔记"(write down),也就是你的田野笔记、你的观察、描述片段等,而阿特金森将"撰写"(write up)视为"强烈地指涉着书写的建构面向"(Atkinson, 1990: 61)。阿特金森指出的重点在于:虽然随笔"写下"的东西被视为"资料",而仔细"撰写成文"的东西被视为研究的最终产物,但这两种书写模式都必须经过诠释,也应该被视为与"文本建构"有关。我们可以进一步使用这个区分来了解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自己对于文本生产的某些态度。

C·赖特·米尔斯指出:我们应该发展出一个档案(或笔记本),让我们可在其中如同作家一般地进行试验。米尔斯这位对我们帮助很大的实用主义者,建议我们至少每个礼拜都要写些东西。如此一来,你就可以"如同作家一样进行试验……并开发你的表达能力。要维持'这样的'一个档案,就必须控制经验"(Mills, 1959: 217)。

当你要生产更多已完成的书写题材时,策划则是书写过程中的一个本质部分。在你书写文章之前,必须仔细了解整个结构。同样地,米尔斯将这个面向扩大到可以用来思考你的工作的普遍面向上。策划不应该只发生在某个计划的开始,例如,当你要申

请从事博士研究或申请经费补助的时候,而应该是你学术生涯中一个持续进行、不断反思的过程。

和研究过程中的所有面向一样,没有任何快捷方式可以获得书写的结构与路径。显然,一个初步的计划与大纲是非常重要的,如此一来你才能明白每个章节或段落所包含的不同面向为何:论证是如何发展出来的、你的"动机"是什么。对博士生而言,书写要提报的研讨会论文、着手书写内部出版的论文、在研讨会上发表论文,以及如果可能的话,以一些早期的研究"论点"为基础去书写一篇期刊文章,这些都是形塑你研究工作的绝佳策略。

练习如何透过研讨班和会议来传达你的想法是很重要的,光是读完一篇为了出版而书写的论文,是无法有效做到这点的。你应该要重新从论文中摘要出一份适合口头提报的草稿,而且对于你可以提报的时间、你的听众以及他们的兴趣也要相当清楚,再尽可能以最有趣、最迷人的方式让听众得以理解你的论点和用以支持论点的例证。你曾经在研讨会上忍受过多少提报者冗长的报告,他们是以著作的语言而非以提报的方式来报告的吗?倘若你历经这个编辑的过程,你的思绪就能集中,你就可以了解这些题材可以如何处理,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一篇提报完美的论文将能够鼓励具创造力的、激发性的问题与论辩的产生,而且你可以从中学习。同样地,你在期刊中第一次发表自己的研究论点时,若时机恰到好处,这篇文章将可以吸引一些感兴趣的研究者以及也在从事相同领域的学者。如果你够幸运,这些接触可以扩大你的学术社群,这将让你受用无穷,而且也能减少一些无可避免的孤立感。

风格与惯例

能够有意识地选择适合你研究题材的写作风格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同我们在研究的每个阶段都应该不断地进行反思,这同样也能应用到我们的书写(与阅读)实践当中。一些实用的文本坚持采用民族志研究(以及其他研究形式)的文本性,而我们再也无法接受将书写视为是整个研究过程中"明显"或"中立"部分的

说法。书写和研究过程中的每个部分一样,都是具有选择性与建构性的。书写似乎是短暂、难以清楚明白的,因此赋予我们自己一些书写模式是非常实用的,这些模式处理更多的文类与文本,这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正采取何种书写形式。我们如何与我们的理想读者进行沟通、我们如何做到让具体的实例与我们自己的论述、分析观点相互作用,这些都与选择息息相关。我们如何呈现我们的研究主题?如何让他们发声?我在哪里是文本的作者吗?这些问题都将在你着手计划书写时出现在你面前,你需要仔细地、批判性并反身性地去思考这些问题。

哈默斯利与阿特金森(Hammersley and Atkinson, 1993)在书写关于民族志的文本与论文时,指出在所有民族志文本中都存在的主要修辞或言说的形式。这些修辞包括:隐喻、提喻(synecdoche)、转喻、讽喻、惯用法。我发现这些概念对思考书写实践相当实用,而且对于界定出某些我们自己所隐含的书写策略而言,也是相当有帮助的。同样地,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强调,这些是我们可用来挖掘我们自己与其他人的文本的重要工具,这些工具并非一套僵化的书写方式。它们是思考的工具。

隐　喻(metaphor)

正如同在小说里一样,隐喻可以浓缩、捕捉一组存在于影像或符号里的复杂关系。哈默斯里与阿特金森提醒我们,较传统的社会科学中都充斥着隐喻,例如,"社会结构"与"市场"。但是他们认为戈夫曼对于戏剧、剧场与表演的隐喻,或许是社会科学里使用隐喻最为经典且最具洞见的代表。这个隐喻以一种优雅且简单的方式,彰显出社会生活、在特定场景里的行动者,以及角色身份三者之间的复杂性。阅读学术性文本并了解其中对于隐喻的使用,是相当有益的练习。毕竟,阅读好的著述可以提升我们自身的研究实践。

提　喻(synecdoche)

提喻是指以"部分"来代表"整体",主要是使用在一些范例、例证、肖像画与小品文中。透过例证的方式,提喻提供读者一种有趣、直接的方式去理解较为一般性的分析架构或较为广泛的议

题。因此,某一次的邂逅可以构成一则奇闻轶事;某个受访者的故事可以被当成所有处于相同社会地位的受访者的范例;一则关于研究者经验的故事、某些发生在田野调查工作期间的事,都可以被用来说明研究实践中更广泛的问题。

转 喻(metonymy)

转喻与因果性、关联性以及事件的顺序有关。它被使用在"写实主义的描述"里,而且与"说故事"有关。研究者收集故事作为资料,然后再把它们"重新运用"在社会学或人类学的叙事中(Hammersley and Atkinson, 1993: 249)。"将'田野'转变成'文本',有一部分是透过日常生活的叙事建构而达成的"(ibid.: 250)。的确,如曼凯卡而言,"所以,我对于观赏者对电视节目的诠释的看法,是采用一种有目的的说故事形式,此形式是由部分的观点与立场所形构而成的"(Mankekar, 1999: 68)。

讽 喻(irony)

讽喻的形式时常可以在社会学与民族志文本中发现,也可以在视角性或相对主义的观点中发现。它指出不和谐的状态,在熟悉与陌生的事物之间、预期中与非预期中的事物之间作出比较、对照,并彰显出特定行动过程中意料之外的结果。

惯用法(topos)

哈默斯利与阿特金森指出,惯用法是指那些人们早已知道、视为理所当然或常识的知识,这些知识是作者与读者所共享的。援引特定的文本、以特定的方式来使用概念,这些全都指涉着人们所共享的知识以及与研究议题相关的背景知识。

肖像画

肖像画或提喻的使用已经在先前关于分析的章节里讨论过了,显然你在诠释阶段的选择,将形塑你对于建构书写文本的选择种类。有两位作者将肖像画的功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分别

是肖恩·穆尔斯与乔克·赫米斯。穆尔斯在其关于日常生活中使用卫星电视的研究里使用肖像画(Moores, 1996),而后者则将肖像画使用在她关于女性杂志读者的研究中(Hermes, 1995)。

穆尔斯的专题论文并非全由肖像画所构成,他以不同的方式将研究立基于三个相近的领域,再从这三个领域呈现出研究题材。其中,有一个章节只使用肖像画或小品文的风格。虽然穆尔斯并未过于深入地讲述他的理由,但显然他使用肖像画是因为它们彼此之间可以直接与卫星电视的现状相互对照。在本章里,穆尔斯探讨了关于卫星出现在室外与品味之间关系的问题(至少是就英国的例子而言)。借着使用小品文与对于特定家庭的肖像画,他得以和读者沟通家庭内外的品味文化之复杂与微妙的运作情形。这是以一种直接而迷人的方式引荐了关于世代、专业、传统、传承等因素。另外两个他研究的相近领域构成了他论文的另外两个章节,这两个章节处理了他的实证数据,并以主题的方式呈现出来。

赫米斯在一个名为"两名读者的肖像画"章节里,背离了书中的主要模式,而呈现出两个"深度的"肖像画,这两个肖像画强调了生命历程对于阅读杂志的重要性。虽然她的其他受访者也表现出当代阅读实践的"快照"(snapshots),但是在她另外两次延伸性的访谈里,她却可以探讨关于这个流行且"非常容易估计"的形式的时间与记忆面向。

康奈尔(Connell, 1995)在研究阳刚特质的变迁 (在上一个章节里我已经提及他的分析方法)时,选择以"四个关于阳刚特质的动态性的研究"(Four Studies of the Dynamics of Masculinity)来呈现其研究题材。就这个方法而言,康奈尔试图保留个人的生命故事,虽然并非保留全部,但尽其可能地在一个主题性与比较性的结构里保留生命故事的菁华。他研究中的男性在四个研究中被划分成不同的群集,这四个研究分别代表着阳刚特质的建构与解构的关键要素。因此,他的"样本"是经过策略性地筛选,以作为这些"关键要素"的例证,这些要素包括失业、接触女性主义、同性恋以及理性等,而且他的分析让他必须对于这些个别的故事进行逐字稿抄录的工作,以及界定出主题,接着还要援引生命故事的观点来建构出他的研究。在此,他致力于寻找在这些研究里所

界定出来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在阅读他的研究时,读者穿梭在特定的生命故事以及社会变迁的广泛社会结构要素之间。然而,重要的是,他对于每个人的肖像画并未消失在如此的呈现当中。他的呈现方式非常具有创意,此种方式将片段模式与肖像画模式结合起来,如此一来不仅超越了这两种模式,更产生一种对于改变中阳刚特质的丰富、分析性的论述,而这个论述也向外指涉着社会现实。同时,这也造就了一份可读性相当高的文本。

文本中的作者

许多你所阅读过的研究计划——也许是你自己做过的研究——都会要求受访者的观点必须与你自己的观察、你自己的声音相互交织,同时也希望透过你的理论架构与诠释架构来进行诠释。当你决定如何具体表现你的研究题材时,就暗示了你对于受访者以及知识论立场的取向。我们已经在其他地方讨论过关于言说观点的地位,尤其是必须将它们思考为偶发的观点以及随着访谈的动向、团体讨论或观察而产生的响应。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在研究中呈现这个题材?我们可以回到我们将生命故事视为资源或研究主题的区分上,并将它延伸到我们对于研究题材地位的思考。

倘若我们在搜集叙述、对话与其他形式的言说资料时遇到困难,那么能找到得以将它们化为书写文本形式的方式就显得格外重要。肯·普卢默认为,我们可视之为一种"建构的连续"(continuum of constructions)(Plummer, 2000: 179-183)。他并主张:"在任何社会学的生命故事里,都存在着两个主要的诠释者:研究对象与社会科学家"。研究对象,亦即我们的受访者,随着我们的意向开始对他们的生命进行诠释,并援引对于世界的"常识"。社会科学家则从他们的学科里,援引理论性与分析性建构来诠释研究的题材。在分析与书写的议题中,谈论的是社会科学家在何种程度上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研究题材之上,以及受访者较为个人化的观点被允许出现在文本里的程度为何。

许多文本都使用普卢默所谓的"透过奇闻轶事来确证"(veri-

fication by anecdote)的方法,这是指从实证数据中筛选出一些好的例子,在这些资料中,作者并未对特定例子的引用提供正当性。如此一来,资料主要是用来支持理论假设或作者的分析架构。

第二种方式或许较为人所熟悉,它在不同的主题之下使用访谈内容的摘要,而这些主题都和社会学或文化理论有关。普卢默称此为"系统性的主题分析",举例而言,这就是我用以呈现我对于录放机研究的模式。

第三种模式被普卢默称为是用来呈现生命史记录的方法,在此种方法里,社会学家的干预会尽可能地降至最低(除了编辑的工作)。这是一种生命故事的极端形式,而且正如我们所见,我们有可能以更具分析性的叙述来呈现生命故事或为期较长的对话访谈,同时又能顾及到我们受访者的尊严,康奈尔的研究即是一例。

在约翰·佛纳斯、乌尔夫·林德伯格以及奥韦·舍海德关于摇滚、青少年与现代性的研究里,他们完成了一项对三个不同乐团所做的民族志研究。在他们研究的书写文本《在车库之地》(Fornas et al., 1995)一书中,三位研究者节录了访谈以及与乐团所进行的讨论,这些节录在页面上对照着他们自己的人类学式论述。在这个方法里,读者被邀请来理解乐团的本质与字汇的交换。

迪佛特(Devault, 1990)采纳了女性主义的书写方式,但是她却是从一个不同的观点出发。她强调开发新词汇及新言说形式的重要性,这是为了要赋予先前可能未知或未被命名的实践与女性经验正当性。她坚称,女性主义学者不应该受到"学术"或"科学"语言所限,而应该尽可能地为读者建构出不同的期待,并为他们准备不同的用词与不同的书写风格。对迪佛特而言,这是唯一能够让我们真诚对待研究主体及其隐藏的生命复杂度的方法。

本书一再强调,生活经验作为理解文化与社会变迁的丰富来源的重要性与意义。因此,重要的是受访者的声音不应该被遗漏在我们的文本里,我们更要意识到,"为他人发声"以及"让他人发声"是无法同时达成的。最后,我们是自己文本的作者,所以应该对我们所选择的研究方法负责。正如莱斯·巴克在其研究导论中所言:"在本书里,我使用了各种文本策略来叙述诸多的'接触

区'（contact zones）……这构成了本书的焦点。这些策略包括引用、描述与独白。所有这些机制与观点都是经过调度才得以存在，我们应该以知识论的怀疑眼光来看待它们"（Back，1996：6）。

批判性与反身性书写：批评

倘若我们现在以不同的方式继续思考书写的问题，那么就意味着将书写视为一个透过各种不同模式所产生的文本。巴克指出女性主义、人类学与社会学中的"文学转向"（literary turn），此一转向"让我们以崭新洞见去看待影响文本生产的过程，而这里所生产的是以研究为基础的知识"（Back，1998：292），这也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因为这个主题处理了研究的不同阶段，且可以提供我们看待书写的洞见。巴克引用阿特金森的结论：

> 完全成熟的民族志研究，需要一种对于自身的书写、对于语言的可能性与局限性的反身性意识，也需要一种对于再现模式的原则性探讨。我们不仅需要培养建构民族志文本的自我意识，更需要准备好以一种较为"文学批判的"视野来阅读文本。社会学家与其学生必须养成阅读自己与他人论述的习惯，以培养自己的风格与修辞特性。（Atkinson，1990：180）

在此，我们清楚看到一个关于反身性书写的重要性的论点。我们身为研究的作者，应该了解自己在书写中所占据的位置，并意识到我们所使用的修辞与其他策略。这是一个寻找书写形式攸关的问题，此形式必须适合你自己的研究工作、研究策略以及你所希望呈现的资料种类。

空间的隐喻在思考整个复杂的研究实践时是非常实用的，而且有利于作出一些实际的区分，尤其是关于身为作者与研究者的我们，是如何穿梭在我们所建构的文本之中，以及各种叙事与声音是如何，又是以何种方式被引荐至研究中的，例如对话书写、多元观点、小品文、个案研究以及肖像画等方式。

在讨论民族志文本时，距离与在场的面向格外实用，正如克

利福德(Clifford)所观察的,有两种文本要素决定了人类学的权威:文本中第一人称的使用,因为这宣称着“我曾经在那里”,并将人类学家放在文本的中心位置上;以及压抑第一人称的发声,如此一来,文本的作者被视为是不在场的,因此就能建立起人类学家的科学权威。

第一个要素是指研究者在场的情况,就此而言,民族志者或研究者可宣称他们的有效性,也因此可以从一个权威的立场上发声,因为他们曾经出现在那儿。而文本则时常是以现在式书写,民族志者作为一个亲眼见证者,生产出一种经验性观点。

第二个要素称之为距离,亦即研究者不在场的情况,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研究,其中作者不表明自己的身份,而是与文本保持着客观的距离。此种文本是以第三人称的学术性、科学性风格来书写。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这最终将否定作者对于文本所应负起的责任,作者隐匿在客观性的屏幕背后,并暗示了文本的中立性。如此非反身性的模式产生了利兹·斯坦利所谓的非扎根或非在地性的知识。

思考民族志文本权威性的问题时,其解答是质疑民族志者与研究者在田野调查工作时所采取的方法,而另一个方法则是打破民族志文本,并揭露出他们所采取的修辞与文本策略。

一些人类学家已经开始解构文本与书写战术或民族志论文的修辞策略,詹姆斯·克利福德就是其中之一(Clifford and Marcus, 1986)。他认为,所谓的“民族志诗学”(poetics of ethnography)涵盖许多面向,包括语境、修辞、制度、种属、政治与历史。他指出,这些面向可以成为非常实用的分析类目。作为一个关键性的煽动者,克利福德主要的工作在于反思并质疑人类学的再现传统,并时常提及一种“民族志书写中的再现危机”。这些反思已经导致他们开始诉诸不同的书写形式,例如一种对话性的书写形式,其中“他者”在文本里也有平等的发声机会。

然而,许多人质疑这一潮流。举例而言,拉比诺即认为,这些后设反思可被视为是后现代转向的一部分。它们发生在学术政治里,而且渗透其中,学术政治里的人类学者不断对自己进行反思,他们不再待在帐篷,而是在校园的图书馆里进行考察工作。

同样地,斯特拉森也对安逸的交互方式及其背后动力有所批

判。她指出,实验家几乎都是男性,他们采取这种教养又乐观的模式来表达一种感性形式。和他们一样的文本激进分子致力于建立起各种关系,以证明他们研究工作里的关联性与开放性的重要性,并进一步达成共享与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因此权力与社会经济现实的限制反而变得模糊且未被处理。斯特拉森反而坚持不应该丧失根本差异、权力关系与阶级宰制的洞见,因此仍将有意义的差异视为是社会文化批判的重要价值。

在呈现研究时使用影像

照片的使用早已成为民族志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正如萨拉·平克所言,这些照片在传统上都被视为是民族志者曾经在场的“证据”(Pink, 2001)。在此种写实主义的模式中,影像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在传统上,照片被放入文本中以为它们自己发声,或是被放入民族志的描述领域里,仅仅是作为图说而存在。平克坚称,视觉影像的使用对于民族志研究而言,具有极大的潜力。然而,我们却需要思考影像的意图以及读者可能如何诠释这些影像。她同时也指出一些文本的例子,虽然这些例子并非传统的民族志研究,但是它们将影像用作表达个人观点的图片录,或是混合着文本一起使用,如此的使用方式可让读者将影像当作影像来诠释,而非将它们当作文本的附属品。约翰·伯杰与简·莫尔共事时,已持续地在他的研究中使用影像(Berger and Mohr, 1967, 1982)。摄影照片同时也可以基于不同的目的,提供不同种类的有用数据。乔·斯彭斯在从事有关自己身份认同的研究时,透过她家庭相簿中的影像数据,来探讨自己的历史与传记,并将这些影像数据与自我肖像画并置讨论(Spence, 1986)。就此而言,她采用了家庭档案以及她对于照片的反思,并将它们视为一种数据来源,同时透过这些数据发展出社会与文化分析。

在思考自己的文本时,你可以考虑的几个问题:

- 叙事:故事是如何被诉说的?文本中所采取的策略有哪些?
- 谁在说故事?我们听到谁的声音?
- 这些文本的对象是谁以及谁可以看到/读到这些文本?

实验性文本

显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丰富的书写文本!其中有些关注较为实务性的问题,但是其中有大部分,尤其是在人类学中的文本都意识到一种转换,也就是从认为语言(与研究文本)是对于被研究世界的"反映"(其中语言被视为是中立的),转而认为语言与文本本身是建构的,是由研究资料本身所建构出来的,形式皆有其意义。然而,哈默斯利与阿特金森(Atkinson,1993)曾经提出一个警告:我们必须始终如一地捍卫自己所使用的文本策略。因此,对于符码与研究书写惯例的实验与逾越,不能仅是简单地套用它们,而应该仔细地思考它们与研究主题之间的关系。举例而言,我们必须支持我们的宣称,而且我们的书写一定不能完全脱离由研究题材所衍生出来的外在指涉。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有必要将理论框架与经验数据连接起来,并提供读者足够的题材以评估我们的研究。

我们为谁而书写

巴克与普卢默主张,我们必须透过不同的书写方式,例如新闻写作,以将我们的研究推广出去。的确,我在本书中所谈论的研究种类,其中处理的议题与主题,都强烈吸引着大学图书馆外的人士。然而,许多文化研究文本并未说明这个广泛的关系。时常,在文本所使用的语言上,似乎存在着一种刻意的排外或甚至精英主义,这真的是一点也不合理。没有任何事能阻挡我们尝试

去寻找一种直接或可行的方式，来传达我们对于社会文化过程复杂性的洞见。毕竟，人们对于“故事”有种强烈喜好，也见证了以“平凡人”生活为内容的电视节目的成长，同时，那些与“真实生活”相关的书籍与杂志也兴盛不衰。这并非意味着我们都应该转而去生产一些“卖座的”文本——但是，何乐而不为呢？——相反地，大众对于我们在文化研究与社会学中的所作所为有极大的猜疑与误解，其中有些人对我们应该有比较正确的理解，而我们必须努力找到可以进入大众论述领域的方法，也就是应该多关注国家认同、大众广播、消费与消费者议题、青少年文化、流行文本等，并以非防卫性或模糊的方式来表现，但其中却是有些值得详加说明的东西。顺带一提，倘若我们没有任何需要对学术外人士说明的东西，那么，我真的认为我们应该要质疑，我们到底对自己的时代有什么贡献！

第10章 知识的来源与认识的方法

Sources of Knowledge and Ways of Knowing

本书的焦点一直集中在生活文化这个概念，以及我们如何发展出探索日常生活的方法。这样的一本书显然不可能做出任何的结论，但我还是希望本书可以启发并让研究者得以形构出他们的研究计划，并发展出适当且具反思性的探讨方法。在本章里，我想要从一些较为传统的研究路径（这些研究路径来自于各种学科领域）发展里，寻求它们的意涵并挑战这些路径，同时也将建议一些探讨文化研究的实证路径之新方法，并以较为适切的评判标准为依据。这必须要意识到知识宣称的不稳定性，也就是所谓的“再现的危机”，也必须认识到研究开始转向后结构与后现代的研究模式。实际的情形是，你必须将你的研究放在某个时期里，但在此时期中，现代主义与实用主义模式所证明的知识确定性却已经遭到质疑（Denzin，1997：45）。这些可能被视为是对于知识的“常识”路径，这些路径认为有一个可被认识的世界，而研究者可以借由特定观察方法来认识这个世界。正如邓金所指，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就这方面而言，社会科学与民族志变成了诸多“真实”形式中的一种（ibid.：45）。科学与科学论述或宣称科学真理的论述，如今开始遭到质疑，而且也不再拥有它们曾经占据的权威与主宰地位。

这些发生在学术内部的议题也呼应了全球各地的发展。在世界各地，确定性与疆界正遭受挑战与僭越。随着全球传播流通急剧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移动与迁徙，国家的疆界以及与文化、归属感较为相关的地理位置也开始产生转变与流动。就一个较为世俗的层面而言，文本的快速成长让我们很难区分“媒体”与“真

实”之间的差异,甚至根本不可能加以区分,因此,我们的“阅听人”概念已经严重面临媒体文本饱和的挑战。

我在本书中所采取的研究路径,是借由坚持探究文本与生活文化、自我与自传,以及探讨反身性与经验的重要概念,而得以为各种关系与身份认同的概念化方法奠定基石,其中也包括了研究者的身份认同,这或许较能适当地掌握当代世界的真实以及麦克罗比所谓的“文化中身份认同”的概念。

就我的观点而言,这涉及了建立起我们对于“身份认同”的了解,与第 2 章我们所讨论的主体化过程,同时也牵涉到必须重访女性主义观点的理论。同样地,根据洪宜安的论点,她强调我们的研究语境化的重要性(Ang,1996:66-81),并坚称在我们的研究实践中必定有“某些重要的东西”,即她所谓的“文化政治”(ibid.:78)。我们的研究以及研究所标示出的“可知空间”是偶然的,而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它们的历史特殊性,以及所要研究的对象为何。“文化政治”构成了我们对于偶然性的认识,其中关系到我们架构特定语境的方法,以及在研究中所彰显出来的问题为何。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如此激进的语境化过程为某些研究者带来了刻不容缓的问题,那些研究者要求的是概括性,同时他们针对代表性、有效性与可信度而立下的衡量标准,对于这些研究而言,已经渐渐地不适用了。

让我从某种吊诡的情况说起吧! 这个情况是指可能出现的疆界的转换、根性的丧失与流动等概念。有一种错置(dislocation)的概念脱离了较为传统的人类学所假定的“人与文化”模式,而指出空间与地方如今都可被质疑,并且无法以任何一种方式,连结至人与文化所位处的那些特定地点。然而,在要求一种激进的语境化过程时,洪宜安主张,比起那些可能以概括性为目标,或是以生产一种解释性的庞大叙事为目标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应该要更中庸而更具偶然性。在认知到“全球化”已经创造出一种跨全球性的传播连结时,其中隐含的危险是,研究者可能会试图要了解全球化的全貌,而非将自己定位在某个特定的地点,因而在没有任何立场之下发言。正如我在本书中所一再主张的,我们无法出现在每一个地方,也不能没有自己发言的立场,因此,我们必须在一开始时就将自己以及研究对象定位在研究调查与生产的特定

语境下。这是为了挑战“将理论自我呈现为一种无时间性或无地方性的普世性解释,这种解释将理论重新定位为一种具反思性、能自我矫正的诠释实践”(Code, 1995: 2,引自 Skeggs, 1997: 22)。但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宣称这是一个具正当性的研究活动,同时它也可以提供广义而非只是一个特定案例,因而在这个语境化的过程中,我们的确需要相当严谨的研究程序。

进一步而言,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关于认同与主体性的健全理论,并明确界定出我们所理解的“经验”的意义是什么,以及经验在整个研究中的地位。我们必须透露出自己身为研究者的立场,如此才能清楚立场论(standpoint theory)可能逐渐向本质主义靠拢的危险,更确切地说,我们应该将自己的立场视为是采取了特定观点,好让我们可以从中生产出暂时性的“情境化知识”。我们搜集研究题材的方法将能够产生叙事,对文本产生诠释以及能够诱导故事被诉说出来。于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就可以被视为是某个叙事的建构,而且这种叙事宣称它仅是“某种立场下的真理”(Ang, 1996: 78)。“我们的研究不仅告诉我们‘部分的真理’,它们同时也是(无论有无意识地)某种立场下的真理”(Abu-Loghod, 1991: 142,引自 Ang, 1996: 78)。

立场论

在第2章里,我简短地提及女性主义者的研究发展,他们质疑关于何谓知识建构的那些主张。学者们认为,知识来自于经验,甚至认为那些处于压迫接收端的人,特别能够接近关于受压迫者与压迫者的知识。对于将经验带入理论的发展以及观看世界的方式而言,这是极为重要的。经验产生知识的概念非常重要,但是正如史盖吉所指,这也可视为是女性主义论辩中,一个时代下的产物。在此种研究工作当中,我们亟需将女性经验放在中心位置,并试着证明女性的日常生活知识是有系统地被压抑的,而且被现存的社会科学范畴与方法论教义拒于门外。然而,“立场论”在许多观点上是有问题的:

1. 它假定身份认同是先于经验而“存在”,因此个人在本质上

就被认为是先于经验而存在的。

2. 特定的经验观点可能被视为优于其他观点。

3. 在以生产一个较好的真理为目标,并宣称可以产生一个较好的真理时,立场论仍旧是在"科学"的范畴下努力。

然而,我们可以从这些论辩所导致的、有关被压抑团体的重要研究工作中,了解到知识至少是部分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客观地看待世界,并宣称可以"完全认识"世界。女性主义者也彰显出知识的生产在根本上有种政治性的本质,他们并坚称,知识生产的过程及其生产关系都应该被彰显出来。透过"立场论"所产生的论辩,经验的范畴以及使用方法,开始成为备受瞩目的问题。当中所突显的问题是,显然经验在我们对于生活文化的理解上,仍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史盖吉对于经验的形构,在此是非常实用的。她并非将它视为真正知识的来源,也不认为它在我们拥有立场知识之前就必定存在,相反地,她认为经验"构成了我们最初的立场,以及某些立场的生产,但是它并未将我们固定在时间或空间上"(Skeggs, 1997: 27)。我们可以进一步将经验视为一种构连(articulation),一种主体性得以被建构而成的场域,如此一来,"经验'即是'主体性与理论建构的关键"(Skeggs, 1997: 27)。哈乐韦(Haraway, 1998)则提出"情境化知识"的概念,这个概念有助于理解研究者的立场和她所做的研究宣称,并进一步理解受访者提供给她的观点。于是,我们有了一些"立场",这些立场可能是那些研究者与不同受访者接触时所采取的立场,也可能是受访者自己的立场,在研究过程中,这些立场不可能固定不动,而是需要就其特定位置来理解。

主体性

形构研究过程本身的这个方法,即是将它视为生产"主体性"的过程。尼古拉斯·罗斯关于主体性的研究在此非常实用,他强调我们应该要"关注异质性,以及关注在不同实践中所采取的个人理想模式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Rose, 1996: 133)。因此,我们可以思考,在产生认同与主体性的实践中,关于不同论述

的构连情形。罗斯跟随着福柯的观点,他主张人们是被一种复杂的技术复合体所主导,这些技术形塑着自我,但同时也让主体在处于不同场景与不同身份时,能参与自我战术的部署。这让我们可以正视不同主体性之间时常是相互矛盾的本质,而且非常有助于理解人类如何透过特殊且偶然的方式,部署人类技术以响应所面临的机会。对罗斯而言,人类:

> 并非某种完全被主宰的王国(此种王国以它所梦想的方式来制造人)之下的统一主体,相反地,他们是生活在各种不同实践持续的变动中,这些实践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形塑着他们。在这些不同的实践里,人们被视为是各种不同的存在、被假定成各种不同的人类,并且被当成是各种不同的人类而各自采取行动。(Rose, 1996: 140-141)

借着采取罗斯的观点,我们可以着手分析人们所面对的不同机构与实践,并探究何种主体性是他们所乐见的,以及人们是如何援引各种不同的技术,例如语言的技术、言说与叙事的技术、行为举止的技术等。我在伯明翰城市的旅行就是个相当贴切的例子,我从主要的购物区开始逛,沿途的商店橱窗引诱我去观看、去尝试、去购买。我穿梭在街道、购物中心与百货公司之间,犹如一个消费的主体。当我走上山丘顶,远离明亮的店铺与商店时,我来到了"文明"中心,艺廊、博物馆与图书馆促使拥有权利与义务的称职公民去展现其行为举止与风度仪态。因此,我们被提供了一些位置,这些位置引发我们透过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甚至要我们去体现符合特定语境的某种主体的王国。当然,我们可以拒绝此种定位,但这是为了要强调某种它所主张的"理想"形式的存在。从一个历史的观点而言,罗斯主张一种"主体化的系谱学"(genealogy of subjectification),这可能会"朝向一种论点,探讨现代的'自我王国'是如何来自于……诸多偶然的……实践与过程"(Rose, 1996: 129)。卡罗琳·斯蒂德曼关于"书写自我"的观点(已于第6章中讨论过)与此密切相关。但是,在所有这些论述当中,经验在哪里?罗斯的研究鼓励我们去思考人们如何赋予经验意义,以及他们如何生产经验。因此,人类并非由经验生产而得,而是透过各种意义生产的机制,以及说故事、词汇、文化项目、符

码与惯例的采用等机制本身来生产经验。这些技术并非现成的，而是必须被启动的，并时常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场景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启动。这些即是罗斯所谓的主体化过程，这些过程包含了各种不同的过程与实践，“透过这些过程与实践，人们才能够以特定的主体种类建立起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对罗斯而言，主体化的过程拥有它自己的历史。重要的是，他并非透过这个词汇来暗示主体是被主宰与被压抑的客体，而是在主张，透过这个过程，主体被“设定成”特定的种类。就罗斯的观点而言，我们有可能将主体视为被治理、被规范化以及被主宰的，但同时也视之为透过主体化的过程所形构，它是偶然的，且时常是矛盾、不固定的。

此主体化的形构过程提供我们思考各种不同活动形式的机会，这些活动一般都定义为工作与休闲，亦即主体接触不同社会机构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主体以各种不同方式受到这些机构所形塑。举例而言，杜盖伊指出公司与企业组织是如何致力于培养所谓的“企业化主体”（enterprising subjects），此种主体是一种自主、自我规约、具生产力的个体（Miller and Rose，1990:1-31）。当西方的工作环境不断改变时，工作世界中的大型或小型组织都鼓励企业活动与创业活动的推行。因此，“自我管理”变成了关键，即“如何让自己保持在最佳状态”。对所有劳动者的建议是“为自己制订一个计划”，也就是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工作关系，并努力耕耘他们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以借此发展出一种“生活风格”，此种生活风格将能“让他们自己的生存价值提升到最高程度”（DuGay，1991：55）。在我自己目前的研究里，我正透过观察女性/阴性主体性在消费与企业文化的论述中，是如何被生产与处置的，以借此探索主体性的新形式。这是一个关于女性的研究，研究中的女性处于特定情境、生活世界、工作场合、全球资本等社会与历史的场景中，此研究将探讨阴性的主体形式在“市场”的动态环境中，可以如何被生产出来。

穿梭在日常生活之中

在第 7 章里,我们的焦点在于:试图了解"阅听人"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或者更广义而言,即流行文化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而在第 3 章里,我们指出了迷身份认同的转变及其无所不在的特质,同时也指出了菲斯克的宣称,他认为人们是在日常生活中,撷取自己所想要的流行文化。"日常生活是由流行文化的实践所构成,而且具有一种特性:当弱者拒绝屈服于消减个人权力(disempowering)的体系时,依然能具创造性地使用该体系所提供的资源"(Fiske, 1989: 47)。如此具有高度乌托邦色彩的流行文化权力概念,似乎忽视了决定论的概念或我们日常生活的限制。显然,我一直主张的论点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消费与文化使用中,我们是不断地被生产出来,也不断地将自己建构为主体,不断地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然而,因为我们是主动地参与这些日常生活的战术,所以这并非意味着,在"拒绝屈服于消权体系"的同时,我们才变得有权力。罗杰·西尔弗斯通将这个紧张关系理解为思考流行文化形式(对他而言尤指电视这个形式)及其使用的主要核心。他认为,这个"……强加赋予的意义与经过筛选的意义——受到控制的行为与自由的行为——无意义与有意义——被动与主动"之间的吊诡情形"是持续地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状态"(Silverstone, 1994: 164)。西尔弗斯通更进一步指出,这些紧张关系可以透过民族志的研究工作来追溯,但是他也坚称,这些研究"……必须坚实地扎根在实证与理论理解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因为正是在这个特殊的动态之中,我们才能去界定(即使不是全盘了解)结构之间的各种力量:即宰制与反抗的力量"(ibid.)。在现代的世界里,存在着许多关于"宰制与反抗力量中特殊动态"的绝佳例证,而现在我所要处理的就是这些例子。

散居研究

散居或移居研究所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而且这些研究也将来自于文化研究、人类学、社会学与地理学的学者拉拢在一起。对人类学者而言，这意味着去质疑某个根植于特定的国家或地理语境下地方与文化之间隐而不显的关系。散居与移居出现在所有文化中，是一种现代生活的事实，但有一些非常极端的例子是，许多逃离压迫政体的流亡者在不同的地方寻求庇护所。许多人主张，现代性早已建立在人口的移居之上，因为乡村的劳动者已移往发展中城市与工业城市以寻求工作机会。近年来，关于散居团体在全球各地（重新）建构他们的社群的研究，已经扩张了认同、社群与空间、地方等概念。

人类学家利萨·马尔基（Liisa Malkki）认为，这些研究所要求的是一种新的“移居社会学”或“游牧学”（nomadology）。她坚称，这不是要否定地方对于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性，而是要认知到地方、空间与认同并非本质性的，同时也要认知到那些时常被假定为身份认同的来源或根源的事物本身，也是不断在改变的。她援引何柏第在他关于加勒比音乐与文化认同研究中的一段话：“与其追溯他们的根源……他们的来源，我反而是尝试表现出这些根源本身是如何处于一种不断流动、不断改变的状态。这些根源并非停留在某一个地方……根本没有所谓的单一起源……但这并非意味着没有所谓的历史”（Hebdige，1987：10）。马尔基更进一步主张，去疆界化（deterritorialisation）与认同之间息息相关，“散居总是对另一个地方与时间留有共同记忆轨迹，并创造出欲望与情感归属的新地图”（Breckenridge and Appadurai，1989：引述于Malkki in Gupta and Ferguson，1997：72）。

马尔基坚称，我们都关注于“人们的各种归属感，这是他们透过生活在某些地方、对于这些地方的回忆以及想象所形塑出来的”（Malkki，1997：72）。如此关于人类学的反思不仅坚称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地方与空间（但只是将它们视为偶发情况），也主张我们应该关注居住在那些空间里的团体，视他们为尚处建构过

程当中的身份认同。

关于媒体使用的面向时常是了解身份认同与社群的主要关键,而且一些研究也反思这个面向的重要性。我们已经探讨过吉莱斯皮对于居住在伦敦西边郊区——南绍尔的旁遮普青少年的研究。

这些研究所要求的就是崭新的思考方式,尤其是有关传播、再现以及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跨国空间的媒体流动情形。纳菲希在《理解流放文化》中,研究在洛杉矶的伊朗电视节目的文化生产,其中她强调商业建置的重要性,因为它能够产生多元的媒体活动。透过电视与电影影像所建构的想象中的祖国,常常让散居社群可以在他们的新落脚之处拥有一种移居的想象关系。吉莱斯皮指出,在造访他们的"祖国"德里时,她研究中的一些青少年发现,德里反而比他们在南区的家还要更像伦敦。一个散居社群的建构的证据,主要是建立在对于一个"想象"家园的记忆上。其他较为近期的研究,像是寇斯尼克、艾柯索与罗宾斯的研究即是关于欧洲土耳其电视频道的快速成长,这使得土耳其散居社群得以收看来自"祖国"的电视节目(Kosnick, 2000; Aksoy and Robins, 2000)。罗宾斯与艾柯索问及这些媒体文化对于"认同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可以收看'来自祖国'的电视节目"而言,究竟代表着什么意义?(ibid.: 351)坎宁安与辛克莱所编的选集《漂浮的生命:媒体与亚洲散居族群》(Cunningham and Sinclair,2000)中指出,媒体与散居社群的文化活动,建构出他们所描述的"公领域"(public sphericules),但同时也指出,这些社群未必存在于"与'祖国'相关或来自于'祖国'的文本",举例而言,那些散居于悉尼环太平洋地区的斐济印度人,"造就了一股以消费以及北印度电影圈的庆典为主的活跃流行文化,同时也激发出与北印度电影圈相关的音乐、舞蹈与时尚文化"(Cunningham,2001: 144)。上述这些研究皆指出散居社群的复杂性,但却是透过在这些特定地方中的媒体文化的媒体文本、消费与日常生活来说明的。文化认同的问题对于理解这些生活文化而言,显然是非常关键的。他们同时也将"宏观"的理解(跨边界与跨国社群及认同的可能性)与个人及团体的在地实践结合起来。

为了要持续探索现代性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创新的方法论

策略，对许多人而言，这些即是指与移动能力、移动、转变的身份认同与移居等相关的策略。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关注国界内外之事，并关注于跨全球传播的复杂性，因为跨全球传播冲击并影响了那些在国家网络中产生的传播，以及那些文化/公领域中产生的多元结果。马尔基坚持人类学应该将文化与地方加以区分，这是为了要指明，倘若那些现存的学科研究程序想要捕捉到研究中生活与文化的任何“真实”面向，那么它们就需要被不断地重新检视。因此，方法论与方法必须意识到社会世界的变迁，更应该对经验有所警觉，尤其是那些质疑概念假定的经验。

批判性理解

现在，我想要回到效度的问题，并遵循邓金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上述主张，即我们需要新的标准来评估“源自于质性研究计划”的研究实践。邓金认为，内在效度、外在效度、可信度与客观性的标准，可以应用到那些采取正常认识论观点的研究中。这些研究假定“正常（the normal）是指在较多数的人口中最具代表性者，而这些‘正常’的人口即是最直接、最具概括性的”（Denzin，1997：7）。正如他所指，这种研究路径忽略了人口中的差异、争议与较为边缘的形式，甚至将这些视为是不存在的。

邓金指出，后现代民族志造就了一种对于特定场景中特定文化过程的特殊理解方式。“任何一种被研究的实践对象都具有其重要性，因为那是一个发生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里的文化实践实例”（ibid.：8）。无庸置疑的是，这些实践无法被概括化，他们唯一能做的是，主张这些实践是文化实践的最佳写照。这反而比较类似于本书第 3 章所讨论的理查德·约翰逊的“进入”（tapping in）论点。

随着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受到女性主义著作的影响，一直以来，民族志研究的重点皆在于强调主体性、情感、感觉、意义、欲望与幻想的重要性。作者也都意识到必须透过对话文本的发展来寻求赋权（empowerment）的形式，以及必须与受访者建立起信赖感。这里所提的其中一些特征会出现在文化研究里，且呼应并发

展出约翰逊所呼吁的、较具政治性的判断标准。同样地,邓金也认为,对这些民族志、质性研究而言,“效度”这个评估词汇已经不再适用了,而根据拉瑟(Lather, 1993)的观点认为,应改用“权威性”与“合法性”等词。他更进一步提出一些政治性标准,这些标准比较适合用于后结构研究之中。

政治性

在此,我们的议题将关注:文本、书写研究报告或论文是如何声称它们的权威性,同时也将试着理解权力与意识形态是如何运作于论述体系中,并问及文本是如何将诸如种族、阶级、性别、族裔、能力、年龄等面向交织进论述当中,以及如何镶嵌于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借用斯图尔特·霍尔的话:研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或以洪宜安的话:它的文化政治性为何?

真实性

邓金使用这个词汇来思考文本是如何试图“描绘真实”,这个词汇意识到书写是一种再现,而且“真实”的概念是被主动地建构进文本之中。那么,就何种程度而言,文本能够彰显出它的真理宣称?它是否将它的“真实性”视为是多元观点的以及暂时性的?这个标准极为重要,因为它认知到意义是必须经过抗争才能取得的,不仅是在文本建构、语言、论点之中进行抗争,也在读者与文本的交遇之中抗争。于是,重要的问题是:“谁的观点是真实的?”

我还要增加两个实用的评估标准,分别是对于受访者的尊敬与方法论所造成的结果。

尊重、中肯与反思

在本书里,我一直强调尊重受访者或研究参与者的重要性。这点应该反映在相关方法的讨论里,同时也反映在文本对于个人或集体观点的处理方式上。诠释的观点是否与被诉说的故事相关,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这些诠释对文本而言是恰当的?理论架构是否被中肯地运用或具实验性,以及诸如在我所列举的希拉里的例子里,这些理论架构是否因为严苛或自负的分析而威胁到受访者?以及,就什么程度而言,研究者能够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立

场、能够对他们的立场进行反思，并能够认知到他们研究的局限？

方法论的结果

最后让我们的焦点回到较为传统的学术标准上。赫米斯、康奈尔与巴克可能会主张，他们的研究与理论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但并非指概化性的面向（即这些情况可以应用到广泛的人口上），而是指批判性的理解面向，就赫米斯的例子而言，这种批判性理解可以用来探讨杂志的消费实践与过程；而就康奈尔的例子而言，则可以用来探讨建构阳刚特质的状况的转变；在巴克的例子里，批判性理解则可以用来探讨都市文化中族裔认同的斗争（Back，1996；Connell，1995；Hermes，1995）。此方法论的结果对于未来想要批判性地处理论点的研究者而言，相当有帮助，而且也让他们在思考自己的研究路径时，得以诚实地看待他们的研究实践。

我所建议的这些指针，对于那些规模较小的、由民族志所构成的、具批判性动机的、理论性的、具创新方法论的研究而言较为适当，我也已经在本书里提供许多相关例证。这些研究在一开始即表示，在整个研究中有哪些种类的问题会被提出来、这个研究的探索性本质及暂时性特质是什么，以及最适切的认识论是什么。这些评估标准虽然无法令人满意，但是我希望本书对于将来那些勇于实现这些指标的研究能有些微的贡献。



参考文献

Aksoy, A. and Robins, K. (2000) 'Thinking across spaces: transnational television from Turkey',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3 (3): 343-365.

Alasuutari, P. (1995) *Researching Culture: Qualitative Method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Alasuutari, P. (ed.) (1999) *Rethinking the Media Audience*. London: Sage.

Alexander, C. E. (2000) *The Asian Gang: Ethnicity, Identity, Masculinity*. Oxford: Berg.

Ang, I. (1985) *Watching Dallas: 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London: Methuen.

Ang, I. (1996) *Living Room Wars*. London: Routledge.

Atkinson, P. (1990) *The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 Textual Constructions of Reality*. London: Routledge.

Atkinson, P. (1992) 'The ethnography of a medical setting: reading, writing and rhetoric',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2 (4): 451-474.

Back, L. (1993) 'Gendered participation: masculinity and fieldwork in a south London adolescent community', in D. Bell, P. Caplan and W. J. Karim (eds), *Gendered Fields. Women, Men and Ethn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Back, L. (1996) *New Ethnicities and Urban Culture: Racisms and Multiculture in Young Lives*. London: UCL Press.

Back, L. (1998) 'Reading and writing research', in C. Seale (ed.), *Researching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pp. 285-296.

Barthes, R. (1972) *Mythologies*. London: Jonathan Cape.

Barthes, R. (1977) *Image-Music-Text*. Glasgow: Collins.

Bell, D., Caplan, P. and Karim, W. J. (eds) (1993) *Gendered Fields: Women, Men and Ethn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Benjamin, W. (1973) *Illuminations*. Glasgow: Collins.

Berger, J. and Mohr, J. (1967) *A Fortunate Man*. Cambridge: Granta Books.

Berger, J. and Mohr, J. (1982) *Another Way of Telling*. Cambridge: Granta Books.

Born, G. (2000) 'Inside television: television studies and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Screen*, 41 (4): 404-424.

Bourne, G. (2000) 'Inside television: television studies and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Screen*, 41 (4),404-424.

Breckenridge, C. and Appadurai, A. (1989) 'On moving targets', *Public Culture*, 2 (1) i-iv.

Bruno, G. (1989) untitled article. *Camera obscura*, 20/21, 28-40.

Brunsdon, C. (1981) '*Crossroads*: notes on soap opera', *Screen*, 22 (4): 52-57.

Brunsdon, C. (1989) 'Text and audience', in E. Seiter, H. Borchers, G. Kreutzner and E. Warth, *Remote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Brunsdon, C. (1993) 'Identity in feminist television criticism',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5

(2): 309-320.

Brunsdon, C. (1996) 'A thief in the night. Stories of feminism in the 1970s at CCCS', in D. Morley and K-H.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Brunsdon, C. (2000) *The Feminist, the Housewife, and the Soap Oper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runsdon, C. and Morley, D. (1978) *Everyday Television: 'Nationwid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Buckingham, D. (1987) *Public Secrets: 'EastEnders' and its Audienc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Buckingham, D. (1993) *Children Talking Television: The Making of Television Literacy*. London: Falmer.

Burgos-Debray, E. (1984) 'Introduction', in R. Menchu, *I Rigoberta Menchu*. London: Verso.

Butler, J. and Scott, J. W. (eds) (1992)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New York: Routledge.

Canclini, N. G. (1995) *Hybrid Cultur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anning, K. (1994) 'Feminist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historicizing discourse and experience',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9 (2): 368-404.

Cheesman, T. (1994) *The Shocking Ballad Picture Show: German Popular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History*. Oxford: Berg.

Chen, K.-H. (ed.) (1998) *Trajector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Clifford, J. and Marcus, G. E.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de, L. (1995) *Rhetorical Spaces: Essays on Gendered Locations*. London: Routledge.

Cohen, S. (1997) 'Symbols of trouble', in K. Gelder and S. Thornton (eds), *The Subcultur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Coles, R. (1997) *Doing Documentary W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mer, L. (1984) *Wedlocked Women*. Leeds: Feminist Books.

Connell, R. W. (1995) *Masculini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Couldry, N. (2000) *The Place of Media Power: Pilgrims and Witnesses of the Media Age*. London: Routledge.

Cruz, J. and Lewis, J. (1994) 'Reflections on the encoding/decoding model: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in J. Cruz and J. Lewis (eds), *Viewing, Reading, Listening: Audiences and Cultural Recep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Cruz, J. and Lewis, J. (eds) (1994) *Viewing, Reading, Listening: Audiences and Cultural Recep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Cunningham, S. and Sinclair, J. (eds) (2000) *Floating Lives: The Media and Asian Diasporas*. 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and Boulder, CO: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Cunningham, S. (2001) 'Popular media as public "sphericules" for diasporic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4 (2): 131-148.

Curran, J., Morley, D. and Walkerdine, V. (1996) *Cultural Studies and Communications*. London: Arnold.

Dawson, G. (1994) *Soldier Heroes: British Adventure, Empire and the Imagining of Masculinities*. London: Routledge.

De Certeau, M.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eem, R. (1986) *All Work and No Play? A Study of Women and Leisure*.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De Lauretis, T. (1984) *Alice Doesn't: Feminism, Semiotics, Cinema*. London: Routledge.

Denzin, N. K. (1992)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Cambridge, MA: Blackwell.

Denzin, N. K. (1997)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Ethnographic Practic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vault, M. L. (1990) 'Talking and listening from women's standpoint: feminist strategies for interviewing and analysis', *Social Problems*, 37:1.

Doane, M. A. (1989) untitled article. *Camera obscura*, 20/21, 142-147.

DuGay, P. (1991) 'Enterprise culture and the ideology of excellence', *New Formations*, 13: 45-61.

DuGay, P. (1996) *Consumption and Identity at Work*. London: Sage.

DuGay, P., Hall, S., Janes, L., Mackay, H. and Negus, K. (1997) *Doing Cultural Studies: The Story of the Walkman*. London: Sage/Open University.

During, S. (1993)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Dyer, R. (1977) '*Victim*: hermeneutic project', in *Film Form*, 1 (2) Autumn.

Dyer, R. (1997) *White*. London: Routledge.

Dyer, R., Geraghty, C., Jordan, J., Lovell, T., Paterson, R. and Stewart, 1. (eds) (1981) *Coronation Street*.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Fischer, M. D. (1994) *Applications in Computing for Social Anthropologists*. London: Routledge.

Fiske, J. (1989) 'Moments of television: neither the text nor the audience', in E. Seiter, H. Borchers, G. Kreutzner and E. Warth (eds), *Remote Control: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Power*. London: Routledge. pp. 56-68.

Fiske, J. (1996) 'Down under cultural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10 (2): 369-374.

Fornas, J., Lindberg, U. and Sernhede, O. (1995) In *Garageland: Rock, Youth and 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Frankenberg, R. (1993) *White Women, Race Matter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iteness*. London: Routledge.

Gavron, H. (1968) *The Captive Wife: Conflicts of Housebound Mothers*. Harmondsworth: Penguin.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Gelder, K. and Thornton, S. (eds) (1997) *The Subcultur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Gill, R. (2000) 'Discourse analysis: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in J. T. E.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Psych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eicester: BPS Books.

Gillespie, M. (1989)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audio-visual culture among south Asian families in west London', *Cultural Studies*, 3: 2.

Gillespie, M. (1995) *Television, Ethnicity and Cultur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Gilroy, P. (1996)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pitfalls of identity', in J. Curran, D. Morley. and V. Walkerdine, *Cultural Studies and Communications*. London: Arnold. pp. 35-49.

Glaser, B. G. and Strauss, A.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Chicago: Aldine.

Goffman, E. (1972) *Encounters: Two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Interaction*. London: Allen Lane.

Graham, H. (1984) *Women, Health and the Family*. Brighton: Wheatsheaf.

Gray, A. (1992) *Video Playtime: The Gendering of a Leisure Technology*. London: Routledge.

Gray, A. (1995) 'I want to tell you a story: the narratives of *Video Playtime*', in B. Skeggs (ed.), *Feminist Cultural Theory: Process and Produc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Gray, A. (1997)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cultural studies and feminism', in J. McGuigan (ed.), *Cultural Methodologies*. London: Sage.

Gray, A. (2001) 'Jobs for the girls: women, consumption and the enterprising self', Anglo*Saxonica* Serie Ⅱ 14/15, Lisbon: University of Lisbon. pp. 123-142.

Gray, A. and McGuigan, J. (1993 and 1995) *Studying Culture: An Introductory Reader*. London: Edward Arnold.

Green, M. (1997) 'Working practices', in J. McGuigan (ed.), *Cultural Methodologies*. London: Sage.

Grossberg, L., Nelson, C. and Treichler, P. (eds) (1992)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Guba, E. G. (1990) *The Paradigm Dialogue*.

Gupta, A. and Ferguson, J. (eds) (1997) *Culture, Power, Place: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Hall, S. (1980) 'Encoding/decoding', in S. Hall, D. Hobson, A. Lowe and P. Willis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Hall, S. (1987) 'Minimal selves', in *The Real Me: Post-modernism and the Question of Identity*. ICA Documents 6. London: ICA.

Hall, S. (1992)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in L. Grossberg, C. Nelson, and P. 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Hall, S., Critcher, C., Jefferson, T., Clarke, J, and Roberts. B.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London: Macmillan.

Hall, S. and DuGay, P. (eds) (1996)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Hall, S., Hobson, D., Lowe, A. and Willis, P. (eds) (1980)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Hammersley, M. and Atkinson, P. (1993) *Ethnography: Principles in Practice*.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Hanson, S., Bhattacharyya, G. and Gray, A. (2000) *Placing Yourself in the Community: Workbook* 3. Birmingham: CoBaLT 2000,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Haraway, D. (1988) 'Situated knowledge: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14: 575-599.

Haraway, D. (1990)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in L. Nicholson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pp. 190-233.

Harding, S. (1986)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Harding, S. (ed.) (1987)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Harding, S. (1991)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Hebdige, D. (1979)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Routledge.

Hebdige, D. (1987) *Cut'n' Mix*. London: Methuen.

Hermes, J, (1995) *Reading Women's Magazin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ill-Collins, P. (1990)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London: Routledge.

Hobson, D. (1978) 'Housewives: isolation as oppression', in Women's Studies Group CCCS, *Women Take Issue: Aspects of Women's Subordination*. London: Hutchinson.

Hobson, D. (1980) 'Housewives and the mass media', in S. Hall, D. Hobson, A. Lowe, and P. Willis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Hobson, D. (1982) *Crossroads: The Drama of a Soap Opera*. London: Methuen.

Hodkinson, P. (2001) 'Subculture as substance: the identities, values, practices and infrastructure of the goth scene'.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Hodkinson, P. (2002) *Goth: Identity, Style and Subculture*. Oxford: Berg.

Hoggart, R. (1957) *The Uses of Literac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Hollway, W. (1989) *Subjectivity and Method in Psychology: Gender, Meaning and Science*. London: Sage.

Holstein, J. A. and Gubrium, J. F. (1997) 'Active interviewing',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Hunt, J. (1989) *Psychoanalytic Aspects of Fieldwork*. Newbury Park, CA: Sage.

Jefferson, T. (ed.) (1976)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London: Hutchinson.

Jenkins, H. (1992) *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Johnson, R. (1997) 'Reinventing cultural studies: remembering for the best version', in E. Long, *From Sociology to Cultural Studies: New Perspectives*. Malden, MA: Blackwell.

Jones, S. (1988) *Black Culture, White Youth: The Reggae Tradition from JA to UK*. London: Macmillan.

Junker, B. (1960) *Field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auffman, B. J, (1992) 'Feminist facts: interview strategies and political subjects in ethnography', *Communication Theory*, 2 (3): 187-206.

Knorr-Cetina, K. D. (1981) 'The micro-sociological challenge of macro-sociology: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K. Knorr-Cetina and A. V. Cicourel (eds), *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Micro-and Macro-sociologies*.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Kosnick, K (2000) Building bridges: media for migrants and the public service mission in Germany',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3 (3): 319-342.

Kuhn, A. (1995) *Family Secrets: Acts of Memory and Imagination*. London: Verso.

Lather, P. (1993) 'Fertile obsession: validity after poststructuralism',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673-694.

Leal, O. F. (1990) 'Popular taste and erudite repertoire: the place and space of television in Brazil', *Cultural Studies*, 4 (1): 19-28.

Lefebvre, H. (1990)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Lewis, L. A. (ed.) (1992) *The Adoring Audience: 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 London: Routledge,

Liebes, T. and Katz, E. (1993) *The Export of Meaning: Cross-cultural Readings of 'Dalla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Lofland, J. (1971) *Analysing Social Setting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Belmont, CA: Wadsworth.

Long, E. (ed.) (1997) *From Sociology to Cultural Studies: New Perspectives*. Malden, MA: Blackwell.

Lull, J. (1990) *Inside Family Viewing: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 Television's Audiences*. London: Routledge.

Malkki, L. (1997) 'National Geographic: the rooting of peoples and the territorializ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scholars and refugees', in A. Gupta and J. Ferguson (eds), *Culture, Power, Place: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Mankekar, P. (1999) *Screening Culture, Viewing Politics: An Ethnography of Television, Womanhood, and Nation in Postcolonial Indi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Marcus, G. E. and Fisher, M. M. J.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rtin-Barbero, J. (1993)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Hegemony*. London: Sage.

Maynard, M. and Purvis, J. (eds) (1994) *Researching Live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McGuigan, J. (ed.) (1997) *Cultural Methodologies*. London: Sage.

McRobbie, A. (1978) 'Working class girls and the culture of femininity', in Women's Studies Group CCCS, *Women Take Issue: Aspects of Women's Subordination*. London: Hutchinson.

McRobbie, A. (1982) 'The politics of feminist research: between talk, text and action', *Feminist Review*, 12,46-57.

McRobbie, A. (1992) 'Post-Marx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a post-script', in L. Grossberg, C. Nelson and P. 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McRobbie, A. (ed.) (1997) *Back to Reality? Social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Studi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cRobbie, A. (1998) *British Fashion Design: Rag Trade or Image Industry?* London: Routledge.

Meijer, I. C. (2001) 'The colour of soap opera: an analysis of professional speech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ethnicity',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4 (2): 207-230.

Menchu, R. (1984) *I Rigoberta Menchu*. London: Verso.

Miller, P. and Rose, N. (1990) 'Governing economic life', *Economy and Society*, 19: 1-31.

Mills, C. W.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Modleski, T. (1982) *Loving with a Vengeance: Mass-Produced Fantasies for Women*. Hamden, CT: Shoestring Press.

Modleski, T. (1983) 'The rhythm of reception: daytime television and women's work', in E. A. Kaplan (ed.), *Regarding Television: Critical Approaches-An Anthology*. Los Angeles: American Film Institute.

Moores, S. (1996) *Satellite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Articulating Technology*. Luton: University of Luton Press.

Morley, D. (1980)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Morley, D. (1986) *Family Television: 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 London: Comedia.

Morley, D. (1992)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Morley, D. (2000) *Home Territories. Media, Mobility and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Morley, D. and Chen, K.-H. (eds) (1996)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Morris, M. (1997) 'A question of cultural studies', in A. McRobbie (ed.), *Back to Reality? Social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Studi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yerhoff, B. (1988) 'Surviving stories: reflections on number our days', in J. Kugelmas, (ed.), *Between Two Worlds: Ethnographic Essays on American Jew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yrdal, G. (1969) *Objectivity and Social Research*. London: Duckworth.

Naficy, H. (1993) *The Making of Exile Cultures: Iranian Television in Los Angel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Neale, S. (1981) 'Genre and cinema', in T. Bennett, S. Boyd Bowman, C. Mercer and J. Woollacott (eds) *Culture, Ideology and Social Process*.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Nixon, S. (1996) *Hard Looks: Masculinities, Spectatorship and Contemporary Consumption*. London: UCL Press.

Paget, M. A. (1983)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Human Studies*, 6: 67-90.

Penacchioni. I. (1984) 'The reception of popular television in Northeast Brazil',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6: 337-341.

Pink, S. (2000) *Doing Visual Ethnography*. London: Sage.

Plummer, K. (1995) *Telling Sexual Stories: Power, Change and Social Worlds*. London: Routledge.

Plummer, K. (2001) *Documents of Lift 2: An Invitation to a Critical Humanism*. London: Sage.

Potter, J. (2000)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es: theoretical background', in Richardson, J. T. E. (ed.),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Psych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eicester: BPS Books.

Probyn, E. (1993) *Sexing the Self: Gendered Position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Propp, V. (1968) *Morphology of the Folk Tale*.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Pursehouse, M. (1989) 'Reading the *Sun*: conflicts in the popular', unpublished M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Rabinow, P. (1986) 'Representations are social facts: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in anthropology', in J. Clifford and G. E. Marcuse (eds) *Writing Culture*. Berkeley, CA: Univer-

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adway, J. (1988) 'The Book-of-the-Month Club and the general reader: on the uses of "serious" fiction', *Critical Inquiry*, 14 (Spring), 516-538.

Radway, J. (1989) 'Ethnography among elites: comparing discourses of powe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3 (2): 3-11.

Radway, J. A. (1984)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Radway, J. A. (1987) *Reading the Romance*. London: Verso.

Richardson, J. T. E. (ed.) (2000)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Psych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eicester: BPS Books.

Riis, J. A. (1971)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New York: Dover (first published 1890).

Roberts, H. (ed.) (1981) *Doing Feminist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Rose, G. (2001) *Visual Methodologi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Materials*. London: Sage.

Rose, N. (1996) 'Identity, genealogy, history', in S. Hall and P. du Gay,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Said, E. W. (1978) *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Schlesinger, P. (1978) *Putting Reality Together: BBC News*. London: Constable.

Scott, J. W. (1992) 'Experience', in J. Butler and J. W. Scott (eds),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New York: Routledge.

Seal, C. (ed) (1998) *Researching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Seiter, E. (1990) 'Making distinctions in audience research', *Cultural Studies*, 4 (1): 61-84.

Seiter, E., Borchers, H., Kreutzner, G. and Warth, E. (eds) (1989) *Remote Control: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Power*. London: Routledge.

Silverman, D. (ed.) (1997)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Silverstone, R. (1994)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Skeggs, B. (1994) 'Situating the production of feminist ethnography'. In M. Maynard and J. Purvis (eds) *Researching Live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Skeggs, B. (ed.) (1995) *Feminist Cultural Theory: Process and Produc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Skeggs, B. (1997) *Formations of Class and Gender*. London: Sage.

Slack, J. D. (1996)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articulation in cultural studies', in D. Morley and K-H.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Song, M. and Parker, D. (1995) 'Commonality, difference and the dynamics of disclosure in in-depth interviewing', *Sociology*, 29 (2), 241-256.

Spence, J. (1986) *Putting Myself in the Picture: A Political, Personal and Photographic Autobiography*. London: Camden Press.

Spivak, G. (1987)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Stacey, J. (1994) *Star Gazing; Hollywood Cinema and Female Spectatorship*. London: Routledge.

Stake, R. E. (1995) *The Art of Case Study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Stanley, L. (ed.) (1990) *Feminist Praxis: Research, Theory and Epistemology in Feminist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Stanley, L. and Wise, S. (1993) *Breaking Out Again: Feminist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London: Routledge.

Steedman, C. (1986) *Landscape for a Good Woman: A Story of Two Lives*. London: Virago.

Steedman, C. (1997) 'Writing the self: the end of the scholarship girl', in J. McGuigan (ed.) *Cultural Methodologies*. London: Sage.

Strathern, M. (1999) *Property, Substance and Effect: Anthropological Essays on Persons and*

Things.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Summerfield, P. (1998) *Reconstructing Women's Wartime Liv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Tagg, J. (1988) *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Essays on Photographies and Histories*. Basingstoke: Macmillan.
Terkel, S. (1978) *Talking to Myself: A Memoir of My Times*. New York: Pocket Books.
Tesch, R. (1990) *Qualitative Research: Analysis, Types and Software Tools*. London: Falmer.
Thomas, W. I. and Znaniecki, F. (1958)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Thornton, S. (1995) *Club Cultures: Music, Media and Subcultural Capita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Ticknell, E. and Raghuram. P. (2002) *Big Brother*. reconfiguring the "active" audi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5 (2).
Tolson, A. (1990) 'Social surveillance and subjectification: the emergence of "subculture" in the work of Henry Mayhew', in *Cultural Studies*, 4 : 2. 113-127.
Tudor, A. (1999) *Decoding Culture Theory and Method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Tufte, T. (2000) *Living with the Rubbish Queen: Telenovelas,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Brazil*. Luton: University of Luton Press.
Turkle, S. (1995)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London: Phoenix.
Van Zoonen, L. (1998) 'A professional, unreliable, heroic marionette (m/f): structure, agency and subjectivity in contemporary journalisms',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 (1) 123-145.
Walkerdine, V. (1986) 'Video replay: families, films and fantasy', in V. Burgin, J. Donal and C. Kaplen (eds) *Formations of Fantasy*. London: Methuen.
Walkerdine, V. (1997) *Daddy's Girl: Young Girls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Macmillan.
Walkerdine, V. and Lucey, H. (1989) *Democracy in the Kitchen: Regulating Mothers and Socialising Daughters*. London: Virago.
Whyte, W. F. (1943) *Street Corner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lliams, R. (1958)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Williams, R. (1961)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Williams, R. (1979) *Politics and Letters*. London: Verso.
Williams. R. (1981) *Culture*. Glasgow: Collins.
Williamson, J. (1978) *Decoding Advertisements*. London: Marion Boyars.
Willis, P. (1980) 'Notes on method', in S. Hall, D. Hobson, A. Lowe and P. Willis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Willis, P. E. (1977) *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Aldershot: Gower.
Willis, P. E. (1981) *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illis, P. E. (1997) 'Theoretical confessions and reflexive method', in K. Gelder and S. Thornton (eds), *The Subcultur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Winship, J. (1987) *Inside Women's Magazines*. London: Pandora.
Women's Studies Group CCCS (1978) *Women Take Issue: Aspects of Women's Subordination*. London: Hutchinson.
Znaniecki, F. (1934) *The Method of Sociology*. 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专有名称汉英对照表

人名汉英对照表(以首汉字拼音为序)

阿彻　Archer
阿尔都塞　Althusser
阿克希尔·古普塔　Akhil Gupta
阿特金森　Atkinson
埃金顿　Edginton
埃里克森　Erickson
埃伦·塞特　Ellen Seiter
艾柯索　Aksoy
艾琳·科斯塔·梅杰　Irene Costa Meijer
艾琳·梅杰　Irene Meijer
艾琳·潘纳奇欧尼　Irene Penacchioni
爱德华·赛德　Edward Said
安德鲁·托尔森　Andrew Tolson
安德森　Anderson
安杰拉·麦克罗比　Angela McRobbie
安妮塔·布鲁克纳　Anita Brookner
安·格雷　Ann Gray
昂迪纳·法什尔·利尔　Ondina Fachel Leal
奥韦·舍海德　Ove Sernhede
巴克　Back
巴特　Barthes
芭芭拉·泰勒·布拉德福德　Barbara Taylor Bradford
白金汉　Buckingham
保罗·吉洛伊　Paul Gilroy
鲍勃·康奈尔　Bob Connell
鲍尔·阿特金森　Paul Atkinson
鲍尔·杜盖伊　Paul du Gay
鲍尔·霍金林　Paul Hodkinson
鲍尔·威利斯　Paul Willis
贝弗利·史盖吉　Beverley Skeggs

贝丝·埃金顿 Beth Edginton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波特 Potter
伯恩 Bourne
伯格斯迪博莱 Burgos-Debray
伯杰 Berger
博恩 Born
布迪厄 Bourdieu
布拉德福德 Bradford
布鲁克纳 Brookner
布鲁诺 Bruno
布鲁丝顿 Brunsdon
布鲁斯顿 Brunsdon
C·赖特·米尔斯 C Wright Mills
戴尔 Dyer
戴维·白金汉 David Buckingham
戴维·莫利 David Morley
戴维·帕克 David Parker
道森 Dawson
德拉布尔 Drabble
邓金 Denzin
狄塞托 de Certeau
迪佛特 Devault
蒂克纳尔 Ticknell
杜盖伊 DuGay
多恩 Doane
多萝西·霍布森 Dorothy Hobson
范佐南 van Zoonen
菲斯克 Fiske
费希尔 Fischer
佛纳斯 Fornas
弗格森 Ferguson
弗拉迪米尔·普洛普 Vladimir Proopp
弗兰克·韦伯斯特 Frank Webster
弗兰肯伯格 Frankenberg
盖布莱恩 Gubrium
甘力尼 Canclini

格尔茨　Geertz
格拉泽　Glaser
格兰西　Gramsci
格雷　Gray
格雷厄姆·道森　Graham Dawson
格里纳姆康芒　Greenham Common
格林　Green
格罗斯博格　Grossberg
葛拉斯顿伯里　Glastonbury
古普塔　Gupta
哈丁　Harding
哈乐韦　Haraway
哈默斯里　Hammersley
海伦·卢西　Helen Lucey
汉森　Hanson
何伯第　Hebdige
赫米斯　Hermes
黑兹尔·卡比　Hazel Carby
亨利·勒费布尔　Henri Lefebvre
亨利·梅休　Henry Mayhew
亨利·詹金斯　Henry Jenkins
洪宜安　Ang
怀特　Whyte
霍布森　Hobson
霍尔　Hall
霍尔斯坦　Holstein
霍尔韦　Hollway
霍格特　Hoggart
霍金林　Hodkinson
吉莱斯皮　Gillespie
吉利娜·布鲁诺　Guiliana Bruno
吉洛伊　Gilroy
贾尼丝·罗德葳　Janice Radway
简·坎贝尔　Jan Campbell
简·莫尔　Jan Mohr
杰弗里·阿彻　Jeffrey Archer
杰姬·斯泰西　Jackie Stacey

洁尔 Gill
卡比 Carby
卡茨 Katz
卡罗琳·斯蒂德曼 Carolyn Steedman
凯瑟琳 Kathleen Canning
凯特 Kate
坎贝尔 Campbell
坎宁安 Cunningham
康尔德里 Couldry
康奈尔 Connell
科恩 Cohen
科尔斯 Coles
克莱尔·亚历山大 Claire Alexander
克利福德 Clifford
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肯·普卢默 Ken Plummer
寇斯尼克 Kosnick
拉比诺 Rabinow
拉古拉姆 Raghuram
拉克劳 Laclau
拉里·罗斯伯格 Larry Grossberg
莱斯·巴克 Les Back
劳拉 Lorrah
劳拉帝丝 de Lauretis
劳伦斯·格罗斯博格 Lawrence Grossberg
勒费布尔 Lefebvre
雷蒙德·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里斯 Riis
理查德·霍格特 Richard Hoggart
理查德·约翰逊 Richard Johnson
理查德·戴尔 Richard Dyer
利布斯 Liebes
利尔 Leal
利萨·马尔基 Liisa Malkki
利斯伯特·范佐南 Liesbet van Zoonen
利兹 Liz
列维-斯特劳斯 Lévi-Strauss

林德伯格 Lindberg
卢西 Lucey
露丝·弗兰肯伯格 Ruth Frankenberg
罗宾斯 Robins
罗伯特·科尔斯 Robert Coles
罗伯特·斯特克 Robert Stake
罗德葳 Radway
罗杰·西尔弗斯通 Roger Silverstone
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罗丝·洁尔 Ros Gill
罗斯 Rose
罗斯伯格 Grossberg
马丁-巴贝罗 Martin-Berbero
马克·埃里克森 Mark Erickson
马克·珀斯浩斯 Mark Pursehouse
马库斯 Marcus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 Margaret Drabble
玛丽莲·斯特拉森 Marilyn Strathern
玛丽·安·多恩 Mary Ann Doane
玛丽·吉莱斯皮 Marie Gillespie
玛乔丽·迪佛特 Marjorie Devault
迈克尔·格林 Michael Green
麦克罗比 McRobbie
曼凯卡 Mankekar
曼祖 Menchu
梅杰 Meijer
梅杰霍夫 Myerhoff
梅休 Mayhew
马尔基 Malkki
米达尔 Myrdal
米尔斯 Mills
米根·莫里斯 Meaghan Morris
米里·桑 Miri Song
米歇尔·狄塞托 Michel de Certeau
莫蒂默 Mortimer
莫尔 Mohr
莫里斯 Morris

莫利 Morley
穆尔斯 Moores
纳诺尔-赛蒂娜 Knorr-Cetina
纳菲希 Naficy
尼尔 Neale
尼古拉斯·罗斯 Nikolas Rose
尼克·格雷 Nick Gray
尼克·康尔德里 Nick Couldry
诺厄 Noah
帕克 Parker
帕马 Parmar
潘纳奇欧尼 Penacchioni
佩吉特 Paget
彭妮·萨默菲尔德 Penny Summerfield
皮特尔 Pieter
平克 Pink
珀尼马·曼凯卡 Purnima Mankekar
珀斯浩斯 Pursehouse
普拉蒂巴·帕马 Pratibha Parmar
普卢默 Plummer
普罗宾 Probyn
普洛普 Proopp
乔克·赫米斯 Joke Hermes
乔治娜·伯恩 Georgina Bourne
乔治娜·博恩 Georgina Born
乔·斯彭斯 Jo Spence
琼·劳拉 Jean Lorrah
琼·斯科特 Joan Scott
瑞葛蓓塔·曼祖 Rigoberta Menchu
萨拉·平克 Sarah Pink
萨拉·桑顿 Sarah Thornton
萨默菲尔德 Summerfield
萨夏 Sacha
塞特 Seiter
赛德 Said
桑 Song
桑德拉·哈丁 Sandra Harding

桑顿 Thornton
舍海德 Sernhede
施莱辛格 Schlesinger
史盖吉 Skeggs
斯蒂德曼 Steedman
斯科特 Scott
斯彭斯 Spence
斯皮瓦克 Spivak
斯塔兹·特克尔 Studs Terkel
斯泰西 Stacey
斯坦利·科恩 Stanley Cohen
斯特克 Stake
斯特拉森 Strathern
斯图尔特·汉森 Stuart Hanson
斯图尔特·霍尔 Stuart Hall
塔夫特 Tufte
唐纳·哈乐韦 Donna Haraway
特克尔 Terkel
特寇 Turkle
托尔森 Tolson
托马斯·塔夫特 Thomas Tufte
托姆·夏普 Tome Sharpe
瓦莱丽·沃克丁 Valerie Walkerdine
威利斯 Willis
威廉斯 Williams
韦伯斯特 Webster
韦斯雷尔 Wetherell
温迪·霍尔韦 Wendy Hollway
沃克丁 Walkerdine
乌尔夫·林德伯格 Ulf Lindberg
西尔弗斯通 Silverstone
夏洛特·布鲁斯顿 Charlotte Brunsdon
夏普 Sharpe
肖恩·穆尔斯 Sean Moores
谢里·特寇 Sherry Turkle
辛克莱 Sinclair
雅各布·里斯 Jacob Riis

亚拉苏塔立 Alasuutari 亚历山大 Alexander
伊恩·安 Ien Ang
伊丽莎白·伯格斯迪博莱 Elisabeth Burgos – Debray
伊丽莎白·普罗宾 Elspeth Probyn
约翰逊 Johnson
约翰·伯杰 John Berger
约翰·菲斯克 John Fiske
约翰·佛纳斯 John Fornas
约翰·莫蒂默 John Mortimer
詹金斯 Jenkins
詹姆斯·弗格森 James Ferguson
詹姆斯·克利福德 James Clifford
珍妮特 Janet

作品名称汉英对照表(以首汉字拼音为序)

拜金女郎 Material Girl
朝代 Dynasty
迟来的乐园 Paradise Postponed
出类拔萃 First Among Equals
从事记录工作 Doing Documentary Work
大哥大 Big Brother
帝国反击:70 年代英国的种族与种族主义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Race and Racism in 70s Britain
电视、族裔与文化变迁 Television, Ethnicity and Cultural Change
东区居民 East Enders
工人阶级女孩与女性文化 Working Class Girls and the Culture of Feminity
工人阶级文化 Working Class Culture
豪门恩怨 Watching Dallas
加冕街 Coronation Street
家庭电视 Family Television
监控危机 Policing the Crisis
阶级与性别的形构 Formations of Class and Gender
街角社会 Street Corner Society
解读罗曼史 Reading the Romance
解读女性杂志与阳刚特质 Reading Women's Magazines and Masculinities
举国上下 Nationwide
理解流放文化 the Making of Exile Cultures

另一半人们的生活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笼罩大地 Blott on the Landscape
录像带娱乐时间 Video Playtime
伦敦晨报 London Morning Chronicle
伦敦劳工与伦敦穷人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论知识分子技艺 on Intellectual Cartmanship
洛基 Rocky
漫长的革命 the Long Revolution
女性议题 Women Take Issue
女性主义研究的政治:在言说、文本与行动之间 the Politics of Feminist Research: Between Talk, Text and Action
漂浮的生命:媒体与亚洲散居族群 Floating Lives: the Media and Asian Diasporas
社会学的想象力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神话学 Mythologies
生活纪实 2 Documents of Life 2
十字路口 Grossroads
识字断文的用途 Uses of Literacy
受害者 Victim
说性的故事 Telling Sexual Stories
文化分析模式 Mode of Cultural Analysis
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文化与社会 Culture and Society
写信给布利兹涅夫 Letter to Brezhnev
新族群性与都市文化 New Ethnicities and Urban Culture
星舰奇航 Star Trek
学会劳动 Learning to Labour
学习劳动:工人阶级小孩如何获得工人阶级的工作 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亚洲帮派 the Asian Gang
阳刚特质 Masculinities
鹰冠庄园 Falcon Grest
在车库之地 in Garageland
造就一个好女性的景观 Landscape for a Good Woman
蜘蛛女 the Spiderwoman
主体性与心理学方法 Subjectivity and Method in Psychology
最少的自我 Minimal Selves

机构名对照表(以首汉字拼音为序)

澳大利亚研究奖助委员会	Australian Research Grants Committee
博姿	Boots
大众记忆团体	Popular Memory Group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CCCS
杜达山电视台	Doordarshan
哈勒根出版社	Harlequin Press
监督委员会	Wastewatch Committee
每月一书俱乐部	the Book of the Month Club
米尔斯与布恩出版社	Mills and Boon Press
太阳报	Sun 英国广播公司BBC
英国全国前卫党	British National Front Party
自由国家党派	Liberal and National Parties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与生活文化
作者＝
页数＝２４７
ＳＳ号＝１２１８８４８５
ＤＸ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